

Geschichte der Gestapo

盖世太保史

[法]雅克·德拉律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盖世太保史

〔法〕雅克·德拉律 著

黄林发 萧 弘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Jacques Delarue
GESCHICHTE DER GESTAPO

根据 Hans Steinsdorff 的德译本
“Geschichte der Gestapo”
(Athenäum-Verlag, 1979) 转译

盖世太保史

〔法〕雅克·德拉律 著

黄林发 萧弘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5.75 字数 300,000

1984 年 10 月第 1 版 198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3,000 册

书号：11188·35 定价：1.45 元

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雅克·德拉律是法国有名的自由撰稿作家。他生于一九一九年，曾长期担任法国警官，一九五三年起从事写作工作。

本书出版于一九六四年，并于同年由德国翻译家汉斯·施泰因斯多夫译成德语，之后又被译成数国语言相继出版，成为研究德国现代史的不可缺少的史料之一。

本书专门记述了从希特勒上台到德国法西斯崩溃这十二年的历史，重点写当时德国国家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历史的全过程。此外，作者还用大量的历史论著、档案文献以及他个人的亲身感受揭露了纳粹各个组织之间明争暗斗、尔虞我诈的种种丑行。由于本书作者曾长期担任法国警务工作，因而所选择的史料十分丰富，既有当时德国战犯的口供笔录，又有许多目睹者的铁证材料。对研究德国现代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尤其对研究盖世太保的来龙去脉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译本第一至第五部和附录由黄林发翻译，第六部由萧弘翻译。个别处略有删节。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译文有不妥之处希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前 言..... 1

第 一 部

盖世太保的诞生(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年)

第一章 纳粹党人成为德国的主人..... 2
第二章 戈林开始抓警察工作.....16
第三章 国会纵火和盖世太保.....33

第 二 部

盖世太保玩弄手法，巧取豪夺

(一九三四——一九三六年)

第一章 希姆莱接管盖世太保.....62
第二章 希姆莱的黑色军团.....83
第三章 盖世太保无所不在.....97
第四章 莱因哈德·海德里希..... 112
第五章 盖世太保反对罗姆..... 125

第六章	盖世太保清除罗姆·····	134
第七章	警察队伍重整旗鼓·····	157

第三部

盖世太保准备入侵(一九三六——一九三九年)

第一章	盖世太保敢于打入军队·····	176
第二章	盖世太保盘踞欧洲·····	199
第三章	披着德国中央保安局外衣的盖世太保·····	216

第四部

战争中的盖世太保(一九四〇年)

第一章	在波兰·····	234
第二章	盖世太保进驻法国·····	253
第三章	盖世太保巧胜军人·····	270

第五部

盖世太保的地狱(一九四〇——一九四四年)

第一章	盖世太保在法国开展工作·····	294
第二章	东欧地区的苦难·····	312
第三章	纳粹研究者的“科学实验”·····	344
第四章	盖世太保的间谍网遍及整个法国·····	370

第六部

盖世太保的末日(一九四四年)

第一章	陆军反击盖世太保.....	400
第二章	豺狼互相残杀.....	420

附录

德国中央保安局的内部结构.....	453
奥伯格—布斯凯的第二个条约.....	461
人名索引.....	463

纪念

那些死于盖世太保和纳粹手下的各种族和
各国的男人、妇女和儿童。

纪念

那些为荣誉、真理和自由而牺牲的人们。

前 言

盖世太保(GESTAPO)^①——这四个字使德国乃至整个欧洲颤抖了整整十二年。成千上万人的身后跟踪着特务，特务们在这块“公司招牌”下进行活动；数百万人受尽了他们及其同伙党卫队的打击而丧命。

虽然，内容丰富的成百本书籍都对纳粹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事件作了最细致的研究、分析和评论，但是在第三帝国崩溃十九年后的今天还缺少一部描写盖世太保全部历史的著作。当时，盖世太保是这个纳粹国家的主要台柱。只有认识这个国家的内部机构，才能了解那个时期所发生的事件。盖世太保这个机械装置几乎每时每刻都是在庞大的警察机器的这个或那个传动机的带动下运转的。

任何国家、任何时代几乎未曾有过这么庞大和完整的组织。它拥有的权力和给人民造成的可怕而恐惧的影响，竟会达到如此“完美无缺”的境界。

因此，在人们的记忆中，盖世太保乃是丧尽天良、滥用社会安全工具的一个例证。这就向我们指出，如果一个国家机关不去为民族服务，而是去替一个私党效劳，那会把国

^① Gestapo为 Geheime Staatspolizei 的缩写。原意为秘密（国家）警察。——译者

家引向何处！本来把权力和武器给予他们，是为了保护公民和公民的权利与自由，然而现在权力和武器却成为奴役人民的手段和置人于死地的工具。罪魁集团的专政，赤裸裸的暴力统治被摧毁了，威力强大的政权的末日来到了。

我的意图是要“拆开”这台巨大的机器，打开它的各个发动装置，把它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让人们看看，纳粹政权之所以能巩固和维持，只不过是依靠这样的装置来支撑和保护他们大厦的最小部分。人们可以看到，盖世太保和党卫队保安处的无数分支是如何渗透到人民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如何把那些被奴役者紧紧地箍在狭窄的网套里，致使任何行动、甚至任何思想都逃脱不过他们的监视。

今天，人们对于那些掌握全部指挥棒的人物和这台机器的本身所知甚微。我认为，揭露这些人的罪恶和罪状以及他们的实质，还其本来面目是完全必要的。是啊，这些怪物本来也是与其他人一模一样的，其中有些人所表现的特性几乎是可以克制的。他们的命运之所以拐进了一个新的奇异的方向，是因为希特勒主义向他们灌输了新的奇怪的“道德观念”。他们抹煞了自己的良心，完全屈服在纳粹的教条之下。

我手头的这本书是根据两种资料撰写而成的：一是利用了大量尚未出版的材料，其次利用了所附参考书目中列举的出版物。

一九四五至一九五五年这十年里，法国对盖世太保特务和战犯进行了起诉。在此期间，我记录和收集了大量的私人材料。

就在那时，我有机会亲自认识了曾在法国领导过德国警察的大多数人。我当时理解到，他们无非也是人，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他们是一些智力迟钝或者聪敏的人，没有一个人有他自己的性格，全是一些意志不坚的人。他们除了服从命令之外，不能区别善与恶的概念。

大多数囚犯不感到内疚。他们似乎没有能力判断自己的处境。在他们看来，从刑事上追究他们所犯的罪行，只不过是战胜者对战败者的一次报复行为。再说，正因为他们持这样的观点，所以他们（看来是无意识地）容忍了自己所处的命运。这与他们的所作所为是相符合的。那些最会看风使舵的人想用泄露机密的方法或通过向战胜者效劳的设想来赎回他们的生命。马絮是盖世太保一个“辅助队”里最臭名昭著的拷问者之一，他被监禁在弗雷斯纳已有好几个月。他在监狱里起草了一个玩具厂的规划，他打算在释放后去西班牙开办这么一个工厂。对于释放，他是毫不怀疑的，并认为不久即可兑现。

通过这些直接的接触，我尽力把在法国活动的大多数特务的脸谱勾画出来。

我利用他们的叙述和回忆，不仅是为了把盖世太保整个组织机构及其在法国的培训基地的情况告诉人们，而且也是为了把迄今为止很少为人所知的某些事件的背景原原本本地公布于众。此外，国家法庭、其他法庭和军事法庭对通敌案件的审理记录也同样给我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出版物中对我最有用的是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理主要战犯案件时的那三十二卷记录文件以及有关的十七本卷

宗。此外，我还利用了法国政府的某些出版物。关于纳粹组织的行政机构及其职权的叙述，均根据纳粹党和第三帝国国家机关出版的文件。这些文件也为我提供了有用的传记性的文献资料。

在不到十年的研究期间，我有幸获得了不少鼓励和宝贵的帮助，如果没有这些鼓励和帮助，我很可能难以完成我给自己布置的这个任务。

请所有在我著书立说的道路上支持过我的人，接受我真切的感谢。我特别要感谢对我无限友好的内政部图书馆女馆员利斯博纳小姐；乐意为我开放私人图书馆的检察官M·夏莱；司法部的案卷保管员M·迪朗巴尔泰；近代资料图书馆的案卷女保管员阿德勒·布雷塞小姐；M·约瑟夫·比利和当代犹太资料中心的全体人员，该中心的档案对我非常有用；M·米歇尔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委员会以及在作战部历史档案馆负责德国资料的女保管员弗雷西热小姐。

在撰写盖世太保的历史以前，似乎有必要回顾一下一九一九至一九三三年纳粹在夺权道路上所发生的一些事件。事实上，我们不能把盖世太保与纳粹主义割裂开来，在本质上，它们两者是息息相关的。

纳粹主义是从失败和由此而引起的后果的变态心理中产生的。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当德国不得不承认它被打败的时候，军人们却拒绝承认这种不应得到的失败。

普鲁士军官集团所统治的德皇陆军骨干力量，长久以来维持着军国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并发展到了恶性膨胀的程度。一些自认为是德国当然主人的将军们不愿意接受帝

国的投降思想，也不想从中吸取教训。他们开始散布一种说法，说什么军队不是在战场上被打败的，而是被出卖的。这种“背后一箭”说^①从此就诞生了。不过他们忘了说，德国部队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虽有一百八十四个前线师，但实际拥有的还不到十七个后备师，其中只有两个新补充师。与此同时，同盟国的军队有二百零五个师驻扎在前线，还有一百零三个后备师，其中六十个师是新编制的，而且美国增援部队与日俱增，德国在上月（十月份）已从南线退却下来。十一月六日，奥地利全面崩溃。德国成为孤家寡人。十一月三日，舰队的第五分舰队在基尔哗变。十一月七日巴伐利亚举行起义。国王路易三世不得不让位。十一月九日，在斯巴召开的军事扩大会议确定，德国参谋总部已失去主动权并决定请求停战。首相下台，皇帝逃往荷兰。但是，留下三名文职人员：巴登的马克斯亲王，新帝国首相弗里德里希·埃伯特和天主教主教埃尔兹伯格，他们不得不含垢忍辱进行停战谈判。同一天，社会民主党人谢德曼在国会的阳台上宣告共和国成立。

这个在苦难中诞生的年轻共和国很快使军人感到憎恶，失败的苦味还没有消逝，他们就开始谈论起“背叛”来了。

德国陷入一片混乱。旧的等级制度的金字塔倒坍了。失业和贫困使得混乱的情况进一步恶化。为了恢复秩序，不得不有求于军人的援助。他们成立了一些稀奇古怪的团体，什么“自由团”和“战斗队”，那是一种私人性质的军队，只

^① “背后一箭”说(Dolchstoßlegende)，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一种谬论，认为德国战败是由于“后方的背叛”，即革命所致。——译者

承认军官领导一切，不承认其他任何权威！这些战斗队镇压地方上的起义，在他们建立新的军队的骨干——国防军之后不久，便捏造种种罪名来加罪于共和政体。

与此同时，军人们公开他们的政策或者他们所认为的政策，并在巴伐利亚军区司令部的范围内创办了“政治训练班”。创始人之一就是罗姆。

一九一九年初夏，一个名叫阿道夫·希特勒的上等兵结束了“政治训练班”的学习，被分配在连队接受“军官教育”。德国军人在纳粹主义诞生时所起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他们与一些实业家勾结在一起，竭力恢复和豢养那些散布反民主思想、颂扬军国主义、煽动当时已完全消失的反犹太主义的小社团。

看来共和政府很相信魏玛宪法的优越性，因而对这些煽动性的阴谋估计不足。一九一九年八月的宪法无疑是合乎民意的，但骨子里却包含着将来有朝一日可被用来扼杀共和国的几项条文。

新政权的敌人很快就明白，与其发动正面攻击，倒不如采用渗透方法。他们表面上装作信仰共和政体，以便把指挥棒紧紧地握在手里。社会民主党的作战部长诺斯克非常认真地说道：“我借用年轻的共和国的军队给你们带来了自由与和平。”

共和国的敌人在这些花言巧语的掩盖下继续从事阴谋活动。他们在“贵族俱乐部”里用恰当的语言来装饰他们的理论，并通过格莱辛男爵主编的机关刊物《循环》进行传播。这份刊物这样说，自从革命以来，国防军的军官们早已学会

了如何去区别国家本身与其外部的形式。军官们愿意为永久性的、抽象概念的国家效劳。

因此，这一切已十分明白，只要国家不符合军官们的政治观念，他们就不再负有义务去为这个仅仅还是一种“外部形式”的国家效劳了。不久有人开导他们说，他们有义务迫使国家接受他们的法律。

恩斯特·罗姆上尉和他的同伴们也许理解了这些教导。他们准备在未来的事业上恢复旧制度，建立一些民间组织。这样可以使政府高枕无忧，逃避各种有效的监督，并使这些组织在有人对它们进攻时卸掉责任，经过改头换面，然后东山再起。目前要把所有这些受到同样意志鼓舞的、只是表面上涣散的力量团结在一个领导下，看来似乎是件轻而易举的事。

一九一九年九月，这个“教导军官”阿道夫·希特勒参加了其中一个叫安东·德莱克斯勒的德国工人党的组织。他很快控制了德莱克斯勒的这个党，并在罗姆帮助下于一九二一年上半年把它改变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该党还把其他三个社团的成员吸收进来。它们是安东·德莱克斯勒的德国工人党、鲁道夫·荣格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和施特莱彻的德国社会主义党。纳粹党成立时只有六十八个党员，到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发展为三千名党员。该党常常用醒目的大红标题进行积极的宣传鼓动战，其中有军人所编造的“十一月罪犯叛变”的神话，所以该党成长迅速。此外还成立了打手别动队，他们用拳头或橡皮棍子来堵住那些敢于在党代会上发言的政敌的嘴巴。“冲锋队”就

是在这个时候诞生的，它的简称是 SA。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党赢得了一位精明强干的党员：赫尔曼·戈林上尉。他是一位战功赫赫的飞行员，著名的里希特霍芬战斗机中队的最后一位指挥官，也可以说是盖世太保之父。

纳粹党的最佳宣传员都是军人。同时，他们也是冲锋队的干部，为此罗姆就把他们组织成为一支真正的军队。这支军队很快威胁着政府，甚至在人员力量方面超过了国防军。

但是，那时候冲锋队还谈不上与国防军分庭抗礼，因为国防军支持冲锋队，向他们提供武器、“秘密”干部，有时还提供经费。一九二三年四月，冲锋队占据了军队的秘密军火库，同年九月，第七军区司令官洛索夫将军拒绝服从陆军司令部首脑冯·西克特上将的领导；他宁可被解除司令官的职务，也要藐视西克特的关于禁止在慕尼黑出版纳粹党报《人民观察家报》的命令。

纳粹的观点容易被军人接受，同“训练班”的论点极其相似：取消议会制，把权力集中在一个强大的国家里，而这个国家则由一位负责的、通过表决直接求教于人民的首脑来领导。宪法可以不要，因为它是无用的框框，会阻碍发展。这个国家决不容许政敌无休止地捣乱，它将消灭他们。不要反对派的报刊，也不要“背叛”，不要破坏权力机构的反对党。除了“民族利益”外，什么都不要。

这些纳粹党人的全部阴谋就在于他们把执政党和祖国相提并论。这是一出军人们习以为常的魔术戏。用保卫祖国

(即所谓保卫党) 来为种种行径辩护。个人是不复存在的，他只能作为一个愿为集体牺牲一切的成员而存在。最重要的是铁的纪律和对元首无条件的服从。因此，对知识分子必须实行监督，如果他们对国家，即对政权有所危害的话，就要毫不留情地消灭他们。

除了这些观点外，还有纯血统的、北欧血统的种族论的论点；有日耳曼“优等民族”的优越性的论点；有把他们的法则强加于劣等人的那种必要性的论点；有变种或劣等种族的论点；有在“自然法则”中得不到博爱和同情的那种“人性愚昧”的危害性的论点。

当纳粹党利用宣传取得进展时，其他社团也在拚命地夺权。失败的政变进行过多次，如卡普政变和布赫鲁克少校在库斯特林的哗变都诱惑着希特勒去冒暴动的风险。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八日，希特勒想方设法联合鲁登道夫将军去说服敌视帝国政府的、闹分裂的巴伐利亚政府同他们一起进行武装暴动，推翻魏玛共和国。然而，由这位自封的新帝国政府元首一手操纵的这场运动在数小时之后就失败了：十一月九日清晨，“战斗联盟”中的三千人向元帅大会堂附近的慕尼黑军区司令部进军，但是在大批警察的卡宾枪的射击下，几分钟内就失败了，十四人死亡，五十人受伤。

希特勒被逮捕；他身旁的戈林受了重伤，但是他却侥幸地到达了奥地利。

事后还有一个人，他曾经作为“德国战旗”（一个由罗姆发起的组织）的旗手参加了这次事件。他名叫海因里希·希姆莱。

德国政府并没有好好利用这次未遂政变和希特勒的被捕，而是错过了结束纳粹主义的机会。

这次诉讼案件出丑以后，鲁登道夫无罪释放，希特勒被判处五年要塞监禁，这对叛逆罪来说是最轻的惩罚。因此，他希望在缓刑期内能被提前释放。那些被告在伙伴们的热烈掌声和国歌声中坦然地离开了法庭……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希特勒经过十三个月零二十天的监禁以后，从要塞里给释放了出来。他认识到，只有通过合法的途径才能上台，就是说既要把暴力掩饰起来去破坏法律，又要保护好得力的助手，既要假装遵守民主章程，同时又要从内部来破坏民主。

这种需要耐心的挖墙脚的工作可能要很长时间。回想起那些极右政党和纳粹党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的选举中遭到惨重失败，并且在实际上不得不于一九二五年初重起炉灶时，确实令人感到满意。一九二四至一九三二年的八年时间内，左派政党在选举中连连得胜，赢得了三百三十二万九千张选票，从而加强了他们的地位。但是这只不过是相对的胜利，因为就在那个时候，纳粹党人通过宣传成功地把一大批年轻的选民争取了过来（一九三〇年拥有新选举权的人数达到三百万）；与此同时，极右派、右派和中立派的选民成批地倒向纳粹党人一边。所有正直的、传统主义的以及胆怯的人都学会了一些出口伤人的话，但万万没有想到这些话在纳粹的语言里却包含着完全不同的意义。一九二五年二月，当选举年迈的元帅兴登堡为共和国总统的时候，正是这些正直的人对共和国进行了首次抨击。共和国的敌人

一方面掩饰着自己既往的荣誉，另一方面在大部分重要岗位上安插亲信。

纳粹党人及其同伙利用假牌玩弄民主游戏，把魏玛共和国的整幢大厦推向崩溃的边缘。他们不停地使政府产生危机(采用接二连三的选举法)，把民主政权的一大批拥护者争夺了过来，使他们俯首帖耳地听从纳粹的宣传。左派政党面对这种战略，不能团结一致，不能放弃内部斗争来公然对抗共同的敌人，不能抓住无数次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可赢回主动权的机会。就一些邻国而言，首先指的是昨日的胜利者法国和英国，他们也许能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他们不仅在纳粹“夺权”的时期里，而且在纳粹统治的最初年代里都表现得非常暧昧和盲从。

一九三二年五月三十日，兴登堡干脆辞退了勃鲁宁首相，任命“男爵”和国防军的代表弗朗兹·冯·巴本为他的继承人。从此开始了纳粹掌权的最后阶段。托马斯·曼在谈论德国小市民时说过，他们害怕陷入无产阶级的深渊，所以欢迎巴本上任。对他们说来，兴登堡这位年迈的元帅倒是一位天赐者，是他们阶级的救星，而且他的每一项决定都是英明的。

六月十四日，巴本上任还不到两周，就取消了勃鲁宁曾明智地颁布过的解散冲锋队、禁止穿希特勒制服的禁令。从此以后，巴本的作用看来是一清二楚的了。一九三二年九月初，德国军官国家联盟大会在柏林召开。德国国民议员埃弗林站在讲台上坦然自若地说：“巴本总理为在新的基础上重建帝国，为扫除魏玛共和国大厦的最后一堆瓦砾而呕心

沥血。”

巴本赶走了国内共和政体的高级行政官员，并用“国家党人”取而代之。只有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所支持的普鲁士的勃劳恩—泽韦林政府起来反抗。但是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日帝国总统在魏玛宪法第四十八条基础上颁布的一项简易法令，就把普鲁士政府赶下了台，其理由是，普鲁士警察无力“恢复安定和秩序”，就是说无力制止纳粹党人的不断发生的暴力行为！

巴本开辟了通往政权的道路，纳粹党人选择了这条不流血的道路。一九三二年七月的选举使他们获得了二百三十个议席；他们已成为德国最强大的政党，八月三十日，戈林被选为国会议长。从此，最后的胜利只不过是一个策略问题了。

右派政党也好，军人也好，当他们暗中向纳粹提供方便时似乎没有考虑到会带来这个必然结果。他们全都主张传统性的政治法制，而忽视了政权会有落入纳粹分子手中的可能性。他们只认为纳粹分子没有能力实行单独统治。为了使传统性的价值再次发挥作用和夺回特权，他们只想利用纳粹党人的冲力，跟在他们后面随波逐流，他们为了得到这种帮助准备让纳粹党人参加政府，以此作为交换条件。但是他们却忘记了希特勒的预言：“只要有我们存在的地方，就无他人立足之地。”等到他们理解到这句话的严重性时，已经花费了许多时间和带来了许多血迹斑斑的经验教训。

一九三二年七月被巴本扶上台的纳粹党人在十一月份面临着一次意想不到的选举，他们在选举中失去了二百万

张选票和三十四国会议席。这个教训应该引起重视。巴本在选举后的第五天被迫辞职，由库特·冯·施莱彻尔将军接替。由于施莱彻尔不断受到攻击，他不得不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八日作出让步。

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巴本接见希特勒，授权与他组织新内阁。兴登堡“这位老先生”无可奈何地只好作出决定，把权力移交给以前看不起的、称之为“波希米亚上等兵”的这个人。

当这种不可挽回的事情发生以后，仍然无人相信纳粹会取得胜利。托马斯·曼在听到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的消息时，微笑着说道：“这样更好，他维持不了八个月。”这句话是他对那些看法一致的法国和英国“专家”讲的，纳粹主义最终会弄得身败名裂。

兴登堡本来认为，他已采取了足够的预防措施把希特勒置于监护之下，迫使他同意巴本担任副总理兼普鲁士帝国委员，勃洛姆堡担任战争部长。但是这些“绊脚石”应该尽快地清除干净。

二月一日，希特勒接到总统关于解散国会的命令。这是由于兴登堡在四天前拒绝了施莱彻尔关于发布解散国会命令的请求，为此施莱彻尔被迫辞职。新的选举规定在三月五日举行。从这时起，纳粹党人下定决心，要不惜一切手段保住政权。德国进入了它历史上血腥味最浓的时期。起初，盖世太保的行动有所节制，到后来竟扮演起主要角色来了。

第一部

盖世太保的诞生

(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年)

第一章

纳粹党人成为德国的主人

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在兴登堡大元帅的办公室里，一个持续十五年之久的时代在世界命运的潮流中突然宣告结束。希特勒获得了德国内阁总理的任命书。除他以外，巴本出任副总理兼普鲁士帝国委员。他从前是个现役军官，而现在却成了元帅的心腹和农业联盟的傀儡。这个农业联盟在卡尔克卢斯伯爵领导下，把德国东部的大地主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巴本受兴登堡之托“与一些政党建立联系，以便弄清政治形势和‘探索’建立一个内阁的现有可能性”，他把希特勒当作容克地主所信任的人推荐给元帅。因为希特勒一个人就可以通过实力政策制止各地蔓延着的社会主义倾向。巴本也是军界人物之一。

现在，内政部长是威廉·弗立克，以前他在慕尼黑担任过高级警官，曾经作为一个顽固不化的纳粹党人支持过希特勒。瓦尔纳·冯·勃洛姆堡将军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外交部长仍由康斯坦丁·冯·牛赖特男爵留任。仍然担任国会议长的戈林作为不管部部长隶属于内阁，同时兼管空军和普鲁士内政部的事务。

这位一九二二年以来的忠诚党员、“十一月政变”时受

过伤的“不管部部长”在“夺权”以后的一星期内起了重要的作用。一九二八年五月以来，戈林就是国会议员和普鲁士邦议会的议员，他为攫取警察的领导权作了很大的努力，同时通过他的一位新朋友，柏林警察局第一厅官员鲁道夫·狄尔斯熟悉了政治警察的伎俩。

希特勒担任帝国总理后不久，恐怖便笼罩着德国，它的形式多种多样，挑衅性的巷战暴动造成血流成河、惨不忍睹，也有在凌晨时肆意捕人，然后用手枪或绳索把他们干掉，手段极为阴险毒辣，搞得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一月三十日晚上，纳粹突击队袭击了共产党人，真正的巷战就此开始。一月三十一日，希特勒通过电台发布一项声明。新总理用他那适中的语调说：“他感到自己同那些传统的原则是息息相关的。政府的任务是要把德国人民的精神和意志重新统一起来。基督教应受到保护，家庭作为人民和国家躯体的细胞应受到保护。”他就是这样俨然以市民利益的捍卫者自居。

这位表现出如此有教养的总理于二月一日收到了兴登堡拒绝施莱彻尔发布的解散国会的法令。选举定在三月五日举行：纳粹分子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活动，但由于胜利没有把握，所以他们想尽办法，有计划地去消灭对手。二月二日，戈林以普鲁士内政部长的身份接管了普鲁士警察局的领导权，并对它进行了清洗，开除了一批长期来具有共和体制思想的官员，由可靠的纳粹分子取而代之。成百个警官、监察员和穿制服的警察、三分之二的骨干分子不得不让位于冲锋队和党卫队队员。盖世太保从已组成的纳粹

团体——它在一般的行政部门里是受压制的——中崛起。

普鲁士邦议会反对这些非法的措施。结果连它自己也被“人民保护法”这一命令给赶下了台。同一天另一项命令传达下来，禁止召开那些“属于”“破坏公共秩序”的集会。这为镇压左派党的集会和使纳粹分子无法无天大开了方便之门。

二月五日，钢盔队、防暴警察和褐衫队在柏林大街上举行了公开的阅兵式：这是官方对冲锋队的一次承认，也是对民族主义政党有名的“哈尔兹堡阵线”的一次纪念。阅兵式以后，紧随着出现的是一个流血的夜晚，他们袭击了共产党人的集会大厅和常去光顾的饮食店。在波鸿、布雷斯劳、莱比锡、施塔斯富特和杜塞尔多夫发生了殴斗，造成了许多人伤亡。就在这个时候，政府的权力掌握在希特勒、巴本、休根堡这三个执政者的手里。休根堡任经济与粮食部长，是新闻和电影大王以及德意志民族党的主席。

二月六日，一项“保护德国人民”的紧急法就取缔了反对党的报社和新闻机构。

二月九日，戈林的警察机器正在加紧开动。它们对全国的共产党人的聚会场所和共产党领导人的住宅进行了搜查，并在报道中制造谣言，说什么发现了武器、弹药和文件，这些文件“证明”了有人企图进行叛乱，并准备发出信号，焚毁公共建筑物。逮捕和绑架活动成倍地增加，冲锋队员拷打和杀害了那些多年来列入他们名单中的敌手。

鲁登道夫发誓与他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时的同谋断绝往来，并写信给兴登堡：

“我庄严地向你预言，这个不祥之人将把我们的帝国推入深渊，将把我们的民族带入令人震惊的苦难之中。即使你进了坟墓，未来的子子孙孙也会咒骂你所干的蠢事。”^①兴登堡同意把鲁登道夫的信件转交给希特勒。

二月二十日，戈林授权警察局，对发表敌视政府声明的人采取武力手段。前首相勃鲁宁在凯泽斯劳滕召开了天主教“宫厅卫士”的大会。大会结束后，纳粹分子立即用橡皮警棍和手枪袭击了那些离开会场的人，当时一人死亡，三人重伤，多人轻伤。对此，中央机关刊物《日耳曼尼亚报》向兴登堡发出呼吁，可是“这位老先生”却装聋作哑。

二月二十三日，身为民主党人的符腾堡经济部长迈尔抗议有人企图剥夺各邦的权利。他要求南德意志人为捍卫共和政体的合法性，以及共和国的权利和自由团结起来。

第二天，国家内政部长弗立克对此作了明确的回答：“德国将以它的威望赢得对南德各邦的胜利，即使希特勒在三月五日得不到多数票，他仍将继续执政。”这就要求颁布国家紧急法，取消部分宪法，“因为敌人的多数只能是暂时的”。

尽管纳粹分子决心保住他们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所夺取的政权，但是他们仍然心神不安。在野党反对他们。事件越是接二连三地发生，形势就越危险。二月二十五日，一些共产党的战斗组织（其中有反法西斯同盟）服从于统一领导，以便在白天以前对占领卡尔·李卜克内西大厦作出回答。二月二十六日，新领导发出号召，“建立群众堡垒”以及“对

^① 戈立茨：《阿道夫·希特勒传记》，斯图加特，1952年。

法西斯专政发动一场强大的攻势，来保卫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权利”。

共产党不可能在一次反法西斯的运动中接管领导权，为了打击它，唯一的方法只能用合法的手段消灭它。必须使这个国家相信，推翻政府的计划事实上已酝酿成熟，共产党人的暴动已迫在眉睫；因此，要尽可能在选举前消灭共产党领导人，并处处使他们的党声名狼藉。

对纳粹分子说来，要把打击密谋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并不困难。由于戈林对柏林警察局已进行过一次清洗，所以他们可以把它牢牢地掌握在手里。手臂上带着卐字袖章的三万名“辅助警察”成为街道上的主人。纳粹党每天支付给每人三马克的报酬。二月二十二日，戈林用公告的方式对冲锋队和钢盔队队员作了安排。好戏可以开场了。二月二十七日那天，这台戏的帷幕徐徐揭开。

二月二十七日深夜九点四十五分，一位神学系的大学生路过国会大厦的西侧，听见玻璃窗被敲碎的声音，碎玻璃片落到了大街上，发出乒乒乓乓的声音。这位大学生急忙忙地去喊警察，偶然在国会大厦旁边遇到了一个值班巡官。他向消防队和警察局报警，并通过夜间看门人直接报告国会官员。他们急匆匆地兜了一圈，发现一个人影，此人手中执着一件燃烧着的东西跑出了国会大厦。

没隔多久，消防队和警察赶到现场。拉泰特少尉率领的第一辆警车比第一辆救火车晚到一分钟。纵火者逃跑以后，拉泰特同大厦管理员斯克兰诺维茨和几名官员一起迅速搜查大厦。所有的人对四处蔓延的大火极为震惊。整个

大厅内，一种异乎寻常的情景使在场的人目瞪口呆。一股巨大的、有几米高、一米多宽的火焰直冲天花板，烟雾弥漫。这股火焰是大厅里唯一的火源，它显然是依靠一种非常强烈的燃料才得以燃烧的。他们拿着手枪继续进行搜查。餐厅已经变成一片火海，所有窗帘和地毯都在熊熊燃烧。

在位于南侧的那个俾斯麦大厅里，突然出现一个男人，赤裸着上身，汗流浹背，目光呆滞，神志恍惚，不知所措。他听到叫唤声后立刻举起双手，乖乖地让人搜查。他随身只带了几张脏纸、一把刀和一张荷兰护照。斯克兰诺维茨把一条毯子丢在他的肩上，然后把他押送到亚历山大广场的警察局里。这个男人毫不反抗地陈述了他的履历：马里努斯·范·德·卢勃，荷兰人，一九〇九年一月十三日生于莱伊登，失业者。

电台得到失火报告后，立即广播这条消息：“共产党人纵火烧毁国会。”调查工作还没有开始，大家就已经知道，只有共产党人才会是纵火犯。就在同一天晚上，开始采取镇压措施：二月二十八日，颁布了由兴登堡签署的“保护人民和国家紧急法”。

直接受到打击的是共产党人，但是所有社会民主党的报纸也被禁止发行。这些法令取消了宪法中规定的许多基本权利，如：新闻自由、集会自由、通信保密、住宅的不可侵犯以及每个被捕者有权要求按法律程序进行审讯。结果是：德国人民从此受到纳粹警察的任意摆布。警察可以无限制地、不负责任地采取行动，可以肆无忌惮地秘密捕人，并且在没有起诉、没有证据、不倾听法官意见以及不用律师的情

况下，把被捕者关押起来，要关多久，就关多久。审判人不能违抗纳粹的旨意，不能提出释放或者要求查阅有关案卷。

盖世太保固守这种特权直至政权垮台。

在起火以后的几小时内，逮捕浪潮席卷柏林市。深夜时分，已有四千五百个共产党人和反对派的民主党人遭到“预防性的保护拘留”。警察、冲锋队和党卫队共同参与了这次行动，他们搜查住宅和办公室，审讯可疑者，把被捕者安在敞篷的载重卡车里。被捕者起先关押在纳粹党的一间地牢或者监狱里，后来把他们聚集到按照戈林意图建立的第一批集中营里。

从三点钟起，严格控制机场和码头，搜查边境上的列车，未经许可不得离开德国。尽管如此，许多持异议者还是成功地逃跑了，但是打击还在进行。在普鲁士有五千人被逮捕，在莱因兰逮捕了两千人。

三月一日，第二号法令规定，凡是“要求对国家进行武装斗争”和“要求总罢工”的人都将受到惩罚。实际上，纳粹分子最最害怕的是总罢工，它确是被分裂的左派唯一有效的武器。现在，共产党人已失去领导，社会民主党人摇摆不定，但是工会还存在。

如果工会当时能依靠数量众多的会员和拥护者，通过总罢工使国家陷于瘫痪，并制止纳粹分子挺进那该多好啊！

在德国有三个工会：全德工会联合会——最强大的工人组织，全德独立工会联合会（这两个工会共有会员四百五十多万）和拥有一百二十五万会员的基督教职工会。德国工会所拥有的会员人数是世界上最多的：有百分之八十五的

德国工人参加了工会组织。他们没有忘记过去为战争所付出的代价，他们是军国主义的敌人，因为军国主义会导致一场新的冲突，他们必须为之承担费用。

此外，尽管他们敌视那些官运亨通者，但是他们不知道动员人们起来反抗将要承担多大的风险。因此他们象社会民主党人那样，决定缩进脖子，采取等着瞧的态度。他们的这种消极行为很快得到自食其果的报应。

在这种无法律保护的混乱局面下，选举日期渐渐来临。自一月三十日以来，德国人忽视了恐怖浪潮和一场宣传攻势，这种宣传攻势渗透到每个地方，溶化在他们日常生活的每个行动，每一分钟里。

纳粹分子组织召开了数千次选举大会。希特勒采取几乎是令人难以相信的方法多次从一个城市窜到另一个城市，他认为当务之急，是要用一些粗野和空洞的词句——这是他的拿手好戏——去激励他的部队。戈培尔开动了巨大的宣传机器。他们有意识地想把检阅搞得文绉绉，但要有效果，他们手里拿着小旗、军旗，行军起来真是盛气凌人。这台戏给予赶来聆听这个新救世主讲话的那些穷鬼以深刻的印象。在德国有一千七百万失业者，这意味着每三个工人中就有一个工人不得不依靠微薄的救济金生活。

三月五日那天，有选举权的人中间只有百分之十一没有参加投票，与前几次选举相比较，这是一个很低的数目。

纳粹党人获得一千七百一十六万四千张选票。这是他们炫耀武力的结果，是对德国人施加千倍压力的结果，也是国会纵火案事件大欺诈的结果。

等待共产党人的是销声匿迹，但是他们的行动比人们想象的要好。尽管他们遭到可怕的镇压、监禁或者他们的领导人被迫逃亡，尽管他们的报纸被禁止发行，但他们还是赢得了四百七十五万张选票，而且得到了八十一个席位。新的国会由二百八十八名纳粹党人，一百一十八名社会民主党人（这两个政党合在一起的票数将近七百万张），七十名中央党人，五十二名德国国家人民党员，二十八名巴伐利亚人民党和其他政党的议员以及八十一名共产党人所组成。这样，纳粹党人的票数只占百分之四十三点九，没有达到议会的绝对多数。他们为了阻止其他政党联合起来反对自己，“建议”共产党议员不要行使他们的委任权。共产党人清楚地懂得，如果他们忽视这一点，就意味着死亡。所以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愿意这样做。

三月二十一日——俾斯麦在一八七一年召开第一届国会的周年纪念日——新国会隆重举行开幕仪式。三月二十二日，在柏林动物园内的克罗尔歌剧院里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主席台和讲台后面插了许多面大幅的卐字旗，两旁各插一面黑白红三色小旗，过道上挤满了冲锋队和党卫队员。全体纳粹党议员身穿党服：新的条例不加掩饰地正在付诸实行。

由于共产党人的退出，纳粹党人当时拥有百分之五十二以上的票数，没有一个议员对采用这种切除手术方法把整个权力移交给纳粹党人提出异议。主席团的选举只花了几分钟时间，采用从“座位上起立”的办法使戈林当选为国会议长，只有社会民主党人坐着不动。

三月二十三日，希特勒发表了一篇完全无关痛痒的纲领性的演说，并要求获得为期四年的政府代表权。他说，政府拥有的这个多数可以使他放手实施这个措施。一旦政府有了全权就可以在宪法之外采取行动，政府的法令既不需要国会议长的签字，也不需要国会的同意，政府也可以取消它同外国签订的、经议会批准的那些条约。这就是说可以一笔勾销议会的民主，从而使它合法地进入专政时期。

一群冲锋队员聚集在克罗尔歌剧院大楼的周围。他们发出了威胁性的喧闹声，阵阵传入会议室。有人迈步前去投票，只有社会民主党人鼓足勇气，拒绝投票。于是以四百四十一票对九十四票通过了“授权法案”。接着是解散大会。甚至连年迈的元帅都被解除了政治权力，现在不再需要他在法令上签字了。纳粹党人打算以主人的身份统治国家：真正的革命就该从现在开始。

纳粹党人现在已经大权在握，他们清楚地懂得，为了维护这个权力，必须对在前几次选举中具有生命力的反对党采取强硬态度。

因此，现在该是立即开始“国家一体化”的时候了，就是说使德国完全纳粹化、使人民屈服并使国家处于万能的党的领导之下。为此，必须首先解散所有的政治组织，用谋杀、逮捕或迫使他们逃亡的方法，使那些不受欢迎的人在他们的领导人的眼帘下销声匿迹。

共产党人被清除了。四月一日，纳粹党宣布抵制犹太人的产品和商店。长期来，“该死的犹太人”早已成为褐衫队员暗语中的一句主要口号。现在冲锋队和党卫队分布在

柏林的街道上，唆使群众起来反对犹太人，破坏和抢劫犹太人的商店，并把犹太顾客从大旅馆和咖啡馆里赶出去。这股由暴行而带来中世纪大屠杀的血腥味遭到了世界各国的反对。

可是这些暴行并不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肆无忌惮。希特勒曾经说过，我们必须经常考虑到人有其弱点和兽性。纳粹主义利用人的最原始的压迫本能首先表现在反犹太主义上，这种反犹太主义与新思想是不可分割的。但是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的“行动”主要用作掩护：当所有的眼睛都注视着这种行动的时候，国家行政部门奉命实行集中化。各邦议会（普鲁士邦议会除外）统统解散，接替这些工作的是由希特勒所挑选的、赋予全权的地方长官。这样可以把各邦议会中，特别是巴伐利亚邦议会中兴起的一股反抗气焰扑灭下去。此外，还授权那些地方长官去撤换“非亚利安人种”或者完全不适合这一政权的官员。

这些预防措施采取以后，接着在四月一日解散了全德工会联合会的二十八个工会。它们的财产被没收，领导人被捕，工人银行的领导人同样被捕。其他工会则寸步难行。

希特勒声明五月一日为“全国劳动节”。凡属友好的、带有社会主义和天主教倾向的自由工会的领导人（就是说，只要他们还存在）都被邀请参加了纳粹党为首次庆祝新政权而组织的大会：所有工人在民族友爱之中团结起来，那是应该庆贺的。它是一种社会的，而不是政治的活动，它也应该成为一次和解的庆祝典礼。每个人都象在正常的劳动日那样得到他的工资，而且，还将得到旅游费和膳食费。

是头脑简单还是贪生怕死？谁敢对此作出判断？总之，所有工会只得接受这种邀请。

五月一日，一百万工人聚集在坦贝尔霍夫广场上。希特勒向他们发表了一篇动听的演说，他鼓励群众工作并向上帝呼吁。第二天上午十点钟，一组冲锋队员和警察占领了人民之家——工会办公室、它们的报馆、合作社和工人银行及其支行。

四月二十六日通过戈林法令在普鲁士成立的秘密警察首次在柏林用新名称开展工作，这种秘密警察是从旧的政治警察演变过来的。连日来，受到严密监视和注意的工会领导人在他们的住房或者避难所里被逮捕，受到保护性拘留，其中有莱巴特、格罗斯曼和维塞尔，总共有五十八人。工会的档案和银行帐目，其中包括救济金和养老金均被没收。

同一天，以罗伯特·莱伊为首的一个“保护德国劳动行动委员会”夺取了工会的领导权。

拥有约六百万会员、年收入达到一亿八千四百万马克的组织在没有进行丝毫抵抗的情况下就被解散了。

五月四日，莱伊宣布“德国劳工阵线”成立并颁布了劳动义务法。劳工阵线被用来作为巨大的宣传工具，以便在几百万被压制的会员中间传播“纳粹主义的世界观”。结果是把工人的生活条件拉平了。当希特勒的庞大计划使失业者的人数下降时，工人的平均工资受到了损害，而那些赞同纳粹主义的工业家却大发其财。

工会被解散之后，清除政党就比较容易了。对中立党

采取措施使休根堡深为震惊。他曾经促使德国国家党人积极支持政府，并在一月三十日同希特勒和巴本一起行使权力。根据新法令，即使是他的党员也要立即解雇他们担任的许多行政职务，何况他还是个经济和粮食部长！为了除掉他，就对他的农业政策提出了强有力的抗议。他被迫于六月二十八日辞职。

同一天，施特莱斯曼的老党德国人民党认为自行解散实为上策。七月四日，天主教党、中央党步它的后尘。只有巴伐利亚人民党公然对抗这些威胁。然而，他们的领导人却被逮捕，其中有弗斯特·符雷德，他是一位骑兵军官，并在一九二三年同希特勒一起参加过“十一月暴动”，还一起在兰德斯堡监狱坐过牢。巴伐利亚人民党必须投降，与其他党一样自动解散。

七月七日，一条法令下来把社会民主党的议员们赶出了国会和邦政府。他们中的许多人到国外去了。其他的人则被关在监狱里或集中营里。纳粹分子通知说，应该让那些不理解纳粹主义优越性的人到那里去接受“再教育”。三月二十五日，第一个集中营在斯图加特附近建成。那里只能安置一千五百个犯人，可是据说不久却容纳了三至四倍的人数。当时这个集中营很快就成为德国的主要机构之一。

七月十四日，德国政府颁布了一项法律，其中有条是不允许持有异议的：

“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是德国唯一的政党。

“谁想同另一个政党保持组织上的联系或者建立一个

新的政党，只要这种行为违反了其他条例，谁就要受到加倍惩处，就要被监禁三年或者坐六个月至三年的监牢。”^①

许多有名望的德国人非常有可能对这些事件所引起的转变感到震惊。他们曾犯了错误，没有记住希特勒的那句预言：“只要有我们存在的地方，就无他人立足之地。”他昨天的朋友和盟友（德国国家人民党人）曾花了好长时间去思考这个问题。

从现在起，纳粹党人就是德国的绝对主人，他们的新机构、盖世太保和集中营可以自由发挥作用了。

^① 《国家公报》，第1部分，第81期，第479页，1933年7月15日。

第二章

戈林开始抓警察工作

一九三四年春，六万五千名德国人离开了国土。为期一年的纳粹专政使人们流尽了鲜血，成千上万的男女，其中绝大部分是学者、艺术家和作家冒险偷越边境，逃亡国外。他们逃避强制劳动和威慑，逃避盖世太保的阴险毒辣的暴行。

盖世太保，这四个字使最大胆的人也胆战心惊，现在秘密和恐惧已重重地压在他们的肩上。但是哪一个人能用自己的双手描绘出这个可怕的、令人憎恶的东西？是哪个庞然大物锻造了纳粹机器的这根轴？这台纳粹机器造成了二千五百万人死亡，使欧洲成为一片瓦砾灰烬。

这个人看上去不象个庞然大物，他那宽阔的脸膛要比他的许多同志来得和蔼可亲。他讨人喜欢，举止随和。他就是赫尔曼·戈林。

如果回顾一下戈林的生平，就会联想起马尔罗^①的两句话：“察其人不能观其所隐，而应观其所行”（《阿尔登堡的胡桃树》）以及“看一个人要看他所做的和他所能做的行为的总和”（《人世间》）。戈培尔、赫斯、鲍曼、希姆莱，更不用

^① 安德烈·马尔罗(1901—1976)，法国作家、政治家。——译者

说希特勒了，他们很快产生了某种忧愁。而戈林倒是很冷静。奥托·施特拉塞的判断正好打中要害：“戈林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一个杀人犯，他心里想的就是恐怖……”不错，“心里想的就是恐怖”，不过他采用艺术加工的方式，这种颓废的风格居然吸引着那位肥胖而又骄傲的元帅。

他的这种特殊想法是在稀奇古怪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在一九三〇年九月十四日选出来的国会中，纳粹党人的议席仅次于社会民主党人，以一百四十三个议席成为议会中第二强大的党团。参加开幕仪式的一百零七名纳粹党议员，身穿褐色衬衫，排成队列，步伐整齐地进入会场。走在这个奇怪队伍的第一排，并指挥这个队伍的是赫尔曼·戈林，他是最老的党员中的一个。从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日纳粹党费力地赢得十二个议席以来，他就成为这个国会的议员了。当时只有少数德国人回忆起这位新议员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雄，大战还没有成为神话。他出现在这些年轻的、难以治服的和声名狼藉的纳粹党人中间不免使人感到有点惊异。按照出身和过去的经历，他与那些保守的、特别是那些拥护君主政体的德国国家党人在一起或者坐在德国人民党的位置上倒是来得恰当一些。他主要是属于大资产阶级的。他确实出身于这个阶级。

赫尔曼·戈林是旧学校的一位高级职员海因里希·戈林博士的儿子，一八九三年一月十二日生于慕尼黑附近的罗森海姆。由于他母亲的祖母卡罗琳·德·内莱的缘故，他成了法国人的后代，他们是定居在荷兰的新教徒。他的父亲（俾斯麦的一位私人朋友）是德属西南非的第一任总督。

他曾在波恩大学和海德尔堡大学就过学。在普鲁士军队里服过兵役，又是一位具有普鲁士人的思想方法和照普鲁士制度办事的行政官员。

戈林博士是个鳏夫，他的第一个妻子生了五个孩子，以后他娶了一位年轻的提罗尔女人，是他在第二次去殖民地传教旅行中带回海地的。在他们回来以后，就生了赫尔曼·戈林。

赫尔曼·戈林在童年时代老是惹是生非。由于他性格专横好斗，所以每所学校都勒令他退学，这样，他父亲就决定送他去卡尔斯鲁厄的军官学校。他再从那里转到柏林的军事学院，并以优异的成绩结业。

一九一二年三月，十九岁的戈林以少尉军衔参加米尔豪森的威廉亲王步兵团。驻防生活使这个性情暴躁的年轻人闷闷不乐，所以他高兴地上战场。一九一四年十月，他被调往空军。他在那里赢得了可喜的声誉。他先是观察员，后来从一九一五年六月起当上了侦察机的飞行员。一九一五年秋天，他终于成为战斗机驾驶员。

戈林少尉只有在他的小飞机里才能尽情享受，才能发挥他的战斗力。他击落了一架英国第一批汉德利·佩奇型的重型轰炸机，不过自己的飞机也被英国的战斗机击中。他等到腰部和左腿处的伤势痊愈后，重新登上飞机，成为德国战斗机最佳驾驶员之一，并于一九一七年五月获得第二十七战斗机中队的指挥权。一九一七年初，他取得了二十一次空战的胜利，一九一八年五月，皇帝授予他功勋奖章——德国最高奖章。这时候，戈林被编入著名的第一战斗机中

队，这个战斗机中队以它第一个指挥员的名字“里希特霍芬”闻名于世。

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一日，里希特霍芬男爵在取得八十多次空战胜利以后被击落下来，受伤而死。他的接替人莱因哈特少尉于七月三日阵亡。接着，戈林对享有荣誉的联队行使指挥权。七月十四日这一天德国人开始从马恩省撤退。

里希特霍芬战斗机中队由于过份勇敢而使德国遭受挫折。这对戈林说来，是个艰难的时刻。他不得不在十一月份把他中队的人员和飞机撤回德国，并且痛苦地把停战事件登记在中队的日记本里。这个中队曾经获得六百四十四次空战的胜利，六十二个飞行员在它的旗帜下阵亡。

戈林被解除上尉职务。他胸前挂着一级铁十字勋章、刻有剑的蔡林格狮子勋章、卡尔·弗里德里希勋章、刻有剑的三级霍亨佐伦王室勋章和功勋奖章。他永远不会忘记他一生中的这个时期，永远不会忘记他的里希特霍芬战斗机中队的同志们。一九四三年，一个名叫路德的犹太人在汉堡被盖世太保逮捕。但是这个人以前是属于里希特霍芬战斗机中队的。戈林一听到这个意外事件之后，有力地进行了干预，想方设法要释放他的这位同志，并把他置于他个人的保护之下。

一九一九年底，戈林上尉复员之后，不得不东奔西走，寻找工作。如果他能进入国防军那该多好啊，但是他作为共和国的敌人被拒之门外。为了生活，他在丹麦呆了几年，然后在瑞典当上了飞行员和航空公司的领导。每逢星期天，

那些信赖他的小福克尔^①飞机的运动飞行员都向他学习如何驾驶飞机。他就是这样来糊口度日的，想不到这时候还赢得了一位夫人，为了他的缘故，她离开了她的丈夫和儿子。他把她带回德国，并在慕尼黑同她结了婚。

在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情况下，戈林进了慕尼黑大学，盲目地攻读政治学和历史，主要是为了给自己的惰性蒙上一层受人尊重的面纱。他住在慕尼黑市郊的一幢漂亮的小房子里，依靠他妻子(娘家原名卡琳·冯·福克)从娘家得到的救济金维持生活。

一九二二年秋天，协约国要求引渡战犯。戈林看到自己的名字已被登记在由法国开列的一份名单上时，特别恼火。

十一月的某个星期天，在慕尼黑的国王广场上举行了一次反对协约国要求引渡战犯的大会。戈林参加了这次大会。他在听演讲的时候，发觉附近有一个不显眼的男人，他的侧面轮廓线条很明显，留着一撮修饰得整整齐齐的褐色的小胡子。这张脸对他说来并不陌生。当然，他就是阿道夫·希特勒，就是人们在巴伐利亚开始谈论的，也是他早已听人说过的的那个人。一小批拥护者把他团团围住。他们鼓励他讲话，但是他拒绝了，“为的是不打扰这次体现德国团结的市民集会”。他说话时口气轻蔑，冷若冰霜，因而引起戈林的注目。他也认为，这种柏拉图式的抗议不会有什么作用。第二个星期，他参加了纳粹党的一次集会。希特勒谈

^① 安东尼·福克尔(1890—1939)，荷兰人，飞机设计师。——译者

了一些老生常谈的内容；这次演讲的主题也是“反对凡尔赛专政的斗争”。凡尔赛和约把戈林这位容光焕发的军官变成了一个依赖他妻子生活的半乞丐。他被这次演说吸引住了，大会结束后表示愿意为希特勒效劳。

对于一个虽然还很软弱、但是处于全力发展的政党说来，戈林倒是一个可贵的新党员。纳粹党可以利用他的战斗英雄的名望，而且他那利欲熏心的本性是同党的路线一致的。一星期以后，戈林成为纳粹党的一名正式党员，他决心全心全意地把自己献给他认识才十天的那个人。党的“冲锋队”(SA)缺少一位领袖，冲锋队必须组织起来，队员们应该懂得纪律，协调一致，正象戈林后来所说的那样，把它建设成为一支“执行希特勒和我的命令”的绝对可靠的部队。一九二三年一月初，这位闲着无事的英雄戈林接管了纳粹武装部队的指挥权。

戈林依靠国防军，尤其是依靠控制着秘密民兵的罗姆的帮助，在几个月内就把这个具有重要意义、但组织性很差的冲锋队队伍改变成为一支军队。罗姆也是从“思想上”领导这些半军事化的部队的。他已经加入了德莱克斯勒的德国工人党，并对希特勒及其政党发生兴趣。但是在一个基本问题上他们的看法是针锋相对的：希特勒认为，党的政工人员和政治组织应该占据第一位；罗姆认为，士兵应占据第一位，士兵必须政治化。

罗姆用以前属于市民保卫团的国防军的秘密武器库来装备冲锋队。他希望有朝一日把这支部队置于他的直接指挥之下。一种暗地里的竞争不久使他同戈林产生矛盾。他

不愿看到戈林出现在他的眼前，而戈林呢，不久也预感到罗姆是一个危险的对手。

然而，这应归咎于他们那种各自心怀鬼胎的合作，因为纳粹党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初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它收罗了一些曾经响应过戈林在《人民观察家报》上的号召的前军官。

希特勒和他的朋友们满怀信心地迎接计划在十一月九日发动的政变。这次暴动尽管在十月底就已准备完毕，但是正象大家所知道的那样，由于希特勒—鲁登道夫的专政同巴伐利亚政府分裂主义和君主主义的势力在最后时刻的不一致，这次政变在几分钟之内也就垮台了。

戈林在音乐厅广场前遭到警察的射击，下身中了两弹，负伤倒地。他最初在一个巴林犹太人家庭的住宅里找到了避难所，等待把他秘密送往因斯布鲁克去的忠诚的朋友。他终于在那里得到了医生的治疗。二十年以后，巴林一家人的生命说不定还得归功于这件偶然的事呢。

创伤和随之而来的休养使戈林的性格起了根本的变化。鉴于逮捕令，他不能回到德国去；他不得不在奥地利、意大利和瑞典生活了四年。由于伤口医治得晚，所以在他体内留下了很深的创伤的痕迹。两年来，他使用过量的吗啡来麻醉自己。在他逐渐中毒之后，患上了精神错乱症，而且日益恶化。人们不得不送他进兰格勃罗精神病医院，不久送往康拉斯堡，最后再回到兰格勃罗。他继续在门诊治疗，等到一半痊愈以后，就离开那里。曾经在兰格勃罗检查过他的法医卡尔·A·隆德堡报告说，戈林是个歇斯底里的

患者，性格捉摸不定，一会儿哭哭啼啼，一会儿大发脾气，在这种时候，他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

他的家庭对此毫不惊讶；长期以来，家庭对他已经悲观失望。根据他的堂兄弟赫尔伯特·戈林说，家里把虚荣、怕负责任和丧尽天良看作是赫尔曼的主要特征。它可以促使他干出任何丑事。

长时间的被迫停止工作，住医院和疗养院治疗，戈林的外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过去的体型一直显得肥胖，三十二岁的时候，他就被一种不健康的、永远摆脱不掉的脂肪层弄得臃肿不堪，而现在这种肥胖的趋势已不复存在。他在离开纳粹朋友之后，也摆脱了那种粗野的环境影响，从此以后，他讨厌直接采取行动。慕尼黑的失败经验告诉他，应该到其他地方去寻找出路。对此，他考虑了很久。

昨天的野兽已经起了变化，它的好斗本能换了另一副面孔。现在，戈林将用非常危险的武器进行斗争。这种发展使他与罗姆这个粗鲁者分道扬镳。

戈林终于在一九二七年回到了德国。他同希特勒一样确信，只有通过“政治”手段才能得到政权。显然，他所理解的“政治”手段是最卑鄙的手段。

一九二七年秋天大赦以后，他回到了慕尼黑，再次与他的朋友们见面：他们是早已释放的希特勒、戈培尔、施特莱彻、罗森堡。其中还有一个新人物：希姆莱。希特勒考虑委托他改组他的卫队——党卫队。这时罗姆正在训练波利维亚人的军队，而戈林却想把冲锋队重新搞到手，而且要干得更加出色一点。在一九二八年的国会选举中，他被列在纳

粹党候选人的名单上。纳粹党人虽然只获得十二个议席，但是戈林被选上了。他立刻对国会举行的那种隆重的会议感到满意。再则每月六百马克的补贴改善了她的经济状况。他那富裕的家庭出身和以前的军官头衔使他能够进入柏林的上层社会，特别是可以与那些工业家接近。他在这些圈子里成为“希特勒的大使”。他处在“元首最忠心的骑士”的那个时代里。沙龙内的交往使他完全与罗姆的老兵和他的冲锋队疏远了。他那装模作样的审美观和自负的庇护人的态度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形成的。

在党内，有两个竞争小组彼此对峙着：冲锋队和由格利戈尔·施特拉塞领导的政治组织。戈林与他相处得很不好。他在这些暗礁之间看风使舵，遇到不幸就追随他的主子和祖师爷希特勒。希特勒为了更好地控制这两个人，非常巧妙地利用他们的相互角逐，驱使这一个人来反对另一个人。

一九三〇年九月选举以后，以戈林为首的一百零七个纳粹党议员进入国会。格利戈尔·施特拉塞属于他们中的一个。在不到两年半的时间内，从十二个议席发展到一百零七个议席，戈林是唯一取得这样胜利的人。一九三一年十月，他失去了他的妻子卡琳；她多年来患有结核病。现在他可以完全投身到政治界，把他的一生献给在他看来已经成为半个上帝的那个人。

一九三二年初，选举总统的准备工作开始了，年迈的兴登堡总统到四月份任期届满。纳粹党人认真地注视着希特勒的竞选，可是有一个障碍：希特勒不是德国人。这时戈林突然有个天才的想法。多亏他在不伦瑞克政府里有两个

纳粹党人朋友格兴泰尔总理和克拉格斯内政部长的帮忙，希特勒才被任命为不伦瑞克驻柏林公使的政府顾问。这样，他自然而然地得到了德国国籍。从此，一切都进行得一帆风顺。二月二十四日，他拿到了任命书，二月二十六日他宣誓并放弃他的工资。三月四日，他辞去职务。仅仅八天时间希特勒就成了德国公民！

但是他在四月份的总统选举中受到了挫折。年迈的元帅仍在总统这个职位上。三个月以后，在七月三十一日的国会选举中出现了一次真正的纳粹袭击高潮：纳粹党以二百三十个议席成为德国最强大的政党。戈林所作的努力得到了报偿：他被选为国会议长之后，搬进了紧靠国会大厦的那座宫殿。

国会很快又被解散了，因而不得不重新选举——那是一种逐渐变得庸俗化的走过场，从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二年在德国确实有过三十多次的选举。尽管纳粹党人在新选举中失去三十四个议席而遭受挫折，戈林仍然是国会议长，他的职责是打开通向那位老元帅的大门，他在危机中有求于元帅。现在危机几乎是接踵而来，他使老先生想起了这个旧日的军官，原来在大战期间接受荣誉时，有人把他介绍给了元帅。

作为国会议长的戈林曾有两次机会把事态的发展转到另一个方向。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二日，在巴本还未把由国会议长收到的解散法令交给他之前，他叫人们对不信任提案进行表决，因为这个提案要强迫解散巴本主管的那个部；当巴本在他面前对这个提案表示犹豫时，戈林就故意忽视这

项解散法令。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二日发生了第二件事情，施莱彻尔内阁处于崩溃阶段。这时戈林说服元帅的儿子奥斯卡·冯·兴登堡，要他对他的父亲施加这样的影响：只有希特勒能够成立新政府。

因此戈林为希特勒效劳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个人的行动对夺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一九三三年三月，他已经把一部分重要的权力紧紧地掌握在自己手里了。

这个人的情况就是这样，他在取消德国人的自由和建立盖世太保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当老元帅把总理职务托给那个在不久前还被他称之为“波希米亚上等兵”的男人时，他提出了四个正式条件。第一，首先应该让巴本担任副总理。第二，牛赖特留任外交部长。第三，巴本作为普鲁士总理应得到一个近似于帝国内阁总理的重要官职。第四，当时作为德方代表离开柏林前去参加日内瓦裁军会议的瓦尔纳·冯·勃洛姆堡担任国防部长。

“这位老先生”想通过以上四个条件把纳粹置于自己的监护之下，特别是想把纳粹置于巴本的控制之下。纳粹党人接受了这些条件，因为他们有决心扭转这个困难局面。在这方面，戈林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戈林在电台发表讲话说，希特勒再过几小时就要担任总理了。前几年蒙受耻辱的历史永远结束了。“今天翻开了新的一页，而且在这一页里，自由和荣誉将奠定新的国家基础。”自由?! 荣誉?! 许多德国人很快就会有机会在盖世太保的集中营和监狱里理解这些话的

价值！

在新的内阁里，戈林必须顶住巴本这个对立面。他是不管部部长、国会议长、普鲁士内政部长和航空界的全权代表。显然，巴本并不打算干涉航空事务，但是他以普鲁士帝国委员身份想要在警察事务中监督戈林。因为普鲁士无疑是德国最重要的一个联邦，而且柏林处在戈林的管辖之下。

因此，戈林首先采取的一个措施就是要剥夺帝国委员在警察中的权力，并亲自掌握警察的领导权。此时，弗立克作为德国内政部长有权监视普鲁士内政部的活动。虽然他不能对它颁布任何命令，但是却可以给它出一些难题。戈林禁止他部里的官员回答德国内政部的询问。

戈林对警察发生兴趣已有多多年。在他担任国会议员并在政府部门里建立持久联系的时候，他就权迷心窍，一旦有了这种权力，他就可以建立一支组织良好的、可以任意摆布的政治警察。在他的脑海里逐渐产生了一种成立秘密警察的设想。他曾经有机会认识了普鲁士政治警察的头头：鲁道夫·狄尔斯。此人是马尔堡大学的“永久大学生”，与其说要在课堂里找到他，倒不如说在啤酒晚会上找到他来得更容易。他是某个封建团体的成员，而且是个有名的好色之徒。大家都知道，他是个爱开玩笑的人，又是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为了结束他那放荡的生活，他终于当了警官。他可以在这个位置上充分利用迄今为止未发挥的特点：一种特殊的观察力和异常敏锐的目光。

他在柏林警察局第一处工作时有机会发挥这种才能。人们可以交给他任何任务，即使是非常困难的、违反常规

的：只要事情对他大有可为，他就会努力去解决。他如此巧妙地混入了柏林堕落者的圈子里，致使他可以收买罗姆的私下信件。在这些信件中，这位冲锋队的参谋长毫无保留地说出了他对同性恋爱的嗜好。这些信件落到了普鲁士政府的一个公务员的手里，他希望把它们公布于众，给予冲锋队以致命的打击。

在争权夺利的那些年代里，纳粹党不得不公然对抗四万多件针对他们的诉讼案。一九三二年底，党员总共被判一万四千年的监禁和一百五十万马克的罚款。在刑事起诉中警察局第一处曾起了重要的作用。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三日，全德国警察对冲锋队和党卫队采取行动，终于取缔了这两个组织。到处在进行抄家，包括冲锋队的学校、军营、司令部。这两个纳粹战斗组织的活动一直被禁止到巴本政府取消禁令为止。

由于这些事件，狄尔斯和他的同伴们一样陷入了困境，也许他还要陷得更深一些，因为他表现得特别积极。他比他们有先见之明：他第一个知道，形势起了变化，纳粹党人不久将是德国的主人。

八月份，戈林当了国会议长，狄尔斯并没有弄错。他谨慎地对这位新议长进行了一次拜访，并向他呈递了秘密的档案材料，其中有过去调查来的、可使敌人动弹不得的档案材料，而这些材料如今却在那里打瞌睡。精通业务的狄尔斯向戈林说明了他所使用的渗透手段。正象他所梦想的那样，他可以成为一个政治警察，一个全能警察。面对这些可以用来恫吓政敌的秘密档案，戈林知道该对他如何表示感

谢，并使他有可能巩固其在纳粹党内的地位。他已经意识到那种隐蔽方法的无声价值。只有这样一种秘密力量才能把罗姆有朝一日企图使用的（不是为了党和元首，而是为了自己）那批打手和吹牛大王的军队打倒在地。

狄尔斯似乎已经理解到，还得用其他方法博得戈林的欢心。戈林好充大人物。他喜欢在国会或者在他的议会大厦里夸耀自己，每当公众在集会上向他欢呼时，他总觉得乐滋滋的。遗憾的是，他是个穷极潦倒的贵族。那个到处都要插一手的狄尔斯现在也同交易所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多亏他在那里得到的情报，戈林才能幸运地进行投机买卖，根据自己的地位和奢望轻易出场。狄尔斯就是这样成为戈林的心腹的，而且他还采用不可靠的冒险行为，甚至把他的伙伴拉入帮凶的行列，以达到高官厚禄的目的。

纳粹党人掌权时，用来巩固他们政权地位的警察机器业已准备就绪。长期以来，狄尔斯拟定了消灭共和政体的警官名单早在二月八日，即纳粹掌权的第三天开始清洗，只留下了三分之一不会干坏事的老人马。在警察的名单上充斥了清一色的纳粹党人，他们都是从党员或者从冲锋队和党卫队中挑选出来的。戈林把政府高级顾问狄尔斯放在新警察的领导岗位上。

狄尔斯的那种疑神疑鬼的性格和那种放荡的、屡教不改的生活习气并不妨碍戈林。难怪希尔马·沙赫特博士以后说道，当时“酒癖是纳粹思想的最基本的要素之一”。

狄尔斯知道，他的主子和上司由于竞争的缘故成了罗姆的对手。但是他自己同冲锋队的领导，尤其同罗姆，还有

柏林-勃兰登堡小组的领导恩斯特、柏林冲锋队队长赫尔道夫伯爵和后来的柏林警察局长以及冲锋队未来的参谋长维克多·卢策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他始终不渝的老习惯是玩弄两面手法，利用与他们的关系收集一些资料，这些资料在不久的将来可以证明是最最有用的。

清洗警察的工作几小时后就结束了，接着马上开始镇压政治上的敌人。对此，冲锋队、党卫队和警察紧密合作。首先剥夺共产党的领导，然后剥夺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冲锋队在柏林附近的奥拉宁堡建立一个“私人”集中营。成百个无辜被捕者被押送了进去。前总统埃伯特的儿子和普鲁士邦社会民主党主席恩斯特·海尔曼同许多其他的知名人士一起被关在那里。戈林不仅知道冲锋队的其他四十个集中营，而且也知道这个集中营的存在。

党卫队在柏林本地建立了自己的监狱。它设在巴佩将军大街的哥伦比亚大厦里，完全逃避了由非纳粹分子古特纳博士掌权的德国司法部的监督。纳粹党人诙谐地把这座监狱称之为“打鸽子”。不久，从这座监狱里流传出一些最骇人听闻的事情。

二月二十二日，戈林签署了一项法令，这项法令把冲锋队和钢盔队的队员变成了辅助警察。这样，他不仅加强了他的“扩大的警察的军事行动”，而且还能腾出一部分力量来对付罗姆，因为现在的冲锋队已为警察效劳，受警察雇佣，因而也就自动地处于戈林的权威之下。这种半官方性质的冲锋队加倍采取暴力行动，而戈林对此却完全无动于衷。

与此相反，他鼓励那些服从他命令的部下无情地采取行动。二月十七日，他命令普鲁士警官“在紧急情况下立即开枪。每个警察都必须要有这种思想，即不采取行动要比在执行命令中所犯的 error 更为严重”^①。

他在二月十日和二月十七日的指示中建议：“……现在从警察枪管中发射出的每颗子弹就是我的子弹。如果有人说是谋杀，那我就是在进行谋杀。这一切都是我的命令，我抵偿一切，我承担责任，我无所畏惧。”^②

三月三日，他在公开的演讲中对“祖国的敌人”，即对纳粹党的敌人说：“我这里不行使什么公道，要有的是消灭和根除，别的什么也没有……但是我要在这场生死搏斗中痛击你们〔共产党人〕，我要同我手下的褐衫队员^③一起进行这场斗争！”

由于这些鼓励，多特蒙德的警察局长舍普曼命令他的部下，无须报告就可向散发敌对性传单的人开枪，天天能发现带着残酷虐待痕迹的尸体。二月底，德国报馆可以写东西了，六个月里，至少有二万八千人被送进集中营和监狱，这一切怎么会不使人感到惊讶呢？此外，这个数字还远远不符合事实，因为大多数人都是被秘密逮捕的。

发生国会纵火案的当天晚上颁布的紧急法使上述这些

① 《国际军事法庭对主要战犯的审讯、记录和文件》（注：以下简称为《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 42 卷，脚注 2324。

② 赫·戈林：《一个民族的建设》，第 86 页，柏林，1934 年，《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 30 卷，第 178 页，脚注 2324。

③ 格里茨巴赫：《赫尔曼·戈林——演说和文章》，第 27 页，慕尼黑，1939 年，《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 30 卷，第 27 页，脚注 1856。

措施合法化,反对党的所有领导人被捕入狱。

纳粹党人终于在三月五日顺利地上了台。当时担任普鲁士总理的戈林完成了他的事业,并准备让引以为骄傲的政治警察(盖世太保)大显身手。但是,在幕后早已有另外一个人决心要把警察夺走。

第三章

国会纵火和盖世太保

三月二十三日，戈林宣布新的国会议会开幕。早在第一次会议上就宣布了对为“祖国着想”即为纳粹着想的罪犯和过失者实行大赦。六月二十三日，由于取消了在反对纳粹“斗争年代”中所作出的判决，该大赦令更趋完备。有关的法律规定：立即释放被剥夺自由的人，退回他们所付罚款，注销所有被判刑者在刑事犯登记表上的名字。纳粹党为他们平反，偿还他们的费用。这样做也是对未来的一种保证。但是戈林想从现在起按照严格的法则办事。这意味着今后只有根据命令才能开枪。

为了能够顺利地进行这些或多或少的罪恶活动，那些“资产阶级”的部长们必须从他们负责的岗位上撤换下来。由于四月一日和七日颁布了国家新秩序的两项根本法，除了普鲁士邦议会外，所有的邦议会都解散了。任命各邦地方长官来替代他们的工作。这些地方长官直接向总理负责，并关心国家法和元首指示的执行情况。中央集权就这样轻易地产生了。不久，已成为多余的德国参议院和在一九三四年初各邦保留的一些自主权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各邦地方长官是在经过彻底了解、确实经受得住考验的纳粹分子中挑

选出来的。党的政治组织成员在反对党卫队的显贵者——他们是危险的敌人——的激烈斗争中夺得了大部分权力。

在普鲁士，斗争进行得很激烈，因为它是关系到要把巴本甩掉的一场斗争。希特勒自任总督——这是有关法律所允许的——并且把某些权力授予戈林，帝国委员弗朗兹·冯·巴本则被赶下了台。戈林对完成他的庞大的警察组织的建设工作非常重视。这就是普鲁士政府为什么还没有解散的原因。如果该政府解散了，普鲁士警察就会落入帝国内政部长弗立克的管辖权之内。

经过这次准备工作之后，戈林于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公布了一项法令：在普鲁士内政部长戈林的亲自领导下，正式建立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同一天，狄尔斯被任命为警察部长戈林的首席助手。在德语中，“秘密”这个词具有“私人”的意思。事实上，这个秘密警察将同时成为一个政党，甚至某个人的私人警察。各联邦中通常把国家和党等同和混淆在一起的做法在这里得到了证实，而且又很快在其他所有部门得到证实。

通过这项法令，普鲁士每个区均建立了国家警察分局，它们隶属柏林总局。当时限制在柏林地区活动的盖世太保在每个地区架设了一条天线。但是它的势力还没有超越普鲁士的界限。

无论在警察局，还是在司法机关和国家官员中，清洗工作已经完毕。四月七日公布的一项法律允许释放反法西斯的、犹太人的或以前左派组织中的国家官员和法官。

六月二十二日，戈林部长的一项指示谆谆教诲那些官员，要监督所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谈话，并且把发表批判性言论的人的名字报告给他。六月三十日，下达同样的指示，要暗中监视工人。连续不断的间谍活动就这样开始了，监视和告密交织成的网覆盖着德国大地。

秘密警察居于这只蜘蛛网的中心。从它成立那天起，人们就习惯于根据它印的邮戳“盖世太保”来称呼它。这个名字在几天之内就声名狼藉。七月份，盖世太保在打击反对派这一战役中取得了重大成就，从而显示了它的厉害。早在几年前成立的共产党地下组织被摧毁了，由约翰·谢尔领导的工作人员全部被逮捕。谢尔自己由于重新建立一个被解散的党而受到控告，冲锋队队员把他从待审拘留中带走，并枪杀了他。

在对反对党采取行动的同时，盖世太保奉戈林的命令开始对冲锋队进行颠覆活动。现在罗姆直接受到了监视。

戈林作为代理帝国委员和普鲁士警察部长主管集中营。可是由冲锋队建立的一批集中营都逃过了他的控制。有关集中营的可怕报道流传极广。对此，戈林并不过问，但是他不允许在他的职权范围内打开缺口。那些可怕的谣传给他提供了直接攻击罗姆的机会。因此，罗姆的处境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危险。自从夺权以来，冲锋队在无限制地扩大。仅柏林一地的冲锋队（包括勃兰登堡省的一个边区）就有六十万人以上。“红色阵线”的整个部队转入了冲锋队。柏林人称他们是“牛排货”，即“外褐里红”。罗姆对此满不在乎。一九三三年底，德国有四百五十万名冲锋队队员，罗

姆任不管部部长。

戈林试图制止罗姆步步高升，他委托狄尔斯去调查冲锋队在集中营的情况并去解散它们。只允许“官方的”集中营继续存在，而且由党卫队管理。为此目的，戈林同党卫队头子希姆莱达成了一项秘密协议。

事实上，冲锋队交付了一叠染上鲜血的帐单，他们不但“消灭”了敌人，而且还消灭了已经变得危险的昔日的帮凶。冲锋队杀死了工程师乔治·贝尔，他在希特勒和亨利·德特丁先生之间的财政交易中曾经当过经纪人。冲锋队枪杀了警察少校洪格林格，他在慕尼黑十一月政变开始时反对过希特勒。此外，在冲锋队的牺牲者当中还有它们的逃兵、党卫队长，因为这些党卫队长在那个疯狂般地追求功名、天天削尖脑袋向上爬的海因里希·希姆莱眼里已经成为危险的劲敌。

冲锋队在夺权斗争中有三百人死亡，四万人受伤。他们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

汉斯·伯恩德·吉斯维乌斯自己曾经参加过几个月盖世太保，在他站到反对党一边以前，他对这股旋风作了如下描绘：

“……冲锋队进行大搜捕。冲锋队进行抄家。冲锋队没收财物。冲锋队传人审问。冲锋队拘捕他人下狱。简而言之，冲锋队已经上升为永久性的辅助警察。他们对在所谓‘体制时代’建立的各种法律原则和管理制度毫不介意……要是它看准了谁，谁就倒霉！当时出现了‘地堡’式的那种可怕的秘密监狱。每个出色的冲锋队组织必须至少

占有一个秘密监狱。抓人已成为冲锋队的嗜好。衡量一个冲锋队领导人的才干是根据他囚犯的数目，评价一个打手的威望是根据他对俘虏进行‘教育’的打击力……”^①

在有些地方，昨天的同盟者、右派政党对这些暴力行为深感不安。但是在布朗斯威克，钢盔队起来反对冲锋队，因此被解散。任何一种反抗，甚至犹豫不决都会受到镇压。

冲锋队领导人成为骄傲和残酷的总督，成为对他们同胞的生死权利提出无理要求的君主。每一个暴君身边都有一个武装到牙齿的、恶棍式的贴身警卫，并且尽可能为自己组织一支特别分队——“第一局”，他们的任务是追踪和干掉政治上的敌人。他们毫无根据地逮捕以下各种人：真正的和所谓的共产党员、犹太人和那些由于缺乏感化的、善良的、怕得要死的人士。

这是违法的竞争，戈林对此很生气。狄尔斯把他的罗网撒向“秘密集中营”。这类集中营大约有四十个，有四万到五万个“祖国的敌人”被杀害在集中营里。最有名的是奥拉宁堡，虽然冲锋队建立了这个集中营，但是自从它建立以来却由盖世太保的官员进行管理。盖世太保几乎把所有的被捕者都送往那里。可是没有人去过问此事。但是在乌珀塔尔、霍恩施泰因和勃莱多夫这三个地方的集中营是由当地的冲锋队队长领导的。帝国司法部曾经收到过关于虐待那里囚犯的诉苦信。古特纳把这些信件转呈给希特勒。

勃莱多夫集中营是由冲锋队队长、前任波莫瑞区的行政长官卡尔芬斯坦因建立的。戈林却把它关闭了，同时关

^① 《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12卷，第296页。

闭的还有海因斯领导的布雷斯劳集中营，海因斯是罗姆的知己，与罗姆一样有同性恋爱的怪癖，他把快乐建筑在对俘虏施以残忍的极刑上。在柏林地区，那里的冲锋队队长卡尔·恩斯特过去是咖啡馆的一个服务员，他的经历很不光彩，可现在却是冲锋队的一位重要人物，他同样拥有自己的“秘密”集中营，戈林也把它关闭了。

然而，这里还没有谈到有干扰党卫队集中营的事情。达豪集中营就是其中之一，它在十二年以后落到了臭不可闻的地步。集中营司令官、党卫队队长西奥多·艾克公布“警卫人员工作守则”，其中说：“容忍意味着软弱。从这种认识出发，只要为了祖国的利益必须在任何地方采取无情的行动。那些受人挑拨的、规规矩矩的同一民族的人是不会触及这些刑法的。但是要告诉那些政治上的挑拨者和聪明的煽动者(不管是哪种倾向的)，你们要当心，不要让他们捉到你们，否则他们会抓着你们的脖子以牙还牙地杀害你们。”^①

每个党卫队员都知道，什么是“祖国的利益”。五月份，前共产党议员德雷泽尔和施莱法在达豪被谋害。五月十六日至二十七日这段时间里，另外四个俘虏被杀死，而且是被四个党卫队卫兵杀死的，这说明杀人是他们的家常便饭。

五月二十四日，当慕尼黑的律师阿尔弗雷德·施特劳斯博士在白天受讯之后，因颈项被人开了两枪而致死。进行尸体解剖的医生确定，身体上有“黑色和蓝色的压伤处和裂缝的伤口”。其他三个俘虏莱昂哈德·豪斯曼、路易·施洛

^① 《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26卷，第292页，脚注778。

斯和塞巴斯蒂恩·内夫茨格惨遭同样方式的杀害。

当时慕尼黑检察院还没有按照纳粹思想行事。他们要对这起谋杀嫌疑案提出起诉。党卫队领导解释说，这四个俘虏是在企图逃跑中被开枪打死的。可是施特劳斯博士案件中的医生鉴定证明，死者是穿着拖鞋的，他“一只脚穿着短袜，另一只是赤脚的”，“显然是由于伤口”的缘故。这两颗子弹是从附近发射出来的。

很清楚，关闭冲锋队的集中营，不是因为那里囚犯受到虐待，而恰恰是冲锋队在管理着它们。罗姆和他的朋友们十分懂得这一点。他们进行了回击。

一天早晨，柏林的盖世太保把两个囚犯押送到奥拉宁堡。这两个人也同其他囚犯一样，情况很惨。十分明显，在审讯时他们遭到了虐待。不过这一次，集中营当局对这件事非常恼火。集中营司令官舍费尔向他的上级冲锋队领导人舒茨韦克塞尔报告了这宗案件。舒茨韦克塞尔也显得很恼火。他俩驱车前往盖世太保的所在地艾尔布莱希特亲王街，“要求予以澄清”。人们有礼貌地接待了他们，答应他们查清犯罪的人，并在第二天提出一份报告。

事实上，第二天就对这些抗议作了回答，而且是通过电话回答的：由于虐待囚犯，特此解散奥拉宁堡集中营。一列列车已在途中，以便把俘虏押往不久前由党卫队在埃姆斯河附近建立的集中营。舍费尔正好还有时间赶往柏林，向国务秘书格劳尔特报告此事。他眼看着一场严重的冲突即将来临，因此决定撤回这项解散令。奥拉宁堡集中营在舍费尔父亲般的严格控制下照常“工作”。

这仅仅是激烈斗争中的许多插曲之一。这些天以来，各个纳粹组织之间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随着这个政权的崩溃，斗争才会自行停止。是的，有些私人的帐只有在纽伦堡法院大厅的国际军事法庭上才得到清算！但是那里的竞争常常发展到无比仇恨的地步。

这些竞争是在争权夺利、争夺嘉奖的斗争中发生的，在这场斗争中，不是以个人功劳、能力、道德价值作为准则，而是以一个集团或受到一位有势之友的一时宠爱或暂时得势作为准则。每个组织都在拚命排挤别的组织，特别是触犯自己利益的那些组织，在它们内部，一场类似的斗争在那些想要分享权力的私党中间蔓延开来。

盖世太保也参与了这场斗争。这帮家伙表面上看来是个相互依赖的、顽固的和可怕的统一体，但是实际上却象一只篮子里面的许多螃蟹在互相争夺，互相排挤。

狄尔斯是戈林唯一的得宠者，他的职务令人羡慕。对某些人说来，干掉狄尔斯就意味着取代他的宝座。因为按照纳粹的习惯，告密者先要把被告者交给刽子手之后，才能获得作为报酬的职位。戈林的敌人把狄尔斯作为目标，如果他下台，这对总理来说将是一个严重的损失。但是面对这些阴谋，狄尔斯采用一个狡猾的奉承者的完美无缺的伎俩来见风使舵。

可是有一天，他的一个敌人找到了可以出其不备、攻其一点的机会。兴登堡所信任的一些将军们故意对盖世太保的种种惯例提出了抗议，接着向兴登堡递交了一份材料。那是弗立克搞的，他对戈林争夺盖世太保控制权的方式方法

并不满意。但是这种手腕也没有成功。戈林解释说，这可能只是那些过于热心的部下所犯的个别的越轨行为，同时委托一个委员会来改组盖世太保并对越轨干涉行为采取相应措施。显然该委员会从未举行过会议。但是戈林为了安慰一下元帅，不得不牺牲狄尔斯。不过在一九三三年九月底，他又被召回来，担任柏林警察局副局长。可是狄尔斯——盖世太保的真正“发明者”是熟悉它的曲折道路的。他鄙视新职务，认为聪明人应该越过捷克斯洛伐克边界，在波希米亚耐心等待即将发生的事件。在他看来，已经受到纳粹侵袭的奥地利不太安全。

戈林忍受了他所遭受到的打击。狄尔斯的免职是他敌人的一个胜利。但是他找到了补救。

戈林任命一位名正言顺不会受到怀疑的“老战士”来替代狄尔斯，他就是威廉·库贝的一位朋友阿尔托纳区的警察局长保罗·欣克勒。威廉·库贝曾经是纳粹党议会党团驻普鲁士的议会主席兼勃兰登堡地方行政官。

欣克勒就此充任新职。戈林知道保罗·欣克勒是个酒鬼，不过经过慎重考虑之后，感到不说为妙，因为欣克勒与他前任的酒量相比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他曾因盗用公款一事受过审讯，但后来由于神经错乱而被释放。事实上，欣克勒是个双料的神经错乱者：生来的低能者和十足的酒鬼。

狄尔斯住在农村深居简出，但还是密切注视着即将发生的事件。九月二十一日，在他逃跑时的前八天，国会纵火案开始提起诉讼。狄尔斯曾经领导过这次调查工作，他熟悉内情，知道有人会重新提起这桩事。在国外，这次起诉激

动人心，流亡国外的德国人尽力要使案件的真相大白于天下。狄尔斯悄悄地透露风声，如果有人肯奖赏，他可以回到纳粹那里去。

在柏林，欣克勒的越轨行为日见增多，十月底，他任职还不到三十天，就被迅速地撤了职。狄尔斯被紧急召回，官复原职。他首先要做的是公布对欣克勒的逮捕令。当密探在清晨时刻到达他家时，幸亏他还有时间，穿着睡衣裤跳出窗外，穿过动物园逃跑。一个警察巡逻队把他带到了附近的警察分局，他可以在那里通知他的朋友库贝前来给他解围。

在预先发出这个警告之后，狄尔斯重新恢复了自己的工作和原来的方式方法。戈林似乎嗅出了子弹的气味，决心预防一次新的袭击。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三十日，他以普鲁士总理的身份，通过一项变革的法令，剥夺盖世太保在内政部的权力，然后把它置于自己的领导之下，从法律上来看，把警察中的一个部门分离出来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是纳粹的信条就是要藐视任何的法律准则。

同一天，戈林对委员会的某些成员免除逮捕令。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是在狄尔斯辞职时任职的，而且根本没有举行过一次改组和控制盖世太保的会议。虽然没有执行逮捕令，但是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对那些想要从神圣不可侵犯的盖世太保那里捞好处的人提出了警告。

一九三四年初，赫斯特报纸发表了戈林的一篇文章，他写道：“我们拒绝用法律来为人民的敌人进行辩护……我们纳粹党人有意识地反对错误的宽大和错误的人道主义……”

我们对深思熟虑的律师艺术和言过其实的咬文嚼字的法律一窍不通。”^①

当然，纳粹党人从来没有尊重过“咬文嚼字的法律”，唯有在他们设法利用准备好的重大案件进行宣传时才会考虑使用那些法律细则。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在莱比锡的国家法院里，这出戏剧第二幕的幕布徐徐升起。它的第一幕曾经在二月份唤醒了德国和世界。七个月之前，国会大厦的半圆形屋顶着火燃烧，化为一片瓦砾，接着，自由德国跌进了一只毁灭性的高温炉里。现在，帝国的那些新主子力图在国际舆论面前为自己辩护，但是自从纵火案发生以来，没有人会相信传奇式的纵火案会由共产党人干的，这样一个神话有可能对纳粹党人的敌人采取毫不留情的镇压措施和发动一场毁灭性的战争。当时他们的地位还不稳固，所以需要战争来巩固政权。

那位穿着法衣的老态龙钟的参议院议长宾格尔的身旁坐着四个陪审员。在召开的五十四次会议期间，他作了最大的努力来维护他那仅有的一点尊严，可还是逐渐失去了审理案件的领导权。

在被告席上坐着五个完全不同类型的男人，显然，这是因为（对纳粹党有利的）偶然事情使他们五人相继来到这里。在被告席上为首的是一个半白痴的荷兰人范·德·卢勃。他是在燃烧着的国会大厦里被捕的，无疑属于纵火犯

^① 戈林：《演说和文章》，第1591页，慕尼黑，1940年。《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7卷，第215页。

之一。坐在他旁边的是共产党国会议会党团的前任主席，党的最有名的演说家之一托格勒，接下来是最受人爱戴的德国共产党主席恩斯特·台尔曼。为了证明自己是无罪的，他在纵火那天自己去向警察局自首，此后他就被禁闭起来。这是根据两个可疑的证人的供词而对他提出的控告，这两个人就是参加过纳粹党的前老共产党员弗赖和卡尔瓦纳。他们发誓作证说，纵火那天，他们看见托格勒同范·德·卢勃一起走进国会大厦，就凭这个供词已经足够了。更有趣的是其他三个被告是在莫明其妙的情况下被捕的，他们三个都是保加利亚人。一个名叫黑尔默的人是波茨坦大街“巴伐利亚宫”饭店的服务员，他在报上看到范·德·卢勃的一张照片和看到广告栏里的一则通告，通告里这么说，凡是抓到凶手范·德·卢勃的同谋犯，可得重赏两万马克。黑尔默现在回忆说，在“巴伐利亚宫”曾看到卢勃同三个男人在一起，他们经常光临这家饭店，“肯定是布尔什维克”。因为“巴伐利亚宫”是一家相当高级的饭店，而象范·德·卢勃这样的流浪汉很可能还未进门就被赶了出来。这种情况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警察在“巴伐利亚宫”设了一个圈套，在三月九日逮捕了这三个老顾客。两个人身边带着普通护照，上面证明他们是黑迪格尔博士和帕内夫博士。第三个人身边没有带护照。当局只花了几分钟，就确定这些护照是伪造的。对此，这三个人承认，他们叫布拉戈伊·波波夫，华西尔·泰涅夫和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而且都是保加利亚人。

季米特洛夫！当盖世太保总部的人获悉有这个战利品

时，顿时爆发出一片欢呼声。季米特洛夫是西欧共产国际地下组织的领导人，在保加利亚已经两次被分别判处二十年和十二年监禁。其他两个保加利亚人在他们的国家里，同样由于政治活动被判了刑，每人被判徒刑十二年。他们逃出了保加利亚，在俄国避难了一段较长的时间，不久前才来到德国，以便设法从这里秘密地回到保加利亚去。他们断言，从未看见过范·德·卢勃，至于托格勒这个人也是只知其名，而不知其人。他们被捕的消息一公布后，就有几十个证人前来报到。这些人都斩钉截铁地说，在饭店里，在大街上以及在国会里，看见过这三个人同托格勒和范·德·卢勃一起，如何把贮藏器拖到那里以及如何偷偷地把它们放在大厅和那些最想象不到的地方。季米特洛夫镇静地倾听着这些言论。要证明他在起火那天去过慕尼黑，那是不费吹灰之力的。

五个人就这样站到了被告席上，控告书的指控对当场被抓到的卢勃来说是致命的，他是一只披着人皮迷了路的可怜的野兽，而对其他四个人则是毫无根据的。

公众对这次起诉颇感兴趣。来自世界各地（没有得到允许的苏联记者除外）的一百二十名新闻记者把国会大厅的记者席位挤得满满的。希特勒想从这次“无情的”判决中捞一把，通过这次判决，使案件审理获得成功，并借助新的力量使反共宣传复活起来。

然而，在莱比锡起诉前不久，已经有另一个法庭对这次事件作了判决。流亡在法国、荷兰、英国和美国的德国人曾经向世界舆论发出紧急呼吁。他们进行了调查，请来了证

人，公布了照片和文件，设法把大家认为可能的真相如实地反映出来：国会是由纳粹党人自己放火烧的，目的是要让年迈的兴登堡在紧急法上签字，为他们的镇压措施辩护。

在巴黎，借助于安德烈和克拉腊·马尔罗，让·盖埃诺和意大利人希亚罗蒙特成立了一个特别积极的核心小组。在德国共产党的两个作家维利·明茨贝格和古斯塔夫·雷格勒的领导下，用几种语言公布《褐皮书》并广泛宣传。真相开始大白于天下。

九月初，伦敦的一个反法西斯委员会委托国际调查委员会，由它决定，在莱比锡起诉前，对国会纵火案进行起诉。在一位有名的伦敦法学家，工党的一位拥护者，检察长德尼·诺韦尔·普里特的主持下，法国、英国、美国、比利时和瑞典的知名人士云集在该委员会里，其中有加斯东·贝热里，律师德·莫罗·贾费里，律师亨利·托雷，阿尔蒂尔·埃斯和弗莫伊伦。斯坦福·克里普斯爵士坐在起诉者的位置上。他叙述了事实的经过并强调指出，这次表面上的起诉在法律上是无效的，它除了揭露在德国由于种种情况而受到阻碍的真相之外，别无其他目的。

会后，委员会才明白，卢勃虽然是纵火者之一，但只是被用来作为一种工具。那么它是掌握在谁的手里？委员会回答说，是在纳粹党人的手里，特别是掌握在戈林的手里，他应该是主要的被告人。九月十一日，律师德·莫罗·贾费里大声叫喊道：

“在整个世界上不会有这样的法庭，不会有这样的裁决，甚至是最无情的裁决，对被告抱着最敌视的态度所作出

的裁决，都不愿意在眼下去接受这种童话似的可笑证据，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人是要面子的，在决意干坏事的被告者身后，肯定隐藏着戈林那样的人，他已经遭到所有正直人的良心上的谴责。

“二月二十七日晚上，在柏林，是谁手拿钥匙去国会大厦的？”

“是谁向警察下达命令的？”

“是谁能够加强或放松对国会大厦监视呢？”

“又是谁手里拿有去大厦地下室的钥匙，而且看来只有用这把钥匙才能进入地下室呢？！”

“这个人既是普鲁士邦政府的内政部长，又是国会议长，他就是戈林！”

“为了保持面子……”对此，最高法庭费了很大的劲。因为起诉者一方很快出了洋相，他们面对着季米特洛夫对他们发起的猛烈抨击，只有招架之势，而无反击之力。其他被告态度消极。范·德·卢勃神情忧郁，人们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他嘴里挤出一些简短的答词。至于泰涅夫和波波夫，他们不会说一句德国话。季米特洛夫争得了起诉的主动权。他成了起诉者，他的起诉词简洁明了，使得原来的起诉者、帝国律师瓦尔纳博士决定采取一个惊人的步骤。他设法弄到流亡者的一本《褐皮书》的样本，逐页进行审查，以便证明这是编造出来的唯一谎言！

这样，起诉者成为被告者，诉讼案在继续审理过程中，除为起诉者进行辩护外，并没有达到其他目的。

接着，这些人在法庭的栅栏旁一一走过，德国人都在窃

窃私语着他们的名字：布雷斯劳的警察局长，西里西亚的冲锋队队长海因斯；纵火时任波茨坦警察局局长的赫尔道夫伯爵；冲锋队队员舒尔兹以及最后戈林自己。

吉斯维乌斯生动地描绘了戈林出庭时的情景。他喜爱表现变化多端的性格（流行的“赫尔曼”、“忠心的骑士”、“民族英雄”等等），而在那一天他却选择了他特别喜欢的一种性格：“铁腕赫尔曼”。

这位“铁腕赫尔曼”身穿亚麻织成的淡褐色的猎装，脚上穿着使地板发出咯咯声响的高统靴步入会场。他强作镇静，但是很快就失去了镇静。由于愤怒而汗流浹背，他开始大发雷霆地讲了一通。这次起诉，出乎意外地发生转变，使他惊慌失措。戈林不知道，法官们正在研究一本《褐皮书》，那是一份“煽动性的文件”，这种文件只要被他发现，他就要把它消灭掉。

宾格尔坐在椅子上胆怯地注视着这个场面。他开始理解到，这次诉讼对他事业上的成就等于是敲响了丧钟。被告席上的季米特洛夫按捺不住他内心的喜悦。戈林怒气未消，气势汹汹地注视着他，试图重新保持自己的镇静。但现在的情况是由被告季米特洛夫审讯国会议长，国会议长必须回答！

一场难以置信的对话开始了^①：

“为了……能够找到同谋者，内政部长先生在二月二十八日以及在此后的几天里做了些什么，可能是在寻找同谋者吧？”季米特洛夫问道。

^① 吉斯维乌斯：《痛苦的结局》，第39页，汉堡，未注明年代。

“我本人不是刑事官员，而是位负责的部长，”戈林回答说。“因此，对我说来，重要的根本不是去发现几个小混蛋，而是去注意那些应对罪恶世界观负有责任的政党。”

他上了季米特洛夫的圈套，在围绕政治的舌战中迷失了方向。虽然他是一个纳粹党的重要战略家，但是他没有那种气势能够对抗一位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大师。突然，对戈林证人的审问变为一次共产主义的宣传会议，戈林大发雷霆，用侮辱性的口吻狂叫着：

“在我的眼里，你是一个应该立即被吊在绞刑架上的骗子！”

庭长马上插话，他提醒季米特洛夫，他已经对他说过，不允许他在这里进行共产主义的宣传。“如果这位证人发怒的话”，他是不会感到惊讶的。

季米特洛夫回答说：

“我很满意国会议长先生的回答。”

“滚出去，你这个混蛋！滚出去！”戈林吼叫着。

法庭上顿时骚动起来，工作人员把季米特洛夫拉出大厅时，他讲了最后一句话：

“你大概害怕了吧，国会议长先生……？你大概害怕了吧……？你怕了吧，国会议长先生……？！”

范·德·卢勃和其他被告之间的秘密协议是以控告卢勃是共产党人这个事实为基础的。但是在审理案件期间发现卢勃在一九三一年背弃了共产主义。刑事警察调查的结果清清楚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十二月二十三日，帝国法庭宣告判决：范·德·卢勃被判

处死刑，其他四名被告被判无罪释放。各国报纸对这次事件作了评论，流亡者胜利了。尽管对德国法官施加压力，但他们还是不准对无罪者判刑。当希特勒知道这次判决时，他暴跳如雷，周围的人见此情景，怕得要命。

然而，戈林不愿放弃他的战利品。他曾经对季米特洛夫说过：“我会再抓到你的！”事实上，戈林又抓到了他。尽管宣判无罪，但四名共产党人继续被监禁，直到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日益强烈的国际舆论的压力下，他们才被释放。托格勒被送进了集中营。服刑一段时间以后，他离开了这个集中营。因为他为纳粹服务，所以获得了自由。

一月十日宣布，范·德·卢勃已在莱比锡监狱的院子里被绞死。许多德国人对此表示怀疑。有人说，卢勃的家属为了把他安葬在荷兰，多次提出合法的要求，但是他们的要求从未得到满足。然而，使人不能理解的是，如果卢勃真是一个奸细的话，为什么纳粹党人对本来可以用世界上最合法的手段除掉一个如此讨厌的帮凶犹豫不决。盖世太保不喜欢留下任何痕迹。

立即把下面这句拉丁文成语写到国会大厦的废墟上也许是最恰当不过了：“*Is fecit cui prodest.*”^①

这次“奉命”照办的纵火案确实给纳粹党人帮了大忙，甚至可以这样说，纳粹党人是非常需要这把火的，因为这既

^① 前不久，德国新闻杂志《明镜》发表长篇大论，试图说明国会纵火案是卢勃一人搞的。我不能同意论文的结论。因为它对许多要点没有解释清楚，也许对于国会纵火案还得费上许多笔墨。（拉丁文 *Is fecit cui prodest.* 意思是：这是由此事获得利益的人所干的。——译者）

可为镇压措施辩护，同时又加强了盖世太保的地位以及为大规模的选举宣传提供了合法的证据。

发现起火后的一小时，希特勒和戈林都在注视着燃烧的大厦。狄尔斯领着他们穿过大火尚未烧到的走廊，向那些已在进行工作的人员交代第一批任务。

希特勒一到，火冒三丈地高声怒吼道：

“这是上帝的旨意！现在没有人会阻挡我们用铁拳去消灭共产党人了。”

一月三十一日，戈培尔在他的日记簿上写道：“希特勒在大会上部署了反对红色恐怖斗争的重大路线。我们目前不会采取反击措施。只有当共产主义革命爆发时，我们才会在适当的时刻给予打击。”

有人需要“共产主义革命”，是为了能够采取“反击措施”，然而，时间在消逝，革命没有爆发，而选举却愈来愈近了。选举前一星期，国会大厦失火了，这是上帝恩赐的一件真正的礼物，戈培尔可以从中捞到极大的好处。

二月二十二日，起火前五天，戈林把冲锋队改成辅助警察。没有他们根本不可能在起火的晚上和在第二天的几个小时内进行大规模的逮捕，逮捕对象的名单早已准备就绪，但是要逮捕这么多的人是需要出动全体人马的。

另外一个情况是：起火是在竞选中发生的。希特勒象往常一样进行了一场周密的选举活动。他那份由戈培尔制定的、并在二月十日分发给党小组的日程表恰巧安排得满满的。希特勒每天都得在几个大会上发言，大会地点往往是彼此离得很远。他所有的宝贵时间也许连一小时也不能失

去。但是，戈培尔在二月十日那天并没有把大会规定在二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而且把元首在二月二十七日不能在群众大会上讲话的事明确地通知了各党小组。事情发生得很奇怪：就在二月二十七日的这天晚上，国会大厦里的火焰熊熊燃烧起来。

现在着火了：第一批警官是在发现火势以后几分钟，即在晚上九点十五分到达出事地点的。他们对多处火源（六十到六十五处）以及分布在整幢大厦里的火源感到吃惊。大多数火源看来是由于燃料引起和点燃的，特别是从大会厅地板上升起的那股巨大的无烟火柱……

由海因里希·冯·格莱兴（“贵族俱乐部”的一个会员）出版的保守的《环球》周刊在三月份第二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在文章的最后部分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这一切怎么可能呢？我们真是愚蠢的民族吗？搞阴谋的主犯在哪里？他们对自己所干的事情会感到心安理得吗？也许他们是德国或国际上等社会的成员。”

这篇文章发表后，《环球》周刊立即被查封了。

戈林和戈培尔通过电台喊道，只有共产党人会进行暗害。起火后的那天，盖世太保和刑事警察搜查了共产党的所在地卡尔·李卜克内西大厦。尽管这幢大厦已经搜查过多次，并对它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清理，同时又有警察看守，但是正象戈培尔博士所宣布的那样，总还发现了具有头等意义的“重要文件”，这些文件证明，有人要在整个德国策划一次暴动。发动红色恐怖的信号可能是火烧国会大厦。他们到处散播这次所谓计划的细节，并说，这次计划之所以失败，

只是因为纳粹爱国者当机立断。尽管外国报纸提出许多要求，但这一大堆文件是永远也不会公布的，甚至连国会纵火案中一份非常重要的证件都不会提交出来。

那么这些担任调查工作的官员干了些什么呢？具体的事实已经证明其中有一个纵火犯当场被逮捕了。这些官员除了捉到一个托格勒和几个保加利亚人外，一无所获。然而，在阿图尔·奈比的支持下，狄尔斯亲自继续“追查”此事。阿图尔·奈比是一位有经验的老警官，他曾经因写了一篇刑事学论文而一举成名。

奇怪的谣言在居民中不胫而走，其中有些名字听来令人惊奇。毫无疑问，他们的名字已经传到成千个盖世太保中的一些人的耳朵里面去了。

有位贝尔医师讲了有关卢勃的一些怪事。这位医生在纳粹党内有许多朋友。但是他现在却说，卢勃同冲锋队保持多方关系。他装出一副知情人的样子补充说，他知道国会起火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在三月三日或四日那天，他在弗雷德里希大街国际俱乐部里对德国人民党的一位朋友说，他知道二月二十七日的事情经过，他（为了解此事而感到骄傲）又把这件事写信告诉一些党内朋友，以便使他们从中得到好处。其中有一封信投到了盖世太保的一个办公室。贝尔医生觉得自己已被人追踪、监视，他感到恐惧，于是他企图在奥地利那一边的边境，一个宁静的库夫斯太因地方寻求避难。四月三日，当他感到自己已经安然无恙的时候，他却被那些来自慕尼黑的冲锋队员杀害了。

接着，发生了奥伯弗伦博士（德国民族党国会议会党团

主席)的怪事。他也知道国会纵火事件的奇怪的细节。但是他写这些事情也太不聪明了。他把他知道关于那些纵火准备工作的情况记录了下来,然后寄给一些朋友。有一本小册子传到了国外。这份回忆录被发表在法国、英国和瑞士的报纸上。五月三日,人们发现这位博士死在他的住所里。根据警察局的报告,他是自杀的,但是他的家属发现他的一些私人文件不翼而飞了。

经过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的那次血腥清洗,罗姆的司机克鲁泽在成功地逃到了国外后给兴登堡写了一封信,向他揭发了国会纵火问题,说是由几个冲锋队员——罗姆的心腹——在戈林和戈培尔的帮助策划下干的。

但是所有这些谣言和说法,不管多么具体,有些细节很少有说服力。人们怎样才能进入国会大厦里去呢?入口处只有两个,一处是西姆逊大街上的二号门,它只有在举行会议的日子里才开放,一处是在国会旁边的五号门。二月二十七日那天只开放五号门。穿过这扇门到达一座大厅,大厅与门之间隔着一条绳栅栏。绳栅栏后面是门房间。每一个来客必须把他想要找的那个议员的名字登记在一张纸条上,然后写上他自己的名字和来访原因。工作人员把纸条送给那位议员,只有得到他的同意,来访者才允许进入大厦并由议会工作人员带领到议员那里去。最后把来访者的姓名登记在一份特别的日常进出人员表上。

据调查现场情况的官员说,总共有七至十个人携带大量燃料,而且他们一定拥有一把梯子。但是这七至十个人怎么可能回避检查呢?直到现在这还是一个谜。

此外，国会大厦的地下室里也有暖气设备，从那里有一段小阶梯通往地下过道，它贯通弗雷德里希-埃伯特大街，终点设在位于大街另一端的国会议长的王宫里。有一扇小门把过道与那里的暖气室隔离开来。走廊相当宽，甚至连一车煤也可以通过一条轨道推往王宫的暖气室里。

现在看起来，穿过该通道把整队人马带进国会大厦是多么的容易。

外面谣传纷纷，冲锋队长恩斯特和海因斯都是纵火犯，赫尔道夫伯爵也参加了这次行动，或者多少参与了这次准备工作。此外，恩斯特在喝酒时吹嘘过这次行动。起火后几个星期，在诺伊鲁平有一个名叫拉尔的人因撬门偷窃案被捕。他自以为，只要他揭露些什么，就可以摆脱这件偷窃案件。因此他要求，“在另外一件案例中”作为证人接受调查法官的审讯。

“二月份，”他说，“我是卡尔·恩斯特的卫队人员，国会大厦起火时我在场。”

这位好心肠的人就这样不停地往下说。他提到戈培尔和戈林，说出那些参加过这次行动的人的名字并且详细地描述了这次行动的情况，那位感到十分惊讶的书记员，司法部职员赖内金把全部供词作了记录。

这件事情是这样发生的：二月底的一天晚上，恩斯特把他卫队中的十名特别能干的冲锋队员召集到身边，要他们去完成一项棘手的任务。只准成功，不许失败。拉尔也是其中一个。根据一项计划，他们被安排在国会大厦的一些地方。纵火焚烧国会的目的并没有马上泄露给他们。在纵火

的那天晚上，这十个人随车进入国会议长的王宫，然后进入地下室。他们在那里等待卡尔·恩斯特的一个约定信号已有二、三小时，每人拿着一罐燃料，由于经过多次练习，每个人已经记住了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在长时间的等待过程中，是否还要进行其他活动，他们是一无所知的。

大约在晚上九点钟，恩斯特终于来了，他发出信号，这十个人就通过地下过道潜入到那幢静悄悄的国会大厦里，走遍各个角落，然后把燃料点燃。这一切在十分钟内就干完了。十个人仍由原路回到王宫。

这十个人也一直在等待同一时间发生的“另一个行动”的信号，另一个行动不是别的，而是对那位被“朋友们”当作心理状态正常的范·德·卢勃进行“遥控”。当时，这位可怜的家伙也许受到一种药物的影响，主要是受人唆使，袋里塞满了火柴和点火器来到国会大厦，他跨上一个窗台，敲碎了一块玻璃，这时候冲锋队员已经穿过几间屋子，把他们的燃料浇在指定的地点上，然后在戈林的保护下离开那里。显然，戈林到底是巧妙地找到并同意了由主谋者戈培尔所拟定的这项计划。

当这次行动的准备工作的准备工作一切就绪，戈林先授权吉斯维乌斯，以后又授权狄尔斯转移调查方向，要他们去注意消灭那些正在出现的、没有预计到的家伙。

拉尔就是这样一个“没有预计到的家伙”。

曾经把拉尔的供词记录下来那个书记员赖内金是个纳粹党人，他虽然是个不重要的，却是个自信的、没有头衔

的冲锋队员。他现在看到了一种能够出人头地的可能性，那就是使该政权的那些达官贵人注意他的价值。他深信，拉尔说出了事实的真相；拉尔说的那许多详情细节有据可查，特别是他在二月底确实担任过卡尔·恩斯特的贴身近卫，这一点他是深信不疑的。在同证人和证人供词的多次接触中，他学会了一种各打五十大板的本领。

赖内金向他的上司作了紧急汇报。鉴于事情的重要性，他们决定前往冲锋队总部。那里的人指示他们去找盖世太保。

盖世太保把拉尔从诺伊鲁平监狱里接出来并告诉法官，要使用他的证词。他被带到盖世太保总部那里，连续审问了二十四小时。

不少密探被派到各地去。盖世太保在莱比锡的邮局里截获了一封信，诺伊鲁平的法官把这封信送交给了帝国法庭的调查法官，信里附有拉尔供词的一份记录副本。

突然被提升为队长的赖内金在诺伊鲁平受托去销毁这份原始记录。同时，盖世太保在拉尔的住宅里、在他的情人处以及可能藏有他的信件或记录的其他地方都进行了搜查。

拉尔的下场正象他曾经希望过的那样，他获得了释放。而且是最终的释放。几天以后，一位农民发现了他的尸体。他是在白天耕田时把尸体挖掘出来的。尸体被人埋葬在只有二十厘米深的田里。他是被掐死的。

不管所有这些说法的真实性有多少，盖世太保的作用是很明显的：毫无疑问，国会大厦的火是由冲锋队放的，他

们归根到底是受到计划的主谋者戈培尔的怂恿，以及得到戈林的帮助进行行动的，如果没有他，那将会一事无成。

那么范·德·卢勃要在这伙人当中寻找什么呢？正如帝国法庭在审讯时正式指出的那样，这位不幸者是搞同性恋爱的。他曾经在柏林几家名声败坏的夜总会、避难所和咖啡馆里消磨时光，跟聚集在那里的一伙人厮混。冲锋队沾染上了同性恋爱，“男性友谊”盛行一时，参谋长罗姆是个标兵。柏林-勃兰登堡的冲锋队冲击团也受到了毒害，这批纵火犯就是从他们那里来的。恩斯特周围的人，如果不包括恩斯特本人的话，海因斯和其他许多人都是属于这伙弟兄们的，并且从他们当中挑选卫兵、司机和心腹。这位荷兰人由于同周围有着秘密的联系，所以当那些阴谋家正在密谋策划的时候，他就陷入了他们的圈套。他们立即认识到，可以使用他来担任一种角色。这可能是一种儿戏，训练这样一个半疯的人，唤醒他的无政府主义的狂热性，说服他（一个可怜的赫罗斯特拉塔！^①）把挑衅性的嘲笑火把掷进国会大厦——他所厌恶的这个社会制度的象征——的王宫里去。

他在行动前也许受到药物的影响。在审讯期间，他含糊地喃喃自语道，还有“其他人”。他讲不出什么更多的话；他陷入了某些医生认为是由莨菪胺引起的那种迟钝的状态中。

伦敦国际调查委员会揭露了地下通道的事情。在起诉过程中，莱比锡法庭人员前往柏林国会，走进有名的地下通

^① 赫罗斯特拉塔，希腊人，约于公元前365年，为在全国闻名而纵火焚烧阿尔忒弥斯(Artemis)女神之庙。——译者

道，不过目的只是为了得出纵火犯也许不会从这条路潜入大厦的结论，但是国会大厦的那些守夜更夫们保证说，他们当时肯定发现有人经过这里。

这位忧郁的范·德·卢勃为这个偶然事件付出了他的生命，因为这个事件曾经把他引向那些穿着褐衫服的纵火犯的道路。除拉尔外，大多数纵火犯都牺牲在同谋者的子弹下。盖世太保估计不会再有证人了。

国会起火和莱比锡法庭的起诉使纳粹党、及其方法和人员暴露无遗。整个文明人类对他们的伎俩作了评价，对他们的道德观念作了衡量并得出了结论，他们是一伙行为最卑鄙的犯罪者。因此，要从中得出印在人们脑海里的那些结论是不怎么困难的。

然而，对此还需要有点勇气。要是闭上眼睛，让杀人犯继续胡作非为，那是很容易的。德国的盖世太保早已懂得用恐怖手段使人人缄口无言。

几年以后，勒普克这么写道：“当今的世界灾难使世界不得不为之付出巨大的代价，因为这个世界对待一切告急信号——它从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九年就大声疾呼灾难即将来临——置若罔闻，这种灾难是由纳粹的魔鬼部队带来的，它首先带给了德国本身，继而带给了其他国家。这次战争的恐怖程度同世界施加在德国的其他恐怖程度完全相等，当时世界上的一些国家甚至同纳粹保持正常的关系，同他们一起筹备国际性的庆祝活动和大会。”^①

^① R.A.佩尔克曼在纽伦堡引用勒普克的《德国问题》；《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21卷，第639页。

缺 页

第 二 部

盖世太保玩弄手法，巧取豪夺

(一九三四——一九三六年)

第一章

希姆莱接管盖世太保

一九三三年，戈林被“国会纵火诉讼案”弄得精疲力尽，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这次起诉对纳粹党人来说是个失败；他们在德国，尤其在海外名誉扫地。

赫尔曼·戈林感到欣慰的是，他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收到元首的一封信。希特勒回忆了慕尼黑十一月政变和由戈林领导的重建冲锋队的工作情况，信中最后写道：“你为创造一月三十日的先决条件帮了大忙。因此，我急于，……对你为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以及进而为赢得德国人民所作出的如此伟大的功绩……深表谢意。”^①

几个星期以后，他在精神上稍许得到宽慰。航空兵部改名为航空部，虽然说，这是一个民用部，但是它却掩盖了秘密地重建德国空军的真相。这样，戈林就成为航空部长，并乘此机会成为德国军队的将军。有人在兴登堡那儿旁敲侧击地说，一位部长也许明天就要对强大的空军发布命令，他怎能继续担任上尉。

一个由退伍将军格里梅领导的“空军防御同盟”成立

^① 格里茨巴赫：《赫尔曼·戈林》，第60页，慕尼黑，1942年。《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32卷，第83页，脚注3259。

了。麦塞施米特和亨克尔设计师在上校埃哈德·米尔契的领导下着手进行工作。米尔契是戈林从一九一八年当上尉飞行员时所认识的空军后任总监。

现在，戈林逐渐减少去过问警察问题；卢勃的案件使他在这方面退让三分。但是他并不打算把“他的”盖世太保完全拱手交给别人，所以他在一九三四年这么写道：

“我个人致力于改造盖世太保已有数星期，我终于单枪匹马、当机立断地建立了国家秘密警察。如今德国和普鲁士根本谈不上有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危险。这首先是那种使国家的敌人胆战心惊的机构对此作出了贡献。”^①

一九三四年一月三十日，即夺权周年的那一天，全部警察置身于帝国的管辖权之下，只有它们的行政权还留在邦内，自从任命行政长官以来那些邦已是名存实亡了。但是直到一九三六年，那些邦仍然必须从它们的财政资金中拿出部分支付警察的费用。

就帝国控制盖世太保而言，这种控制只是行政上的一种形式而已。戈林把他的这个“宠儿”紧紧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说实在的，他为自己的事业太自豪了，以致不想放弃它。此外，他还需要用它来消灭他的那位福星高照的、危险的对手罗姆。他所需要的是把盖世太保——他已完全自由地支配它——托付给可靠的帮手。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三十日的法令收回了普鲁士内政部对盖世太保的控制权，直接

^① 戈林：《一个民族的建设》，第88页，柏林，1934年。《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4卷，第258页，脚注2344。

由国会议长戈林掌管盖世太保。

这样，他可以在一九三四年春把普鲁士内政部移交给他的另一个对手威廉·弗立克部长。弗立克总算还有对政治警察发布一般指示的权力，但是没有发布过任何一项具体的命令。到了一九三六年春，他连这一点儿权力也丧失殆尽。

实际上行政管理非常混乱，作为普鲁士内政部长的弗立克属于戈林的下属，但是作为帝国内政部长的戈林还可以向各地方政府下达指示，何况他本身又是普鲁士的总理！这种复杂的关系可以逃避任何监督，可以大大减轻责任，甚至大可不必承担责任。在这样一座迷宫里，一般市民给弄得晕头转向，束手无策。

戈林之所以决定把这件迟到的“礼物”赠送给弗立克，是因为他发现了一个难得的鹰犬，他可以成为反对罗姆的可靠盟友。这个男人想把处境危险的、不完善的盖世太保变为办事效率高的那种机构，使它在两年之后有能力消灭一切反对派。此人就是海因里希·希姆莱。

一九三四年四月一日，狄尔斯获准辞职。这一次，戈林对他的辞职并不感到惋惜；他担心他的继承人会毫不费力地超过他。但是，直到希姆莱在四月二十日上任为止，狄尔斯还是办完了一些日常琐事。他的辞职，所得到的礼物是一张科恩市长的任命书。罗姆死后，他去接替了罗姆的继承人维克多·卢策的职务。

随着罗姆的死亡，盖世太保的“第一个时代”宣告结束，希姆莱这位新人物想在盖世太保那儿显露一下个人的“风

格”，使它具有有一种不可磨灭的特征。

当他在艾尔布莱希特亲王街八号定居以后，便结束了他早在几个月前开始的行动。

戈林在普鲁士建立他的盖世太保时，希姆莱出于建立政权基础的动机也想去抓政治警察。因为普鲁士早在另一个竞争者的手里，所以他只得另想办法。一九三三年三月，他被任命为慕尼黑警察局长，一个月以后成为整个巴伐利亚政治警察的领导人。只要党卫队首脑的职务对他有用，他就会不遗余力地去弄到手。他的部下会告诉他哪些地盘应该占领，必要时去暗示那里的当局，大家可以从占领的某些职务中各自分享到好处。这是一场激烈的斗争，因为冲锋队领导人和政治组织的领导人对这些职务同样垂涎三尺。

十月份，希姆莱控制了汉堡警察局。接着相继控制梅克伦堡、吕贝克、图林根、黑森、巴登、符腾堡和安哈特。一九三四年初，不来梅、奥尔登堡以及萨克森也置于他的管辖之下。到了春天，除普鲁士外他控制了整个德国。他要求戈林把盖世太保让给他。希特勒支持他，他表示接受帝国元首的党卫队的观点，说什么在全国范围内以同样方式去追击敌人那是“正确的、恰当的和必要的”。戈林对希姆莱决心清除罗姆——他的一个敌人——的这个事实表示接受。他赞赏由希姆莱领导的这次快速攻坚战在战略上的灵活性。有了这样一位盟友，罗姆的日子是屈指可数的了。

四月二十日，戈林把盖世太保的领导权移交给希姆莱。事实上，希姆莱已成为它的领导人，不过依据法律，戈林一直到一九三六年还仍然保留着一个聊以自慰的头衔。

希姆莱在担任许多市和邦的警察首脑之后，并不能真正行使所有这些职权，因此他把一些职务委派给他的副手。当时的习惯就是要使那些党阀有可能同时身兼数职，希姆莱在他的党卫队的心腹中挑选代表。他指定了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人——党卫队保安处、党卫队情报处处长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为他在慕尼黑，继而在巴伐利亚的代表。当希姆莱最终达到目的，并在柏林定居下来以后，他立即任命海德里希为盖世太保总部领导人。同时，他把德国的全部政治警察统一起来。这样从希姆莱到达柏林那天起，盖世太保就越过普鲁士边界，把它的网撒遍整个德国地区。

希姆莱能够得到盖世太保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戈林决定同狄尔斯分道扬镳时，在继承人的人选上出现了另外一个很严肃的候选人：库特·达吕格。他是党卫队上将，除希姆莱及其强大的对手之外，他是级别最高的人。他被戈林提拔为警察上将，领导帝国和普鲁士的所有治安警察，即穿制服的警察以及保安警察。戈林已经把他范围内的权力移交给了他。达吕格认为，他有权合理地领导政治警察。

一场无声的斗争开始了。达吕格受到希特勒的宠爱，但是希特勒对希姆莱也很器重。此外，达吕格还是帝国内政部长弗立克的秘书长。他实际上不太喜欢象戈林所解释的那样的政治警察，因此，这种情况决定了他的抉择。戈林认为，达吕格太依恋于某种形式主义；他拒绝盖世太保通常使用的伎俩，这对戈林说来是个障碍。此外，他的任命也许使弗立克有可能了解盖世太保想要隐瞒的事实真相。这样

海因里希·希姆莱就作为胜利者赢得了这张奇特的彩票。

这笔遗产究竟会落到谁的手里呢？希姆莱和戈林都出身于资产阶级。如果不是一九一八年以后的那个动荡时代的思潮和纷乱使他们脱离既定的人生轨道，他们很可能一辈子默默无闻。库特·海因里希·希姆莱在一九〇〇年十月七日生于慕尼黑。他的父亲曾经是巴伐利亚宫廷里的家庭教师，他的母亲出身于萨瓦伊的一个蔬菜商家庭。他在巴伐利亚的中等城市兰茨胡特度过童年。他父亲在那里当过校长，是一位要求别人顺从他的严厉的人。他不许别人违反在他看来是永恒不变的家规、公共规章制度和社会等级制度。希姆莱一家是信奉天主教的。年轻的海因里希必须象他兄弟一样严格地遵守教规。

这种教育对这位年轻人压力很重，但是它的影响却深深地留在他的心里。他重视某些有价值的东西，当然他从来也没有意识到，这种敬意仅仅停留在表面上。当集中营转变成巨大的粉碎机，而他又是这些集中营的统治者的时候，他叫人挂上了一块标语牌，上面的题词是：“一条通往自由的道路。它的里程碑是：服从、廉洁、克制、规矩、牺牲精神、秩序、纪律和热爱祖国。”这题词不是犬儒主义的反映，而是那位巴伐利亚的严厉训导者——他的父亲——的学说的体现。他的儿子因受纳粹主义“思想体系”的腐蚀而蜕化变质，所以他父亲打得他皮开肉绽，尽管如此，他还是念念不忘他的父亲。

他十七岁那年成为战争中的志愿兵，那时正好遇上灾难，他迫不得已同那时的德国军队和将军们共度灾难，当时

有人教他要尊敬他们。生活中的这段小小插曲并没有给他带来军事方面的经验和知识；武装党卫队的上将保尔·豪泽尔向纽伦堡军事法庭供认，希姆莱在军事问题上的无能在党卫队当中是众所周知的：“大家知道，大约只当过一年兵的海因里希·希姆莱对部队根本一窍不通，他低估军事任务及其工作。他喜欢用过甚其词来突出有权势的人。”^①

社会结构同时发生动摇会对年轻的希姆莱产生一种不亚于旧德国军队完蛋时的影响。对教授的尊重消失了，军官的肩章被撕去了，人们对演讲者报以热烈的掌声，要是在前不久，他们非常可能由于演讲而被开枪打死。

战争结束后，希姆莱重返柏林。他生活贫困，当过差役，做过胶水厂的职员，但还是孜孜不倦地继续学习农业。

当时的柏林仿佛是一只沸腾的锅炉，里面挤满了最危险的人物。普遍的生活困难、失业、政治动荡和货币贬值容易形成一个动乱的、好斗的下层社会，它在大城市动荡不定的居民中间是不可忽视的。看来，年轻的希姆莱由于受旧的社会概念和势力以及教育基础的震动而被搞得昏头转向，已混杂在这个下层社会里，并以柏林人的“环境”方式生活了几个月。

对那些后来有权威的纳粹分子的生活进行研究，这是很困难的，况且连研究过德国现代史的作家也渐渐地忽视了那个时代。在这十五年里，希姆莱、卡尔登勃鲁纳和海德里希之流把全部警察当作私人财产控制在手里，他们经

^① 《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20卷，第403页，1946年8月6日。

常乘机把刑事案卷悄悄地拿走。这更能说明，纳粹党人研究了偷运进德国的、由维利·明茨贝格和在巴黎的流亡者用德文发表的小册子《纳粹领导人注视着你》。它收集了最重要的纳粹领导人的一些很不完整的传记。这些报道经常是局限于他们在党内所犯的一些刑事案件上，但是由于报道简明扼要倒也很扣人心弦。

显然，这本小书被列入了“奥托”的目录，这份出版物的目录在德国人进驻巴黎后毁灭了。国立图书馆有两本在占领时期藏起来的小册子样本，可是样本经过一九三五年第二次再版已被窜改，“不知谁”撕去了一页，而且撕去的正好是有关希姆莱这一章节的页数。

然而，人们还是可以在安德烈·居尔贝的书^①里看到。年轻的希姆莱在战争结束后不久，由于下列情况同警察和法院发生冲突。一九一九年初，他同同一个一八九三年生于明希贝格而比他大七岁的妓女弗里达·瓦格纳一起住在莫阿比特区的一家声名狼藉的旅馆里。在他以前，居尔贝也曾住过这家旅馆。一九一九年四月二日，第四五六区警察所的警官弗兰茨·施蒂曼报告说，邻舍们抱怨这对夫妇经常发生激烈的争吵。还说，年轻的希姆莱靠瓦格纳生活。除此之外，施蒂曼还添加了一部分。一九二〇年初，希姆莱突然失踪了。那是在发现弗里达·瓦格纳被杀时才证实的。警察立刻追捕他。一九二〇年七月四日，他在慕尼黑被捕，接着押往柏林，于九月八日以谋杀罪被提交法庭。他为自己

① 安德烈·居尔贝：《希姆莱和他的罪行》，巴黎，1946年。

辩护说，他根本没有逃过。由于缺乏证据，他被释放了。

就在这个时候，希姆莱在柏林认识了一位年轻人，名叫汉斯·霍尔斯特·威塞尔。他也出身于富有的资产阶级，在柏林“环境”里过着一种令人费解的生活。他住在马克思街四十五号。根据警官库特·许塞尔曼的报告，他依靠一个妓女为生。一九二四年九月四日，他因欺诈罪被判两年徒刑。释放后，他从事政治活动，不久在国家社会主义党里又找到了他的老朋友海因里希·希姆莱。此时，纳粹党恰好在下层社会中寻找壮汉，这些人后来成为冲锋队的支柱。

一九二九年七月，霍尔斯特·威塞尔加入纳粹党和冲锋队。他通过他的朋友在柏林的社会渣滓中纠集了一批打手，建立了柏林冲锋队第五分队。在柏林一个由共产党人控制的区里经过一场殴斗之后，他成功地占领了这条街。由于这次行动，他被接受为柏林冲锋队的第五、六和七分队的荣誉队员。

霍尔斯特·威塞尔为冲锋队谱曲，再配上一首古老的海员歌曲的曲调，以此消磨时间。在他死后，这首《霍尔斯特·威塞尔之歌》成为党的赞美歌。他死于暴力，但不是死在街上。一个名叫阿留·赫勒的人，此人为了抢占一位姑娘与威塞尔发生争执，一九三〇年二月二十三日晚上，双方又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吵，赫勒就在韦丁区威塞尔租有家具的小屋里把他杀死了。

希特勒执政之后，霍尔斯特·威塞尔被吸收到为党殉难者的名人堂里。他的母亲同他的姐妹由于在宣传大会上抛头露面而遭到人家的议论。

柏林事件以后，年轻的希姆莱决定折回家里。一九二一年初，他又到达兰茨胡特。他始终对农业感兴趣，又有这方面的才能，而且他还拿到一张农业文凭。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准备了一个小养鸡场并且劝告他，不要为任何政治鼓动所迷惑。当时巴伐利亚，特别是慕尼黑的形势一触即发。希姆莱曾经参加过德国青年运动，它是在“鲜血、土地和利剑”的口号下宣扬“德国农民阶级革新”的一支队伍。这句口号成为党卫队的一条行动准则。

希姆莱不顾父亲的劝告还是从事于“祖国运动”。这些运动要求回到传统的价值中去，结束魏玛政权，处死对“耻辱的停战”负责的“十一月罪犯”。他参加海斯上尉领导的与罗姆上尉有着密切联系的“德国国旗”组织。在一九二三年十月的最初几天，这个联盟分裂了；海斯手下的大多数成员赞同卡尔的政策，同情纳粹党的“极右分子”退出了“德国国旗”。希姆莱属于三百名极端分子中的一个。他们在罗姆和赛德尔上尉领导下建立了“德国战旗”组织。这个“战斗联盟”一成立即参加了十一月政变。希姆莱在这次事件中丝毫未受损伤。

纳粹党处于“进军柏林”的阴影之中，当时它正值低潮时期，但是希姆莱还是不断地用旧思想在各个小组里发挥其作用，这些小组是为纳粹党人打掩护的。他曾有一段时期做过格利戈尔·施特拉塞的秘书。一九二五年，戈培尔继任他的这一职务。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底，希姆莱获悉希特勒已从监狱里释放并回到了慕尼黑。他在一九二五年二月五日写信给他

时说，有祖国观念的德国人是多么信任他，把他视为能帮助德国摆脱混乱，重新占据它应有地位的这样一个人。希特勒对这封信深为感动，要求他的这位年轻的崇拜者来看望他。希特勒在兰茨贝格监狱坐牢期间，他的极大部分追随者已各奔东西。三月十二日那天，希姆莱敲着蒂尔许大街四十号赖歇特老太太的房门，希特勒就住在他转租来的这幢房子里。希姆莱的党证编号是一三四五；希特勒曾经想再度从头开始，从一号开始，但是为了给新党员留下好的印象，所以从五百号开始。

希特勒喜欢希姆莱那种恭敬的态度和严守纪律的作风。希姆莱能用他父亲曾经谆谆教导他的那种顺从的态度来对付这个人。他专心致志地聆听希特勒的讲话。只要有听众（那怕只有一个听众），希特勒就会做起政治报告来。希姆莱凭他的风度充当杰出的第二号人物，他扮演这个忠诚而又不可缺少的仆人角色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与许多纳粹分子，特别是与那些经常企图排挤希特勒的“老战士”相反，希姆莱从来不去谋求夺取最高权力。他是“忍受屈辱的典型的第二号人物”，名列纳粹医生格哈特之后。格哈特非常熟悉希姆莱，因为他俩是在兰茨胡特时的同学。

第二个月，希特勒有机会对这位新兵的品质作出正确的评价。在党的一些大会上，这位年轻的希姆莱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最热忱的拥护者。当时，纳粹党又发动了一次宣传攻势。再说希姆莱十分重视担任希特勒途中的保镖一事。从理论上来说，纳粹党是受到禁止的。在这期间，埃伯特总统于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八日逝世。鲁登道夫也参加了三月

二十九日举行的接班人的竞选。希特勒愿意助他一臂之力。

鲁登道夫在选举中远远落后于他的主要对手兴登堡，所得票数不到百分之一，这是一次灾难性的失败。但是魏玛共和国从那时起注定要灭亡。纳粹党人在一九二五年下半年展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宣传活动；魏玛政权受到破坏，希特勒意识到，要赶紧对共和国采取步步进逼的姿态。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九日，他乘慕尼黑“光荣挺进”周年的机会，成立了一种特殊的卫队——“党卫队”，简称为“SS”。

希特勒随身总是带着一名警卫。他从“萨尔卫队”——他们的任务是在即将召开的党的大会上使政敌哑口无言，在紧急情况下使用啤酒杯和椅子腿——中挑选五名彪形大汉作为自己的贴身警卫：少尉约瑟夫·伯希托尔德，艾米尔·莫里斯，克里斯蒂安·韦伯，新闻记者赫尔曼·埃塞和屠夫乌里希·格拉夫，这个人成为元首的私人警卫员。

此时，冲锋队的第一任长官约翰·乌里希·克林茨赫开始为希特勒搜罗警卫；因此就成立了“阿道夫·希特勒袭击队”。不过他们在希特勒坐牢期间已经解散了。现在由党卫队代替。他们的司令官是尤利乌斯·施雷克。一九二六年初，党卫队与冲锋队重新合并，合并之后，他们又成立了一个特别分队。因此，党卫队就得听命于冲锋队参谋长，弗朗兹·冯·普菲费尔上尉。

一九二九年，希特勒和普菲费尔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第二年，普菲费尔离开了希特勒。

希特勒懂得要有一个全心全意忠于他的人来领导新的警卫队。那些不满意的人则认为，希特勒在扮演苏丹^①的角色。现在，这位苏丹需要亲信的卫兵，海因里希·希姆莱就自然地成为他们的指挥官了。

当希姆莱于一九二九年一月六日接管党卫队时，该队只有二百八十人，但都是些久经考验的人。希姆莱坚持精选原则，由他建立起来的警卫队一开始就打好了基础。罗姆与他截然不同，罗姆只考虑数量，而他注重于政治质量，在党卫队中成立党的精锐部队。

这些意见分歧直到一九三一年一月罗姆再度接受冲锋队的指挥权，在名义上成为希姆莱的上司的时候才得到证实。当时党卫队还只是冲锋队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两人中间出现一种反感，它造成了敌对情绪，最终导致了激烈的竞争，从而促使希姆莱作出抢夺警察权力的决定。

希姆莱推行的那项严格挑选的原则一开始就使得新兵补充工作进展相当缓慢。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党卫队有二百八十人，第二年增加到二千人，一九三一年增加到一万人，夺权时人数上升到三万，在希姆莱成为盖世太保头子的时候发展到五万二千人，这个数字与罗姆控制的四百五十万冲锋队员相比，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然而，这些重要的党卫队员均被他们的头子安插在关键的岗位上。希特勒一搬进总理府，希姆莱就首先挑选了一百二十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彪形大汉用来作为阿道夫·

^① 苏丹是某些伊斯兰教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称号。——译者

希特勒的警卫团，这是一支专门保护总理府的精锐部队，它一直存在到希特勒完蛋。此外，希特勒周围的人几乎都是由党卫队员所组成。处理希特勒私人事务的是旅长尤利乌斯·夏勃，而旅长施雷克则成为希特勒的司机。他个人的安全直接由腊登休伯旅长领导下的一个党卫队和刑事检察官赫格尔领导下的一组盖世太保人员负责。这些人和希特勒形影不离。因此，希姆莱对最小的意外事件，任何一种访问以及小范围的谈话始终了如指掌。如果没有得到他的同意，任何人不能接近元首。在夺权后不久的那段清洗和改组的时间里，党卫队的人员也偷偷地打进盖世太保。

希姆莱对冲锋队和罗姆进行了有步骤的攻击。在戈林授意下，他向希特勒汇报冲锋队在集中营里所犯的暴行，并且指出，他们可能会得到不利的后果。他并不是对冲锋队的方法感到不满，而是对冲锋队那种不成体统的方式感到不满。

一九三三年三月，党卫队设立了他们自己的集中营。希姆莱逐渐把“竞争者”排挤掉。一九三四年初，他做到了这一点，使所有的集中营一概置于党卫队的管理和监督之下，他特别为此建立了“骷髅队”。他们在集中营里的暴行同他们的前人一样，按照工业标准把集中营变成一个杀人工厂。集中营的维修费用由各邦的财政部门负担，一九三六年以后才从国家财政中支出。

骷髅队的建立清楚地表明了，集中营有成为国家官方组织的危险。此间，权威人士、行政官员、法官、甚至帝国司法部长居特纳都不敢对这种在法律上站不住脚的、令人气

愤的事提出丝毫抗议，但是宪法确实还在生效。他们可以堂而皇之地不经过控告，不作出判决不断对成千上万的人进行逮捕、监禁和拘留，用戈林的一句话来说，“元首同情他们”。正是由于不断地、怯懦地忍受了这些既成事实，致使纳粹的各种手法，对法律的藐视和犯罪组织最后能畅通无阻地到处逞凶。

希姆莱在艾尔布莱希特亲王街八号盖世太保总部定居下来时，已经是一个实力雄厚的人物了，他象一只网中的蜘蛛在那里监视着整个德国。

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他给党卫队写了一封十分明确的信：“赋予我们最紧迫的任务是，去发现、反对和消灭元首和国家社会主义的一切公开的和暗藏的敌人。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我们必须做好准备，不仅要自己流血，而且还要让别人流血。”

雅各布·伯梅在三十五年前写道，身体具有内在力量的特征，而内在力量又使身体充满活力。这句短短的真情实话击中了大多数纳粹头子的要害。罗姆看上去象是杀人狂，鲍曼的相貌更是令人不安，卡尔登勃鲁纳和海德里希长着一副杀人相，而希姆莱却露出一副虚伪的、非常庸俗的嘴脸。

他的个子中等偏高，长得非常结实，脸有点儿胖。他虽然从三十三岁时才开始警察生涯，但是颞颥和前额已经开始秃了。他的相貌象一个小职员，一个朴素的财会人员或者一个小商人。他那有点儿扁平的下颞显不出有什么大的毅力。上唇胡子遮掩着那张松弛的被两只招风耳围住的脸

庞。他笑声不绝，完全给人以一种商人的感觉。

只有两种迹象提醒人们千万小心：又薄又苍白的嘴唇和灰蓝色的小眼睛，圆玻璃的夹鼻眼镜的后面掩饰不住那对令人惊异的、冷若冰霜的目光。希姆莱也许知道，这样的目光使他的真面目暴露无遗。他轻快地把头朝右倾侧一下，在反光的镜片掩护下，可以窥视那个也许能成为战利品的对话人。他那病态的脖子引起某些来客的注意；他象一位脸上皮肤松弛，布满皱纹的白发老人。他的手长得非常小，非常细嫩，几乎象女人白皙的手，脉络清晰可见。不管他自己说话，还是听人家说话，两只手经常一动不动地平放在他面前的那张写字台上。这双麻木的手同他那种不可捉摸的、毫无生气的面部表情倒很协调。

他的部下在以后作证时说，他从来不表扬，也不责备。他的指示通常是模棱两可的。他喜欢让部下自己去寻找最好的方法来使头头满意，而头头的意图应该逐渐向他们透露。他过去有一种保守思想，因此，他所建立的组织都深深地打上了这个烙印，他要使保密成为绝对的规章，谁损害它，谁就会遭到严厉惩处，有时会处以死刑。

他的精力很旺盛。从上午八点钟开始工作，一直到深夜才结束，有时工作到第二天凌晨二点钟。他到处不停地工作。外出时，他的秘书总陪着他；他时常在火车、飞机或汽车里口授信件，并且通过完善的通讯设备不断地与盖世太保总部保持联系。

每份报告和每封比较重要的信件都必须呈递给他。他一边仔细地阅读，一边用一支色调不淡不浓的绿铅笔在边

角上做摘记。经过他手的每件公文，他都吹毛求疵地作了“批阅”，然后写上日期，签上名字开头的两个大写的H，中间划上斜线。他选择淡绿的色调正是反映了他的性格。相反，那位打扮得引人注目的、喜欢夸耀的戈林在边角上做摘记时使用一支鲜艳的红色铅笔。虽然字数寥寥无几，却是多么富有启发啊！

希姆莱喜欢出其不意地作视察旅行，如果不出去，他差不多总是在党卫队或盖世太保的军官餐厅或者在酒店里进餐，因此，只有进餐才打断他的漫长的工作。他挽留客人进午餐是常有的事，而且经常宴请他各部门的头头，并乘机会显示自己是个愉快的主人，即使他的事业已达到了高峰，一人身兼数职，而且实际上已成为这个政权中最强大的人物，他仍然是一个有趣的、不傲慢的闲谈者。

他有一些忠心耿耿的好朋友；大部分是以前的同学，他们曾同他一起在兰茨胡特他父亲开办的学校念书。在党卫队里，人们常常亲切地称呼他是“海因老总”，这种亲切感充满着对他的尊敬和友情。从这段迷人的历史可以看到，杀人犯是如何用沾满成千上万个儿童鲜血的手去培植友谊花朵，如何用彼此的小名称兄道弟，这些小名还带着教室里那种粉笔和墨水的痕迹。他把大部分同学争取到了自己的一边；格布哈特医学博士应该对杀人的科学实验负责。慕尼黑警察局的官员随同希姆莱来到柏林，参加了盖世太保。他们相信，他会步步高升；他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说服才能。“他不管在什么时候说话，他只相信自己所说的话，而且也要大家相信。”格哈特就是这样来描述他的。

他不知道家庭是个什么滋味，看来没有私生活。他的一生是在党卫队和盖世太保的圈子里度过的，看来他只是为了这些庞然大物及其孩子而活着。他外表看上去很开朗，但内心深处隐藏着一种创痛。他不幸地与一个生在比得哥什而比他大七岁的护士马尔加·康策尔佐娃结了婚。她是在最糟糕的道德败坏的情况下受雇在柏林的一家医院里工作，搞了多次违法手术和其他可疑的实习。因此，她看不起医生和外科医生。与学校的医学相反，她赞赏草药的强烈作用，她把这种信念传给她的丈夫。希姆莱用他妻子的钱在慕尼黑附近的特鲁德林办起了家禽饲养场，但是失败了。后来他听从妻子的建议种植药草，津津有味地钻研中世纪的草药书，可是仍然没有在经济上获得成果。不过这并没有改变他对草药的热爱。因此，他以后就让集中营囚犯培植药草，管理药草圃。

经商的失败也许是后来造成婚姻不幸的根源。他的妻子看不起他，在一九二八年生下女儿古德隆后，这种不幸的关系丝毫未变。据格哈特博士说，希姆莱患有局部阳痿症，因而“难以克服这种内部冲突”。紧张关系达到这样的程度，他不得不下决心与他的妻子分居。但是，为了他的女儿，他又固执地拒绝离婚，这也许是他受到严格的天主教教育的下意识的影响。

不久以后，他认识了一位妇女，并与她一起共同生活。他们结婚后生了两个孩子，一男一女。这两个孩子都生在霍亨里亨的格哈特博士的疗养院，并在那里长大成人。

他要照料两个家庭，所以经济上经常发生困难，不得不

靠借债生活。希姆莱也许是从不依仗自己的地位来发财致富的唯一的纳粹高级官员，即使他大权在握，党的机构里上上下下营私舞弊成风，他也不这样做。他的诚实使他非常蔑视戈林。戈林在战争期间参与各种各样的黑市交易，因此能够在党和国家里面担任要职。

可是希姆莱缺乏真正的文化修养。这位文化程度不高的人是个浪漫主义者。他把他的所有“创作”和第三帝国的全部组织都打上独特观点的标志。他相信魅力、催眠术，相信最不可靠的优生学理论和普通食物给予精神力量的作用，相信江湖郎中，相信动物磁气疗法施行者和先知先觉者，他一生同那些人有过长期交往，要是没有他们出谋献计，他往往不能决定，该作出什么样的抉择。他同早期党的许多纳粹分子领导人一样都有这种乖僻。这些领导人在柏林的先知先觉者哈努森的家进进出出（这就使“国会纵火”的预言成为事实）。

军纪给希姆莱以深刻的印象。格哈特认为，他对必须执行命令的这条旧军事原则“作了一次简直是歇斯底里的解释”。他把这项原则作为他的部队的绝对信条，之所以容易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来自民众中的青年人象自由市民，而倒是象梦游者那样进入第三帝国。由于他的浪漫主义也就产生了对狮子亨利和亨利一世国王的深切崇敬。他钦佩这位萨克森皇帝建立的骑士军队，依靠这支军队他才打败了匈牙利人，征服了奴隶。这个榜样基本上决定了党卫队的组织和象征。因此，那些年轻的党卫队员在深夜聚集在法克尔沙因附近亨利国王的棺材前面举行宣誓仪式。

· 弗朗索瓦·贝勒博士认为，一种性格特征深深地支配着希姆莱：生来不会独立地全面地思考，不善于理解有关的概念，由于他的这种无能，致使他考虑问题不全面，不系统；当他对工作不满时就会产生固执的自我偏见，工作热情就会消失，意志就会消沉；完全缺乏独创性和感应力，结果在进行工作时他的思想似乎到了机械的地步，以致于被人看作是一种病态。再说在这方面还有：缺乏健康人的正常理智，日趋荒谬的死顽固和缺乏立即认识复杂事物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即使经过智力训练后也是不能解决的。他的性欲发展不正常，一方面迫切需要温柔多情和友好往来，另一方面却产生一种完全冷漠的情感，致使这两种感情自相矛盾地交织在一起。

这种前后矛盾的思想使他在希特勒的心目中成为救命人。他准备使用一种非常简单的有效的解决方法。他首先给人一种自信而顽强的感觉，在新教徒顽固的头脑中引起共鸣。当健谈的希特勒出于他的自信来散布种族问题和谈论纯血统论的时候，一根敏感的弦却在希姆莱的心里振荡着。自从他在农业学校里从事研究选种问题以来，他就一直关注着这些问题，并且认为，由于他对这些问题着迷，因而找到了科学的形式。这位家禽饲养员认为，人们为了幸福也可以屈服于合理淘汰的规律。他懂得，在养鸡场或者在厩里必须淘汰那些无利可图的牲畜，并认为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所写的关于种族选择的事是完全合理的。

当希特勒预感到，纳粹国家将使用他的这种理论的时

候，希姆莱表示赞同。他一旦有了这个可能性，就会付诸行动，使它实现。

第二章

希姆莱的黑色军团

希姆莱在他的那套古怪的理论束缚下梦见了一个新的骑士阶层和一块用来进行植物试验的田地。党卫队使他有可能实现这一梦想。党卫队也会把他的特性的印记镌刻在盖世太保的身上。

希姆莱是党卫队领袖，即党卫队在整个德国的司令官，事实上，党卫队直至崩溃的最后一天仍是他的财产。

由于各种等级制度重重叠叠，所以纳粹管理机器的工作错综复杂，难以清理国家官员和军人的等级、党员和党卫队的特殊等级。为了了解这部机器是如何运转的，就得调查一下，党卫队究竟是什么组织，因为它不仅渗透到党的所有机构，而且也渗透到国家行政部门和公共组织，甚至私人的组织机构里。大约在一九四〇年初，该政权的所有重要人士，所有警官和重要机关的头子都是党卫队员或者具有党卫队的名誉身份。

党卫队的思想和原则不断影响着德国的生活，当领导职务落到与党卫队有从属关系的那些人手里时，他们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希姆莱的控制。不过希姆莱规定了党卫队的两条基本原则：种族选择和盲目服从。

种族选择的滑稽剧完全是根据教团宗教领袖的口味用假科学的观察方法表现出来的。“纯北欧血统”的教义象一则拙劣的笑话在这样一个国家里起着作用，因为这个国家几千年来深受各种各样的影响，而在这个国家居民中的大部分其他民族，首先是斯拉夫民族已经醒悟过来。因此有关北欧种族的那些演讲也使民众感到很好笑，例如民众讥笑戈培尔博士是“萎缩的日耳曼人”。不过有一份党报却非常认真地把戈培尔比为北欧类型的人。这里还想说明的是，正当大家根据党卫队的原则对祖先进行研究时，希特勒却禁止研究他的祖先，据他的对手说，希特勒本人的出身相当复杂。

希姆莱想把党卫队变成一个骑士阶层，并且通过它建立一支有骑士风度的队伍，它也许是纳粹德国的最可靠的基础。

国家社会主义主要建立在种族原则基础之上，根据这些原则可以大批处死“劣等民族”，杀掉数百万人，另外把数百万人拉去当奴隶。一九三五年，那些种族原则导致了纽伦堡法令的公布。公民地位和公民权取决于某种道德前提并且只承认“同民族的人”，就是说承认可以证明他们祖父母中至少有三人是“德国血统或德国亲属血统”的，或者五个人中至少有一个属于“亚利安人”的种族。

这表明国家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促使价值等级制度的崩溃，而西方世界的精神文明就是建立在这些价值基础之上的。自从基督教胜利并开始影响社会共同生活以来，在所有社会组织形式内部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由上帝创造

的、并在上帝面前平等的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这种平等、博爱在人权宣言里占据首位，而马克思主义尽管否认世界上有上帝的存在，但也捍卫这平等的原则。

可是国家社会主义竭力主张人的不平等。它提出这样一种论点，人与人之间是根本不相同的，这种不同不在于知识、力量或所得到的地位，而在于他们的出身。北欧人，即纳粹党人站在最高阶梯上，站在最低层的是低等的或堕落的种族，属于“劣等人”，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是过渡阶层，人们将用假科学的方法来鉴定这个过渡阶层。但是要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依靠暴力政策，依靠一系列在科学上没有考虑余地的主张，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办法。这样就会使人们设法去消灭“劣等人”。

党卫队，特别是盖世太保是战斗的纳粹种族信念的执行者。希姆莱想借助党卫队那些稀奇古怪的规章把骑士风度的队伍重新扶植起来。这些就是基本原则。那位年轻的党卫队继承者在一次戏剧性的典礼上开始宣誓：“我向你帝国元首和总理阿道夫·希特勒宣誓，为你效忠，勇敢战斗，我发誓至死服从你和由你指定的上级，我向上帝发誓。”^①

这是一种盲目服从的宣誓，它将迫使党卫队员毫不犹疑地去犯下最可怕的罪行。

“我的荣誉是忠诚”，这就是党卫队的那句骄傲的格言，它不能说是重复服从誓言，只能理解为是唯独对元首和党卫队头子和同伙们负有义务，不对任何一项传统性的、道义上的准则负有义务。党卫队的荣誉在唇枪舌剑的角逐中

^① 《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32卷，第284页，脚注3429。

已经谈论得很多。这种荣誉不仅没有阻碍党卫队去杀害孩子、妇女和老人，相反他们把杀人当作自己的职责。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他们为了节约时间，不高兴把孩子活活地丢进一只正在燃烧汽油的坑里，而是把孩子从他们的母亲怀里夺走，然后送进毒气室，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特殊荣誉的名义下发生的。

纳粹分子混淆荣誉和忠诚的概念，使这两个词毫无内容。正如纳粹分子理解的那样，希姆莱自己于一九四三年十月四日在波兹南对警卫团军官所作的演说中说道：“有一项原则必须绝对用于党卫队员：我们对待自己血统中的成员必须诚实、正派、忠诚和友好，而对待其他人则不同。怎样对待俄国人，怎样对待捷克人，这对我来说是完全无关紧要的。”^①

这就是运动早期希特勒所运用的“优等民族”的宝贵理论。党卫队员是按“纯北欧血统”的原则招募来的，他们将组成明日世界的贵族阶级。人类的价值是一个种族问题：“因此千真万确的是，根据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事实上只有好的血统，即北欧血统才能真正被看作是领导的、创造性的并且支撑着每个国家，尤其是支撑着每个士兵活动的血统。我在想：如果我能成功地在一个组织里尽量从德国人民中争取一大批支持这种血统的人，把他们置于军人领导之下，逐渐用血统价值论和由此而产生的完整的世界观来教育他们，那么就一定有可能，建立一个实际上能肩负起任何重担

^① 《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 29 卷，第 122 页，脚注 1919。

的精锐组织。”①

为了把支持高贵血统的人分门别类，在候选人当中进行了严格的选择：“候选人将进行闻所未闻的考试和审查。我们平均可以从一百人当中至多挑选十人或十五人，再多则不需要。我们要求得到其父母和兄弟姐妹的政治名誉证书。并且需要他的从今天一直上溯到一七五〇年的家谱。当然，我们要对他进行体格检查，得到他的希特勒青年团证书。此外，我们还要一份无遗传病的证书，就是说……在他家里不存在有遗传的病例。”②

用希姆莱的话来说，如此谨慎小心的最终目的是：“我们要建立一个将统治欧洲几百年的上层社会。”他在另外一个场合时说，根据古代的先例，一个扩展到整个欧洲的未来帝国将建立起来，由二十分之一到十分之一的居民组成的上层社会将行使政权，而让其余的人，一大群奴隶去干活。实际上，可以断定，在占领欧洲四分之三的时候，纳粹政权就会使奴隶制度重新复活。

这些党卫队成员、未来的领主享有特权。他们宣誓之后获得党卫队短剑。有人告诉他们说，用这把短剑来捍卫他们的荣誉，并且在他们认为遭到攻击的任何情况下，用鲜血洗刷掉耻辱。一九三五年，希姆莱详细地解释了这种权利。再则，一份法院的判决书补充说：“如果可以用其他手

① 1937年1月15日至23日，希姆莱：《在国防军的纳粹课程中有关党卫队和警察的性质和任务》演说词（只是对需要在国防军服役的人而讲的），第138页。《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29卷，第207页，脚注1992(A)。

② 《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29卷，第210页，脚注1992(A)。

段击退敌人，那么也允许党卫队使用他们的武器。”杀人无罪的权利是党卫队的一种特权。一九三九年九月，武装党卫队的一个突击队员与军事警察的一名卫队长一起监督五十个犹太人在修理一座桥梁。当五十个犹太人工作结束后，他们把这些不幸者赶进一座犹太教堂并开枪把他们统统打死，借此取乐。主管的战地军事法庭判处这个卫队长九年徒刑，判处这个党卫队员三年徒刑。由于是谋杀案，起诉代理人提出应该判处死刑。但是军队中的最高军事法官同意给这个党卫队员“减刑”，因为他是“一个党卫队员，在看到犹太人时心中不免产生德国人仇视犹太人的那种感觉”，因而以青年人那种鲁莽行为，毫不思索地采取了行动。如果有可能的话，甚至可以为他的这种“鲁莽行为”考虑立即提拔这位天才的优秀队员。

为了更好地保护党卫队，通过了一些法令，使他们逃避正常的审判，并且仅仅置于党卫队的内部法庭管辖之下。

一开始，他们限于使用一九三三年八月二日颁布的法令，该法令授权给政府，控制任何一种调查和审理。但是这种方法有其某些缺点。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七日，达豪集中营的两名囚犯“自杀”身死。集中营的领导报告说，这两人可能是用他们的裤带自缢的，但是家属想要说服慕尼黑检察院，而且两位法医证实，这两个不幸者是受到虐待后被勒死的。头骨和全身的无数伤口排除了任何怀疑，脖子上的伤痕也清楚地表明是卡死的，不是自缢的。这两条裤带也未能拿出来示众。

在向上一级部门告急之前，这些事实早已水落石出。从

理论上讲，罗姆是一个不能独立于冲锋队之外的党卫队长官。当他一获悉此事，就写了一份报告说，达豪集中营是一个保护性看管囚犯和政治犯的集中营。现在涉及的是政治性事件，所以首先应该由政治部门，而不是由司法部门对它们作出决定。这是他作为参谋长，作为德国部长的看法。他促使党卫队首脑发布命令，目前不准预审当局进入集中营，不准审讯囚犯。

帝国内政部长要求停止起诉，因为起诉会损害纳粹国家的威望，它是针对冲锋队和党卫队成员的，即对准纳粹国家主要支柱的。

九月二十七日，检察院停止调查此案，因为调查的结果表明，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两人的死是受到外来的影响。

这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然而，帝国司法部长于十二月五日发布命令，以最快速度把此案调查完毕。

这是一桩讨厌的意外事件。但是也十分明显，这件事情不会再有什么危险了，因为它已经被拖延得很久了，而且法院当局在党卫队周围进行调查时，自由行动已越来越有限了。从最坏处着想，那些“局外人”多亏这些令人遗憾的事件才能近在咫尺之地观察党卫队的“私人事务”，同时可以知道不得向外人泄漏的某些阴谋。

这里原因在于为党卫队寻求自己的审判权。党卫队一旦拥有自己的审判权，它就可以为自己建立一个无人能闯入的世界。

希姆莱把这个不可侵犯的党卫队看作是一个宝贵的、供他个人用来作为活人试验的理想组织。这位手持农业执

照的家禽饲养员又一次露面，而且很关心他所培育的纯品种。党卫队员未经上级允许不得结婚。如果姑娘打算嫁给一个普通的党卫队员或者一个党卫队的低级军官，她必须证明，她的家族追溯到一八〇〇年为止属于“亚利安种族”人，如果她想成为一名党卫队军官的夫人，那就要追溯到一七五〇年。只有作为领导中心的总部有权对这些搞到的证件宣布有效并发给必要的结婚证书。此外，这个年轻姑娘必须接受医生的多次检查，以证实她能保证给优等民族带来子孙。按照党卫队旨意，这位年轻的妇女在婚后要在一所特殊学校里接受政治训练，向她灌输“纯种族观念的思想”。她要学习有关家政、婴儿保健等方面的课程，目的是要在数年内培育一个统一的种族，使其人数不断增加，并使他们在身体上和精神上严格地一致起来。

希姆莱在建立“生命源泉”——一种人类的饲养场——中所尽的努力已达到了顶峰，在那里，按照纯北欧的特点，可以不必受法律的约束，把选定的姑娘同按照同样标准选定的党卫队员结合起来。由此而生的孩子——一种有意识的选择的果实——应该属于国家所有，并在特殊的学校里接受教育。理论上，这些儿童在娘胎里就注定要成为纯种国社党员的下一代。但是政权的崩溃使希姆莱不能继续这种试验。在此期间，估计已经有五万个孩子出生在这些养育院里。一般说来，他们的智力水平普遍低于中等程度。按百分率计算，他们当中的低能者要比正常情况所出现的多四至五倍。纳粹的优生学者不了解没落国家和退化种族的那些心理学家现在所知道的：最完美的养育院在“培育”

孩子方面大大落后于母亲，甚至落后于智力中等的母亲。思想体系和生物学不能代替母爱。

希姆莱借助党卫队所进行的生物学的试验也扩大到了食物方面。这位家禽饲养员认为，食物会影响到解剖学和心理学的特点，所以在党卫队的营房里，根据古日耳曼的标准，早晨不喝咖啡，而喝牛奶和粥汤。主餐由党的优生学家进行“科学的”安排。矿泉水用来作为饮料。在党卫队的宿舍里也进行了磁力试验，并且对某些党卫队长进行神经系统按摩的试验。他们被贬低到牲畜或用于科学试验的家兔的地位，任人去进行试验，他们并没有感到自己在人的尊严方面受到损害，相反感到这种试验是一种使他们无比骄傲的嘉奖，有人要把他们变成造物主，变成蔑视所有其他人的超人。

对于这些新的党卫队成员来说，主要的是应具有“健壮的军人体魄”、顽强性和权欲感。用欧根·科贡的话来说，他们有的是“贪图功名、等级偏见、虐待狂和不断用他们所有原始的和被曲解了的形式进行专横虐待……那种以和解和辨别力为前提、因而需要不断增长知识的不满思想会削弱打击力，会使他们精神涣散、离心离德、危险、不忠和‘犹太腔’”。

为了能维护“荣誉”，党卫队成员已经享有特权，这种特权实际上是对同胞的生杀予夺之权，同胞们所表现的那种容忍都只会增强他们的优越感。就他们行动的合法性而言，这是不成问题的；在这方面，党卫队从不考虑他们的行为是否合法。

怎么还会有不同的看法呢？一般说来，德国传统的杰

出人物默默地忍受着这最野蛮的行为。他们滑到了纳粹体系这一边，而且一般说来并不拒绝同那些官运亨通者进行合作。希姆莱作为党卫队首脑，他一开始就努力把一直享有崇高威望的贵族拉入党卫队：社会的最高层、某些有名望的军人和类似的知名人士。前自由团军官作为民族英雄参加党卫队的行列无疑引起了共鸣。一九二八年以来，几家贵族家庭的遗产归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所有，早在一九三三年以前，那些贵族已经被吸收进“黑色军团”（党卫队），例如，约西亚斯·冯·瓦尔德克·皮尔蒙特王子和大公国王子梅克伦堡-施威林。掌权以后，其他许多人相继加入进来：霍亨佐伦-西格马林根的一位亲王，不伦瑞克的公爵王子，利普-比斯坦费尔德的王子，冯·舒伦堡将军。甚至其中还有弗赖堡的大主教格罗贝尔。纳粹党人并不要求这些显赫的新成员担任职务，而是巧妙地利用他们加入这个组织进行招摇撞骗。这对补充新人员起了显著的作用，以致希姆莱在后来向那些不属于党卫队的杰出的知名人士颁发了党卫队的名誉证书。

没过多久，这一政策的成果在上层市民中显示出来；不久，党卫队被看作是“精致的”，黑色制服是男性美的标志。

假如把参加党卫队的人员理解为同意党卫队的体制的话，就得补充说明一下，国际上不会有任何反响，这只会使他们心安理得。

流亡者进行的宣传仍然毫无效果，而且当每天在德国所犯的罪行再也隐瞒不了时，却没有一个“文明”国家肯花费片刻时间去考虑同那些杀人犯彻底决裂。大使们依然彬

彬彬有礼地去握那双沾满着无辜者鲜血的手，并为那些刽子手们举行宴会，同德国的这些主人们签订新的贸易条约，法国邀请纳粹德国参加一九三七年的国际博览会。一九三九年，当苏俄还是同这些人——他们曾经把数千名共产党人拷打致死，并把他们中的数万名关进集中营——缔结了互不侵犯友好条约的时候，他们的绥靖政策终于达到了顶峰。

这些来自社会上层和最高层的成员只是被用来作为一种吹嘘的理由。为了招募大批新人员，就得渗透到居民的最底层中去。如果指定他们去工作的话，那就需要听话的汉子、驯服的粗鲁人或者经过训练的虐待狂。

这些新补充的人员当然有其局限性。纳粹分子懂得，为了保证“合适”的分子源源不断地进来，必须从儿童着手，把他们培养成为明天的护卫军。希特勒青年团成为党卫队和盖世太保的巨大源泉。在每年四月二十日元首生日那天，年满十岁的孩子被吸收到少年队来。庆贺希特勒生日的目的是要给天真的孩子的幻想增添一种印象。男孩子在少年队里一直可以呆到十三岁。当他们在四个部门里各度过一年之后，就被吸收到希特勒青年团里，直接在那里的武装部队或纳粹党的某个情报部门工作。

当初，希特勒青年团是冲锋队的军官团，后来它在这个新名字下独树一帜。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二日，通过一项法令把迄今为止的德国青年组织全都解散了。它们的财产被没收，成员被并入希特勒青年团。一九三六年，有一条法令规定：青年人义务在希特勒青年团中服役。因此德国青年从十岁起就处在连续不断地向他们袭来的纳粹宣传的

影响之下。在这样一个幼小的年龄里很容易形成个性，“领袖原则”作为绝对信条深深地印进了青年人的脑海里。过后不久训练开始进行，这种训练能够使一个人处于绝对服从的状态。这种非人的“饲养”是对盖世太保的存在和对那些今天还在刺激人类良心的罪行的唯一解释。一小撮职业杀人犯为了能够统治人民，并强迫人民接受他们的方法，因此，需要把人从小孩起就教坏。华沙犹太人区的奥拉多尔，东部的大屠杀场奥斯威辛，它们不是德国人的罪行，而是纳粹的罪行。不管把同样的方法使用在哪一个民族上，都将会产生同样的结果，这是千真万确的。如果说德国人民是容易被人左右的群众，那是因为传统的军国主义教育使他们严格遵守一种比较严密的纪律，在大多数“无纪律”的国家里，政府方面对这样一种纪律，只能轻描淡写地表示一下遗憾。在夺权的时候，那些烧毁奥拉多尔的党卫队员几乎全是些八岁到十四岁的孩子。他们从少年时代起就接受纳粹的教育和训练，而且没有一个人为他们提供机会来考虑和讨论这种教育和训练的价值。一九三三年到一九四〇年期间 希特勒青年团里有人在准备奥拉多尔的战斗。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希特勒说出了他与德国青年的意图：

“如果敌人说，我不到你们那里去，你们也别想抓到我。那么我可以非常放心地告诉你们：‘今天，你的孩子已经属于我们。一个民族是万古长存的。你是什么？你走了，但是你的子子孙孙已在新的集中营里。他们除了知道这个新

的集体之外，在短时期内将一无所知。”^①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在柏林大学前面的广场上，在戈培尔的策动和领导下举行了一个烧毁异教徒的文学作品的仪式。几星期之前，有人对公共图书馆进行了“清洗”。他们成吨地没收犹太人或马克思主义者著的书籍，或者没收内容与纳粹原则不一致的书籍。接着就是五月十日，纳粹大学生把二万册书本拖到大学前面，把它们同黄色书籍和那些“蜕化变质”的哲学家的作品混在一起，堆叠成一个巨大的火刑柱。给整堆书籍浇上汽油，点上火，这时乐队演奏《国歌》和《霍尔斯特·威塞尔之歌》。然后，戈培尔讲话：“今天的庆祝是一个象征性的行动；它将向世界宣告，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的共和国的道德基础已被永远摧毁。一种新生的凤凰将从这堆烟灰中展翅高飞。”

党卫队分为三种类型：普通党卫队，它不经常执行任务；党卫队预备队的任务是宿营待命；党卫队骷髅队，它的任务是监视集中营。

普通党卫队组成最上层的土壤。年轻的候选者必须在完成国家公职之后才被吸收进普通党卫队。年轻人的虚荣心驱使他们加入精锐团。他们得到基本训练，经受了考验，于是进行宣誓，最后接受荣誉剑。他们到了五十岁还必须是党卫队的积极分子，而且要每年检查他们的身体状况、军事训练和政治上的正统性。

为了在国家部门谋求一官半职，或者在私营工业部门

^① 《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2卷，第237页，脚注2455。

获得高职,或者为了能上大学,参加党卫队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了。

因此,由希姆莱建立的特殊的“黑色军团”被安置在德国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里。实际上,它很快授予它的最高领导人以无限的权力,并使他有可能消灭他最危险的敌人。

第三章

盖世太保无所不在

希姆莱把他的黑色军团的部分原则运用在盖世太保的组织上。党卫队那种严格的等级制度不断地被沿用到秘密警察上,而且当盖世太保成员获得党卫队头衔的时候,甚至完全恢复了党卫队的等级制度。有了保密措施可以增强严格划清权限的概念。保密责任制属于党卫队纪律的基本原则,而保守秘密则是盖世太保的基础;希姆莱把党卫队和盖世太保变成一个封闭的世界,致使无人有权对它膘上一眼,或对它进行任何批评。

盖世太保从它建立的第一天起就有自己的活动场所。艾尔布莱希特亲王街上的建筑物和其他许多大楼由于所处地势和内部的布局而显得非常融洽,尤其是那里的民族博物馆;里面的东西被人清除了,博物馆也被占用了。还有一所职业学校的学生宿舍也很派用场,他们借口某些学生是共产党人,宿舍是“夜间纵酒放荡”的场所,因而把教师和学生赶了出去。盖世太保盘踞着这些场所。他们的办公室由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控制着。一九三一年,希姆莱将海德里希安插在党卫队保安处的最高位置上。一九三三年初任慕尼黑警察局副局长,成为希姆莱的副手,一九三四年初,

当希姆莱获得国家秘密警察的全部领导权以后，海德里希在柏林又投奔希姆莱去了。希姆莱立即委任他担任盖世太保总部的领导。

根据纳粹分子的演习，他们的作用被分为两部分。盖世太保头子海德里希作为国家官员行使职权，同时又是党卫队保安处头子，因为保安处隶属党卫队，它是纳粹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海德里希可以使用自己的党组织。另一方面从双重意义上来看，就是说在海德里希手下工作的绝大部分同僚，这些人既是官员，同时又是党员。这对他来说极为有利，因为这些人从来不要花招，敢于向司法部门报告情况，他们对待以党的名义发布的保密令要比对待行政部门的保密令更为敏感。

纳粹党开始争夺国家领导权。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一日法令的第一条明文规定：“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是德国国家思想的代表，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

不管是国家公务人员，还是党员，大家所追求的是实现元首的政治计划，实现他的幻想：建立他多年来宣告的那个千年帝国，如果完成此项事业，那么在不远的将来就会动摇社会制度的基础，破坏国际均衡，优等种族就会兴起，世界就会殖民化。纳粹党成为这些神圣原则的捍卫者，成为传播这种思想的工具。事实上，党就是国家。谁要是被开除出党，谁就接近被判处死刑：“开除出党意味着是最严厉的惩罚措施。在某种情况下，它同样意味着是失去任何生存的可能性和任何个人的威望。”然而，这比起希姆莱施加在党卫队员头上的可怕的威胁要小得多：“谁要是不忠，哪怕

只是一个想法，谁就要被开除出党卫队，而且要他当心从活人的世界里消失掉。”

盖世太保的任务就是：禁止对纳粹教条进行任何讨论，要消灭敌人，不管使用什么方法，甚至连那些仅仅敢于怀疑制度优越的人也不例外。为了完成这个任务，盖世太保必须是全能的。希姆莱和海德里希设法从它的组织里了解一切，知道一切。他们需要数年来完善盖世太保组织的内部机构，但是想不到他们的工作一开始就有了基础。在它非法存在期间，党卫队保安处把重要材料搜集成案卷。他们谨慎地把党的敌人做了登记卡。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许多案卷搞得毫无漏洞，对政治活动和职业活动、家庭、朋友、住房和可能去的避难所、秘密的社会关系、个人弱点和爱好一一作了说明。所有这些记录都存放在那里，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加以利用。

现在盖世太保开始利用这些档案。敌对者被逮捕、拷打和杀害。大多数德国人是知道这一点的。但是这些人中间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位部长，没有一位将军敢于大声疾呼，他们本来也许能够发出可以听到的告急声，也许能够把他们的国家和世界从日益增长的危险中拯救出来。正象吉斯维乌斯在以后写的那样，如果当时从国外透过一团漆黑的艾尔布莱希特亲王街一眼看穿海德里希的魔术的话，那该多好啊！但是外面却没有一个人感到有必要进入这块一团漆黑的地方。纽伦堡审讯时，美国起诉人罗伯特·H·杰克逊曾这样说过：“德国已成为一个人间魔窟。”

盖世太保服从党的监督。因为他们主要是由那些职业

警察组成的，他们尽管在希特勒上台后受到清洗，但大部分还在留用，所以不能立即着手进行明显的改组，否则就要使这个机警的机构陷于紊乱。从一九三四年四月起，盖世太保官员的政治思想受到较为严格的考查。新进来的人员必须参加党组织，同样，每次提升前需要一份党的鉴定并得到党的同意，为此，纳粹党保存着一张特制的索引卡片。接收和提升取决于他们的“政治鉴定”——官方授与的荣誉称号。

根据党卫队保安处最高当局的通函，必须要写“政治鉴定”。盖世太保官员服从党卫队保安处的政治监督，即服从党组织的有关“双重领导”。这样同党组织形成了越来越密切的合作。

在海德里希领导下的党卫队保安处和盖世太保这两个组织监视着公众舆论；作为党的机构的党卫队保安处负责情报工作，而作为国家执法机关的盖世太保则负责逮捕、审讯、抄家等任务。简而言之，负责任何直接的警务工作。

盖世太保在一九三四年从党卫队保安处那里得到的情报远远不是他们唯一的新闻来源。党组织的基础如同国家的基础一样是“元首原则”，根据这个原则，各级权力掌握在某一个人的手里。党的法令宣布：元首永远是对的。对你说来，纲领必须是信条。为政治运动服务是对的，因此，为德国服务也是对的（因为党和祖国两者已经等同起来）。“党组织的基础是元首的思想。所有政治领导人都是由元首任命的并由他负责。他们在所管辖的部门里享有很高威望。”

所有的人对由元首任命的领导人都要绝对的服从，因为元首是绝对正确的。第一条就已经侵犯那些未成文的人

权：“每个领导人都有权在不屈服于任何监督的情况下，进行检查、管理或者作出决定。”

德国人从上学开始就要牢牢记住“元首原则”。在等级制度的金字塔里有十五个德国领导人排列在希特勒的后面。最有名的人物是党务部主任鲁道夫·赫斯，以后由马丁·鲍曼接替，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海因里希·希姆莱，劳工阵线领导人罗伯特·莱伊，希特勒青年团领导人巴尔杜·冯·席腊赫和所谓党的思想家阿尔弗雷德·罗森堡。

一九三三年初，德国被划分为三十二个行政区，每个行政区下设县，每个县下设镇，镇下面为乡，乡下面为村。行政长官、县长直至村长都是这些单位的领导人，一般统称为“地方长官”。

直接由元首任命的行政区长官全面负责授予给他的最高权力。他既是“国家政权的支柱”，同时还兼县长，一般说来，他负责政治领导人、党员和居民的政治学习和思想教育。镇长也是“国家政权的支柱”，负责几个乡，共约一千五百户住户。乡长负责四至八个村，是村长的直接顶头上司，他向那些村长传达党的指示并对他们进行监督。村长是组成党内金字塔的基础，他实际上负责四十至六十户住户，因为他是同居民直接打交道的唯一的干部，从他那里可以详细地得到他所管辖的地段内的每个居民的情况。

他必须发现那些不满的人并向他们解释一些引起“误会”的规定和诸如此类的事情。如果这样做还不够，他可以使用其他方法：“忠告，有时也可采用较为严厉的教育形

式，告诫他们，个人的错误行为会给他自己和集体造成损害。”^①

十分明显，地方长官熟悉他地段内的居民情况还会带来另外的好处：“他〔村长〕可以确定那些散布恶言的人并把他们的情况汇报给支部，以便国家主管部门，即盖世太保能够掌握情况。^②最后，盖世太保借助组织得很科学的侦察和密告掌握情况。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鲍曼规定：“为使党的所有部门以及它们的支部同秘密警察保持更为密切的联系，我代表元首邀请盖世太保领导人在今后参加党和它们支部的所有正式大型会议。”^③

这样盖世太保就能依靠上万个镇长和村长的耳目来窃听和侦察每个德国人的最细小的活动。

驻纽伦堡的美国起诉人托马斯·J·多德在纽伦堡作证时说：“他们通晓每个纳粹支部或每个镇的内部秘密。调整收音机上的波段，不信任的面部表情，神父和忏悔者之间的不可侵犯的秘密，父子间的那种古老的信任关系，甚至婚姻的神圣性，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们的业务范围。了解本身就是他们的业务。”^④没有任何事能逃过盖世太保的眼睛。

但是成千上万个志愿间谍仍嫌不够。还要追踪每个人

① 《党的面貌》，单行本，出版者：德国组织领导人，由教育局教育通讯处修订，慕尼黑1940年。《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31卷，第204页，脚注2833。

② 纳粹党的组织书刊，第14页。《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4卷，第35页，脚注1893。

③ 1946年8月30日，鲁登柯将军在他判决前的最后总结发言。《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22卷，第364页。

④ 1946年8月29日，多德在判决前的总结发言。《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22卷，第300页。

的职业活动，一般人在外面娱乐消遣时也要受到监视，简而言之，他们的后面总有人尾随着，除非他们能够从村长——监狱长的眼前溜走。

当然公务人员首先受到监视。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二日，戈林在一份传阅文件中告诫那些干部要监督国家公务人员的言行，并把那些对政权持批评态度的人通报上来。他们用这种方法达到一种自我监督的目的，因为每个人都在暗中监视他周围的人，而自己又被别人监视。为了保证这个密告制度行之有效，戈林威胁性地补充说，拒绝提供这样的报告将被视为敌视政府的行为！

通过许许多多的小组，例如通过佐尔贝格小组使这件不断进行间谍活动的紧身衣更加完美。一个名叫奥托·阿贝茨的图画老师就是属于特别挑选出来的这个组织的一位年轻的领导人。他安排同法国青年协会的委员会进行会面，在会晤过程中，保安处向他作了有益的指示。一方面这些会见有可能争取法国的志同道合者，其中有几个人已经被拉进来做情报工作，另一方面可以把党卫队保安处的间谍偷偷地送到法国去。

同公务人员一样，每个德国人也都在工作时受到监视。家家工厂，个个企业都设有纳粹党的支部。罗伯特·莱伊控制社会保险、合作社、工资等等。他的劳工阵线代替了工会，所有工人和职员都被“包括”在它的里面并受到严厉监视。一九三三年六月三十日在戈林给盖世太保的一份通告中规定，要把每一个看来在政治态度上有怀疑的党员、工人或职员上报给劳工阵线的代表。

农民经瓦尔特·达里介绍加入他的农民阵线。一九三五年“德国农业协会”要求所有对德国食品供应作出贡献的行业联合起来。

搞体育运动的人也团结在领导人冯·恰梅尔·奥斯滕男爵的周围。如果你想闲聊和旅行一番，那有一个“通过欢乐获得力量”的组织，它是属于莱伊的工作范围。电影院和电台完全由德国宣传部所控制。显而易见，报刊被牢牢地控制在戈培尔的手里；以前的通讯社为国家“德意志通讯社”（简写 DNB）所替代，德国新闻全国协会现在也受纳粹领导。此外，每个记者必须加入德国新闻协会，由它监视那些现在称之为编辑的“文书记录员”。哪个记者敢于含沙射影地表示不满，那他就该倒霉！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很少登载他的文章，因为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需要得到宣传部的特殊批准，只要稍许失礼就会被撤职。多亏有了这些措施他们才不必对所有文章进行检查；只许写宣传部提供给报馆的题材，而且只能按照“语言规则”所规定的那样写。

“文献院”和作家协会把所有依靠写作生活的人都监视起来。只有该组织的成员才可以发表文章，而且只有不受到嫌疑的人才能被吸收到这个组织里来。“文献院”要向宣传部汇报新老作品中出现的有害的东西。图书馆早已被清洗。图书馆的一个组织能更好地控制思想。

律师、医生、大学生同样被管得牢牢的。一八七三年成立的闻名于世的德国医生协会已被纳粹医生协会并吞，它“清洗”了犹太人和共产党人的医生，接着清洗了所有在政治上不合格的人。

德国卫生部成为内政部的一个部门，红十字会受党卫队的控制。享有国际声誉的科学协会——柏林医学协会也逃脱不掉这种监视；在那里要自由发表一种科学的观点是不可能的，那儿的思想水平降到这么低的程度，使得学者们都避而不谈学术见解，不跟那些御用的草包和纳粹宠爱的骗子争长短……

大学引起纳粹的怀疑，因为按照他们的看法，大学教师受到自由主义的毒害。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七年，五分之二的大学生已被解雇。根据法令于一九四三年六月六日成立一个研究委员会，它的那个拥有二十一名成员的主席团耍了一次花招，主席团里面竟没有一位科学家，有的只是鲍曼、希姆莱、凯特尔之类的人；担任主席这个最高职位的是赫尔曼·戈林。这个研究委员会控制了所有研究所，并在每个所里安插一个盖世太保的人。这个人可能是教授，助教或者政府官员或者是一个不知名的大学生——不管怎样，他总得汇报有关研究所成员的思想情况。

纳粹党人依靠其他两个组织可以在边界的对面进行侦察，并把它们的控制系统扩大到全世界去。这是纳粹党的“国外组织”和“外籍日耳曼族人的中转站”，这个中转站负责管理所有日耳曼后裔返回祖国的事情。实际上，这些组织是间谍活动的温床，它们有时单干，有时作为纳粹的有关特殊部门的帮手设法使第五纵队能在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定居下来。这样，它们就有助于去发现和监视那些认为到了国外可以太平无事的德国政敌。他们长期受到纳粹的疯狂迫害。

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五日，戈林命令盖世太保和边防警察注意那些住在邻国的政治流亡者和犹太人，以便他们一旦回到德国就把他们逮捕起来，关进集中营。

这些人在那些避难的国家里仍然受到监视和寸步不离的追踪。在德国部队进驻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以及法国的时候，盖世太保疯狂地迫害这些不幸者。一九三三年逃往法国的社会民主党领袖希尔费丁和布赖特沙伊特成了他们的牺牲品。应德国人的要求，他们在未被占领的法国南部地区遭到逮捕并被移交给盖世太保。希尔费丁在巴黎的牢房里自杀身死。他当过德国财政部长，曾经代表过他的国家出席海牙会议。布赖特沙伊特死在布痕瓦尔德。

一九四二年六月，最高统帅部终于把元首的一项密令转交给非洲军团，根据这项密令要“最严厉地对待”德国政治流亡者。他们在非洲作战的自由法国武装部队的俘虏中终于被人发现，“结果被残酷地枪杀了”。“如果在那里没有被枪杀掉，那么根据以后一个德国军官的命令，目前无需把他们留下来获取情报的话，他们也会立即被开枪打死。”

国外组织和外籍日耳曼族人的中转站同样可以追踪逃犯。国外组织是纳粹党的一个部门，它的任务是“关心”住在国外的德国公民。它的领导人是恩斯特·博勒；他的级别是行政长官，在外交部任国务秘书。一九三一年，格利戈尔·施特拉塞在汉堡建立了国外组织。选择汉堡为该组织的所在地，是因为在十个进出海港的德国人中有八个人是取道汉堡的。汉堡是去北美和南美航线最多的德国海港，是航海大公司的所在地，它有着成百个领事馆。一九三三年十月，

国外组织由元首的副代表赫斯领导。几年内，国外组织成立了约三百五十个遍于全球的纳粹党地方小组。那些要与纳粹党地方小组保持长期接触的个别拥护者尚未计算在内。

日耳曼族人的中转站则完全由党卫队控制。它的头子是党卫队分队长维尔纳·洛伦兹。因为他的任务是保护非德国国籍的讲德语的人，所以他的活动范围首先是在与德国接壤的地区；不论是准备合并奥地利，还是准备在苏台德区掀起鼓动浪潮，他总是插一手。日耳曼族人的中转站是领导第五纵队的组织，有关它的情况已经写得很多了。

战争期间，这个组织对波兰和东欧地区的居民迁移起了重要的作用。十月七日被希特勒任命为“巩固日耳曼民族帝国委员”的希姆莱以他新的特点完成了洛伦兹曾经依靠党卫队和盖世太保所干的事情。

最后还有一个稍许出名的、国外有影响的第三个组织，即罗森堡的“国外政治局”。它的目的是要在国外的公众舆论中进行纳粹主义的宣传、首先是反犹太主义的宣传。宣传途径是互换大学生、优惠贸易往来以及在国外新闻界中宣传在柏林撰写的文章。纳粹宣传的内容就是用此方法通过《赫斯特报》传播到了美国，而法国的某些极右机构则按时从德国宣传部门领取补助金，作为应声虫为希特勒的宣传服务。

但是国外政治局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也就是它最隐蔽的工作。由一批优秀的笔译人员组成的新闻科就是属于这个局的，他们这些人掌握世界上所使用的各种语言。这个小组可以把每份报纸、甚至把登载在世界最遥远角落里的

一份报纸上所登载的事情立即翻译出来。它天天汇编一份新闻梗概和来自三百份外国报纸的摘要，然后把有关世界政治倾向的摘记分发给有关部门。那些翻译人员顺便做些警务工作，从而使盖世太保的索引卡片日益增多。外国报纸上登载的有关政治流亡者，包括结婚和生死广告、集会和大会的预告、商业广告启事等等，一一作了翻译并被放进流亡者的档案里。另一方面，新闻处保存一套世界各大报对公众舆论影响的卡片以及读者和有名的新闻记者动向的卡片，这种研究工作对盖世太保来说同样是有好处的。

根据这些例子可以判断出，通风报信者和密探的网布得多么密，它不仅把盖世太保扩张到整个德国，而且也扩张到全球。为了审讯目的而系统地歪曲人们所做的事情，小心谨慎地收集情报和利用情报，这一切使人感到那是一个窒息的纳粹世界，它在几个月里已经把德国变为一座可怕的监狱。

获取情报还可以通过其他许多途径。当地的市和区警察局得到指示要把他们听到的与政治有关的全部事情呈报上级。盖世太保让他们去调查鸡毛蒜皮的事，而自己只抓头等大事。希姆莱最终直接从党卫队长和党的其他高级官员那里得到情报。

另一个重要的获取情报手段是窃听电话谈话。自从电话问世以来，窃听装置在世界所有国家和所有政权里都发挥着作用。从最近发生的一件丑闻事件中得悉，美国甚至有这样一种私人组织，他们受私人委托，窃听电话谈话，当然要收费。纳粹政权要把它的这些组织变为一个真正的工

业。这种工业适合于德国企业，赫尔曼·戈林在考虑了技术上的完美性之后，就于一九三三年建立这样一个窃听组织，并为它起了个一语双关的名字“赫尔曼·戈林研究所”。事实上，戈林是该所的主人和统治者，不过不好意思说：这是他的财产。海军部的情报专家和狄尔斯那样的警察一起培植了这个所。“研究所”不仅控制电话和电报网，而且也控制无线电通讯。与国外通电话以及拍往国外的电报内容同样受到监视。该组织甚至成功地截获过两个异国之间的谈话；经过德国情报网的过境电话也受到有计划的监视。

即使在德国，重要人物的谈话，甚至有名的外国人的谈话也被窃听，不言而喻，所有在政治上看来不可靠或者受到警察监视的人，他们的谈话也都被窃听了。不过是进行抽查窃听的。如果需要，窃听部门可以立即接上每条线路。最后有一种特殊装置，可以任意地自动记下每次被认为是重要的谈话——这在当时说来，确是达到了技术上的完美境界！元首在电话中的每次谈话也被录制下来，存放在研究所的档案室里。

每天都要向希特勒呈递报告和记录。如果各部或各局对每份情报都感兴趣的话，则继续把情报送往各处。然而，戈林是这个研究机构的创办者和主持者，他出于自己的需要，随时都能捂住某些情况。

“研究所”授予戈林特别权力，并在他反对罗姆的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对这个工具的价值是知道得一清二楚的，所以拒绝把这个研究所连同盖世太保一起让给希姆莱。盖世太保和党卫队保安处可以大大地利用他的这个组

织,不过它直至最后仍在戈林的控制之下。

然而,盖世太保在可疑者的住房里安装窃听器,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自己。趁房客不在家或者借口要检查电话线路或电讯设备时,就把传声器装上,这样就能窃听到可疑者直至他家庭的私生活情况。没有一样东西,没有一个人能逃脱掉这种诡计。经济部长沙赫特终于在一九三四年发现,有人在他的会客室里安装了一架隐蔽的传声器,他的女管家在为盖世太保效劳,她通过窃听器每晚可以从她卧室那里窃听到她主人的私下谈话。

间谍活动无孔不入,不管在哪里,都没有人感到自己安全无恙。米尔契元帅在纽伦堡供认,人们似乎不怕党卫队,但是怕盖世太保:“……大家都确信,人人都处在不断地监视之中。不管我们的官阶如何,全无例外,也许人人会在那里有份案卷,以后,许多人也就是根据这些案卷受到起诉的。由此引起的麻烦不仅落到这些人或者其他人的头上,而且甚至已经步步晋升为德国元帅的那些人也会受到同样的遭遇。”^①

事实上,任何这样的组织已经成为它的缔造者和头子的私人堡垒,而每一个当权者在组织中疯狂地反对他所怀疑的目前和将来的对手。斗争进行得冷酷无情,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希特勒认为这些勾心斗角是一种很好的竞赛,他特别认为,这些贪婪地追求权力和金钱的人由于相互监督,可能变得不那么危险了。

^① 1946年3月1日,米尔契在纽伦堡的供词。《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9卷,第104页。

在这些诡计中，希姆莱懂得如何巧妙地运用手腕去制服他的对手。同戈林的结合使他收益非浅。虽然在正常情况下“研究所”该属于国家警察总部，但是希姆莱却把它让给了戈林，这个例子说明，希姆莱懂得如何通过这方面的妥协以保证自己的友好中立。此外，为了监督戈林本人，盖世太保和党卫队保安处很快设计出他们自己的、绝密的窃听器。

在这场争夺优势的斗争中，最冷酷的犬儒主义和最无怜悯心的残暴是必不可少的武器。希姆莱就是在这场斗争中找到了一个难得的助手，即漂亮又狡猾的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他在希姆莱的助手中是一个永远忠诚可信、善于造谣的家伙。

第四章

莱因哈德·海德里希

一九三四年四月，稳坐“党卫队中央保安局首脑”宝座的这个男人是个性格怪僻、使人着迷的人。他的个性、作用的重要性、活动范围之大以及他的无数罪行和由这些罪行而引起的恐怖足以说明，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

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家庭出身不错，他本人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于一九〇四年三月七日生在哈雷。他的父亲布鲁诺·海德里希是那里音乐专科学校的校长。他在自己的出生地度过了童年和青年时代，在那里上中学，受到传统教育和音乐的熏陶。这种教育深深地印在他的心里，以致难以磨灭。每当他下班后忧郁地回到家里，他总是用弹奏乐器来使自己消除疲劳。那时候他已经是盖世太保的统治者了。

一九二二年的复活节，年轻的海德里希加入了皇家海军。他的生活很有规律；一九二四年他成为见习士官，一九二六年升为少尉，一九二八年当上了中尉。

他长期来对政治很感兴趣。在一九一八和一九一九这两年中，他参加了哈雷的德国国家青年团。他认为，该组织太温和，所以在一九二〇年又加入了德国人民攻守同盟。他渴望参加在他周围发生的政治活动或军事活动，因而很

快就成为哈雷自由团的卢齐师的志愿联络人。一九二一年他与另一个人一起成立了一个新的同盟——德国人民青年队。这时候，他的脑子里装满了极端主义的理论，这些理论受到了所有“爱国”人士，特别是军国主义思想人物的热烈颂扬。最后他被自由团军官们的思想感染上了。

在海军里，他同那个由他协助成立的同盟保持着联系，当他被提升为见习士官之后，如愿以偿地被分配在波罗的海舰队情报处政治科。他在那里获得的知识对他今后几年的工作非常有利。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年轻军官聪明、勤劳、有天才、纪律性强。如果纳粹国家的整幢大厦不出现隐隐约约的裂缝而导致动摇的话，他也许早就飞黄腾达了。海德里希完全为性欲所支配，一个可以作为范例的事件使精神病专家很感兴趣，屡见不鲜的桃色事件妨碍了他的前程，直到一次更为严重的纠纷才使他与那些桃色事件一刀两断。海德里希同汉堡军火厂的一个高级军官的女儿订了婚。众说纷纭，根据其中的一种说法，他把这个年轻姑娘当作他的情人，然后借口说，一个军官不能同这样一个轻佻的姑娘结婚而与她断绝了关系。旁人在猜想，他也许先把她灌醉，然后奸污了她；根据第三种说法，他对她进行了敲诈。纳粹头子想千方百计抹掉他们的过去，所以要调查他们过去的生活动是十分困难的。尽管如此，名誉法庭还是审理了这起案件。后来，在海军元帅雷德尔的主持下作出决定，海德里希的行为与一位军官的身份不相称，并要求他提出辞职，以避免严重的后果。一九三一年，这个年轻的军官被迫流落在汉堡的街头上。现在，海德里希象希姆莱一样也面临着相当

糟糕的境况。他在汉堡、卢卑克和基尔等地生活潦倒，在一些声名狼藉的圈子里兜来兜去，不久结识了一些粗鲁的人，他们是被纳粹党人招募进“萨尔卫队”用来“保护”在大街上举行挑衅性的示威游行的。

海德里希通过与这些人的接触，加上自己过去的政治情况便参加了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党知道所争取的那个人是谁。他的教育、军事训练和具有的专门知识使他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海德里希参加了党卫队，这是一个为自己平步青云的阶梯。此后不久，他指挥一个实力不太强的基尔中队。现在希姆莱对他注意起来了。他看出海德里希的非凡才能，因而于一九三一年八月一日任命他为冲锋队队长，同年秋天提升为突击队大队长(少校)并把他接到慕尼黑的参谋部。

一九三二年七月，希姆莱决定重新组织党卫队保安处，并把这项任务委托给他认为是内行的海德里希。同时任命他为冲击团队长(上校)。自从党卫队建立以来，每个单位都有二人或三人从事于“保安”工作，即情报工作。

一九三一年，希姆莱把这些情报人员从党卫队中抽调出来，组成一个小组。这个新组织被称为“保安处”(SD)。不过它仍然是党卫队的一个机构，一般说来，是负责希姆莱和党卫队领导成员安全的。

海德里希作为保安处头目试图把在海军情报处那里学到的东西运用到实际中去。他按照军队的模式组织他的工作并对他的人员进行技术培训。他把当时管理得很不完善的索引卡建立起来，但是由于缺乏资料，不能象他所希望的

那样迅速地加以充实。一九三三年一月以来，他一直着手弥补这些缺陷。希姆莱对他的工作非常满意，随即提拔他为巴伐利亚邦的警察局副局长，并于一九三四年把他放在盖世太保的最高职位上。虽然海德里希不是“老战士”，但是他很早就在党内，那时他坐镇在柏林，既领导盖世太保，又领导保安处。

这个人的过去经历是变化多端的，他在外表上给人以一种相当善良的印象，但是很快会使德国人吓得发抖，此人高个子，看上去是个很有教养的军官，金黄色的头发，略微带点淡红色，留着分头，梳得又挺又直。他个子瘦长，但很结实，在那时具有受人渴慕的特点：一种“健壮的军人姿态”。不过，海德里希的脸庞掩盖不住他的真面目。他的额头特别高，下面是两只小小的、深凹的蓝眼睛，眼皮耷拉着，这是细长的、抑郁的蒙古人的眼睛，这种不得体的特征令人想到成吉思汗或阿提拉的骑兵中的远祖，这足以动摇人们对海德里希的人种的看法。他的脸型过长，耳朵很大，耳轮特宽，鼻子又长又挺，鼻梁过宽，鼻尖太窄。在这张地道的男性的面孔上，那张嘴唇厚厚的大嘴巴却发出讨厌的、刺耳的声音。海德里希的声音跟他的外表相比，要高出两个音阶：象从一个运动员体内发出来的妇女声音。他的两只手也长得柔软，又白又嫩，保养得很好，象脸部那样富有表情。当希姆莱露出一副难以捉摸的佛像脸孔时，海德里希只能拼命地克制他的神经质的禀性。他说起话来断断续续，经常不把句子说完；考虑问题太仓促，话音落得很快。当希姆莱假装心不在焉地作一般指示，让他的对方对他的意图捉摸

不定的时候，海德里希总是担心，人们会误解他的话。

那种不协调的相互矛盾的、雌雄同体的特性只是一种心理冲突的表现。海德里希老于世故。他是个杰出的骑士和卓越的击剑者——德国最好的击剑者之一，同时他又是一个了不起的艺术之友。为什么他如此小心地保养他的一双手，其中一个原因是，他是个天才的小提琴家。他在自己的住处举行受人推崇的室内音乐晚会，喜欢乘此机会为他无可争论的天才赢得掌声。他虽然悄悄地醉心于英国的君子风度，但有时却暴露出他的可怕的性格。他性欲过度，不断追逐女性，喜欢同一些酒肉朋友出入娱乐场所。甚至当他身居要职的时候，也从来不会放弃寻欢作乐的机会。他先是沉迷于柏林夜总会，在那里通宵达旦，然后把一些准备好的妓女叫到一家下等旅馆里轮流进行性交。

海德里希最主要的性格就是潜伏的残忍。盖世太保的那些最令人可怕的拷问者都知道这种残忍性是怎么回事，因而都怕他。这个无知的残忍者把那些最厉害的杀人流氓都搜罗到自己的部门里来了。

有一批非同一般的智囊专门从事纳粹的这些“杰作”。他们懂得去克制自己的欲望，而且凡是希姆莱所特别重视的事，都要以礼相待。不过，在这种令人愉快、循规蹈矩的态度后面却隐藏着大胆的鲁莽行为。纳粹党人上台不久，当希特勒的地位还不巩固，而且阴谋诡计层出不穷时，海德里希着手把希特勒内部的敌人用婉转词句谈论元首的出身情况及其不光彩的家谱汇编成册。这些人陶醉于家谱之中，关于此事，有一段颇能说明问题的故事。当人们知道，卡纳里斯海

军上将在海德里希死后不久作出保证说，他手中已经掌握一部分关于希特勒是犹太人出身的证据时，这些人受到了嘲笑。

这个人所担负的可怕职务要求神经紧张，因而容易失去自制力，他甚至经常会真的大发雷霆，怒不可遏并威胁他的下级。不过这种情况只是在他的工作范围内发生的。在他窄小的个人小天地里，他非常嫉妒他的妻子，一位冷若冰霜的美人儿，她怂恿丈夫“向上爬”，以此得到她不可缺少的奢侈生活。他对她不放心。为了证实她的忠诚，他派人监视着她。他同样嫉妒他的反对者和朋友们的成就；他追求的是影响、权势、荣誉、金钱，他一定要得到第一把交椅，他已经作好一切准备来获得它。

他的口号就是“一切听从长官”。为了进行控制，他在主要共事者当中挑动这一部分人去反对另一部分人。他利用他们，但是当他竭尽全力从他们身上捞到好处之后，就把他们一脚踢开，甚至同他一起工作的，在他看来非常能干或虽然贪图功名、但是不会成为他的竞争者的那些人也难幸免。为了使他们互不受害，他用纳粹方式建立了一种相互监督制。

海德里希也明白，在政界有权势的人物中间要利用这一部分人去反对另一部分人。他的这种伎俩招来了别人对他的仇恨和敌视。有一天，他对他所讨厌的吉斯维乌斯说：“你是知道的，我可以把我的死敌一直逼进坟墓。”这初看起来是一句空洞的词句，但是却有一点道理。他就是这样仇恨卡纳里斯、博勒、里宾特洛甫的，最后去反对他的首脑，甚

至反对希姆莱。

他暗地里进行着各种剧烈的斗争，一心想的是一个“权”字。他偏爱匿名也许是出于一种自卑感之故吧。

他的部下几乎从不称呼他的名字，他们叫他“C”——一个古怪的绰号，只有了解他家庭秘密的人才知道这个绰号。他不敢正视他的对手，尽管他具有野兽的本能，也不敢正面攻击他们。他内心的活动同纳粹原则是完全一致的，这就使他成为党卫队的种族论和行动准则的思想家、理论家和宣传家。对他说来，首脑就是先知，他可以发布命令，可以为一切辩护。因此，由他领导的党卫队保安处的任务，不是去监视党卫队的“行为是否检点”，而是去监视它的“主义是否合乎潮流”。这个杀人犯戴着道德家的假面具。

海德里希耐心地在他艾尔布莱希特亲王街八号的办公室里编结着覆盖整个德国的巨大的蜘蛛网。对此需要花上五年时间，这五年将把德国引向战争的边缘，一些目光敏锐者早在一九三四年就已经看到地平线上闪烁着战争的火花。

希特勒一开始就规定了盖世太保的特权范围：

“我禁止党的各部、各总支和各联合分队对涉及到盖世太保的事务进行调查和审问。所有政治和警务性质的事除了继续按党章办外，还必须象往常那样立即通知国家秘密警察的有关部门……我特别强调，党所了解的一切关于叛逆和叛国活动的事件必须及时通知秘密警察。党的任务绝对不是在这方面主动地去进行调查和研究。”^①

^① 《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21卷，第314页，脚注1723。

人们根本谈不上会触犯合法性和法律的庄严性。一九三一年，施韦德尔在《政治警察》一书中写道，正象纳粹国家来源于共和国，纳粹学说来自自由主义那样，警察作为国家暴力的工具始终反映国家的本质，它可能从一个共和体制改为纳粹体制。“人们需要一些新的东西”。

事实上，新的东西是得到了一些。盖世太保与警察毫无共同之处，警察在整个文明世界里支持和保护社会。而盖世太保只要一发现可疑的敌人，就使他不能有所为害：

“谁在将来加害于纳粹运动或国家的支持者，谁就会在最短期内失去他的生命。如果他打算蠢蠢欲动或者即使这次行动不会给他造成死亡，而只是受一点伤，那也够他苦一辈子了。”^①

在这个新的国家里，蠢蠢欲动已经够呛了。一个重要的纳粹法律学家格兰德当时曾向德国法官发布指示说，有必要“在刑法中重新使恐吓这个概念发生效力”。

盖世太保可以逍遥法外；盖世太保的人员可以为所欲为——不管犯了什么法；他们不必为此向任何人负责。盖世太保完全不顾法律行事长达三年之久，而且没有一种文本规定它的作用和它的权力。它可以用“保护性拘留”剥夺每个德国公民的自由。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和一九三四年三月八日发布的两项命令授予它这种权力；但是没有一项命令规定它享有那种特权。

务必用正在滋生的听天由命的思想使人民习惯于这个

^① 戈林在1934年7月的讲话。《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2卷，第222页，脚注2494。

特殊的政权，习惯于专制和纪律这个混合体。但是官方的指示通常总是说，警察是受普通法律约束的。但是没有一个人敢说，所有这一切证明：国家的道德正在蜕变，任何真正的司法和法律正在终止。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日，普鲁士邦行政法院在特别情况下决定，盖世太保不受正规审判权的制约。一九三六年二月十日，一种意见主张把普鲁士邦法律作为法律原则：“秘密警察事务中的命令不受行政法院的检查。”^①

盖世太保的行动不需要任何法律根据，这一点不会妨碍任何人。休伯教授写道：“政党的威信是建立在帝国的习惯法上的”，另外，海德里希保安总局的组织科科长、党卫队分队长瓦尔纳·贝斯特博士说，他的权力来自“新的世界观”，而且不需要特别的法律根据。

一九三五年五月，普鲁士邦行政法院解释道，在法庭上对监护令提出责难是不可能的。一九三六年三月，一位基督教牧师敢于在他传教时攻击一位赫赫有名的主教，他是那些走上纳粹路线的主教中的一个。第二天，盖世太保命令该牧师辞职。他拒绝就范并向法庭呼吁。这项命令明明是违法的，但是法庭谢绝他的请求，理由是盖世太保的命令不受法庭判决的约束，因此提出抗议是无济于事的（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九日决议）。

不久又发生一位天主教神甫的类似情况。当地的盖世太保曾经要求他提供教会组织的资料及其成员的情况。他

^① 贝斯特：《德国警察》，第37页，达姆施塔特，1940年。《普鲁士邦法律集》，第21页，1936年。

也在法庭上提出抗议，但遭到拒绝。凡是盖世太保发布的命令，不能讨论，只得服从。

警察在继续伸展它的魔爪。为了从事某种商业，需要有一张许可证，这张许可证由治安警察经过简单查问，证明申请领证人道德清白之后才可签发。盖世太保为了进行控制，在这里探索一个新的阵地。它不承认这些商业执照的有效性，并把这种事情提交给萨克森行政法院。法院的判决乃是卑躬屈膝的杰作：“因为经商者可以用一种允许其进行颠覆性活动的方法做生意，所以在签发许可证之前必须与盖世太保商量。”这样盖世太保就可以对那些在政治上受到怀疑的商人施加各种压力。

盖世太保可以在未经过判决的情况下采取三种强制性的措施：警告、监护、进集中营。这些“合法”的权力使它有可能逮捕和监禁在政治案件中宣告无罪而离开法庭的人。除此之外，盖世太保还有其他的方法：劫持、谋杀和伪装成不幸事故或自杀的谋杀。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的那次大屠杀中，柏林天主教运动的领导人，德国交通部秘书长埃里希·克劳斯纳博士就是被枪弹所杀害的。凶手是两个党卫队员，他们说，他是自己开枪打死的。官方确认了这一点。克劳斯纳对自己的生命作了人寿保险。但是保险公司拒绝给他的寡妇支付保险金，因为他是自杀的。如果再去怀疑这一点，那是很危险的。克劳斯纳太太的律师将委托者的要求直接向内政部提出。但是他的起诉被驳回。在司法部得到的是同样的结果。甩掉捣乱分子固然是一种舒服的方法，可是向正规法庭提交起诉书等于是自投罗网，因为

起诉书把盖世太保卷进了案件中去。在此期间，盖世太保得到了关于律师采取措施的风声，于是认为有人不适当地干涉了他们的事务：这位律师就被逮捕，因为他敢于对盖世太保所作的不是谋杀，而是自杀的正式声明表示怀疑。直到数星期之后才被释放。

瓦尔纳·贝斯特明确写道，没有任何法律条文可以限制人们去保卫那个必须适应敌人战略的国家。盖世太保的任务就是要使军队的章程听从于它，它象一支军队那样不能容忍司法条例去挫伤它在斗争中的积极性。

在短短的几年里，纳粹党人控制了公众舆论和司法部门。当时，戈林对经济部长沙赫特说：“我告诉你，元首要的是二乘二等于五。”尽管对那些处在盖世太保魔爪中的不幸者的虐待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但是当惶惶不安的谣言在整个德国流传的时候，有人就封住那些愤怒者的嘴，并指出，沉默是爱国者的职责。根据纳粹概念，给国家造成不可弥补损失的不是拷问者和凶手；恰恰相反：谁对他们提出起诉，谁就被看作是叛徒并要受到惩罚。一九三八年，随着纳粹军事行动的开始，这个理论发挥了积极作用。谁现在谈论，也就是说，谁现在对虐待狂者和罪犯提出自己的看法，谁就是把反对德国的宣传资料提供给敌人。这种论调容易被那些“忠诚的国民”所接受。不过，这些国民只希望什么都不知道。正象吉斯维乌斯所写的那样，“数百万德国人甚至在同自己捉迷藏”。

这个政权的敌视者纷纷转入地下秘密活动。吉斯维乌斯说得很对，极权主义和反对党在相互排斥。此外，德国反

对党早在一九三四年就遭到全面镇压。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在纳粹夺权后不久被破坏殆尽。这些组织本来是可以作为后盾为抵抗运动或地下运动服务的。适宜于重建这些组织的领导人不是被关押，就是逃跑。少数几个新的组织只能发挥极为有限的政治作用，他们感到被人窥伺，甚至被他们中的一个人所出卖。反对党取得这样一个胜利使纳粹党人不能安睡。他们知道，平静和顺从只是表面现象，骨子里却孕育着深仇大恨。流亡者，首先是共产党人把记载历史事实的反纳粹传单和小册子偷偷地运到德国。盖世太保追捕散发这些文件的人。谁要是被发现这些东西，那他就不死在艾尔布莱希特亲王街的一间地牢里，也得进集中营。戈林确实对他手下的宠儿提出了这样的根据：“正象我所做过的那样，虽然我一下子拘捕了数千名共产党的干部，从而在最初时刻排除了直接的危险，但是危险本身还远远没有被消除。主要的是去发现和不断地监视秘密的联络和联络网等。对此，必须成立一支专业化的警察队伍。”^①

由于秘密警察逐步独揽大权，所以这个“专业化”进展顺利。盖世太保甚至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施韦德尔不久这么写道，“我们的政治警察”包罗万象，因为它是万能的；它坚定不移地用强制性措施进行打击，但同时要有利于民族和国家的发展。

纳粹法律学家休伯特教授指出，盖世太保“在公开行动中还未暴露身份就必须把那些倾向和意图消灭”。

^① 1946年3月13日，戈林在纽伦堡的证词。《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9卷，第291页。

机会即将来临，盖世太保要用惊人的方式来实践这门理论。

第五章

盖世太保反对罗姆

作为最高头目的党卫队首脑希姆莱和作为总局领导人的保安处首脑海德里希，完全把盖世太保掌握在党卫队手里。一九三四年春天，希姆莱巩固了他的权势，长期以来，由于他与罗姆不和，竞争日益尖锐。从理论上讲，希姆莱总还是罗姆的部下，因为“黑衫队”仅仅是冲锋队的一个特别分队。但是实际上罗姆根本支配不了党卫队。然而，希姆莱还是迫不及待地想完全摆脱他。看来盖世太保有可能使他达到这一点。当时盖世太保完全隶属于他，何况罗姆对它的领导根本连瞟上一眼的权利也没有。戈林再次等待时机，因为他想一劳永逸地把他的宿敌打倒在地。罗姆和冲锋队参谋部不断受到监视。希姆莱、海德里希和他们眼前的同谋者戈林取得一致意见，收集一份过硬的档案材料使他们能够向希特勒索取这个家伙的脑袋。罗姆虽然荒淫无耻，但毕竟是希特勒最老的朋友并且曾经给过他最有效的支持。

罗姆同戈林和希姆莱一样，也是巴伐利亚人，出身于市民阶层。当时他是一个血气方刚、身强力壮的人。他身躯笨重而结实。罗姆不象戈林那样肥胖，但是他在宴会上用食过多，虽勤于骑马，也不能抵消。他那胖而结实的身体支撑

着一个人们想象中的野人似的头颅。他那长着双下巴、猪面颊的几乎滚圆的紫铜色的脸上布满许多呈紫色的微细的静脉网。在宽阔的低低的前额下面，闪露出一对很活泼的、深凹的、在丰满面颊上几乎看不见的眼睛。一道很深的伤疤更加深了他那粗鲁的表情。这伤疤象一条很宽的沟从左面的颧骨处横跨过鼻子，几乎把鼻子分成两半。塌鼻梁，圆圆的红鼻尖孤零零地突出于脸部，脸上稍有点不安的神色，就会显得滑稽好笑。一撮修成三角形的乱蓬蓬的小胡子遮盖着那张阔嘴上的薄薄の上唇。他头发剪得很短，而且经常仔细地梳理。两只大耳朵，耳轮上部尖角似地突然向外弯，使他的脸看上去有点淫荡好色。

罗姆挑选了一批体形健美的青少年，同他们混在一起，颇有自娱炫耀之意。他小心谨慎地同他们进行同性反常行为。与他发生同性恋爱的还包括司机和传令兵。罗姆沉醉于军队里的这种放荡生活。一份民主报发表了罗姆给他的一个“朋友”——一个前军官——的私人信件。希特勒恼怒地要他作进一步解释。罗姆狞笑着回答说，他是“两性的”，最后，希特勒对此事不了了之，因为罗姆把他的冲锋队扩大成为一种愈来愈使人可怕的力量。他建立了三十四“地方冲锋队”和十个冲锋队分队。一九三一年年中，这些队发展到四十万人受他指挥。尽管他满脑子是纳粹思想，但还是深深地印着职业军官的烙印。有人想促使希特勒成为“凡尔赛条约的天然孩子”，这个定义用于罗姆更为恰当，因为在他的所有行动和计划的背后，军国主义的复仇思想仿佛象幽灵那样时常出现，而希特勒却受到反革命思想的支配，

受到反对“红色者”的思想支配，也就是说受到反对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的思想支配。

在此期间，罗姆把德国陆军中的老人马一脚踢开；他怀疑这些干部，认为他们是无能的，因为他们不能带来胜利。虽然他无意识地被某种传统主义所束缚，但他还是坚持这个思想：如果他扫除一切传统的东西，就能重建德意志军事大国。

戈林和希姆莱都监视着他。只要一夺取权力，冲锋队完成封锁大街的任务，他们两人就可以在元首身边施展阴谋诡计。当时已经搬入总理府的希特勒把他的主要注意力放在国际舆论上。一九三三年夏天，他真想到外面去向人们大声疾呼：德国要有纪律。许多愤怒而粗暴的冲锋队员变得令人讨厌。他们与党组织领导人施特拉塞完全一样认真地对待纳粹纲领中社会主义的一面，并且高谈什么国有化、土地改革以及诸如此类的事，忘记了格利戈尔·施特拉塞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而被迫辞职的，他们控告希特勒“出卖了革命”。对罗姆说来，夺权只是第一步。那时，冲锋队的口令浓缩成为一个警惕的号召：“决不解除武装！”冲锋队不是唯一想起纳粹党的社会主义原则的组织。一九三三年五月九日，上西里西亚的议长勃鲁克纳在比托姆激烈攻击大企业家，说他们的活动是“一种不断的挑衅”。他因而被撤去职务，开除党籍并于当年被逮捕。劳工阵线的克勒在柏林强调说：“资本主义没有理由要求以它自己规定的条件给予工作的专有权。这种统治地位……必须予以粉碎。”七月份普鲁士邦议会纳粹党团主席W·库

贝告诫容克地主：“纳粹政府必须迫使那些大地主把他们的土地划成小块，把其中最大的那部分交给农民使用。”

这些天真幼稚的人忘记了指示必须从上而来的元首原则。但是事实上，这些指示与那些振奋人心的演说可说是牛头不对马嘴。希特勒着手“按照新思想”改革德国工业时，任命古斯塔夫·克虏伯·冯·波伦-哈尔巴赫博士为工业巨头①。

所有这些空谈使希特勒深为不安。重新恢复制度那是容易的。但是罗姆叫他伤透脑筋。希特勒自信可以担任冲锋队的最高首脑。但它的最高长官罗姆已经把它变为自己的私人军队。冲锋队是强有力的，甚至比德国陆军还要强大。因此必须把注定吞噬希特勒和他的忠诚者的革命扼杀在萌芽之中。七月一日，希特勒在赖兴哈尔浴场召集冲锋队队长并且预告说，不会有第二次革命。七月六日，希特勒向各行政区长官说了同样的话。想把经济推向另一方向的这些行政区长官只不过是“阴险思想的带菌者”，因而在他们还未给国家和民族造成危险之前，必须使他们无能为力。同时要求这些长官注意，不要让党组织采取任何经济措施；经济一事完全由德国经济部负责。七月十一日那天，弗立克宣布，德国革命已经胜利结束，现在进入“发展阶段”。

罗姆受到了警告。工业界的一位人士施密特接替德国

① 7月15日，由十七名会员组成的全德经济委员会中德国最大的工业家是：克虏伯、西门子、包许、蒂森、伏格勒和大银行家施罗德、莱因哈特、芬克。国家“社会主义”以奇怪的方式得到了实现。纳粹纲领第十七条讲到，用没收不给赔偿的方法进行土改，但是自1928年以来几乎不再谈论这件事。

经济部长休根堡的职务。这一事实充分说明新指示的重要性。不属于党报的那些大型报纸象《十字报》和《德意志总汇报》详细地登载了好多篇元首的演说，并且对希特勒把那种“结局”放到德国革命之后的做法表示欢迎。当时只有这样，要么服从，要么与得到大企业组织支持的希特勒展开斗争。

然而，罗姆认为这些警告信号可以置之不理，他泰然自若地注视着同希特勒冲突的可能性。他想象得出这一冲突很可能成为党内的一场争夺战。在党内，希特勒还没有占优势。如果大批纳粹党人在同希特勒发生意见分歧时担任仲裁人，那么可以肯定，希特勒不会获胜。

但是罗姆似乎忽视了一种力量：希姆莱指挥的那支双重军队。党卫队那时建立了一个可怕的警卫团。它在数量上虽然大大落后于冲锋队，但在一九三四年初，它至少也有二十万人，而且由他们组成的八十五个团又是精锐兵团，在战斗力方面远远超过冲锋队。

此外，罗姆没有考虑到希姆莱的那支隐蔽的军队——盖世太保。他相信他的实力，因此掩饰不住自己的心情。他渴望在希特勒第一个内阁里得到国防部长的职务，这是事实。他竭力想得到这个职务，但是得心应手的唯一手段就是要建立一支他所梦寐以求的军队，一支传统的国民军，一支由具有政治素质的士兵组成的军队，它将统治这个国家。为了获得这个职务，他应元首的召见从波利维亚归来。他不甘心一个名叫瓦尔纳·勃洛姆堡的将军占去“他的”位置。他把冲锋队的大本营建立在慕尼黑。每当他来到柏林总是下榻在夏洛滕堡的“法扎嫩饭店”，在那里接待一些或多或

少公开批评希特勒政策的人的时候，他不采取任何谨慎的措施。他也邀请这些志同道合者到他经常去用餐的菜比锡大街上的肯平斯基饭店进餐。每个人可以在那儿畅所欲言。罗姆定出调子：

“阿道夫卑鄙下流。他出卖了我们大家。而且仍和反动派打交道，他的老同事坏透了。那时候他把这些东普鲁士的将军争取过来。现在，这些人成了他可信任的人。阿道夫在我这里学习过。他所知道的军事知识都是从我这儿学到的。尽管如此，他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一个‘艺术家’，一个胡思乱想者。他想让我安静些。如今他想最好呆在山上发号施令，而把我们这些人遗弃在一旁，不让发挥作用。”^①

罗姆很恼火，眼巴巴地看着别人夺走他的胜利果实。

希特勒本来想通过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一日有关党和国家一体化的法令任命罗姆为不管部部长，以此满足他对权力和荣誉的渴望。然而，就在同一天，罗姆发现有人把同样的嘉奖令授给了元首在党部的副代表鲁道夫·赫斯。

一九三四年初，罗姆采取了公开敌视的态度。盖世太保对他进行严密的监视，发现他同许多右翼政党的反对者保持接触。几乎每天有报告向希特勒指出，罗姆在批评他。这些报告使他产生不安的感觉。罗姆是希姆莱和戈林的头号敌人。他的言行受到严格的“审查”。甚至连冲锋队也受

^① 引自赫尔曼·劳希宁的著作。

到监视。冲锋队队员生性好酒，在街上高唱下流和粗鲁的歌曲，来粗暴地诋毁教会和霍亨佐伦王室。他们的这种行为使希特勒很担忧。因此，他很生气。他竭尽全力要使人相信，纳粹党人是尊重公共设施和宗教的。再说那位年迈的元帅显然要保持对霍亨佐伦王室的一切尊敬。

罗姆对这些责备置若罔闻，依然同社会上的小青年一起沉湎于花天酒地的生活。他那车轮战式的宣传经常出洋相，放肆行为全城闻名。他的“心腹”着手干一些臭名昭著的肮脏交易。例如从前当过面包师学徒的卡尔·恩斯特，从电梯驾驶员上升到服务员，最后为了报答他干出那种伤风败俗的事而被任命为柏林冲锋队队长。他曾经把公家募捐来的钱任意挥霍在大吃大喝上。有人小心谨慎地把这一切报告了希特勒。对此，戈林感到十分高兴；罗姆揶揄他骄矜作态，针对他以艺术保护人自诩，与他开了个毫不留情的玩笑。因此，戈林就在这上面大做文章进行报复。然而，这一切不足以促使希特勒作出抉择。希特勒对公开反对罗姆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他也许对罗姆还有点感激之情，因为罗姆为他做过事；希特勒有一种见不得人的自卑感和留在这个前上等兵记忆中的对罗姆上尉的敬意，所以，尽管有盖世太保的报告，但这一切还是阻碍着他把罗姆交付给他的敌人。

一九三四年初，一个威胁性的紧急信号使罗姆陷入危险境地。希特勒知道，军队是敌视新政权的。他曾经抚慰过工业家和容克地主，现在他想来抚慰陆军并且愿意把冲锋队的指挥权交给陆军。但是军人们认为，这是一件危险

的礼物。他们并不怀疑，罗姆的那些“街头顽童”^①将会打入到陆军的守旧分子中去。

希特勒凭经验得知，一个政体没有武装力量今后是不会太平的。在反对党中，除了一个机构以外他攻击了共和国的一切机构：他已经停止对军队的煽动。正象共和国同军队进行讨价还价那样，希特勒也想同他们进行较量。政体更替的唯一牺牲品是同施莱彻尔保持友好关系的陆军总司令冯·哈麦施坦因将军，他于一九三四年一月辞职。同年二月份，他的职务由一位观点接近兴登堡的传统主义的将军瓦尔纳·冯·弗立契男爵接替。这种良好意愿的表示在军官中赢得了信任，而国防部长勃洛姆堡偶尔也故作姿态，表示信任。

希特勒压制将军们使用新的国家原则。自发形成的第三帝国种族原则早在一九三三年四月七日就运用于国家官员中。犹太籍的国家公务人员或者他们中的“混血儿”无疑被开除公职。军队里情况同样如此。但是用于他们的有关法令还要推迟到一九三四年五月三十一日。可以预料到，这将牵涉到许多军官，因为不少德国贵族家庭都是靠犹太籍祖母光耀门楣的。所以军队在“清洗”时进行得极其冷淡。这次清洗的人数在陆军中有五名军官、两名候补军官、三十一名军士和士兵；在海军中有两名军官、四名候补军官、五名下级军官和水兵。

军队的清洗工作进展迅速。阻碍它完成任务的障碍是

^① 指罗姆手下的冲锋队员。——译者

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他叫罗姆。那时，此人深感不安。由于希特勒和军队相互接近，相互勾通，他不得不请求党内社会主义的派系给予帮助，同时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以示反驳。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八日，他在宣传部对外国报界的代表发表讲话，并且不厌其烦地作出保证：“我们所进行的革命不是民族革命，而是一场国家社会主义的革命。我们甚至着重强调最后一个字：‘社会主义’。”罗姆的第一个助手是他在西里西亚的副手埃德蒙·海因斯分队长，五月底此人在那里说道：“我们承担了革命者的义务。我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德国革命一天不完成，我们就一天不会安静下来。”

但是盖世太保保持着警惕，按时向元首汇报。严重的局势一触即发。四月初，春季演习前夕，希特勒在基尔登上装甲舰“德国”号的甲板与那里的勃洛姆堡会晤。勃洛姆堡乘此机会要求干掉罗姆，取缔冲锋队参谋部。为了一劳永逸地争取到这些将军，希特勒同意作出任何牺牲。这只是一种假设。无论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干掉罗姆的想法当时在希特勒的头脑里已经迅速增长。尽管希特勒受到将军们、戈林、赫斯和党组织以及希姆莱和他的盖世太保的压力，但在作出决策之前还是犹疑不决，经过长期的思想动摇之后突然作出了考虑不周的决定，希特勒把这项决定称为“直觉”而且带有他“天才”的痕迹。

第六章

盖世太保清除罗姆

一九三四年六月，在这一触即发的气氛中，希特勒于六月十四日应墨索里尼的邀请携带少数随从飞往威尼斯。他在那里受到外长康斯坦丁·冯·牛赖特男爵和德国驻罗马大使乌里希·冯·哈塞尔的欢迎。墨索里尼由他的外长和女婿齐亚诺伯爵以及国务秘书富尔维奥·苏维希和意大利驻柏林大使切鲁蒂陪同前往拜会希特勒。这是两个独裁者的第一次会晤。墨索里尼把这个人看作是他的学生，与他打交道时无拘无束。希特勒对他这次旅行所得的微不足道的结果感到失望。这样后果非同小可的事件眼看就要发生了。

六月十七日，前总理、现任副总理的弗朗兹·冯·巴本对马尔堡的大学生们发表讲话。大家本来希望听听无关紧要的演说，但是巴本却把一颗重磅炸弹实实在在地投进了讲堂。

尽管希特勒在讲话中向罗姆及其部下指出不会有第二次革命，尽管他向经济界的巨头们作过公开的安全保证，但是保守分子还是对走极端的纳粹分子和冲锋队向他们发出的威胁感到不安。当时巴本以这些保守分子的名义请求希特勒注意他在马尔堡的演说，这篇演说要求希特勒不要忘

记那些协议，它们曾经给他赢来德国国民的支持，并使他有可能会夺取政权。必须结束对正直的人的诽谤，因为他们始终是善良的公民和爱国者。必须结束对脑力工作的嘲弄和对宗教的嘲笑。最后他甚至对整个国家中的一个基础——一党制——提出疑问，并暗示，要重视自由选举，要重新建立某些政党。

希特勒明白这一警告。那时，资产阶级也跟在将军们的后面要拿罗姆的脑袋。巴本参加了帝国内阁；他的演说曾得到年迈的元帅总统、财政界和工业界的同意，而且元帅还拍了电报向他表示祝贺。这位副总理发出了最后通牒。希特勒完全考虑到它的份量，但是他不能容忍对他的政权进行如此激烈的攻击。他立即采取反措施，同时，“要求”德国报纸不要发表这篇演说；已经登载演说的报纸一律没收。戈林、戈培尔和赫斯在电台广播里用威吓的语言讥讽那些“可笑的小人”和“发育不健全的人”，这些人蛮横地阻止纳粹党人行使权力。在此期间，纳粹党的领导与罗姆之间的冲突变得冷酷无情。已开除出德国军官同盟的冲锋队参谋长被送去休假，说是为了让他治疗“关节炎”。

对马尔堡演说的反击不能恰如其份地用来反对副总理本人。于是盖世太保受委托拟定报复的目标。正因为他们巴本周围装置窃听器进行特务活动，所以很容易确证演说词的真正作者是一位年青作家。他是律师埃德加·荣格博士，是“保守革命”和自由知识分子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他曾经赢得一些追随者。六月二十一日，即演说后的第四天，埃德加·荣格在慕尼黑自己的住宅里独自呆了几个小时。当他

的妻子回家时，他已无影无踪。可是她发现在浴室墙上涂有“盖世太保”的字样。六月三十日，他的尸体在柏林与奥拉宁堡之间的公路的壕沟里找到了。过后不久有人证实，他被杀之前，曾在慕尼黑监狱的牢房里受过数小时的严刑拷问。

海德里希对盖世太保的这种表演感到很骄傲。事实上，盖世太保办事迅速、精确有效。但是这种艺术技巧的小型练习并不是什么新发明。现在只不过是用来攻击罗姆罢了。此刻，希特勒决心要除掉他！但是在选择方法上还是左思右想，摇摆不定。希姆莱和戈林亲自担负起收拾罗姆这一任务。戈林急躁得颤抖起来。他的杀人本性再次暴露无遗；他不会忘记罗姆给他带来的侮辱。

盖世太保迫不及待地整理几个月来汇编的有关罗姆及其私党的文件。连那些最细小的摘记都作了彻底的检查；罗姆曾经接待过的来访者，最平常的会见，最无关紧要的谈话：一切的一切都变成一种真正的圣经上的注释了。戈林“研究所”从电话交谈中所窃听到的片言只语帮了很大的忙。从所有这些证件中摘录一段、一句、一字或者几个名字，然后再把这些毫无内在联系的大大小的片断编造成完整的统一体，这也许会在希特勒的心目中唤起应予以考虑的那种残忍的决心。单发出阴谋的警告，要防止给他生命带来危险的、有直接威胁的国家政变就可以使他从犹疑不决的状态中惊醒过来。

档案材料已有眉目。篡改事实真相那是很容易的。罗姆想迫使希特勒建立革命的人民军队，甚至梦想以冲锋队参谋长的身份担任它的最高统帅。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准

备挑起一场冲突，从而把希特勒的新盟友置于劣势地位，迫使他回到他的老朋友、忠诚的老前辈、冲锋队的老战士身边。然而，罗姆放纵的语言、暴力行为、由他引起的桃色事件和轻率行为——所有这一切都被盖世太保的成千双耳目记录了下来。盖世太保从中找到了罗姆要发动阴谋的一些证据，这场阴谋的目的不只是迫使希特勒改变主意，而是要达到推翻他、必要时杀害他的目的。

罗姆变得猜疑起来，他预感到了危险。为了预防这种危险，他通过六月十九日的《人民观察家报》发出通告，准予冲锋队从七月一日起休假一个月，禁止他们在假期中穿制服。以此叫希特勒确信，关于政变的那些流传的谣言是没有根据的。为了强调这件事，罗姆前往维西浴场。

这种躲躲闪闪的举动把戈林和希姆莱的贪婪欲推向了高峰。他们不会轻易失掉自己的战利品。

大队长维克多·卢策曾经任前冲锋队参谋长弗朗兹·冯·普菲费尔上尉的副官，他不会忘记是罗姆夺走了他的职位。他认为，普菲费尔离职之后，这个职位理应属于他的。为此，他去探访所有将军中思想最接近纳粹主义的瓦尔特·莱希瑙将军，把罗姆要“迫使”希特勒采取果断措施的计划告诉给他。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希姆莱和戈林缠着希特勒说，政变已迫在眉睫。然而许多迹象证明，眼前并无政变的威胁。以柏林—勃兰登堡冲锋队头目、大队长卡尔·恩斯特为例，如果一旦发生暴动，他可能起决定性的重要作用，而现在他已经收拾好自己的箱子，以便得到罗姆同意后就去马德拉和卡纳利群岛度假。其他的冲锋队队长

利用从七月一日起的那个意外的休假期也已作好旅行准备。罗姆邀请他的冲锋队队长在维西浴场参加告别宴会，以示特别强调这次离别。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立即给希特勒打了几份报告，说什么罗姆将在慕尼黑举行宴会的那天发动政变，这次宴会只不过是用作召集冲锋队队长的借口。

盖世太保蠢蠢欲动。六月二十八日，警察接到了禁止外出令。同一天，希特勒驱车前往埃森参加行政区长官特波文的婚礼，这是异乎寻常的事。因为特波文不是什么重要得能中断总理事务的人物，尤其在看来受到如此威胁的时刻。但是更不寻常的是戈林陪同希特勒一起前往，以致使特波文感到受宠若惊。事实上，希特勒参加特波文婚礼的原因是要逃离柏林，避开不断施加在他身上的压力。他象平时那样在抉择面前退缩不前。但是戈林已经看到了危险性，他认为时刻紧随元首，那是正确的。狄尔斯为了支持戈林，也参加了这一行列。

六月二十九日，《人民观察家报》发表勃洛姆堡的一篇文章。这位国防部长在题为《第三帝国军队》的文章中借口说，国外报道一则关于军队支持密谋的消息，为此，他向希特勒作出武装部队忠于纳粹政体的保证。但是这篇文章也反对“雇佣兵”，其中包含着对冲锋队的威胁。

由于在大庭广众面前提到冲锋队这个组织的存在，因而也就敲响了他们的丧钟。

同一天，希姆莱开动所有机器对罗姆展开了攻势。希特勒在威斯特法伦参观一座劳动营，随后前往戈德斯贝格浴

场，在那里的德莱森饭店度过周末。他认识那家饭店的老板。上午，海因里希·希姆莱从降落在波恩机场的“柏林”飞机上下来。他随身带来了他的特务们的最新报告，根据这些完全捏造出来的报告说冲锋队要在第二天在慕尼黑和柏林两地开始行动，并占领所有政府大楼。其中有一项命令要谋杀希特勒。说什么冲锋队要全副武装走上街头。罗姆与他的一个老朋友——慕尼黑卫戍区司令、炮兵部队将军威廉·冯·李勃——之间已经一致同意把还隐藏在陆军旧兵库里的武器交给武装冲锋队。事实上，有关武器的协议早已达成。不过恰好是相反的协议，据说冲锋队为了延长假期把他们的武器交出来存放在地方警察局，使那些自由活动的冲锋队员不能随意采取任何“行动”。自从希姆莱到达后，戈德斯贝格浴场和盖世太保总部之间接触频繁。当天到达的一份报告说，慕尼黑党卫队保安处的特务们发觉武器已被装运到一辆卡车上——这就是直接受到政变威胁的一个证据！

该政权的参谋部寸步不离地在德莱森饭店里密谋策划。此时，希特勒被戈林、戈培尔、希姆莱、狄尔斯、卢策和其他级别较低的助手团团围住。一批党卫队哨兵守卫着饭店。

从饭店的餐厅可以远眺威斯特森林和莱茵河谷的景色，可希特勒这时候却象只笼子里的熊无力地在餐厅里徘徊。他对解开这个难题还有点害怕，他犹豫不决，要叫他象杀死叛徒那样去杀死这个人，不！不能杀死他最可靠的支柱和用“你”来称呼的唯一的同志。但是戈林、希姆莱、戈

培尔紧逼着他。在冲锋队赢得时间之前，必须首先采取行动，当机立断，坚决打击。

室外狂风怒吼，乌云密布。室内气候闷热，令人窒息。终于到了晚上，雷电交加，倾盆大雨带来了一丝凉意。晚饭以后，希特勒才突然作出他几个星期以来所回避的决定，他简单地下了命令。戈林和希姆莱接到命令后立即飞回柏林，领导镇压这次“政变”的工作，而希特勒同戈培尔一起将飞往慕尼黑。

夜晚，希特勒乘坐一架三引擎飞机，除了戈培尔陪同之外，还有他的四位心腹。六月三十日清晨四点钟，飞机在施莱斯海姆着陆。机场由党卫队封锁着。希特勒踏进巴伐利亚邦内政部，叫人把冲锋队大队长施奈德休勃及其副官带到他的面前。行政区长官提议把他们两人逮捕起来。元首冲向他们，一面责骂他们，一面撕下他们的肩章。接着把他们两人押往施塔德尔海姆监狱。

五点正，希特勒和他的随从在他的保镖和盖世太保官员的陪同下乘车前往维西浴场。一辆装甲车在前面开道掩护小分队——这是一种多余的安全预防措施，因为护送队在长达六十公里的线路内连最小的武装队伍也没有遇到过。上午七时许，当小分队到达维西浴场时，特格尔恩湖畔那个宁静的小地方还沉浸在睡梦中。

车队停在罗姆及其同伴所居住的汉斯尔鲍尔饭店门前。站在进口处的冲锋队门岗束手就擒。饭店里面静悄悄的。有人说，阴谋家们要在政变的早晨一下子占领公共建筑物，那岂不是成了咄咄怪事。餐厅准备用作告别宴会场

所。希特勒好象没有注意到这些无聊的事情。他抢在小分队队员前面第一个冲进饭店房间。他们遇到的第一个人是年轻的、以标致著称的施普雷蒂伯爵。他是罗姆的朋友兼副官。他被吵醒后从床上跳了起来，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希特勒冲到他身边，用一根旧的河马鞭子——这是希特勒早期的崇拜者送的礼物——朝他劈头盖脸抽去，顿时鲜血直流，然后把他交给党卫队手里，又继续冲到罗姆的房间。罗姆是在睡梦中被叫醒后逮捕的。他已动弹不得，站在那里挨希特勒的责骂。戈培尔参加了这次偷袭，但是却躲在后面。根据他的报告说，在隔壁房间里发现了同样处于睡梦中的大队长海因斯，但是他与他的司机同睡一床。这两个人立即被就地枪决。与此同时，到饭店来换岗的一支冲锋队队员毫无反抗地被解除武装。这次逮捕“谋叛”人员的行动只花了几分钟，进行得非常顺利。海因斯和他司机的死是毫无必要的，但是这两个死者倒使这个事件增加了戏剧性的情节。戈培尔后来向电台谈起过此事，而且有些人把它说成是“睡眠者的谋叛”。

上午八点左右，车队带着衣着简陋，戴着手拷的罗姆和他的部下前往慕尼黑。途中碰上了几辆坐着冲锋队队长的车子，他们是到维西去参加告别宴会的。他们的车子被勒令停了下来，里面的人束手就擒。上午，希特勒同那些“国家俘虏”到达慕尼黑。在清晨时刻，党卫队和盖世太保就开始逮捕，逮捕的人员名单是盖世太保几个星期前就拟定好的。

中午时分，希特勒把那些没有列入名单的党卫队和冲

锋队队长召集在“褐色之家”，公布解除罗姆的职务，任命卢策为冲锋队参谋长。

下午二点左右，配备重武器的党卫队奉命把两百多个俘虏带到“褐色之家”。这些党卫队员得到命令，俘虏只要少许有点叛乱行为就要遭到枪杀。他们乘上卡车被押往施塔德尔海姆监狱。在已抓到的和正要去抓的人当中不仅仅是冲锋队队长，完全相反，大多数是同罗姆和冲锋队毫无关系的政敌，盖世太保乘此机会也把他們一网打尽。

晚上，希特勒接到那份盖世太保拟定的名单，用红笔圈了一百十个名字，命令枪毙他们。巴伐利亚邦司法部部长汉斯·弗朗克对还未经过起诉就被处决的牺牲者的数目感到惊讶。他向希特勒提出异议想通过赫斯的调解，使希特勒把名单中的姓名减少到十九个。

罗姆也没有列入这份名单中。希特勒想下令枪杀他，免得他死得不光彩。然而，他还是把罗姆安置在他的施塔德尔海姆第四七四号牢房，并且建议他用枪自杀。罗姆以沉默作了回答。

晚上，命令下达得一清二楚，如果罗姆拒绝提供给他的这个机会，那就要枪毙。一个监狱看守走进他的牢房，一声不响地把一支手枪放在桌上后就走了。那个人通过窥孔在观察罗姆。他看着那支手枪，无人去碰它，看来要么他是把它忘掉了。十分钟过去了。看守又走进牢房，一声不响地拿了手枪就走。一会儿，两个彪形大汉握着手枪走进牢房。一个是党卫队大队长，达豪集中营长官西奥多·艾克。罗姆看到他们时站起身来。他的上身裸露着，流着汗水。

“这是什么意思？”他说道。

“我们没有时间胡扯，”艾克不让他说下去。

这时，他轻轻地举起手枪，好象在打靶场上那样作了瞄准，然后开了几枪。罗姆跌倒在地。艾克在他前面弯下身子，又给他补上了致命的一枪。至此，至高无上的冲锋队参谋长、阿道夫·希特勒最早的同谋者竟落得个如此下场。

晚上，几名盖世太保人员来到监狱，他们根据一份注有六个人姓名的名单要求监狱长科赫把这些犯人交出来。科赫胆怯地说，他认为，轻易用红笔划线作为处死令是“不完全符合规章”的。他们不予理睬，这六个人（其中有奥古斯特·施奈德休勃）被带到院子里，由塞普·狄特里希命令党卫队执行枪决，被处决的第一个人就是施奈德休勃。

戈林和希姆莱在柏林领导这次“行动”。希特勒由于自己不在场，所以把整个北德的执行权授予戈林，想不到他却肆无忌惮地使用这种全权。逮捕于十点半开始，可以证明，由于冲锋队的政变，盖世太保总部的人感到不安。尽管整个军事行动原来设想首先在慕尼黑奏效，因为据说政变将在那儿发生，但是戈林、盖世太保和党卫队却在柏林、西里西亚和美因河北部大打出手。盖世太保到处进行大逮捕。戈林盼望已久的这一天来到了，一举消灭冲锋队的领导，清算他个人的宿敌。希姆莱提出了他自己的名单，海德里希又附加了他的名单。

柏林一勃兰登堡地区的冲锋队大队长卡尔·恩斯特已经动身前往马德拉作一次休假旅行。这次旅行本来可以救了他的命。六月二十九日以来，他就在不来梅，但是不幸的

是，他的轮船要等到六月三十日晚上才起锚。当党卫队队员在他的饭店房间里（他们想到他会在那里的）宣布逮捕他时，他大吃一惊。他又是高傲，又是愤慨地提出抗议，有人竟敢动手抓他，抓一个大队长、国会议员和国务顾问！这似乎是不可理解的。

他忘记，他已经成为罪犯，忘记在私下谈话中对希姆莱发表不赞同的意见，说他是“黑色耶稣会会员”，这个绰号是奥托·施特拉塞赐给希姆莱的。这一罪行早已被登记在盖世太保的卡片索引上。现在受罚的时刻来到了。

恩斯特之死恐怕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曾经指导和领导过冲锋队执行火烧国会大厦的任务。看来他并没有始终保守秘密，而是受人诱劝轻易地把应该“守口如瓶”的事情讲了出来，结果终究逃脱不掉盖世太保众目睽睽的监视。值得注意的是，属于纵火小组的十个冲锋队队员中有九个人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已被杀害。还活着的第十一个是拉尔，他也早已被干掉。

就热心的司法部职员赖内金来说，他立即以他的记录材料揭露了拉尔，这样他虽免于遭殃，但最后还是被捕，被押往达豪。一九三五年初，他死在那里。

所有在一九三三年二月里证明自己是有用的人，到了一九三四年就变得令人讨厌了。他们不得不销声匿迹，尤其是他们的头子卡尔·恩斯特。

恩斯特乘坐飞机被送往柏林，关在利希特费尔德的党卫队的兵营里（这里原是一所军官学校），二小时以后，他被枪杀在兵营的院子里。其他人被送到那里后没有立即处决，

但也不能化险为夷。对有些人的审讯马马虎虎，大多数人遭到辱骂、挨打。几乎没有一个人幸免于枪杀的。星期六全天和星期日上午，住宅区的周围响彻着处决令的枪声。他们发出的射击令是：“元首命令！瞄准！开枪！”

盖世太保的所在地一切准备就绪。他们从完全被他们控制的办公室里发布枪杀令。有关处决、逮捕逃跑者、杀害企图反抗、逃跑或一看到就该枪毙的一些人的报告源源不断地送到那里。为了保密起见，在被放逐者的名单上，其人名用号码代替，譬如通过电话、电报或无线电送来的报告十分简单：“八号到达，十七、三十五、三十七、六十八、八十四被捕，五号尚未抓到。”当那些隐藏在号码后面的姓名在往后的日子里逐渐为人所知时，整个德国都感到惊讶和恐惧。

盖世太保的凶手和杀人犯对清除冲锋队头子这一点还是不满意。绝大多数牺牲者都是与罗姆和冲锋队毫无关系的男子汉。用弗立克在国际军事法庭上的话来说：“许多人被杀，我不知道杀了多少，这些人与政变绝对无关，他们只不过是‘不讨人喜欢’罢了，例如前总理施莱彻尔。”^①

以巴本的同事、“贵族俱乐部”男爵们的发言人、新闻记者瓦尔特·朔特为例，他就是“不讨人喜欢”。一九三二年，他制定了一项政治策略，它几乎毁灭了纳粹党人的选举希望。在他所著的《巴本政府—施莱彻尔—盖尔》这本书里，对纳粹党的手法作了淋漓尽致的描绘，他的揭露使希特勒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六日的选举中失去了二百万张选票。

^① 《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31卷，第384页，脚注2950。

这一点并没有宽恕他：六月三十日的早晨，他被盖世太保杀害。

格利戈尔·施特拉塞也不讨人喜欢。希特勒没有忘记这个人，他为党的政治组织做了大量工作，感到自己是戈林和戈培尔阴谋的牺牲品，因而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八日慷慨地、一声不吭地引退；从此以后，希特勒对他也怀着默默无言的尊敬，并且把他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但是大权在握的戈林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格利戈尔的弟弟奥托·施特拉塞已经逃往奥地利，在那里建立了反希特勒的“黑色阵线”。格利戈尔不再从事政治活动；他管理舍林-卡尔鲍姆制药厂。这并不能够消除他的敌人戈林和希姆莱的心头之恨。希姆莱曾经委托海德里希去关心“清除”旧账。六月三十日中午，格利戈尔·施特拉塞被人带到哥伦比亚大厦盖世太保监狱的收容所里。下午，一个党卫队员把他叫了出来，然后对被捕者说，他应该关入单人牢房。不到一分钟，收容所里的被捕者就听到附近一声枪响。这个党卫队员从后面对准毫无准备走进牢房的施特拉塞的脖子开了一枪。但是他并没有立即死去，那颗子弹打断了他的主动脉。被害者伸直四肢躺在铺板上，从动脉中流出来的大量鲜血喷溅在墙上，他感到自己的生命已奄奄一息。隔壁牢房的一个被捕者听到他在临终时发出的哮喘声有一小时之久。开枪后不久，海德里希为了对授予他的指示表示忠诚就亲临现场，以便了解一下，党卫队首脑的命令是否已经执行完毕。旁边的囚犯悟出了他的言外之意：“他还没有死？让这头猪去流血吧。”在高度重视“荣誉”的党卫队里，辱骂那些被害者

是司空见惯的。

盖世太保刽子手在城里也是分小组采取行动的。六月三十日早晨，巴本总理府大厅的接待室里来了两个神气活现的党卫队员，他们问道，是否可以同巴本的内阁首脑、政府高级顾问包斯谈话？包斯家里恰好有一位客人，但是这两个队员说，他们有一项紧急消息一定要告诉他，并且非常有礼貌地请他出来一会儿。接着包斯到了接待室。两位“先生”一声不吭地立即拔出手枪对着包斯砰砰两枪，让他躺在地毯上垂死挣扎，然后扬长而去。

在柏林郊外的新巴贝尔斯贝格同样有两位先生（也许就是这两个人）在撒施莱彻尔将军别墅的门铃。他们一声不吭地把前来开门的女佣人推向一旁，冲进接待室，将已经来到接待室门口的施莱彻尔击毙在地，接着又开枪打死他的奔跑过来的妻子和亨尼希斯骑兵将军的女儿。女佣人惊慌地逃跑了。当将军前妻所生的十六岁的女儿放学回家吃午饭时才发现这些尸体。

这两位先生走进交通部，立即来到秘书长克劳斯纳博士的办公室，在他还来不及从自己沙发椅上站起身，他们就把他打死在写字台上。急忙赶来的部长冯·艾尔茨-鲁本那赫男爵被迫退了出去。克劳斯纳是天主教行动的领导人。他的被害引起了强烈的震动。盖世太保声称，他是在别人请求他交出情报的一刹那间自杀的。

再没有什么事情比连续杀人更令人可怕的了。在那个阴郁的星期六，到处可以见到死于枪弹、警棍或者被杀人犯卡住咽喉死去的尸体：与施莱彻尔关系密切的陆军将军库

特·冯·勃莱多夫；年迈的前巴伐利亚邦首席部长古斯塔夫·里特·冯·卡尔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政变时表现出了勇敢的行为，但是希特勒并没有原谅他；格尔特、一位有名的战斗飞行员，曾在前线荣获功勋奖章；格莱维茨的警察局长拉姆斯霍恩和马格德堡的警察局长施拉格米勒；在卡尔·恩斯特周围的还有：伏斯、赞德尔、博伊尔维茨，不要忘记还有海因斯的副官和情人“施密特小姐”。

有一回，一位名叫格拉泽尔的律师在一次诉讼案中轻率地为纳粹党的报纸进行辩护，而且还同希特勒的“帝国法律维护人”汉斯·弗朗克发生争吵，想不到竟被人打死在家门前。早期支持过希特勒，之后又惊恐地躲开他的施丹佛尔神父教授突然遭到枪杀。人们发现信奉天主教的大学生的领袖贝克被谋杀在森林里。杜塞多尔夫的希特勒青年团领导人普罗布斯特同样信奉天主教，他在“逃跑时被击毙”。

其他一些被错杀的人有：慕尼黑的音乐评论家施密特和萨克森的希特勒青年团领导人。

戈林“用铁拳清洗柏林”，然而在做这笔职业性的杀人生意中，他竭力唤起一种合法性的幻想。因此在利希特菲尔德兵营里成立了军事法庭。判处犯人只花几分钟时间，而且在枪杀他们之前才宣读判决书。

六月三十日晚上，希特勒又回到柏林。到坦贝尔霍夫机场上迎候他的有戈林、希姆莱、弗立克、治安警察头子达吕格和警官。希姆莱象戈林一样趾高气扬，在机场上就迫不及待地吧死者名单送给希特勒看。希特勒审阅了一下。

吉斯维乌斯当时也在场，据他说，希特勒读到施特拉塞的名字时突然把头一仰。希姆莱解释说，施特拉塞是自杀的。几天以后，希特勒发出指示，要照顾施特拉塞寡妇的生活。

星期日经过整个上午接连枪杀之后，下午二点钟，戈林在希特勒那儿进行了“斡旋”，请求他停止处决，血已经流够了。但是在他的名单上，只有两个人幸存下来。他隐瞒了这件事。

然而在六月三十日被捕的人当中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在枪决令下达之前就结束生命的。其中有几百个人在监狱里达数月之久，其他人象前“钢盔队”队长杜施特堡中校在一个集中营里消失了，许多人死在那里或者被拘禁多年。埃哈德·米尔契元帅在纽伦堡作证说，一九三五年，在达豪集中营里可能有七百到八百个是六月三十日被捕的牺牲者。

根据纳粹方面的声明：只处决了七十一个被捕者——这个数字实在是太低了，因为据党内其他人的说法，被处决的人达到二百五十到三百。估计死者为一千五百个可能是夸张了一点。不管怎么说，整个德国大概被杀的有成百个（因为盖世太保的密探和刽子手不仅仅在慕尼黑和柏林两地大发雷霆）。通过仔细的计算，确切数为一千零七十六个，但是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不愿把详细的数字记录下来。

七月二日，星期一清晨，盖世太保、党卫队和保安警察收到了由吉斯维乌斯记下来的电报：“普鲁士邦总理和秘密警察首脑发给下属各警务所的通知。根据上级命令，所有与近两天行动有关的文件应予烧毁。此令应立即遵照执行。”

二十四小时内死掉一千人！纳粹政权如此地把人命当作儿戏，这样做有点太过份了。星期六晚上，德国通讯社发表了一条狼狈不堪的消息。同天晚上，戈林在宣传部向报界发表一项声明。这恰好是官方说明的时候，因为有些地方报纸已经出版特刊，国外报纸开始提出棘手的问题。

戈林身穿制服，讲话语调低沉，但很少令人信服。他谈到罗姆准备政变；谈到他周围的人在性欲上的道德败坏；谈到某些顽固分子妄想发动第二次革命以及反革命背叛的阴谋活动。他宣布说，与外国密谋的施莱彻尔在拒捕时中弹身亡。至于罗姆，他“也不再留在生者行列之中”。但是对于施特拉塞被谋害一事却闭口不谈，对于包斯在副总理接待室里和克劳斯纳在他交通部办公室里被枪杀一事同样保持缄默。对每一个想要听讲的人来说，戈林的话句句都是空洞乏味。他只说是奉元首的命令，并且若无其事地说：“我只不过是扩大了我的任务。”

六月三十日，希特勒在飞回柏林之前任命维克多·卢策为冲锋队的参谋长，但是经过事先考虑，不宜授予他部长级别。他在给冲锋队下达每日指令的同时公布对卢策的任命。这篇声明的某些章节是针对褐衫队以外的所有参与该政权的反对派的，所以它起着嘲笑自己的作用。元首谴责“这帮破坏分子”，谴责那些革命者，他们在一九一八年感到自己与国家的关系疏远了，因而失去了与一个合理的人类社会制度保持的各种内在联系，所以内心很悲痛。他们是一些热中于革命的革命家，在革命中看到了一种稳定状态……。同他们进行任何的真诚的合作是不可能的，他们

决心反对现存的一切制度，并且对任何一个权威充满仇恨。他们密谋策划，破坏现有制度，在动荡不定中寻找满足。这批病态的国家敌人之所以危险，是因为他们愿意为任何一次叛乱的尝试提供共谋犯的后备力量，而且要乘一种新制度还未在混乱的冲突状态中形成时开始。

国家元首赶走了昨天把他推到如今领导岗位上的那些人，当时他们拒绝同共和国进行“任何真诚的合作”，而且在暗地里“破坏现有制度”，伺机“发动政变”。希特勒同自己的政治血统一刀两断，他否认这种血统，并指责那些人，他们不适当地使他回忆夺权时所采用的手段。

七月三日，部长们召开内阁会议，认为谋杀是合法的。没有一个人鼓起勇气提出抗议，甚至连司法部长古特纳也没有提出抗议，尽管他同大多数右派人士有着亲密的私人友谊，但这些人还是被凶恶的屠夫杀害了。那些保守主义者同样是无动于衷。

巴本没有参加部长会议，他在同一天辞去了副总理的职务。这是希特勒对他开恩的唯一反应。由于革命者遭到清洗，所以他在马尔堡发表演说时的那个建议被采纳了，但是有人曾向他清楚地指出，容忍轻微的批评都是危险的。盖世太保杀害了自己那些亲近的同事，甚至杀害了一个在总理府工作的人。而他却满足于这种柏拉图式的抗议。

此外，他辞去公职并不是最后的完蛋。巴本在纳粹党人那里接受了新的官职，特别是作为维也纳和安卡拉的大使，为他们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作出反应的保守党人同样是寥寥无几。部长们感谢希

特勒把德国从革命的纷乱中拯救了出来，一致同意古特纳提出的法律草案，其中有一条文这么说：“国家采取的旨在镇压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七月一日和二日的叛逆和叛国活动的防卫措施是有法律根据的。”^①

当年迈的元帅兴登堡得知德国陆军的两位将军被任意杀害的时候，他从昏迷状态中惊醒过来。可是当陆军没有作出反应，他的顾问向他保证一切安然无恙的时候，他被人说服去签发一份给希特勒的感谢电（此电可能由他本人起草）：“我从呈送来的报告中获悉，你坚决地进行了干预和勇敢地动用了你的人员，从而把所有叛逆活动扼杀在萌芽状态中。你把德国人民从一场大难中拯救了出来。为此，我向你表示深切的谢意和真诚的钦佩。”^② 总统府办公室主任、国务秘书奥托·梅斯纳设法使兴登堡签发了这份电报，因而在这些新主人那里得到了好处。

纽台克的这位白发老人由于年老体衰而减轻罪责。勃洛姆堡既不老也无病。他在七月一日的每日指令中解除了紧急状态，他向希特勒作出保证：

“元首以军人的果断和无畏的勇气亲自打击和击退了那些叛徒和暴乱分子。作为全体人民的武装者，不加入内部政治斗争的武装部队将以献身和忠诚作出报答！鉴于共同的理想，武装部队将愉快地同新的冲锋队保持元首所要求的良好关系。”^③

① 《国家公报》第1部分，第529页，1934年。

② 《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20卷，第319页。

③ 《人民观察家报》1934年7月2日。

七月十三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讲话。谁想从他的演说中详细知道有关罗姆及其同犯发动叛乱和政变的准备工作、施特拉塞与施莱彻尔之间的暗中勾结以及施莱彻尔与勃莱多夫“同一个外国政府”（在背后议论法国和弗朗索亚-庞赛大使的名字）的秘密联系，那他会感到完全失望。希特勒的演说只不过是一篇冗长的总结发言。恰好要向人民和世界阐明事件的唯一经过时，他在事实面前摔了一跤。他在谈到卡尔·恩斯特时解释说，恩斯特“留在柏林，以便亲自领导革命行动”。但是人人都知道，恩斯特是在不来梅准备上船去休假旅行前不久被捕的。希特勒想通过快速行动来防止一场“民族的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的论调很少有人相信。试问，象包斯和克劳斯纳那样的保守派在这样的冒险中究竟要寻找什么呢。他最后说道：“此时此刻，我是最高法官，要为民族和德国人民的命运负责。”^① 信口开河要比详细解释容易得多。

一九三四年七月，政治局势非常离奇古怪。六月三十日曾经是“被骗者的一个新日子”，而这次被骗者却是那些将军们。

他们对希特勒的决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并相信，希特勒现在是他们的俘虏，他们可以并吞这个新政权。他们不仅从道德上掩盖了这次军事行动，而且是那些知道准备行动的人。六月二十五日那天，全军奉命处于紧急状态，取消一切休假。部队留营待命，不得离营外出。

^① 《人民观察家报》，1934年7月15日。

勃洛姆堡和将军们相信，冲锋队是为他们而牺牲的。两星期之后，他们找机会向元首表达他们的谢意。

七月底，兴登堡感到他的死亡已为期不远。长期来他身患重病，住在纽台克他的庄园里过着引退的生活。那时起，大家对那里的动向非常关注。只有旧贵族的成员才可做他的继承人。这与兴登堡君主政体的观点是一致的。有人提到普鲁士的奥古斯特·威廉亲王，普鲁士的奥斯卡亲王和不伦瑞克-吕内堡的恩斯特·奥古斯特公爵可以作为候选人。如果白发苍苍的元帅在他的遗嘱中赞成恢复君主制，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从理论上讲，仍然生效的魏玛宪法规定，一旦总统病逝，最高法院院长将行使最高职务，直至选出继任者为止。然而，希特勒借助一九三四年一月三十日公布的命令获得了从不同角度解释宪法的可能性。

当年迈的元帅在作垂死挣扎时，党卫队封锁了纽台克王宫，防止它与外界接触，同时防止“反动派”在最后时刻耍花招。中队长赫尔曼·贝伦斯被安置在这个特别队的领导岗位上。六月三十日，他领导了西里西亚的大屠杀。悲伤的卫士坚守岗位，直至八月一日兴登堡永远闭上眼睛。陆军军官直到八月二日才可以进入纽台克王宫，他们守护在元帅的灵床旁边肃穆致哀。

八月一日晚上，希特勒通过法律宣告总统职务和总理职务合二为一，由他担任新的双重职务“元首兼总理”^①。兴

^① 《国家公报》第1部分，第477页，1934年。

登堡的继任问题业已解决。勃洛姆堡同意副署这道法令，而希特勒则保证支持军队并且叫他相信，反对派将不会在这次政变之前来干扰他。第二天，八月二日，希特勒在公布兴登堡逝世以后，立即监视国防部长和陆海军总司令的效忠宣誓，同时士兵在全国各地的兵营院子里面对着他们军官向他宣誓。誓词把他们和所有部下与元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我向上帝作神圣的宣誓：我将无条件服从德意志国家和人民的元首、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阿道夫·希特勒；我作为一个勇敢的军人，愿意在任何时候为履行此誓言不惜牺牲我的生命。”

当天晚上，勃洛姆堡在给国防军的一项命令中起誓说，兴登堡已经给国防军打开了通向新德国的大门，因此，他的遗嘱将鼓舞它满怀对德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信任迈步走向未来。^①

兴登堡的遗嘱在八月十二日才公布。没有人怀疑它是伪造的。其中有些词句可能是在希特勒口述时记下来的。所以这些话，尤其是涉及到国防军的事与希特勒最近的观点非常一致。文件说：

“为了把不同社会地位和不同阶级的德国人民引向内部团结这一伟大目标，我的总理阿道夫·希特勒的活动已经迈出了具有历史影响的决定性的一步……我即将离开我的德国人民，但是我永远希望，我在一九一九年所渴望的和

^① 《人民观察家报》1934年8月3日。

到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为止的缓慢的发展中所做的这一切是全面实现和完成我国人民的历史使命。当我对祖国的未来抱有坚定信仰的时候，我可以安心地合上眼睛。”^①

一星期以后的八月十九日，希特勒通过全民表决机器迫使人们同意他担任新的双重职务。国防军的支持、“老先生”遗嘱中的祝福、各反对派的完蛋以及把少数幸存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嘴堵塞起来的那种恐怖，所有这一切保证了他的胜利，尤其是因为盖世太保和党卫队保安处秘密控制选票，这就加强了恐怖主义的压力并有可能揭露最后的对手。因此，成果是辉煌的：三千八百三十六万二千七百二十张赞成票，四百二十九万四千六百五十四张反对票，八十七万二千二百九十六张无效票。

多亏将军们的帮忙和盖世太保的不断进行活动，希特勒成了德国的绝对主人，这样在纳粹主义的道路上，在走向战争和灾难的道路上可以畅通无阻。

^① 《人民观察家报》1934年8月16日。

第七章

警察队伍重整旗鼓

将军们本来也许可以推翻该政权，但在这个时刻他们却巩固了它。希特勒为了把军人变成纳粹统治的辩护士，宁可牺牲他的最早的追随者。

从原则上讲，德国的将军们并不害怕战争。他们害怕的倒是一支装备差、战斗力弱的军队卷入到一场武装冲突中去。直到一九三四年初，元首宣布了扩军备战的初步措施才使他们放下心来。他们懂得，希特勒——正象他们自己一样——想搞一次出色的军事报复，想统治欧洲。他们之所以选上了这个军事手艺人，是因为他们——用曼施坦因的话来说——把“战争的荣誉看作是伟大的事业”。他们向希特勒保证给予支持。但前提是，他要重新给予他们原来的级别。他们认为，在清除罗姆以后，党和军队将成为“第三帝国的两根支柱”，双方的胜败是息息相关的。千真万确的是，军队要感谢纳粹党使他们获得新生，而党的威望一部分要感谢军队在战争最初几年中所取得的成就。但是，如果将军们认为，把政治控制权掌握在手，就可以束缚希特勒，并且控制党，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们曾经认为盖世太保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看不清希姆莱、海德里希和他们目前的

盟友戈林的潜在影响，低估了这些沉默寡言的干部，以为这些警察部门是为他们这些将军工作的。然而，六月三十日清洗的，真正的胜利者是希姆莱和海德里希，而政权的第二支柱并不是军队，而是盖世太保。

勃洛姆堡在六月三十日以前就秘密协定所制定的条件是众所周知的。最重要的条件是：希特勒保证让将军们掌握军队的实际指挥权，答应迅速有效地扩充军备并且保证，只有军队负有保卫国家的任务，是国家唯一的武装力量。剥夺冲锋队的权力，把他们逐步改造成一种简单的军事辅助组织，看来这些条件已经得到满足。

在夺权以后冲锋队的实力无限扩大，一九三四年达到四百万人员，而这时起却在迅速下降，人数大约为一百五十万。

根据魏玛宪法规定，希特勒在法律上有权代替总统对军队行使最高指挥权。但是他应放弃实际上的指挥权，同意下达给军队的法令不仅要由总统，即“元首”签字，而且还要由军政部长，现在称之为“国防部长”签字后才能生效。这个规定是《人民观察家报》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五日公布的。在这个前提条件下，勃洛姆堡副署了八月一日的法令，从而使希特勒成为总统和元首。

希特勒在军队效忠宣誓以后给勃洛姆堡写去一封感谢信。信中写道，他将永远把保卫军队的不可侵犯性看作他最高的职责，并且遵循兴登堡的遗嘱坚定不移地使军队成为国家唯一的武装支柱。

六月三十日，希特勒在给卢策的一项每日指令中说：

“我要求所有冲锋队队长用他们自己的忠诚来回答和支持我的忠诚……我特别要求每一位冲锋队队长在对待帝国军队的态度上应该是无条件的坦率、忠心耿耿和诚实可靠。”^①

将军们只感到，在以后的几个月里，许多演说、文章、声明和每日指令着重提出了这些保证，因而错误地认为，他们的地位已经巩固，以致对那些秘密的措施没有引起注意。当 they 从政治控制和自主的梦幻中觉醒过来时，那些秘密措施的准备工作的准备工作已获得了时间。

盖世太保并不限于为六月三十日进行大屠杀时从技术上作细节工作和提出牺牲者的名单，它和党卫队已开始在办公室和住宅里进行屠杀和处决。正象戈林在纽伦堡所作的供词那样，它是受上级的委托。“这不过是反对国家敌人的一次行动。”

在整个德国，六月三十日多少可以说是高压手段的最后实证、是革命时代的最后痕迹。最后，讨厌的人似乎在大庭广众被残暴地杀害了。今后，盖世太保将采用较为文雅的、表决的方法去消灭他们。大屠杀扩大了他们恐怖的名声。希姆莱在给党卫队的一次讲话中说，人人感到害怕，但是人人也知道，盖世太保和党卫队只不过是执行一项应该执行的命令。

不仅在柏林，而且在巴伐利亚以外的整个德国处决令几乎均由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签署。在清洗行动的前一个星期，希姆莱把职位较高的党卫队队长兼警察局长弗雷德里

^① 加莱拉：《我们时代的历史》第8卷，第328页，莱比锡，1935年。

希·卡尔·冯·埃贝施泰因男爵和德累斯顿中部地区的前党卫队长官召到柏林，并要他们的人员保持战斗状态。六月三十日，盖世太保的一个特务得到命令前往德累斯顿，逮捕了二十八个人，枪毙了其中的八个。海德里希签署的命令书上说得很简单：“根据元首和总理的命令……凡是犯了叛逆罪的应予枪决。”这些违法令是由一个无权下达命令的当局拟定，由一个同样无权下达命令的干部签署，然后一字不漏地被遵照执行。这种权力学真值得钦佩啊！

“六·三〇”事件之后，海德里希获得了空前残暴的名声。甚至连最坚强的“老战士”都会在他非凡的果断面前发抖。内政部长弗立克——一个自信的纳粹分子——在一九三五年五月对吉斯维乌斯说道，他可能被迫把希姆莱接纳到他的部里来，但是他绝不让“杀人犯海德里希”进来。

一九三四年最后几个月和一九三五年初，神秘的凶手杀害了大约一百五十名党卫队队长。在每一具尸体上紧缚着一块硬纸片，上面有“R.R.”——“罗姆的复仇人”的字母。这一小组的秘密人员对他们的前任长官很可能都是忠诚的。看来盖世太保没有能够发现他们。

希姆莱有权要求得到他的报酬。七月二十日希特勒规定：“鉴于党卫队的丰功伟绩，特别是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的事件，因此我把这个队看作是在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内的一个独立自主的组织，而党卫队的首脑如同参谋长那样直接隶属于冲锋队的最高首脑。”^①

冲锋队的最高首脑由希特勒亲自担任。

^① 《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29卷，第28页。

通过这个规定，希姆莱与卢策平起平坐，而且党卫队成为独立于冲锋队的组织。从此以后，希姆莱只受希特勒一个人的制约。

这个规定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已经独立的希姆莱可以在党卫队内随心所欲；比如他可以建立和装备党卫队兵团。这样，在希特勒保证军队为国家唯一的武装支柱时，军队的这种责任感已经受到了损害。迄今为止，党卫队拥有的唯一的武装兵团是警卫团，它肩负阿道夫·希特勒元首的贴身保卫任务。六月三十日以后，“党卫队预备队”建立起来并有显著的发展，他们很快成为希特勒的一支私人军队，残暴地控制集中营达十一年之久的骷髅队也是如此。

希姆莱以盖世太保主人自居，他利用它的独立性把党卫队队员偷偷地送进政府各个部门。许许多多的头衔堆积在一个人身上。这种做法最后使德国城市的警察局的工作逐渐转到城市里的党卫队队长手里。警察局长不能根据自己的决定向警察发布任何命令，他们是希姆莱的个人代表，只能传达他的命令，关心命令的执行情况。

将军们对意想不到的这种发展感到不安。军队和党卫队之间产生摩擦。希特勒为了抚慰军人便站在他们一边，但是向他们泄露隐藏在他的友好保证后面的真情实意，那还为时太早。

军人们相信他的保证。他们在一九三四年六月和七月的行动是他们可以用来侵扰共和国的这种伎俩的翻版。为了掌握指挥权，他们坚信自己的原则。看来没有任何理由去怀疑他们这一次的政治策略会获得同样成果。

现在，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在谎言和欺骗中为了争个高低正在磨刀霍霍。一九三四年下半年，最深刻的转变首先是海德里希的保安处。保安处开始时是党卫队的对内情报处，在六月九日通过法令之后成为党的唯一的情报处；由于这次好运气，它才能在六月三十日的清洗行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它不是国家机构。从理论上讲，它的权力只限于党组织内部。但是这个组织为数众多，能善于同极大部分的居民打交道，所以保安处的活动范围那时已经明显扩大。

海德里希在保安处大约拥有三千名特务。他们同党一样有正式的办公室。特别在小城市里，他们的活动用不着长期隐蔽。但是深受其苦的是他们的侦察部门。这一切和六月三十日以来积聚在人们心里的对希姆莱、海德里希的仇恨，特别是“罗姆的复仇人”所进行的谋杀说明，必须建立一个“相应的”秘密情报网。这就是海德里希为什么要强调招募“志愿人员”的原因。

正象所有情报机构那样，保安处一开始就雇用了人们称之为端庄的“志愿人员”的告密者，这种名称一部分是正确的，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除了附加费或者偶然的奖金之外不拿分文工资，他们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信念去献身于这种刺激性的活动，或者因为这样做会引起他们本人的兴趣。夺权以前，保安处不超过三十至五十个人，几乎没有有什么志愿的帮手。

从一九三四年六月起，保安处特务的人数有了显著增加，志愿者的人数日益增多，最后大约增加到三万人。这些

伪装的特务是由社会各阶层人员组成的。绝大多数的大学教授受到监视：从学生中招募来的志愿特务在听课时作笔记，这些笔记使保安处对一些大学教师的政治观点可以作出判断。接近战争末期，为这些报道网工作的妇女要超过男人。在此期间工作的那些志愿帮手获得了“信任者”的称号。

一九三四年七月初，保安处奉海德里希之命进行了一项特殊的文件整理工作。保安处想找到社会阶层的理论基础，在这个借口下采用科学和统计方法把各小组或者前马克思主义、犹太人、自由工会、自由共和政体、宗教和文化团体的成员登记下来。纳粹党人认为，这些组织里面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反对派。这种研究的目的是把还在迷恋旧观念的同志争取到纳粹主义这一边来。在研究社会学的外衣下，保安处建立了很重要的档案，以便监督那些可能的反对者，当政治上需要替罪羊的时候，随时就可把他们推入黑暗的深渊中去。

保安处从理论上垄断着政治情报，独自享用。另一方面他没有行政权力，这种权力唯独盖世太保才有；它只有逮捕、审讯和抄家的权力，对某人采取保护性拘留、送入集中营等权力。而盖世太保任何时候都不会放弃自己的侦察，利用保安处提供的特务达到这一点。

派遣间谍去国外、监督流亡者的政治活动、对别国进行侵略的准备和布置第五纵队的任务、用思想战术使知心朋友和特务在敌人那里站稳脚跟。所有这些任务均由保安处第二科，“保安处外事局”，又称“外事秘密局”负责。该科雇

用近四百名固定的特务。他们在国外是作为领取工资的特务，大多数是以志愿帮手被招募来的。他们往往对自己所要扮演的角色茫然无知。

从技术上看，保安处的这个重要组织不是海德里希的功劳。原先计划保安处行政组织的是中队长梅尔霍恩博士，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以后，他因采取严厉的反犹太措施而在波兰崭露头角。还有分队长瓦尔纳·贝斯特博士，他在柏林盖世太保那里担任过高级参事，后来又在被占领的丹麦担任帝国委员。贝斯特曾经当过法官，一九三三年参加政府。他出身资产阶级，因受过司法教育，身价高人一等，所以海德里希经常利用他去完成不光彩的任务，特别是派他去安慰那些反对盖世太保的方法的重要官员。贝斯特是纳粹党官方法律学家之一，后来发表过一本《德国警察》的著作，这是一部关于警察组织和任务的工作用书。萨克森出生的梅尔霍恩过去是律师，他具有非凡的组织才能。他同贝斯特一样主要也是在技术上负责管理一些部门及其材料、保安处的一般预算以及负责资金分配等工作。他们两人制定“荣誉特务”的制度，这就是说，他们是特别“上等的”志愿帮手，是从有职业和有经验的人员中挑选出来的。多亏他们把具有一定价值的情报按时送到保安处总部，才使总部详细了解一般观点方面的最新情况。他们凭借物质装备把保安处办成德国最现代化、设备齐全的情报处。梅尔霍恩把卡片索引制度搞得完美无缺。从政治和刑事观点看来，那些最重要人士的卡片按照次序被编入一只圆平的大卡片盒，盒内装着五十万张卡片。这部可怕的机器只有一个人管理。由

一架电动机带动的卧式大齿轮围绕它的轴承转动，只要简单地按一下电钮，它就会把你所要的那张卡片提供出来，自从那时以来，打孔的资料卡片系统已经获得了非凡的成功。象保安处那样的卡片索引的设备，估计在当时只此一家。

海德里希在其同事完成任务以后，为了把他们所造的这架仪器占为己有，一心想除掉他们，对于其他的急事置之不顾。他为了惩罚梅尔霍恩，把他放逐到远东的一个偏僻地方，借口说他犯了不忠之罪；贝斯特则被打发到内政部去处理保安警察的事务。

这时的海德里希致力于实现他在侦查领域里的个人想法。在他的“创作”里，最具有特征之一的是“沙龙小猫”。海德里希生活腐化，是那些臭名昭著的夜总会里的常客。他对地下妓院有某种偏爱，乐意在那里同他的新欢聊上半天，他发现，她们的嫖客显然是无所不谈，有时甚至直言不讳地谈及私人的事情。他们可能认为，一个姑娘只是心不在焉地在听讲，与其说是真的感兴趣，倒不如说是出于友好在一旁听讲，所以对她不会产生怀疑。海德里希打算充分利用他发现的男女幽会的这种特点。他请来一位掮客，租了一幢私房，把它布置成雅致的幽会调情楼。这幢楼的设备均由保安处和盖世太保的技术员精心设计：房间里装有暗藏的窃听器，酒吧间里讨人喜欢的壁龛也装着窃听器，地窖里安装了录音机。早期信奉纳粹主义的老刑事警察和卓越的刑事学家阿图尔·奈比回忆说，他曾经在警察风化科工作，受委托为这个名为“沙龙小猫”的研究所招兵买马。挑选来的人不仅要妩媚和美丽，而且要有才智、教养、外国语言知

识和对“祖国的爱”。施伦堡讲述了这件奇怪的事情。并强调，其中也有上层社会的女士，她们“出于爱国主义”而听人摆布。

不久，一批经过挑选的顾客，特别是一些外国的外交官经常出入“沙龙小猫”，这些外交官的朋友出于好意暗中把“好地址”塞给他们。保安处用这种方法获得了很宝贵的情报。无论如何，宁可采取审讯的方式，也不要海德里希部门所惯用的那些手法。海德里希一直在考虑如何使他的机构发挥积极作用，他对自己的这个创作尤为感到骄傲，要是他本人来视察“沙龙小猫”，事先就让人把窃听器关掉。

海德里希在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六年这段流血胜利的时间中官运亨通，这个时期主要是一个组织阶段。当时，海德里希为世界上从未有过的那部残暴的机器制造了部件和传动齿轮。他不仅设计了盖世太保这个机械装置，还选拔了一批能发号施令的人。

早在一九三四年，一个曾住在奥地利、前不久回到德国的二十七岁的年轻纳粹党人参加了保安处，被分配去管理卡片索引。他在这方面特别富有才能，是个不知疲倦的、有条不紊的工人，还是个天生的组织者。他事业上飞黄腾达，后来加入盖世太保，成为驰名于世界的一个部门的头头。他叫阿道夫·艾克曼。

同年，第二个值得注意的年轻人开始保安处的生涯。他才二十三岁，刚刚参加党卫队，在波恩学过法律，酷爱历史，尤其喜爱文艺复兴时期和后来的那段政治发展史。因为他掌握数国语言，海德里希注意到了他的特殊才华，随即把他

的名字记了下来。这位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将有一天会成为德国情报机关的首脑，他的名字叫瓦尔特·施伦堡。

海德里希还在老警官中挑选了仍然留在他们岗位上的合作者。他们中的一个名叫阿图尔·奈比，他是一个有头衔的职业官员。他曾经在魏玛共和国时代当过柏林刑事警察局局长，赢得了大好声誉。他写了一篇作为范本的警务技术论文，为了追击罪犯，造了一间调查实验室并在那里产生了新的技术手段和方法。大家知道，奈比很早就信奉纳粹主义，因此，海德里希急急忙忙把他拉到自己身边。奈比还把刑事警察的许多专家争取到盖世太保的实验室来，由他们在将来组成一个重要的专家小组。

海德里希在盖世太保领导机构内的助手是慕尼黑刑事警察的一位老成员，名叫海因里希·缪勒。他在希特勒进行秘密斗争的年代里曾经严厉地打击过纳粹分子，后来申请入党，遭到拒绝，但这并没阻止他有朝一日成为盖世太保的首脑。

由于海德里希善于使用不同的专家，因而逐渐出现了各种不同的部门。这一部门专门对付政治上的对手；那一部门严密监视哲学、宗教和自由工会组织旧成员的活动；第三部门严厉地采用紧急措施监视犹太人，它在纽伦堡种族法令公布之后表现得特别积极。还有一个部门负责宣布“保护性拘留”，以及把亲信安插在集中营；其他部门是对付愈来愈多的“破坏者”，因为在工作期间只要有丝毫的偷懒或疏忽，就被视为破坏；最后成立了一个负有“特别任务”的小组。

一九三五年许多迹象表明，新政权对大多数邻国怀有进攻的意图。只有军事上的成功和地盘的扩大才能巩固政权，才能提高民族地位，达到物质上的均衡，进而使德国人民承认党的专政。

一月十三日，萨尔区的居民绝大多数人投票赞成回到祖国怀抱（投赞成票的占投票人数的百分之九十点三六），这样通过凡尔赛条约而取得中立的萨尔区于一九三五年三月一日重新划入德国。

在全民投票表决前的竞选活动期间，保安处和纳粹党的特务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发现了一些反对把萨尔区重新划入德国的分子，因而施展恐怖绝技，散布谣言说，那些投票反对回归的人将作为叛国犯受到惩处。

盖世太保立即于三月十日在萨尔区兴师动众。自夺权以来，流亡者通过萨尔区把他们的文章偷运到德国秘密流传达十四个月，以唤醒集中营里反纳粹者的希望。全国范围内发生的一些最大胆的事情同样来自萨尔区，它们的目的是散发反纳粹的标语，重建民主共和的秘密组织。盖世太保追捕国内敌人在萨尔区的帮手，逮捕反对派领袖，并且通过有关宣传煽动居民用私刑处死“法国间谍”。

一九三五年三月，各种事件接踵而来。希特勒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关上和谈大门，退出国际联盟，至此就清楚地暴露了他的意图。秘密推行的、以建设一支空军为借口的扩充军备工作从这时起在众目睽睽下继续进行。三月十日在戈林总司令领导下宣布成立空军。这说明希特勒理解到空军在一场未来战争中的重要性（空军实力从一九三二年的

三十六架飞机提高到一九三六年的五千架和一九三九年的九千多架飞机)，但是这也流露出，希特勒对那些将军们并不信任，所以他要把重新装备的紧急任务交给其中一个最老的纳粹党人。

一九三五年，国家预算计划中规定，纳粹党用于国外任务的费用为二亿六千二百万马克。其中二千九百万马克花在希姆莱的外国特务身上，相反，军队的开支却少得可怜。勃洛姆堡对此有些牢骚，但是希特勒回答说，盖世太保的特务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军队的最好助手，并答应他在陆军参谋总部和希姆莱参谋部之间建立一个联络点，勃洛姆堡只好对这微不足道的安慰表示满意。

到了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六日，希特勒的任何一项命令就好比贴在伤口上的膏药。一项命令下达以后，义务兵役制重新实施，紧接着在五月二十一日发布兵役法，同时把常备军的兵力配备到十二个军团包括三十六个师，人数达五十万。报纸庆贺这个事件是一九一九年以来最重要的事件。从而洗刷了贡比涅的停战耻辱。这是清除凡尔赛条约的第一个重大步骤。法国和它的盟国通过外交途径提出抗议，但是人们还是照常举行规模巨大的庆祝会。

党卫队保安处和盖世太保现在已开始占据未来牺牲者的地盘，他们希望新的国防军能占领全欧洲。他们特别想占领法国。当希特勒保证只追求和平的目的时，他们却想方设法为在巴黎建立各个局创造重要前提，同时也在这儿研究必须克服的困难。

保密原则是盖世太保的主要原则之一，它已经渗透到

德国官方的许多组织，而且在当时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情报处甚至连最低等的警察局都知道，保密对他们的工作说来是多么重要。但是希特勒各局从来没有广泛遵守这个原则，有时保密措施达到了可笑的地步。这些过份的措施留下了海德里希的痕迹，这种痕迹具有他内心的性格特点，在他性格内见不得阳光，装模作样，具有他爱好秘密的那种病态性的味道。

在盖世太保和保安处的每个办公室里都张贴着这样的指示：“只许你知道本职工作份内的事。对你知道的事情必须守口如瓶。”^①

这些事务可分为“秘密”、“严守秘密”、“绝密事务”和“秘密的国家大事”。第四种最高保密级别只适用于呈递给国家最高当局或者指名道姓的人士。

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希特勒向所有军事和民事当局发布下列第一号令：

- “1. 任何人不应知道与己无关的秘密事情。
2. 任何人不应知道超出完成任务所必须知道的事情。
3. 任何人不应提前知道他所要接受的任务。
4. 任何人，即使为了达到目的而不可避免的话，也不得把应保密的任务过多地或过早地传达给下级。”^②

^① 1946年8月5日，证人罗伯特·布里尔在纽伦堡的供词。《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20卷，第381页。

^② 《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11卷，第384页。

战争期间又增加了一条规则：凡携带国家机密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参加那些有可能被捕的危险的作战行动。

这些无情的措施有可能揭开一张不透明的、在秘密行为保护下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的面罩。那些负责人，尤其是集中营的负责人深深知道没有人会去揭露他们的罪行，因而可以不受惩罚地打人、杀人或者叫别人去打人、杀人。他们的下属可能会揭发他们，但又害怕受惩罚而不敢去揭露，要是泄密或者泄漏工作内部的情况将受到惩罚的威胁。

对居民说来，保密的意思就是“对祖国要有保守秘密的义务”，有了这种义务就可以制止损害国家威望的事情扩散。有人就是这样把德国人的嘴巴封了十二年，但是德国人的良心对盖世太保的行刑方法和集中营对囚犯的虐待感到非常愤慨。他们害怕带上“支持敌人宣传”的罪名或者被人控告为犯了支持敌人宣传的罪行。

所有这些条令和指示导致一九三九年成立总体警察的组织；收集和使用情报的那些局彼此经常分得很清楚。制定行动计划的局却从来没有去执行这种计划的任务，这已经成为绝对的准则。

战争末期，保密已失去特别效力。当国防军的指挥官已毫无办法再挽回残局时，大家也知道战争注定要失败时，希特勒却禁止任何人泄漏真情。

于是真相在反对“失败主义”的借口下被统统掩盖起来。成千上万的人又得死去，还有更多的德国城市遭到空袭而变成废墟，国家遭到破坏，直至本来也许可以避免的全面崩溃。

扩建保安处和盖世太保的组织、挑选合适的人员、确定原则和方法以及物质装备等工作进行了两年多，这些工作使希姆莱的局和居民习惯于即将到来的适宜的“气候”：把德国所有警察合并并在希姆莱的权力范围内。

这种合并分两个阶段进行。

一九三六年二月十日，戈林以普鲁士总理的身份发布“盖世太保法令”。此令责成盖世太保在全国范围内去发现所有敌视国家的人，并规定盖世太保不受行政审判权的约束。最有启发性的是这个文件的第一章内容：

“秘密警察的任务如下：在全国范围内探听和反对一切危害国家的人，收集和利用调查得来的成果，向中央政府汇报，使其他局不断了解重要的证据，并得到鼓励。”^①

这一章论述了盖世太保的真正的任务；盖世太保的任务与其说涉及到正规警察的领域，倒不如说涉及到道德和思想领域。盖世太保特务的作用相当于一个大法官的作用，但是他们的任务是研究所有的“尝试”；同时他们又是纳粹当局的“忏悔神父”，因为当局给这些神父以种种“鼓励”。

根据同一天发表的、由弗立克和戈林签署的执行规定，盖世太保在全国各地获得了制订合法措施的权力。其中有一条规定，集中营必须由盖世太保“管理”。这一条是海德里希设法控制集中营的巧妙伎俩的结果，他这样做可以从中渔利。希姆莱对此毫不反对；这符合他通常的策略，他不直接给这位部下制造麻烦，因为他顾全到这位部下的虚荣心。他避免使用规章条文，而是委托党卫队特别队去管理

^① 《普鲁士邦的法律汇编》第 21 页，1936 年。

集中营。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七日的那项命令证明了希姆莱的胜利，他被任命为全德国警察的首脑。从此以后，不论穿制服的，还是穿便服的警察都得服从“德国内政部的党卫队首脑和德国警察首脑”的命令。

自从希姆莱于一九三四年春获得对各邦政治警察的控制权以来，警察的实权事实上已经掌握在他们的手里，但是这种集权只能由他手下的人去实现，不是任何一项命令都能实现的。不过六月十七日的命令倒使全国的盖世太保有了法律基础。这条法令剥夺警察对各邦的管辖权，他们直接隶属于帝国。可是警察的薪俸继续由各邦支付，直到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九日他们的工资和费用才从帝国的预算中开支。

从六月十七日起，盖世太保在形式上隶属内政部，随之而来的是希姆莱成为真正的、独立的警务部长。如果在内阁会议上讨论警务问题，他即去参加。这是希姆莱渴望七年以后所达到的、在攀登内政部高峰道路上的第一步。

全国警察的主人希姆莱重新整顿他的局，并把它们分成两类：穿制服的治安警察(Orpo)和保安警察(Sipo)，他们包括所有穿便服的警察人员。希姆莱在“走向”灭亡期间曾经对一些人进行过考验，因而把这种高度统一化、集中化、军事化和纳粹化的警察任务托付给他们。

他根据党卫队和警察之间的合一君主制发布第一号令，确认纳粹制度下那些忠实仆人的作用并扩大他们的职权。治安警察由党卫队大队长兼警察上将库特·达吕格领

导，属于治安警察的还有：巡警、行政警察、水上警察、海岸警察、消防队、防空队及其技术辅助人员。

保安警察由海德里希领导。它包括盖世太保和刑事警察。

一九三七年在慕尼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保安警察必须抵制国家敌人的各种企图，并把以下这些人看作国家的敌人：

1. 因肉体或道德的堕落站在国民的对立面的人，他们为了自身利益去损害那些为保护公共利益而采取的措施。刑事警察将对这些罪人采取行动。

2. 受纳粹德国人民的政敌的委托去破坏德国统一和毁灭国家政权的人。这些侵略者将由盖世太保处置。

从那时起，政治警察和刑事警察成为希姆莱的光荣，它们对繁荣纳粹政体共同起着作用。

海德里希把盖世太保的领导权交给他的助手海因里希·缪勒，实际上他从一九三五年以来就担任盖世太保的领导。此外，他把刑事警察的领导权交给那个老行家阿图尔·奈比，使他又回到了他原来干的那个行当。

就保安处而言，它仍然是脱离行政机关的一个党组织，所以已经担任“保安警察兼保安处首脑”的海德里希把它牢牢地控制在手里。

将军们似乎对纳粹党在国家内部的新挺进并无反应。他们可能没有觉察到希姆莱权力范围内新部署的意义。但是他们很快会有机会相信这些措施是多么厉害。

第三部

盖世太保准备入侵

(一九三六——一九三九年)

第一章

盖世太保敢于打入军队

一九三六年六月，将军们对希姆莱加强警察力量一事掉以轻心，当时希特勒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对法国采取紧急军事措施上。

在希姆莱担任全德警察首脑前一个月，希特勒突然声明废除洛迦诺公约，占领非军事区莱因兰。在牛赖特向法国、英国、意大利大使和比利时代办递交洛迦诺公约文本的正式通知书时，德国部队正在向科布伦茨公路挺进。大约有二万名德军于五月七日清晨越过莱因河，开进德国军团自一九一八年以来再也没有留神过的旧驻地，居民们兴高采烈地表示欢迎。正象牛赖特所说的那样，这支“象征性的部队”在晚上集结了十三个营的步兵和炮兵。巴黎和伦敦感到吃惊。有人在巴黎说，他们要在军事上进行反击并重新夺回萨尔布吕肯。部长们一致赞成。但是甘末林拒绝在事先不进行总动员的情况下进军。所以大家只得停留在外交的抗议上。一旦洛迦诺公约的签字国采取军事上的反措施，勃洛姆堡对此该作出何种军事反应，他明确地保留决定权。考虑到双方力量的悬殊，德国部队不得不再次撤回。军事上的反击可能会严重地损害希特勒的威望，因此一九三

六年五月七日这个日子应该登记在错过机会的记事单上。

一九三六年德国走上了战争的道路。财政经济政策中的各项规定都是为把德国引向战争经济这一目的。当时科研工作开始着眼于对代用品进行科学研究，这成了法国幽默家和喜剧演员的笑柄，法国人也取笑它。没有料到，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也只好暂且满足那种兵营式的伙食。戈林在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二日说：“如果我们明天有战争，我们不得不用代用品进行自助。到了那个时候，金钱将不起作用。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我们也必须有所准备，在和平中为此创造前提。”^①他在五月二十七日又说：“一切措施要从有把握地进行战争这一立场来考虑。”^②

秋天，公布了第二个四年计划，戈林被任命为帝国委员。该计划的目的是要为德国扩充军备搞到所需的外汇。工业强调要加速生产。一个新的工业企业“赫尔曼·戈林帝国工厂”建立起来，这是一家从五百万资本上升到四亿资本的公司。该企业的任务是开采非金属的矿石，不久发展成为一家巨大的、拥有七十万工人的煤铁托拉斯，它是道道地为战争服务的。

经济部的两个部门受军事管制：勒贝将军负责原材料的供应，汉内克将军负责电力、铁和煤的供应。

军人对这个措施的意义是一清二楚的：战争——它意味着一国的威力——正在孕育。

他们心中滋长的这种优越感弄得他们茫然无知，以致

① 《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4卷，第595页。

② 同上，第596页。

觉察不到希姆莱组织的完善性，也注意不到艾尔布莱希特亲王街办公室里的人士正在暗中编织着他们的情报网。盖世太保的新首脑海因里希·缪勒用老官员的那种非凡的精确性通过党来做最后的驯服军队的工作。

希特勒尽管作了保证，但他从未解除对军官们的根深蒂固的怀疑。这位前上等兵的自卑感是有其根源的，每当他站在军官面前，他就会本能地做出一副下级对上级的某种姿势。后来，他对这些上校、将军已习惯，他当时认为，他们全是些讨厌的请求者，总把他们看作陌生人。

他用鄙视的口气把一些愿意为旧德国承担责任，但又遭到失败的人称为“上等人”。这个曾经中过煤气毒的老兵或许还在怨恨这些将军，因为他们完全从长远的角度看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壕中的密集炮火，而且他们把人的生命当作“儿戏”。罗姆关于“人民军队”的理论在这里影响着

他。

戈林周围的人同希特勒一样对陆军军官团时刻存有戒心。希特勒深信有必要把军队置于铁的纪律之下，否则他就有遭到军队群起而攻之的危险。他对军队“改信”纳粹主义是不抱任何幻想的。他说，“我的陆军是反动的，我的海军是信仰基督教的，而我的空军则是纳粹主义的。”戈林借助于党提供的新干部一手建立了空军，而陆军的君主政体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他们堂而皇之地庆祝皇帝的生日。

希特勒深信，他的军事天才胜过军事院校所教的一切技术、战术和战略课程，并认为有必要掌握军队的领导权，以便能迫使受惊吓的参谋总部接受他的计划。

盖世太保的主人希姆莱和海德里希鼓励他把留在他们身边的唯一敌人干掉。对于他们来说，只有当他们成功地剥夺陆军的最高领导权，才算获得彻底的胜利。为此，希姆莱于一九三五年开始设计他的那部装备精良的机器。他把矛头指向国防军的最高负责人，战争部长瓦尔纳·冯·勃洛姆堡大元帅和陆军总司令弗立契男爵上将。为了清除这两个党卫队的对手，盖世太保采取各种手段来败坏他们的名声。

海德里希指定盖世太保的头头缪勒，一个无聊的行政人员处理技术方面的工作。缪勒身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干部”只是为了他的各种证件、统计表格和报告才活着的。他生活在尽是笔记、组织图表和规章的这一世界里感到孤苦伶仃。他最关心的是提升。他对生活中的卑鄙检举、匿名信和秘密处死一概漠不关心。对他来说，这种恐怖完全只是抽象的东西，不管以报告的形式，还是以评论的形式统统变为这部行政机器所需要的饲料。

海因里希·缪勒是巴伐利亚人，长着一个农民模样的四方脑袋瓜。他身材矮小，有点粗笨，走起路来脚步很重，摇摇摆摆，一看就知道他出身于农村。他聪明不足，固执有余。他在学校里刻苦求学只是为了做官，这是一门在农村特别会引起妒忌的职业，因为他表现出了老年人的镇静和自信。他做到了这一点，是因为他被接受进入巴伐利亚国家警察局。在慕尼黑，他的盲目服从性和熟练的专业知识引起了希姆莱的关注。缪勒同所有政治警官一样一直到一九三二年还在反对纳粹分子。不过希姆莱对这一点倒是无所谓，他深信，缪勒在新主人手下会发挥同样的工作热情。

事实上，缪勒为了忘记他过去的工作，克服某些有影响的党员不断使他感受到的那种敌对关系，现在工作更为卖力。尽管他千方百计来证明自己是绝对服从纳粹政权的忠实仆人，但是他的入党申请报告写了六年还是遭到拒绝；直到一九三九年提升为党卫队大队长，他才成为纳粹党党员。于是国家的主要镇压工具(盖世太保)荒谬地操纵在一个非正统的纳粹党员的手里。事实上，民众法庭^①对他的判断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原因：缪勒同对手存在着敌对关系，他的主子们估计到，他为了反对阻碍他入党的人将会特别热情地工作。

这样估计非常正确。缪勒诚心诚意地要对他的过去表示忏悔，而且现在有人允许他真心实意地去改信纳粹主义的信条，但并不是出于思想上的认识，也不是出于什么热情。在他身上找不到这两种痕迹。前凸的额头下面，是一张冷酷、干巴、单调的脸膛，两片薄薄的、冰冷的嘴唇当中咧开，从一双褐色的小眼睛里透射出来的目光（由于眼皮沉重，眼睛经常模糊不清）凝视着对方。他把后脑勺的头发剃得光光的，脑门前只留一束短头发，中间向两边分开。这种发型在过去民族主义人士中曾经风靡一时。他有一双宽阔、有力、粗大的农民的手。他的敌人说，这是一双卡住人家脖子的手。

缪勒是一个真正的暴力迷。他执行主子命令时百依百顺，甚至往往主动地超出范围。他仇恨精神和才智的一切

^① 民众法庭是古希腊雅典所盛行的一种法庭，凡有害于国家生存安全的人由公众书名于贝壳上，投票决定后则流放国外十年，这种法庭到公元前四一八年才废除。——译者

东西，这同崇拜有关，是互相影响的。有一天，他对施伦堡说，我们应当把知识分子关进一座煤矿里，然后把它炸掉。

正象每一个以后改变信仰的人那样，缪勒一直担心自己会被人疏忽或者以弱者出现。这种精神状态迫使他经常同冲锋队发生争吵。他对冲锋队怀有某种仇恨，因为他怀疑纳粹党之所以找他的麻烦都是由于冲锋队从中作梗。事实上，冲锋队是一个竞争部门，他作为一个旧职业的政治警官，看不起这部门里的人，说他们不过是一些“业余爱好者”。

他的专业知识使他得到了希姆莱的尊重。直至末日来临的那一天，希姆莱还很信任他。而且当一些部门从城市撤退的时候，希姆莱仍嘱咐他留在柏林。这样高的嘉奖在海德里希权力范围的等级制度里是很突出的，它使缪勒得到一个能独当一面的特权地位，同时通过盖世太保的改组他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

为了讨好海德里希，缪勒专心致志地研究每一项最细小的工作，暗中监视自己的同志，并且帮助他的主子清除一些不称心的人。他参加由希姆莱想出来的一切勾当，接受一些最“棘手的”任务。干这一切需要有一个心甘情愿的人，一个象他那样不感到厌恶的人。他的第一个拿手好戏，甚至可以说他的杰作就是勃洛姆堡—弗立契双重事件。

一九三三年春，对德国武装部队发布命令的大权掌握在三个人手里：战争部长瓦尔纳·冯·勃洛姆堡大元帅，陆军总司令瓦尔纳·冯·弗立契男爵上将、陆军参谋总长路德维希·贝克上将。这三位人物是具有传统主义思想的军

官，在德国受到全军的爱戴和尊敬。即使有时候也有人严厉地批评过勃洛姆堡，因为他向纳粹分子“妥协”。虽然他压根儿不是第一个同情纳粹运动的人，但他却是将军中间首先同情纳粹分子的人。一九三一年，当中间派和右派的政党还在反抗纳粹党人的袭击的时候，他遇到了希特勒，而且掩饰不住他对希特勒的那种钦佩心情。当时勃洛姆堡是东普鲁士第一军区司令。他的参谋长是瓦尔特·冯·莱希瑙上校。此人的叔叔，前大使冯·莱希瑙是希特勒的狂热的崇拜者。他的政治信仰影响了侄子。勃洛姆堡很有才华，但是意志不坚，易受影响。在德国军队和红色军队之间存在某种合作的那个时代，他自己承认，已经是个“差不多的布尔什维克”了。在莱希瑙的影响下，他同样轻易地成为纳粹党人。他以战争部长的身份建立了一个联络点，目的是要同国家和党一起讨论武装部队的问题。这个机构在同陆军参谋总部打交道的时候给他带来很大的困难，有人责备他对党太唯命是从了。

勃洛姆堡对重新占领莱因兰起着重要的作用，他直接同党的首脑一起共同起草该计划。为此，希特勒在进军以后提升他为大元帅，同时感谢勃洛姆堡在“粉碎罗姆政变”的日子里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顺从性，因为他容忍别人去杀害他的两个同事施莱彻尔和勃莱多夫，继而又向希特勒作了效忠宣誓。

尽管如此，勃洛姆堡在有些军人中间仍然享有一定的威望。埃哈德·米尔契大元帅在纽伦堡说，勃洛姆堡经常反对希特勒，而希特勒尊敬他，倾听他的话。他是唯一的老

兵，他才华横溢，因而能把军事问题和政治问题两者结合在一起。

当伦斯德在纽伦堡以同事的名义对勃洛姆堡提意见时，他确实明显地减少了对这位陆军元帅的批评。他们总觉得，勃洛姆堡有点儿陌生。他仿佛飘浮在其他的星球上，有一点神通者的模样，其实没有一个人喜欢他。

勃洛姆堡自己招惹得来的“橡皮狮”绰号在那些谴责他的同志们的眼里真是恰到好处。

看来勃洛姆堡不是或者不仅仅是由于个人原因而被迫辞职的，他的职位同纳粹的“元首原则”有矛盾。旧的普鲁士德国军队的领导传统不能与元首原则协调一致，因为这种领导传统的核心是要让一个参谋总长有权使他的观点发挥效力，并使它同他的司令的观点相一致。正象阿尔弗雷德·凯塞林证实的那样，这种共同负责制在战争期间的部队里并没有实施，原因正是那种从上到下起作用的“元首原则”。

一般说来，希特勒不会容忍讨论他的命令，哪怕提出一点儿异议也不容忍。但是他也不得不考虑到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使是极小的可能性——（希姆莱利用这一点并支持他）将军们一方面对他狂妄自大的计划感到吃惊；另一方面准备对该政权发动一次政变，必要时依靠外国政治上的支持。甚至到处散播关于同法国大元帅甘末林的秘密接触。

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四日，勃洛姆堡作了一篇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它可以向希特勒一手策划侵略政策的敌人提供论证。报告中这么说，一般的政治形势证实了一种假

设，即德国不必去考虑来自任何方面的进攻。除了明显缺乏这样一个愿望之外，没有一个国家，尤其俄国要准备打仗。

希特勒不喜欢这些与他计划格格不入的论述。不过他思想上早有准备，容忍希姆莱和盖世太保在战胜将军们之后继续搞阴谋诡计。

一九三八年初发生了一起双重性的阴谋案件，这种卑鄙行为遭到人们的冷嘲热讽。希姆莱之流首次使用新技术来消灭重要的扰乱者——这种方法既不会象过去由于暴力而造成流血事件时引起的骚动，又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二日的那次表演几乎象维也纳歌剧中的一首歌曲刊登在德国报纸中的消息栏里，说什么战争部长勃洛姆堡大元帅和埃娃·格鲁恩秘密地结了婚，证婚人是阿道夫·希特勒和赫尔曼·戈林。奇怪的是报纸对此既不登照片，又不进行报道；这一定会在熟悉勃洛姆堡的上层人物中间引起惊讶。

众所周知，勃洛姆堡是个鳏夫，而且是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的父亲，他的最小的女儿嫁给了战争部国防局局长威廉·凯特尔的儿子。相反，有关勃洛姆堡的第二次婚姻大家只知道这位年轻妇女的性格很朴实，与纳粹的宣传完全吻合。坐在柜台后面和办公室里面的柏林姑娘感到十分高兴，一个来自民间的女孩子竟然占有了一位真正的大元帅。

然而这些浪漫的梦想很快就破灭了。婚后还不到一星期，奇怪的谣言就不胫而走；大家都在窃窃私语，说这位年轻的“女元帅”原来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妓女”。这些流言蜚

语传到了官方人士的耳朵里。因此，人们不得不把这些谣言同某些奇怪的情况作一比较。两人的结合是在匆忙和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没有举行教会婚礼，这在教会遭到党的激烈攻击时当然是不会受到怀疑的。但是必须强调，这位年轻的妇女免去了出示结婚所需要的无数证件，其中有警察局颁发的身世清白证书，父母和祖父母的证书。最后这对新婚夫妇毫无目的地就立即去旅行结婚了。

婚后几天，报纸终于刊登了一张他俩的新闻照片。有一个新闻记者莱比锡动物园里发现了这对夫妇，他有幸在猴山的栏杆前为他们拍摄了一张很漂亮的照片。

这张报纸上的照片同埃娃·格鲁恩的一份档案材料恰好同时放到柏林警察局长赫尔道夫伯爵的写字台上。赫尔道夫于一月二十日为“女元帅”谣言之事进行了谨慎的调查。调查的结果就是赫尔道夫伯爵正在研究的这份档案，但是他对这份材料感到有可疑之处。里面的情况是这样的：

埃娃·格鲁恩于一九一四年在新克尔恩出世，这是柏林的一个工业区，居住着工人和小市民。虽然她芳龄才二十四岁，但是她的经历却很不平凡。她的母亲在新克尔恩的伊丽莎白大街上经营一家十分可疑的“按摩院”。风纪警察监视着格鲁恩妈妈，她已受到两次处罚。长得颇为美丽的埃娃步她母亲的后尘，因而被列入德国五个城市的警察局风化科的档案卡里。一九三三年，早在纳粹政权时代，法院就跟她打过交道。主管“查禁猥亵照片和书籍科”的刑事警察查获有人出售黄色照片，在被没收的照片中发现有埃娃·格鲁恩的模特儿的照片。当时她才十九岁，为了给自

已辩护，她振振有词地说，她的男朋友让她一丝不挂地坐下来干这项“工作”，为此她得到了六十马克。她还说，她是由于生活贫困才被迫接受这项工作的。

赫尔道夫多次把档案里的这些照片同报上刊登的在莱比锡动物园里拍摄的照片进行比较。毋庸置疑：微笑着站在猴山栏杆前面的年轻妇女就是照片上摆着姿势的那个妇女。为了增加档案袋里的份量，刑事警察的拘留登记簿上还有埃娃·格鲁恩的指纹，当她卷进一起偷窃案时（以后并无材料证明是她偷的），她被拘留了。

赫尔道夫的混乱思想稍许平静之后，他决定向凯特尔汇报此事，凯特尔是勃洛姆堡的最亲密的同事和朋友，由于他们孩子间的婚姻，他俩结成亲家。这样一来他犯了一个严重的和极其危险的双重过错，冒犯了工作条例。他本来应该把这份档案呈交给他的顶头上司的，因为这位顶头上司就是德国警察首脑，将军们的死敌希姆莱。另外，他违反了严格的保密指示。赫尔道夫伯爵固然希望凯特尔会警告勃洛姆堡，也许会请求毁掉这份案卷。但是凯特尔讨厌这种过硬的材料，想方设法避开这件事，所以他把赫尔道夫连同案卷一起送到戈林那里，也就是说偏偏送到大家都知道的一心想当个战争部长的那个人手里。

戈林神经紧张地接受了这桩揭露性的案件。他看来十分震惊。因此，他坦率地向赫尔道夫说，勃洛姆堡在婚前告诉过他和希特勒，他的爱人“过去有些问题”。十分清楚：他和元首都猜不出“过去的问题”是些什么。所以希特勒没有反对这桩婚事。戈林答应赫尔道夫采取有效措施。

在一月二十二日这一天，希特勒在上萨尔斯堡逗留。次日，戈林、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在卡林霍尔举行了一次秘密的军事会议。这样一来，清除罗姆的联盟重新得到了加强。

一月二十四日希特勒回来了。戈林迫不急待地把这条新闻告诉他。希特勒作出决定，勃洛姆堡必须立即离婚，最好是宣布因严重受骗上当，此婚姻无效。根据戈林的建议，他又禁止勃洛姆堡穿制服到总理府来。戈林唯命是从地把元首的这一决定转达给勃洛姆堡。他担心，在勃洛姆堡离婚或者甚至取消婚姻之后，希特勒可能会忘掉这次事件，这样一来，一切又得重起炉灶。所以他急急忙忙跑到勃洛姆堡那里，象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所做的那样，“扩大”了他的任务并略微修改了元首的指示。他对勃洛姆堡说，他必须立即去国外作一次长时间的旅行，以此忘掉这件事情。这位陆军元帅对那些揭露首先感到沮丧，继而又被那件具有威胁性的丑闻吓了一大跳。他已经不能离开他的那位年轻而又如此迷人的妻子了。当戈林让人给他一笔很可观的外汇作为路费时，他愉快地接受了戈林的建议。这并不是希特勒作出的安排，不过这倒也是一个比较诱人的解决办法。

希特勒吩咐勃洛姆堡必须在国外住上一年。于是勃洛姆堡夫妇就在一月底去罗马和卡普里旅行。

勃洛姆堡的事情逐渐在上层军官当中明朗化。大家在想，怎么可能出现这样一桩婚事。警察局既然知道这位陆军元帅爱人的过去，那么为什么会同意他们结婚？希特勒又怎么会当证婚人？具有传统观念的军官，更不用说一位陆军元帅和战争部长一般是不会到象埃娃·格鲁恩这样的

人家去的，更不会同这种人家攀门亲事！当然，这位年轻貌美、诡计多端的妓女对获得这个意外的宝贵的猎物感到十分高兴。但究竟是谁派她去盯住这位老兵的呢？

希姆莱、海德里希和缪勒本来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他们也许会这么说，他们为什么闭口不谈早就知道的关于埃娃·格鲁恩的过去。他们怎么会不知道她的情况呢？那时在一九三三年，埃娃被“查禁猥亵照片和书籍科”拘留过，这个科同负责拘留登记的“刑事罪犯鉴定科”一样由他们忠诚的同事奈比领导。另外，即使没有注意到埃娃·格鲁恩的案卷情况，那么勃洛姆堡也应该及时地亲自去进行了解，当然，在了解过程中得到的情报也许是假的或者是打了折扣的。当这位元帅知道他的爱人或者说他的新娘过去有些污点的时候，他确实考虑过反对这门婚事，但是不可理解的是他偏偏相信了戈林的话。他曾经问戈林：“我可以娶一个出身低贱的妇女吗？”这位肥胖的赫尔曼安慰他说：“这样一种婚姻完全符合纳粹思想。你放心同你的那位女工结婚吧！”元帅得知他的诚恳的请求被友好地接受以后，感到欢欣鼓舞。所以几星期之后，元帅为了埃娃再次请求戈林。就在这个时候，她的一位老“相识”又一次找到了她，并且设法挑拨她与勃洛姆堡之间的关系。难道赫尔曼不会去关心一下，让警察悄悄地把这个令人不愉快的人赶跑吗？事实上，警察进行了干预。但是忘了告诉元帅，埃娃的从前的情人是一个有名的姘夫。此外，为了让他保守秘密，警察用装得满满的钱袋把他打发到南美洲去，同时威胁他说，如果他不放聪明一些而想回到德国来，那他的下场将会是不妙的。为了使这位勇

敢的元帅太太平平地结婚，当局采取了一切安全的预防措施……

这起微不足道的事件很可能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巨大的行动，它是艾尔布莱希特亲王街上的主人进行的一次新的政变。

这时勃洛姆堡乘坐的去意大利的车子正在缓缓移动。对于那位把自己看作战争部长的戈林说来道路已经铺平，而对希姆莱说来，他希望利用这个机会挤进将军们的上层社会，使他的党卫队军团成为国防军的第四部分。但是还得克服最后一个障碍：陆军总司令，瓦尔纳·冯·弗立契男爵上将，他是等级制度中的第二把手，很有可能成为勃洛姆堡的继承人。此外，他在军队里非常受人爱戴。希特勒曾经把他从炮兵部队将军提升为上将，并授予他金质党章——一种非常令人羡慕的奖章，而且现在指定他为勃洛姆堡的继承人。但是戈林和希姆莱进行了干预。

一九三五年，盖世太保发现了一种扩大自己作用和加强自己权力的出色方法。他们借口说，在希特勒青年团当中普遍存在着同性恋爱（那里曾经发生过许多这类丑事），因而提出只准由他们来处理这件事，并根据刑事法典第一百七十五条进行调查。为了“研究事实真相”，他们毫不踌躇地把犯有这种罪行的犯人从监狱里叫出来，然后诱使他们招出“同谋者”的姓名。

有一天，他们找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勒索者。汉斯·施密特是个性变态者和男宠，他专门从事窥探和敲榨有钱的同性恋爱者。有时候他甚至碰到好运气，当场突袭一位牺牲

者，然后他冒充刑事官员，敲榨一大笔钱作为保密费。

这个多次被判刑的施密特又坐了牢，盖世太保把他从监牢里叫出来，进行详细的审讯。他乐意讲述有关他的顾客和牺牲者的事情，并把所有的人列举出来：高级官员、医生、律师、商人、工业家、艺术家。其中他也提到一个叫“弗立契或者叫弗立许和类似名字的人”，他曾经在一九三五年底向这个人勒索过钱财。

他供认，在一个冬天的夜晚，他在柏林万湖火车站的大厅里注意到一位衣着讲究的先生，并看到有一个“同伙”（一个风纪警察所熟悉的男宠）向这位先生打招呼以及他们两人一起离去的情景。

这位先生穿着皮上衣，戴着深绿色的帽子，手上拿着刻有象牙柄的手杖，戴着单片眼镜，看上去活象个旧军官。施密特尾随在他们后面，当这位老先生同施密特的“同志”一起在靠近火车站的一个黑暗的新建筑工地上作短暂的交谈以后，他就挡住了这位先生。施密特这时表演他惯常的戏法：警察……用密告威胁还是让丑闻张扬出去……——“两者任择其一”。因为这位先生身上带钱不多，所以施密特一直陪他到利希特菲尔德东区的他家门前。由于钱不够，他甚至强迫他从银行取款。施密特重申，有着不良习惯的这位老先生名叫“弗立契”或者“弗立许”。

盖世太保立即抓住这个意料不到的机会，如获至宝。如果这位先生果真是陆军总司令（这个众所周知的弗立契男爵的话），那清除他的理由该有多妙啊！然而希特勒不同意追查此事，命令销毁审问笔录，对“所有这些肮脏的事”要保

守秘密。

两年以后，秘密泄漏了出来，人们并没有听从希特勒的命令，因为一九三八年一月的那份档案奇怪地又出现在海德里希的手里。实际上呈递给希特勒的那份案卷表面上只是一份合乎逻辑的档案材料，任何一名职业警察从中可以发现许多可疑之处。例如没有去核对当时弗立契将军的地址在哪里，甚至还没有确证他是否在利希特菲尔德东区住过，或者是否有过住所；也没有检查过弗立契的银行存款，不知他是否在约定时间内提过款；甚至连他是否在靠近利希特菲尔德东区火车站附近的银行里开有户头这个简单的问题也没有追问一下。当时那位先生是由施密特陪同去银行的。总而言之，这种十分秘密的“做法”使得呈递给希特勒的那份档案站不住脚。

然而这件事情由一名经过考验的密探、刑警科科长兼党卫队中队长迈辛格尔在继续进行，他是同缪勒一起参加盖世太保的。迈辛格尔——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的主角之一——是缪勒的知交和心腹，缪勒拉他去干那些最肮脏的勾当。对此他得到了管理犹太人财产“特别科”的领导权作为对他的答谢，这真是一个可以捞到很多外快的美差。此后不久，他被派往日本，主要是为了监视里夏德·佐尔格斯的活动。此人以前是共产党人的朋友，“法兰克福报”的记者，后来成为保安处和盖世太保的特务。

此时海德里希把三年前由迈辛格尔所归存的档案又重新发掘出来，不过这一次希特勒并不反对，甚至也不问为什么以前不按他的命令烧毁这份档案，相反在一月二十四日

命令弗立契到他那里去。弗立契在希特勒的军事副官霍斯巴赫上校陪同下驱车前往总理府。他没有想到会把所有严重的后果归罪于他。当希特勒指责他在案卷中干了些什么的时候，他气愤地对这些卑劣的指责提出抗议，并且以荣誉保证他是无罪的。这时场面显得很尴尬。希特勒一面扮演刑事警察的角色，一面突然打开一扇小门，汉斯·施密特从外面走了进来。国家首脑、万能的元首、军队最高统帅在总理府里同一个囚犯、流浪汉和敲榨者进行对质！这个人立即指着弗立契，只是说：“就是他。”

这位上将吓得目瞪口呆。接着他结结巴巴地作了含糊不清的保证并想解释一下，他是那些可耻阴谋的牺牲者。无济于事的愤怒、震惊和轻视相互交织在一起，他的思想和反应显得非常混乱而无能。希特勒见这个气喘吁吁的人的脸上一会儿红，一会儿白，因而把它看作是有罪的证据，并要求弗立契立即提出辞呈。弗立契拒绝这样做，他再次保证，他是无罪的，并要求军事法庭进行调查。在演完这场难以置信的戏之后的第三天，即一月二十七日，弗立契由于健康原因被勒令暂时退休。直到二月四日大家才知道此事。

戈林起先表示反对，以后也就同意让盖世太保去调查此事。陆军总司令弗立契就这样被海德里希的部下传呼到庭，更妙的事还在后面呢！

在这次行动成功之前，为了保守秘密采取了一切措施，但是那些闻所未闻的事情还是在将军们中间传开了，加上还不明朗化的勃洛姆堡事件引起将军们深为不安。在上层军事领导里先后发生的这样两起丑闻一定会使人迷惑不

解。将军们预感到，有人要阴谋破坏军队的威望和地位。古罗马模式的色情早就在德国军队里找到了它的信徒。到本世纪初，这种色情甚至变得有点儿时髦起来了，因为皇帝本人（他个人“不是这样的”）喜欢同他所称呼的“拜占庭人”打交道，他很器重他们的艺术才能，他们当中有公使、普鲁士的一位王子和几位将军。当皇室军事内阁首脑（一个高级将领）穿着女芭蕾舞演员的裙子在表演舞蹈的时候，突然死于心脏病^①。军队也没有忘记菲利普·冯·奥伊伦堡侯爵与库诺·冯·毛奇上校之间关系的丑闻，以及因此而提出的诉讼，最后以判决奥伊伦堡而告终。

弗立契从来没有受过批评，他的生活方式看来是无懈可击的。但是究竟谁能知道呢？这些半信半疑和不明不白的忧虑正象他们反对盖世太保时所怀有的胆怯那样沉重地压在将军们的心头上。当时没有人怀疑是盖世太保在操纵这次事件。

当机立断使这次事件得到彻底的解决。二月三日晚上，电台的一则“特别报道”发布了勃洛姆堡和弗立契下台的消息。没有说明这位战争部长退职的原因，而谈到陆军总司令时只是说，他考虑到健康情况请求解除他的职务。接着德国人民和全世界都知道，战争部被解散了。元首，作为最高司令的国家首脑，直接领导这个部，这个部起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作用。一九三四年，希特勒负责把涉及到国防军的一切计划提交给战争部长批准，现在这个责任制也随之

^① 这件事发生在1908年秋天多瑙厄申根王宫里。在《每日电讯》记者提问之后，这位皇帝因当时国内政治危机持续不断而引退。

失效了。

陆军参谋总长路德维希·贝克上将当时是资历最老的人，因此，在正常情况下，他也许是弗立契当然的继承人。然而，他在一九三四年犯过太亲近希特勒的错误。他曾经这么说过，不管他们多么有才能，也许没有什么东西比相信自发的、不成熟的灵感来得更危险，或者也许没有什么东西比相信还很灼热的愿望来得更危险。大家知道，希特勒就是由于他那“天才的直观能力”而要求统治别人的。贝克的那种说法使纳粹党人记忆犹新，这使他丢失了陆军总司令的职务。至于莱希瑙，他虽然在将军们当中是唯一真正的纳粹分子，但并没有被安置在陆军的第一把交椅上，因为希特勒绝不同意有一个政治军官。戈林说，“第三帝国的将军们无权从事任何政治活动。”弗立契的职位由东普鲁士军区司令瓦尔特·冯·勃劳希契接替。希特勒指定威廉·凯特尔将军在新成立的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担任自己的常务代表。他的服从性是众所周知的，这种服从性使他在军队里得了个“狗腿子”的绰号。

上层领导的变更没有停止。十三名指挥官和二十四名其他官职的将军被动员辞职或调离他职。许多高级军官遭到同样的命运。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引起希特勒的不满或者被盖世太保认为是“反动的”，君主主义的或者倾向于教会的。机械化战争的战略家海因兹·古德里安将军属于逃避这场无情的革命而得以走运的人，他是第十六军（迄今为止所成立的唯一的坦克军）的指挥官。

不仅仅这些将军本人遭到排挤，连他们在政治观点上

相同的朋友(怕他们作出反应)也得不到宽饶。外长牛赖特男爵被免职,由染上纳粹色彩的约希姆·冯·里宾特洛甫接替。三位大使,驻罗马的乌里希·冯·哈塞尔,驻维也纳的弗朗兹·冯·巴本和驻东京的赫伯特·冯·狄克森不得不离职而去。戈林获得了安慰奖,因为他看到他垂涎三尺的最高目标战争部已化为乌有,他成为大元帅,成为国防军中最高级官员。最后,瓦尔特·丰克作为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下台的希尔马·沙赫特的继承人进入帝国经济部,虽然德国人民知道他是个同性恋爱者。

将军们终于醒悟过来。贝克和他的朋友们重新进行斗争,揭露事实真相。他们主动出击,进行彻底调查,(可惜悔之晚矣!)迫使盖世太保供认他们的阴谋。

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不想在事后放弃自己的表演来暴露自己。但是军人们很快找到了事件的根源。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两个人的姓名同音异义,以及两个人的相貌极为相似的缘故。真正有过错的人是一个已经退休的冯·弗立许骑兵上尉。他十年来就住在利希特菲尔德东区的那幢小房子里,因此找到他是不难的。他的女房东报告说,盖世太保人员早在一月十五日,即在施密特与弗立契对质前十一天就到过那里。弗立许本人卧病在床,动弹不得,但他还是三言两语地讲了一些,并请两位前来调查的军事法庭的推事把他敲榨者施密特的受害者这一点记录下来。第二天,军人们想保护这位证人弗立许,但是盖世太保在夜晚就把他带走了。虽然他们不得不把他交给司法执行部门,但是几天之后他就死在审讯监狱里。

利希特菲尔德东区火车站附近的那家银行证明说，退役骑兵上尉冯·弗立许在那里是开有一个户头，一些帐目摘要的确表明，施密特说的那笔钱事实上在他所规定的时间内已经被提走了。然而，盖世太保在一月十五日也到过这里，并且没收了所有的证明文件。

不久前，盖世太保在菲斯滕瓦尔德的兵营里逮捕了一名曾经当过弗立契勤务兵的中士，并想方设法诱使他说出有份量的话。当然，这一次希姆莱和海德里希所干的这种厚颜无耻的行径太过份了。第二天，盖世太保不得不释放这名中士。他们想用同样的方式从弗立契的那个正在乡下度假的女房东那里得到可疑的言论，但是没有成功。以后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施密特没有被带到总理府，而是来到了戈林那里，戈林威胁他说，如果他不马上把元首要对质的那位将军“辨别出来”，就把他处死。

然而，将军们手中掌握着一大批占优势的材料，它们可以证明盖世太保的阴谋诡计。难道他们想要叫希特勒为弗立契上将赔礼道歉？还是为了了解那无耻的阴谋，从而要求元首对盖世太保的首脑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当希特勒受到这种道德行为暴露于众的威胁时，他怎能拒绝最后受人审判？

诚然，将军们的抗议是有气无力的。他们感到自己在德国的一片政治混乱中打了败仗。希特勒总算向弗立契和他们“赔礼道歉”，并让军事法庭判决这个案件。法庭于三月十日开庭，希特勒委任该法庭的成员有弗立契的继承人勃劳希契，海军总司令雷德尔，两名军事法官，但主席却是

这次阴谋的主犯戈林大元帅，因为当时他已坐在级别最高的座位上了。

会议不长。近中午时分，一名副官传达了希特勒的一项命令：要举行会谈，并要三位总司令赶紧去总理府。

在这种突然转变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呢？三十六小时之后才知道出了事。三月十二日，德国部队越过奥地利边界，当晚希特勒在林茨，第二天在维也纳。国防军到处受到居民们的兴高采烈的欢迎。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去抱怨盖世太保的暴行呢？怎样为弗立契恢复名誉？

恢复名誉的工作在悄悄地进行。三月十七日，军事法庭再次召开会议，审讯大敲诈犯施密特。戈林用提问方式对他施加压力，“恳求”他讲“真情”，并向他保证说，他不会有什么问题。施密特“供认”，他是受骗上当的。他起先认为，那位先生是弗立契上将，后来当他发现弄错时，由于害怕后果，不敢承认当初是弄错的。法庭坚持认为，上将弗立契男爵是一次遗憾的误会的牺牲品，证实他是无罪的。没有人邀请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也没有人想到要把他们拉进这次起诉中来。

至于施密特，戈林以名誉向他保证说，他可以免于死，但是几天以后盖世太保把他枪毙了。

弗立契虽然得到平反，但并没有被召回去复职。他过早的退职也许是思考鲁登道夫于一九三七年底在谈话中所说的那一席话。弗立契曾经向鲁登道夫保证，他现在象他的上司勃洛姆堡一样获得希特勒的信任，而鲁登道夫却回答说：“他接着会毫不犹豫地出卖你。”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

二日，勃洛姆堡和弗立契走在鲁登道夫的棺材后面，万万没有想到他的预言会这样快地得到应验。

弗立契的结局太不寻常了。一九三九年九月对波兰的进攻是按照他一九三七年的计划进行的。而他被迫从退休的深居简出中注视着另外一个人是如何实现他所起草的那份计划的。这样做真使他难以忍受。他坐在自己的车里尾随在他的老炮兵团的后面，仍然担任该团的名誉团长。他阵亡在华沙郊外。可能死在战场上。但是许多人认为，他是被盖世太保谋杀的。希特勒命令举行国葬。公道地对待死者总要比对待生者来得更容易吧。

第二章

盖世太保盘踞欧洲

一九三八年二月四日，那种给将军们带来的耻辱很快被人遗忘了。一举拿下奥地利的战绩好比医治创伤的一剂良药。急剧上升的军备扩充意味着战争迫在眉睫，因而将军们认为，和往常一样，一旦发生武装冲突，政治暴动必将屈服于军事暴动。可是前途又一次使他们失望。

只有他们中的少数人才理解到一九三八年二月四日“告全体国防军书”的意义^①，公告的第一段这么说：“从现在起，我亲自对全体国防军发布命令。”希特勒想通过这一强有力的句子独揽更多的权力，比德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甚至比俾斯麦、威廉二世当时掌握的权力还要大得多。事实上，希特勒现在把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里。

少数人理解到形势的严重性，陆军参谋总长路德维希·贝克上将就是其中之一。实际上希特勒不承认将军们的任何微不足道的影响，所以贝克看到了这种迹象，证明未来的战争与和平将取决于一种“天才的直观能力”，而统治集团拱顶的拱心石就是由这些天才的直观能力组成的。

希特勒外交政策的方针表明：他企图对捷克斯洛伐克

^① 《法令公报》第1卷，第375页，1935年。

发动一场闪电战。一九三八年五月三十日，他命令国防军的头头到于特博格的炮兵学校开秘密会议，用“绿色作战计划”的指示向他们泄露了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战争意图。贝克不仅感到惊慌不安，而且也很恼火，因为希特勒在没有同参谋总长商讨和不考虑军事可能性的现实情况下作出了决定；而且他象个梦幻者那样对形势作出了这样的判断，即信仰和政治信念比任何一支军队更有价值。特别使贝克不安的是，希特勒显然没有考虑到国际上将会作出什么反应。他深信，这样一种无法辩护的侵略将会导致一场世界大战，正处于建设中的军队是无论如何难以对付的。

此时，贝克正在撰写一份冗长的意见书，他作为参谋总长抗议这种业已计划好的战争冒险行为。在意见书的最后部分，他提出辞职申请并希望其他将军能步他的后尘。但是他立即发觉自己是孤军作战。他把这份意见书交给勃劳希契，勃劳希契只好忧伤地把它转交给希特勒。希特勒起先拒绝这份申请书，但是，八月十八日贝克却静悄悄地离开了他的岗位，由弗朗兹·哈尔德上将接替。从这个时候起，在通往战争的道路上不再有任何障碍了。

在贝克将军徒然地想倾听理智声音的那个时刻里，他的同事们知道得一清二楚，真正的“接线”大师不是他们。这些长期的准备工作几乎全是盖世太保先生们的杰作：希姆莱、海德里希和他们的特务。

奥地利同德国结成联盟的想法早有所闻。一九二一年，奥地利的许多地区自发地举行了全民投票表决，直至协约国禁止为止。它们表达了部分居民同伟大的邻国人民团结

一致的愿望。那些在大城市，特别是在维也纳的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居民希望同德国的魏玛共和国合并，相反，保守的乡村居民却希望恢复哈布斯堡王朝。

纳粹党人把他们仇恨的种子散播在这块土地上，从而大大促进了这个国家的群众一分为二，相互敌对。与此同时他们对因斯布鲁克和林茨边境地区的乡村居民以及维也纳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群众施加影响，并夸耀他们“社会主义的”纲领。

陶尔斐斯政府的上台使形势更为紧张，它的一些措施只能鼓舞外来支持奥地利的纳粹分子。事实上，它的真正的领导机构在慕尼黑。此外，居住在德国的奥地利纳粹分子组成了一个“奥地利外籍军团”，并在那里进行秘密训练。最后，保安处在奥地利搞到了一个固定的宣传场所。

社会党人在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一日上街游行受到严厉镇压之后，有人在奥地利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暗杀活动。保安处外国局负责破坏和暗杀的特工科经过这次秘密行动之后使自己在今后可利用的技术更趋完善。

七月底，恐怖主义重新抬头。受到墨索里尼公开支持的陶尔斐斯被邀请去意大利逗留几天，这位总理的家属已先期到达那里。他想七月二十五日动身。

七月二十五日中午，五十四个奥地利党卫队冲击团团员，身穿本国军服，在冲击团团长霍尔兹韦贝尔率领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总理府——作为他们帮凶的那位警察局长法尹为这次突然袭击大开方便之门。陶尔斐斯受了重伤，被安置在一张沙发上。他们不去照料他，而要求他辞

去职务。他拒绝就范。有人把纸和笔放在他的身边，催促他签字，此时他正在作垂死挣扎。下午六点钟，他在既无医生，又无他所要求的牧师的帮助，也不投降的情况下以身殉职。

与此同时，忠于陶尔斐斯的部队和警察包围了这幢大厦。晚上人们才知道，墨索里尼对这次暴动反响很大，他派了五个师的兵力赶到边境出事地点。下午七点钟，叛乱分子缴械投降。希特勒召回德国公使里特博士。那位公使在七月二十五日那一天同叛乱者保持着不断的电话联系。

残忍的计划再次遭到失败。希特勒意识到，一旦后果不可收拾，那么这种过失该有多危险。因此，必须使用经过考验的秘密方法，必须让保安处和由它控制的组织单独行动。而盖世太保可以出面进行干预。

然而，希特勒一刻也不放弃他并吞奥地利的计划。他一面向奥地利政府保证，他的想法是真心诚意的，一面于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九日，即政变失败后的两个月，在巴伐利亚的艾别林浴场召集纳粹首脑进行讨论。会议开了两天，结束时所发布的指示不仅说明了希特勒的真正意图，而且也说明了纳粹分子所惯用的手法。第一把交椅显然是让位给盖世太保了。

人们在这些指示中又发现纳粹行动的两个传统的要素：恐怖和盘问，目的是使反对派不能有所为害。希特勒向劳希宁陈述了他是怎样对待情报机构的：“我们没有一批全心全意地去干事业的人将一事无成。官僚主义者是讨厌这个任务的，他们觉得这项任务太脏了。实际上，他们太胆怯、太愚蠢。但是我们想到妇女，想到社会上那些喜欢冒险的

女士，她们对自己毫无意义的生存已经感到厌烦，她们不再满足短暂的恋爱和轰动一时的新闻。我并不反对使用反常的男子汉，使用那些职业冒险家。”^①

希特勒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亲自整理了一份征询意见表，根据这份表格应向他报告他所感兴趣的有关人士的情况，这是一份人类罪恶和过错的真正的目录表：“他拿钱吗？可以从哪里收买他？他爱虚荣吗？他性欲很强吗？哪种类型的？他是搞同性恋爱的吗？最后这个问题特别关心，因为这里面有着永远解不开的密切关系。他是否隐瞒过去的历史？可以对他进行敲诈勒索吗？他经营什么生意？有哪些嗜好、幻想和怪癖？喜欢搞哪项体育运动？喜欢旅行吗？等等……我要以此来搞真正的政治。就是说我要为自己争取到为我工作的人。我要在每一个邦里建立一个政权。”^②

在此期间，陶尔斐斯的继承人库特·冯·许士尼格已经知道，反抗是无济于事的了。他设法赢得时间，最后同德国签订了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一日的条约。其中谈到，奥地利将从属于德国，并同帝国保持友好关系。对此，希特勒才完全承认奥地利的主权，答应不干涉奥地利的外交政策。但是该条约除了许诺大赦奥地利的政治犯之外还有一项条款，根据这项条款，奥地利政府同意让国家反对派的那些“温和的”代表，即奥地利的纳粹分子承担一部分职责。从此时起，希特勒赢得了这场赌博。摧毁魏玛共和国的伎俩得到了重演。

^① 赫尔曼·劳希宁：《与希特勒谈话》，第250页，苏黎世，维也纳，纽约，1950年。

^② 同上，第251页。

党和保安处加强他们的颠覆活动。早在一九三四年秋天，他们就每月秘密地向乡村纳粹分子的前领袖，现在为整个奥地利纳粹分子的首脑赖因塔勒工程师提供二十万马克。

边境日益畅通。保安处、盖世太保和纳粹党人的特务不断来往于两国边境。为此，社会主义和天主教的敌人深感不安，他们知道自己已经暴露，名字已被登记下来。甚至连奥地利警察局都瘫痪了。美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乔治·S·梅塞史密斯向国务院报告说：“纳粹分子有可能夺取政权，这种前景妨碍警察对他们进行有效的干预，因为警察害怕纳粹政府将来会对反对过他们的人——用正当的手法——采取报复措施。”

此外，在格拉斯-霍尔斯特瑙的领导下，“东部行政区协会”成立，因而加强了控制工作。从这时起，纳粹分子尽一切努力把一名心腹推到保安警察的领导岗位上去，并对奥地利政府和人民施加一种巴本所说的慢慢增加的心理上的压力。

施加这种压力的目的是要许士尼格在二月十一日晚上到伯希特斯加登去进行一次原先由巴本建议，之后由希特勒盼望的交谈。许士尼格立即发现自己被希特勒推到了一个被告人的席位，最后，他不得不签署一项强制命令，这等于宣判独立的奥地利死刑。他对此负有责任：1. 任命一九三一年就成为党员的赛斯-英夸特博士为内政部长，这意味着纳粹分子获得对警察的绝对控制权。2. 把奥地利国家社会主义党同祖国阵线等同起来。3. 大赦被拘禁的纳粹党人，

恢复所有被解雇的纳粹官员和军官的职务。

三月八日，许士尼格企图使用最后一个绝望了的急救法。他宣告定于下星期日(三月十三日)举行一次全民投票表决，看看奥地利人民是赞成还是反对一个自由的、德国的和基督教的奥地利。他的意图是反驳希特勒关于多数奥地利人愿意合并的这种主要论调，并且是要向全世界表明他们的独立意志。希特勒看到了这种危险，因而准备采取入侵措施。

许士尼格不得不于三月十一日辞职，但是联邦总统威廉·米克拉斯拒绝委托赛斯-英夸特组织新内阁，可是在深夜十一点十五分他作了让步，任命赛斯-英夸特为联邦总理。

三月十二日清晨，德国部队越过边境，在此同时希姆莱到达维也纳。根据纳粹原则，首先必须清洗警察局和清除反对党，然后再向政府其他部门开刀。结果维也纳人最早受德国盖世太保的领导。希姆莱和保安处外事局局长之一的施伦堡与赫斯、奥地利外籍军团的一些成员同机飞往维也纳。载有党卫队员的第二架飞机陪同他们前来。清晨四点钟光景，希姆莱作为纳粹政府的第一任代表到达维也纳。海德里希乘坐自己的专机随后到达。盖世太保在莫尔津广场设立他们的大本营。许士尼格被拘留在那里几个星期，他在进集中营之前受到了最野蛮的虐待。直到一九四五年五月他才获得释放。四月初以来，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忙于在奥地利建立一座集中营。毛特豪森的肮脏名声传遍全世界。

盖世太保的宿营地还隐藏着另外一个有名的俘虏罗茨

彻尔德男爵。他是第一批被捕者中的一个。保安处早就盘踞在他维登的宫殿内。海德里希曾经说过，罗茨彻尔德应该作为他个人的俘虏。维也纳一家饭店的老板给他送来饭菜，因此，有人到处打听何以有这样一种优待。看来其中的原因是这位男爵同温莎公爵是朋友，温莎公爵在一九三〇年十二月辞职以后曾住在维也纳他的家里。可是现在希特勒企图争取某些英国人士站在自己一边。一个时期以来，雷德斯代尔勋爵的女儿，那个性情古怪的米特福德就是其中之一。对罗茨彻尔德的这种友好姿态可能是做给前国王爱德华八世看的。

海德里希利用这些情况赢得了一笔有利可图的交易：这位伯爵可以自由去巴黎旅行，但要放弃在国内的全部财产。

清洗工作于三月十二日上午开始。在军事情报处和谍报局人员随同第一批部队到达之前，施伦堡完成了他攫取奥地利秘密警察首脑龙格上校的案卷和档案的任务。

“胜利者”在维也纳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社会民主党人伺机以待，而那些犹太人也十分清楚他们在德国的教友是如何被虐待的，因而纷纷逃离或自寻短见。昔日上层社会的许多成员也想一死了事。牺牲者的数字从未公布过，数百个是肯定无疑的，还有许许多多人是在最初的三天里被纳粹杀人犯谋害的。

最后，盖世太保由于犯了两次凶杀案而使得家喻户晓，这两次凶杀案引起了各方的强烈反响。

德国部队进驻那天，盖世太保的暗探们劫持了巴本大

使最亲密的同事，参赞冯·凯特勒男爵。这次谋杀行动的动机从未说明，看来是“秘密”警告巴本，因为有人怀疑他在搞鬼。海德里希认为，凯特勒正在着手帮助巴本把瑞士的秘密文件转移到安全地点。巴本则被从维也纳召回，不久以后被派往安卡拉任大使。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埃德加·荣格和包斯的被害以及这次凯特勒的被害，他都没有提出什么抗议。

第二次谋杀案并不使人感到惊讶：它的牺牲者是策纳将军，他曾经被米克拉斯任命为许士尼克的接班人，那些暗杀他的密探们并没有饶恕他在一九三四年曾反对过政变这件事。三月十二日早晨，弗赖少校亲手开枪打死自己的妻儿以后，自杀了。他在那次政变时确实起了重要的作用。

赛斯-英夸特政府于三月十二日上午成立，奥地利党卫队首脑恩斯特·卡尔登勃鲁纳博士任该政府的公安部长，担任司法部长的是律师（戈林的小舅子）许贝尔博士。党把两名“副代表”推荐给赛斯-英夸特，一个是大使馆代办，希特勒派驻奥地利的特命全权大使威廉·凯普勒，另一个是帝国委员、经过考验的“统一者”约瑟夫·比尔克尔。

三月十三日晚上七点整，希特勒在最高统帅部首脑凯特尔的陪同下来到维也纳。同一天，法令规定：把奥地利与德国合并，作为德国东部的行政区。三月十五日，希特勒在霍夫堡宣告说：“我向德国人民宣布我一生中所做的最伟大的事业。”^①

^① 1946年8月31日，赛斯-英夸特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22卷，第457页。

六百五十万奥地利人就这样无可奈何地与德国同命运、共呼吸，而且必须与它一起共同渡过难关。为了使“一体化”完美无缺，内政部长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十八日授权给德国党卫队首脑兼德国警察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他认为必要时可以采取一切安全措施。

要说保安处、党卫队和盖世太保对并吞奥地利立下了汗马功劳，那他们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危机中所起的作用就更大了。在奥地利所用的方法符合迄今德国“纳粹制度”所奉行的那条路线。

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国家是根据圣歇尔曼条约在前奥地利帝国的领土上组成的，因而这个多民族国家使得纳粹分子为他们采取行动找到同样的借口，从而实现合并并为这种合并进行辩护。

捷克斯洛伐克是东欧民主国家，这一事实特别容易刺激希特勒。

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日，希特勒在一次重要的国会演说中强调指出：党、国家和武装部队是不可分割的联盟。德国人不能容忍居住在德国边境那一边的一千万兄弟长期受到压迫。由于采取合并措施，六百五十万奥地利人回到了“德国大家庭”里。大家知道，那些令人想念的数百万人就是生活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德国人。

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国家大约有七百万捷克人，三百万斯洛伐克人，四十万乌克兰人，十万波兰人和三百六十万德国人。德国人因此成为最强大的“少数派”，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住在苏台德地区，不与外界接触，苏台德地区与德国

边界接壤，由于北部和西部的矿山和波希米亚森林，因而波希米亚和梅伦^①几乎完全被包围了。

此外，苏台德地区使纳粹党人垂涎三尺，因为那儿特别富饶的煤矿和铁矿的周围，欣欣向荣的手工业和工业鳞次栉比。

由于二百九十万德国人居住在与外界隔绝的苏台德地区，所以他们与奥地利人一样要得到人民自决权的民主原则是很容易的，人们对此只要激发起一种感受性就可以了。

早在一九二三年就有一些社团在苏台德扎下了根。这些社团散发充满泛德意志主义和德意志祖国热的纳粹主义标语。但是由于它们的宣传是在秘密情况下进行的，所以需要有一个能够公开代表它们宗旨的组织。

一个办事能干的非纳粹分子建立了这个组织。一九三四年十月一日，捷克斯洛伐克的德国体操协会会长、一个德国父亲和一个捷克母亲的儿子康拉德·汉莱因建立了德意志祖国阵线。汉莱因要求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家范围内给予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以自治权，并且建议按照瑞士模式把这个国家改组成一个联邦国家，这样既可使这些少数人享有独立权，又不会使这个作为整体的国家由此而受到损害。

然而，汉莱因的祖国阵线并不是民主的，而是按照领袖原则组织起来的。这个令人不安的特征一定会引起怀疑。一九三五年，德意志祖国阵线在赢得大批拥护者之后，就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为“苏台德德国党”（SDP）。它们要求的呼声

^① 梅伦为历史地名，在捷克斯洛伐克中部，现名为摩拉维亚。——译者

随着纳粹党人的势力和影响的扩大而变化。一九三六年初，苏台德德国党在捷克斯洛伐克已经起着第五纵队的作用，并通过党卫队大队长洛伦茨按希姆莱预算领导的日耳曼族人中转站(VOMI) 获得资金。德国驻布拉格使馆人员不仅把钱转交给汉莱因，而且把如何进行间谍活动的指示也传达给他。恩斯特·博勒的国外组织(AO)同样每月向汉莱因提供一万五千马克的经费，并加强他们的情报网。所有这一切都是偷偷摸摸地进行的。一九三八年初，汉莱因一方面全力以赴地提出自治要求，一方面把他的政治纲领变为公开亲纳粹和反犹太。一九三八年夏天，纳粹活动有增无减，这与合并前的奥地利所经历的情况极为相似。盖世太保开始蠢蠢欲动。

保安处外事局控制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情报处，根据该局的详细指示，苏台德地区的德国纳粹党人渗透到各地区的组织中去，渗透到体育协会、音乐协会、歌咏协会、老年前线士兵协会、文化协会等组织中去，并把所有这些组织变成亲纳粹的场所。同时他们在这里发现了纳粹主义或者吞并德国的可疑的敌人，还把政治、经济和军事情况汇编成重要的文件。他们渗透到工商企业部门，招聘工厂主和银行经理，或者(如果他们失败的话)招聘他们的主要共事者。

所有这些组织都收集大量的重要情报，为了把情报转送到柏林去，施伦堡派人在边境两边架设了特殊的电话线。

苏台德地区到处充斥着德国特务。保安处和盖世太保分工合作。他们一面利用汉莱因及其参谋部，一面又严密地监视他们，而且有意不掩饰对汉莱因及其参谋部进行监视，

便于防止他们制造意外事端。

边境的那一边建立了一支类似一九三七年奥地利外籍军团那样的志愿兵团，即“佛朗克苏台德德国人军团”，它的总部设在拜罗伊特附近的顿道夫王宫里。

为了在军事上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当时希特勒需要有一个借口。因此，那些控制苏台德纳粹网的“苏台德德国人检查站”得到指示，从九月初开始组织挑衅活动。

九月十二日，希特勒在九月六日召开的纽伦堡党代会上的演说中十分激烈地攻击捷克斯洛伐克及其总统爱德华·贝奈斯，他控告贝奈斯折磨和压迫德国人。接着在苏台德发生暴动事件。捷克政府由于过去的那种消极行为，因而使得最危险的纳粹组织有可能在它的领土上建立起来。此时，捷克政府进行了反击，逮捕了一批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并宣布紧急法。“我们要回德国老家去！”当汉莱因宣布之后，就和他的助手卡尔·赫尔曼·弗朗克动身前往巴伐利亚。

九月十九日，佛朗克军团分成十二人一组采取行动。在边境地区挑起三百多次冲突，造成许多人伤亡，抓了一千五百多名俘虏，缴获二十五挺机枪和一批轻武器。

在此期间，张伯伦于九月二十二日飞往戈德斯堡浴场。他将参加九月二十六日召开的慕尼黑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墨索里尼、希特勒、张伯伦和达拉第四人决定了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国家没有派代表参加会议)的命运。捷克政府提出了抗议，贝奈斯辞职，但是此事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特别注意；到处可见人们兴高采烈地庆祝最后时刻拯救和平的胜

利。

这段插曲使希特勒明白，法国和英国的情报工作是多么糟糕。他一方面保证，他不再有领土要求，一方面开始准备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要是这种预兆能够早就觉察到那该多好啊！

慕尼黑协定一旦可以“和平地”占领苏台德，汉莱因的佛朗克军团就会听从希姆莱的命令，以便“遵照这位党卫队首脑”的命令去完成任务。

民主党人失去了他们本来可以赢得的决定性的一局。

将军们当中已经成立了一个小规模的反抗小组，这个小组的观点同贝克将军是相同的，军队不能对希特勒的侵略政策负责，因为军队不会坚持去反对这样一个联盟，尤其当欧洲其他国家团结一致反对纳粹继续侵略的时候；希特勒政策的必然结果也许就是德国的全面崩溃和毁灭。密谋集团的成员终于作出了希特勒上台以来许多人一再回避的一项决定：他们想利用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有计划的进攻的机会逮捕希特勒并把他送交法庭。如果这事成功的话，纳粹统治也许早就完蛋了，德国和欧洲的命运也许有了转变。

八月中旬，密谋分子把一名特使、德国旧保守党党员埃瓦尔德·冯·克莱施特派往伦敦。他的任务是向英国政府阐明形势，诱使它们站稳立场。当不属于内阁的丘吉尔拥护密谋分子的计划时，尼维尔·张伯伦首相却依然举棋不定。九月初，第二位使者前往伦敦，这一次是一个退役军官，是谍报局的上校汉斯·奥斯特的朋友。几天以后，第三名谈判者想对英国政府施加影响，他是德国驻伦敦大使馆

参赞西奥多·科尔特。他的保证也不能改变张伯伦和达拉第政府抛弃捷克斯洛伐克的决定。

一九四四年秋，当七月二十日的阴谋失败之后，盖世太保在克莱施特家里发现他在一九三八年八月伦敦之行的有关文件。他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十月二十一日，希特勒向最高统帅部发布“极密”指示，要求确保德国边境的安全，为消灭残存的捷克斯洛伐克和占领默默尔区作好准备。

以前，希特勒可以把他的侵略说成是为了团结被压迫的德国弟兄们。但是此时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土上连少数的德国人也没有了。那就不得不编造一些新的谎言。

当残存的捷克斯洛伐克再一次把八千平方公里的领土出让给波兰和匈牙利之后，年迈的总统艾米尔·哈查的布拉格政府想方设法安抚斯洛伐克人，并慷慨地给予他们在普雷斯堡^①的政府和议会的自治权。然而，这个措施只会助长希特勒继续采取行动。斯洛伐克的极端分子的首领杜尔坎斯基和马赫曾经在柏林同他们一起会晤过，戈林也答应过要给予他们援助，因此，他们在戈林的策动下要求斯洛伐克在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紧紧依靠德国的情况下取得完全独立。为了报答德国对他们的保护，斯洛伐克人应该“解决”犹太人问题，取缔共产党。

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冬天，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两地开始了渗透活动。党卫队和盖世太保控制下的苏台

^① 普雷斯堡，捷克斯洛伐克中南部边境城市，现名为布拉迪斯拉发。
——译者

德德国人纳粹大学生小组对此作出了重大贡献。难怪盖世太保和党卫队可以渗透到捷克的公私机构里。

当德国部队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凌晨出乎意料地开进捷克斯洛伐克的残存领土时，纳粹特务早就安插在那些战略据点上了，他们一面控制警察，一面镇压反抗。布尔诺警察总局就这样迅速落到了他们手里。到处发布命令，禁止销毁警察局的政治档案，保证尽快“清洗”这个国家。随后把纳粹大学生组织中的最合适的成员合并到党卫队中来。此外，盖世太保在布拉格起用了许多人。

德国是用挑衅来进行干预的：实际上，斯洛伐克的内阁与布拉格已经一刀两断，中央政府由于普雷斯堡有计划的反抗被迫撤销内阁。

三月十二日，赛斯-英夸特和比尔克尔派飞机把已撤职的内阁总理约瑟夫·提索神甫接到柏林，两天后提索在受到德国部队即将开进斯洛伐克的威胁下宣告斯洛伐克独立。

为了赶去帮助所谓“被压迫的斯洛伐克的爱国者”，德国部队大批涌进残存的捷克斯洛伐克土地。同一天，希特勒在每日指令中宣告：“捷克斯洛伐克已经不复存在。”第二天，一项公告宣布成立“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德国保护国”，并任命牛赖特为那个不幸国家的“德国保护者”。

三月十五日，希特勒在凯特尔、里宾特洛甫、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的护送下前往布拉格。他周围有一支身强力壮的党卫队警卫队。施伦堡迎合着海德里希报告说，希姆莱兴奋地谈论捷克警察的“优秀人材”，并且立即决定把他们

的人员合并到党卫队来。他马上任命汉莱因的前助手卡尔·赫尔曼·弗朗克为拥有国务秘书头衔的警察局长兼党卫队分队长(中将)。弗朗克在他的新的职务上很快得到了难以想象的暴徒的名声。

捷克人民进入了一个听天由命的黑暗时期。对此要负责任的是成为纳粹特务的背叛分子。保安处和盖世太保之所以能干净利落地完成他们的任务,主要靠这些人的合作。他们被政治激情、权欲和种族狂毒害下的爱国热情所迷惑。多亏这些人的帮助,保安处和盖世太保人员才完成了这项艰巨的工作,才会把这个国家的生命实体挖掘一空,以致仅留下一个躯壳,只要稍许碰它一下就会化为乌有。

那些右派和中间派的保守分子过去也支持过这种行动,想不到现在他们自己却成为它的第一个牺牲者。

随着时间的消逝,纳粹政策的秘密通过一九四五年所缴获到的档案已暴露无遗,今天它一次又一次地证实:希特勒政治上的胜利完全是建立在熟悉人的弱点的基础上的。纳粹政策就是要人们不断地去思索人的胆怯和人的残酷,所以这就是盖世太保这样的一个恐怖组织为什么能占据统治地位的原因。

第三章

披着德国中央保安局外衣的盖世太保

由于希特勒的侵略政策节节获胜，纳粹分子无需考虑改变他们的方法。一九三八年底，希特勒决定消灭波兰。当然，被凡尔赛和约隔离在波兰领土中间的但泽自由市可以用来作为最好的借口。此外，在波兰问题上，希特勒的目的并不在于象过去并吞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那样：波兰应当成为德国的殖民地，应当成为占领“生存空间”的第一阶段。自从纳粹主义产生以来，希特勒对德国人民提出了“争取生存空间”的要求。

波兰面临着即将到来的入侵，因而处境不妙。波兰外长约瑟夫·贝克上校长期来十分同情纳粹独裁者。从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三六年，那个一直以民主方式治理国家的波兰在毕苏斯基元帅的独裁下苟延残喘。在他逝世前不久，他同希特勒德国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追随毕苏斯基的最高政府委员会主张用这项条约来阻碍同民主国家，特别是同捷克斯洛伐克达成协议。更有甚者，波兰参加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肢解，并且把捷克人的领土随同煤矿和二十三万居民占为己有。

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希特勒向应召来总理府参

加讨论的武装部队总司令和参谋总长宣布：“在波兰问题上不要犹豫不决了，而是要有决心在最适当的时刻进攻波兰。”^①

对波兰发起进攻的行动计划称为“白色方案”（对捷克进攻的行动计划称为“绿色方案”）。这个方案制订得精确无误，符合要求。希特勒把九月一日规定为最后的进攻日期。

为了引起冲突事件，希特勒当然想起那个专干坏事的人——海因里希·希姆莱。

他把一手策划的残忍行动委托给海德里希去执行，并为它取了个“希姆莱作战计划”的代号。为了完成这个打击计划，海德里希挑选了党卫队突击队队长阿尔弗雷德·赫尔莫特·瑙约克斯。他是海德里希在基尔时代的朋友，当时海军军官团把海德里希开除了出去；他们两人是在一九三一年就参加党卫队的。当时瑙约克斯在码头工人中作为业余拳击手而闻名，他是前工程大学的学生和机械师，对于巷战和“维持集会秩序”当然很精通。一九三四年海德里希请他加入保安处，一九三九年，他在那里领导当时由党卫队大队长海因兹·约斯特所主持的保安处外事局（以后的第六局）的一个部门。

瑙约克斯领导的这个科室（以后为第六科）负有完全特殊的任务，他在柏林德尔布吕克街的办公室里主管着各个工场，在那里做秘密工作的都是一些绝对可靠的人。几乎可以说，第六科是保安处的技术部门。那里的人为保安处的外国间谍制造任何国籍的伪证件、护照、密码、通行证之类的

^① 希特勒的主任副官施蒙特上校的记录。《纽伦堡文件》79。

东西。战争接近尾声，那里甚至还在印制假纸币。一九四一年，瑙约克斯被调到武装党卫队，因为他敢于议论海德里希的一项命令。即使他到了那里，海德里希还是耿耿于怀，对他进行迫害，他坚持要把瑙约克斯分配在东部战线的的一个战斗兵团里。但是希姆莱的严格指示使他免于调动。希姆莱的指示规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机密人员派往可能落入敌人手中的地方。瑙约克斯调到丹麦和被占领的比利时的经济管理部门之后，于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九日开小差逃到美国人那里去了。看来他不知道，他的名字已列在战犯的名单上。一九四六年，他成功地从德国的一个集中营里逃跑。自从那时以来，他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当海德里希于一九三九年八月十日让他到艾尔布莱希特亲王街来的时候，他仍然是他的心腹。海德里希交给他一项任务，要他虚构一件波兰人袭击格莱维茨电台的边境事件。他说，“外国报纸和德国宣传部门需要掌握波兰对外侵略的真凭实据。”^①

瑙约克斯从保安警察中挑选了六个特别可靠的人，他于八月十五日同他们一起乘车前往格莱维茨。自一九三七年夏天以来，边防警察属于盖世太保领导，所以这次行动可以在绝密情况下畅通无阻地进行。瑙约克斯必须在格莱维茨等候海德里希开始进攻的密写信号。他知道，提供给他进行这次“袭击”的将是穿着波兰制服的德国人。作为导演的海德里希规定，“波兰分遣队”应占领电台，并且要把它“控

^① 瑙约克斯在1945年11月20日的招供。《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31卷，第91页，脚注2751。

制”到有一名说波兰语的德国人通过电台发出愤怒的号召时为止。海德里希说：“在演说词中应当这么说，波兰和德国之间的分歧随时会发生，波兰人应当团结起来镇压每一个反抗他们的德国人。”^①

直接受最高统帅部领导的谍报局承担给那些伪装的士兵提供制服、武器和军人证的任务。希姆莱不仅要求真的波兰制服和武器，而且要求真的波兰证件，虽然璫约克斯的工场可以毫无困难地制造完全伪造的文件。

谍报局首脑威廉·卡纳里斯海军上将企图阻止这个作战计划或者至少他的情报处不参加这次行动，但是办不到，因为凯特尔已经同意这项计划，所以他只好袖手旁观。海德里希委托党卫队大队长梅尔霍恩去协调分配到各部门中去的任务。

分配角色的目的是要加强保密观念和分散责任。奈比是刑事警察的首脑，受海德里希的领导。他在五月份曾经向最高统帅部申请给他设法弄到波兰的制服，他打算拍摄一部原原本本地叙述袭击波兰人的影片。这次又向最高统帅部提出了同样的愿望，当然，在那里要求波兰的真武器，尤其要求真的波兰身份证几乎是不会引起任何怀疑的，因为这是准备拍电影用的，而不是想干别的什么。

八月底，还一直在格莱维茨等待海德里希信号的璫约克斯被召到奥普林，缪勒和梅尔霍恩希望在那里同他讨论作战计划的最后细节问题。海德里希委托盖世太保首脑缪勒设法去搞到最重要的“材料”，海德里希给这种“材料”取

^① 璫约克斯在1945年11月20日的招供。

了一个具有特色的代号“罐头食品”。这些“罐头食品”就是缪勒从集中营里带来的十二个被判刑的囚犯。

瑙约克斯作为证人在纽伦堡供认：

“缪勒说，他大约有十二个或十三个被判过刑的犯人，他们应该穿着波兰制服，让他们的尸体躺在出事地点，这样可以说明他们是在进攻时被打死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海德里希雇用了一名医生，由他给这些人打上一支死亡针；然后再给他们补上几枪。当这次袭击结束之后，新闻记者和其他人士被领到现场。接着写了一份警务报告。缪勒告诉我，他接到海德里希的命令，给我提供其中的一名罪犯，以便我在格莱维茨进行活动。”^①

一切细节都考虑得有条不紊：“八月三十一日中午，我通过电话从海德里希那里得到暗号，袭击必须在当天晚上八点钟进行。海德里希说：‘为了进行这次袭击，您到缪勒那里去报到，问问这些罐头食品的情况。’我这样做了，并且指示缪勒，把广播电台附近的这个人交给我……他虽然活着，但毫无知觉。我设法翻开他的眼睛。我不能从他的眼睛里，而只能从他的呼吸中断定他还活着。”^②

缪勒对那些将被杀害的判刑者保证说，由于他们为了祖国参加这次行动，因而应该受到赦免和释放。

“进攻”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根据规定，通过一架辅助电台用波兰语播送三、四分钟的、由海德里希撰写的消息，然后，瑙约克斯和他的人员撤回，让这些“罐头食品”躺在指

① 瑙约克斯在1945年11月20日的招供。

② 同上。

定地点。

第二天九月一日，当德国部队破晓后进驻波兰领土时，希特勒控告波兰人进攻德国，从而发动了这场战争。他列举波兰多次“侵犯边境”（自从八月二十三日以来，德国人把他们的挑衅次数增加了数倍），而且也提到了那次格莱维茨事件：“今天夜里，波兰首次动用正规部队对我国领土开枪射击。”^①

里宾特洛甫通过无线电把公报告诉德国大使馆，公报中说，国防军被迫转入进攻，以“回击”波兰的入侵，这是最高统帅部在报告里常用的一种惯用语。德国报纸和某些外国报纸报道了入侵格莱维茨电台的事件。在知道该事真相之前，六年已经过去。在谈到瑙约克斯挑选出来参加这次行动的那些人员时，党卫队突击队中队长比尔克尔说，除瑙约克斯外，他们全部被“消灭”了。

纳粹分子还是经常用这种方式行事，他们蔑视国际准则，利用敌人的制服和武器。最后一次的特殊例子就是“狮鹫作战计划”，这是奥托·斯科尔兹内的一次分遣队活动，旨在支援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失败的伦斯德的阿登入侵。作战计划的目的是给后方的美国部队在调兵遣将时制造混乱。三千多名党卫队员穿着美国制服，配备谢尔曼中型坦克、真正的美国卡车和吉普车深入到战场的纵深地带，从而完成了最大胆的破坏活动。

虽然“希姆莱作战计划”是党卫队组织和国防军之间第一个十分复杂的实例，但是根据最高统帅部的命令谍报局

^① 纳粹德国通讯社，1939年9月1日。

还是参加了进去。

九月三日，希特勒亲临前线。当德国军队迅速占领波兰土地之后，波兰政府于九月六日从华沙撤退到卢布林。三列专车穿过卡托维兹边境，向索波特北面奔驰而去。第一列专车载着希特勒总部的人员，第二列是戈林专车，第三列取名为“海因里希”，是希姆莱的专车。

立即乘车前往波兰的希姆莱正象过去在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那样第一个到达目的地。他一直由他的贴身副官，大队长沃尔夫陪同参加所有重要的会谈，并且准备在占领区使用党卫队。他管辖的每一个局都派遣一名代表到他那里去参加会议。尤其是保安处“国内反间谍”部门的那个年轻首脑瓦尔特·施伦堡也已到达。海德里希曾经委托他同军方谈判有关在靠近前线的后方地区使用希姆莱人员的事情。盖世太保和保安处的特别队在最初几次发动大规模进攻之前就侵入了这个国家，“目的是要确保后方地区的安全”，主要是执行希姆莱长期来反对波兰人民，从而一举“解决波兰问题”的措施。

由盖世太保和保安处人员组成的“特别行动队”分成几个“特遣队”，它们没有同国防军领导签订任何书面协定。希特勒命令对波兰进行“政治清洗”。将军们知道，这样一项命令会导致无法无天。九月十二日，里宾特洛甫在凯特尔总部向希特勒递交关于“解决波兰问题”的最新指示。此后，除了其他挑衅之外，有人策划搞了一次乌克兰少数民族的“起义”，这次起义使党卫队找到了屠杀那里犹太人和波兰人的借口。将军们感到惊骇，凯特尔把指示转交给了卡

纳里斯，想不到卡纳里斯向他提出责备。当发生意见分歧时，他大声疾呼，有些将军同意他的看法：“世人，首先是国防军要对这些暴行负责，因为这些事情是在他们的眼睛底下发生的！”^①在将军们的压力下，凯特尔和勃劳希契向希特勒报告说，他们愿意在后方使用希姆莱的特遣队；部队对后方地区可以作出充分的安全保证，但是对特遣队的活动概不负责。

令人惊讶的是希特勒承认他们是对的。事隔不久，他又维持原来的决定，并指示凯特尔：陆军必须同意部队编制外的党卫队和保安警察独立行动。凯特尔象往常一样立即表示服从并通知卡纳里斯，希望他对事态的继续发展不要施加影响，因为这是元首的命令。他就是这样把消灭波兰各阶层居民（知识分子、贵族、神父，当然还有犹太人）的事情掩盖了起来。前三种人被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看作是危险的，因为他们在思想上容易感受，并有能力单独组织一个内部抵抗运动。这对于一个被剥夺了精神和道德的民众来说是非常难以做到的，当然也不是说完全不可能。就波兰犹太人而言，消灭他们的命令等于是“最后解决”的开始。

将军们再次提出了强烈的抗议。约翰内斯·冯·勃拉斯科维兹上将在波兰指挥军队，敌对行动结束后留任军事行政长官，他向希特勒提交一份措辞尖锐的意见书，狠狠地批评了党卫队和特遣队的暴行。这一切使希特勒大发雷霆。这些困难给他和希姆莱造成的后果是，在对苏俄开战前最

^① 1946年1月21日，埃尔温·拉豪森将军在纽伦堡的证词。他在波兰战役期间记下卡纳里斯的日记。

高统帅部和希姆莱之间达成了一项关于使用特别行动队的书面协议。据说，在那次进攻苏俄的战役中，党卫队特遣队的恐怖行动大大超过了在波兰所犯的暴行。

一九三九年九月，敢于提出抗议的将军并不多。卡纳里斯、勃拉斯科维兹，在某种情况下还有勃劳希契，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触动了凯特尔，但是他们的努力很快就失效了。

整个武装部队是赞成和支持希特勒的。一九三九年秋，陆军将领们在纳粹国家占据重要的地位。他们在波兰获得了闪电式的战功，准备同西方的民主对着干。国内的一些将军在军事经济部门担任要职。看来，扩大作战地区和活动范围是给予他们一种不平常的独立性，使他们能够脱离党的保护，脱离保安处和盖世太保的控制。

希姆莱和盖世太保面对着将给他们带来危险的这种发展形势持何种态度呢？

限制军人的自治权已经采取了预防措施。根据希姆莱的要求，面对各种演习，武装部队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占领区从来不拥有警察的指挥权。如同在奥地利那样，希姆莱立即在捷克斯洛伐克接管了这种权力。在波兰，直到军队赢得胜利，那些纯军事行动结束以后方才完全接管这种权力。

希姆莱的“大胆革新”就是把保安处和盖世太保的特务分别组成几个特遣队，让他们在军事行动期间而且直接在战斗部队后面以小股形式出现。盖世太保和保安处这两个主要组织的特务采取联合行动，表明他们在完成联合行动

这方面有了一个重要的变革。^①

自从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七日由希姆莱担任德国警察首脑以来，它的组织已经进行了多次改组。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八日作出规定，从十月一日起，各邦的政治警察均命名为“国家秘密警察”，即盖世太保，而地方当局命名为“国家警察”。这种统一命名和无形中所包含的从属关系使进行了三年的一体化得以充实。九月二十日，一份通报——这一次由德国内政部长弗立克（一个挂名的警察部长）签署——中规定，各邦的盖世太保首脑应置于柏林盖世太保总部的监督之下。

为了使恐怖工具更加发挥作用，为了加速对德国居民的镇压，弗立克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五日把采取保护性拘留的提议和权力交给盖世太保。在此之前，盖世太保所作出的决定一定要通过内政部批准。可是从这时起，连这种微小的、最后的控制也没有了。“保护性拘留，”弗立克的指示中这么说，“在秘密警察看来是一种强制性的措施，目的是要防御所有敌视人民和国家的人，这些人由于他们的行为而危害了人民和国家的生存和安全。”^②

保护性拘留的规章没有经过任何人的讨论。它也不是由哪个行政当局或法律当局所规定的，而且不准法庭干涉盖世太保的内部事务。为了使被害人自己心中明白，在逮捕令的上端作了附注：“被捕者对所宣布的保护性拘留无权

^① 建立这些特遣队也是为了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但是它们有着其他的任务，而且一俟在布拉格建立保安警察之后，它们就被解散了。

^② 《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 27 卷，第 496 页，脚注 1723。

提出抗议。”^①里面列举了一些理由。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只写几句话。例如：“有损害国家活动的嫌疑”或者“有帮助逃兵的重大嫌疑”或者“因为与一名流亡者有亲属关系，如果放任自流，他就会利用一切机会来危害帝国”。

此外，弗立克在一月二十五日的法令和九月十四日的指示中要求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组织同盖世太保进行合作。

盖世太保就这样无限制地并终于牢固地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所有与它保持密切关系的干部都成了德国官员。从此以后，海德里希手下遍及整个德国的局包括：

五十七个盖世太保地方局，分为：二十一个国家警察分局，三十六个国家警察所。

一九三六年以来同盖世太保一起组成保安警察的刑事警察拥有：

六十六个地方局，分为：二十个刑事警察分局，四十六个刑事警察所。

海德里希领导全局。因此他感到由衷的满意。虽然他已经是国家保安警察的首脑，但还一直领导着他原来的党卫队组织。至于党卫队保安处，尽管他作了努力，保安处仍然是党的一个机构，这一点使他对有些行政部门不满。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终于颁布了一项法令，它使保安处成为党和国家的情报局。保安处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国家保安警察（国家保安警察 = 盖世太保 + 刑事警察）。但是保安处

^① 根据对工会会员西蒙发布的保护性拘留令，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文件》脚注 2330。

以英国情报局为模式，它在海德里希的严密控制下，与其说是一个警察辅助机构，倒不如说已经成为一个政治情报处，或一个谍报处。

战争爆发时，保安处是国家的情报处，始终是党的一个机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最后。保安处尽管受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的统一领导，但是同希姆莱的其他部门分工不同，因而不断招来麻烦。在部署混合特遣队出征波兰时，这些困难已暴露出来了。因此，希姆莱决定在夏天重新组织这个整体。这样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作出规定，成立“德国中央保安局”（RSHA）。希姆莱把他的一些主要部门重新分为“局”，置于它的领导范围内，这样刑事警察的所有部门同政治警察一样出现了联合的局面。这项措施的最终结果是，党卫队总部进一步加强对全体警察的控制权，因为德国中央保安局从成立起就是德国内政部的一个政府机构，是党卫队最高领导的一个主要机构。这种双重的从属关系——一种完全符合纳粹风格的烦琐的行政部门——通过统一指挥得到了加强。保安处和盖世太保的第一法律顾问卡尔·瓦尔纳·贝斯特博士费力地用一句非法律的行话解释各部门间的联合：

“党卫队和警察不仅在组织机构上，而且在发挥作用方面都组成了一个整体。它们下属的各个部门不会失去各自的专业性，从另外的观点来看，也不会失去在党政机关这个更大的统一体中安插各自力量的机会。”^①

^① 《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 29 卷，第 24 页，脚注 1852。

同时在九月二十七日，这些局的头头得到了任命书。海德里希成为德国中央保安局的首脑。

真正从法律上来看，这种合并是愚蠢的。“德国中央保安局”这个名称只是一种伪装形式，它可以使众所周知的“盖世太保”这个名字消失掉。出于同样原因，那些依附于德国中央保安局的特务和干部（不管他们属于盖世太保还是属于刑事警察）都佩戴着“保安处”的臂章。保安处的证章只表明，当事人属于党卫队保安处特别队队员，与党卫队结为整体的德国中央保安局的人员大体上都参加这个特别队。

德国中央保安局是一部庞大的警察机器，建立这个机构的目的是发现敌人的活动，摸清情况，然后向那个统治者党卫队首脑海因里希·希姆莱报告。接着，这部机器把统治者最小的要求逐级传达下去，把他的命令传达到纳粹世界最偏僻的角落，并保证迅速执行命令。

事实上，德国中央保安局只不过是一个相当臃肿的机构。过细的专业分类和保密条例强加在局和处之间，使他们相互隔绝，发挥不出效能。另外，情报处和执行机构之间的隔阂，以及经过许多层次才能到达上级去的这条漫长的道路致使他们所利用的材料有时往往失真。这些特别队必须从各部门送上来的一大批情报中去伪存真，编成综合性的集子，由于特别队人员往往都是由脱离现实的官僚主义者所组成，所以手中的报告内容在送到上级去的途中一再失去生命力，到达首脑人物手中的只是内容空洞的综合报告，往往同现实不相符合。对警察工作持官僚主义观点是许多

错误的根源，甚至是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的最可怕根源。而国家中央保安局组织的“完美性”自相矛盾，恰好成为它失败的原因。

由于国家中央保安局组织的多样化，因此有必要对所有在那里工作的特务进行特殊训练。一九四〇年五月十八日，海德里希规定，每个参加国家中央保安局的年轻特务必须在各个局工作一段时间。新提升的党卫队员或者参加过法律学考试的大学生首先要在刑事警察部门工作四个月，熟悉警察业务的基本知识和初步的刑事学概念。接着在保安处和盖世太保分别工作三个月。这样他才能了解正在开展活动的一些局的工作全貌，并且知道邻近的局当时在想些什么。最后根据他个人的才能和工作需要被分配在国家中央保安局七个局中的一个局工作。

盖世太保被编为第四局。

国家中央保安局把它的活动范围扩大到被占领和被并吞的国家。在那里建立的分支机构从小范围来看，都是总部各局的翻版。在这方面盖世太保几乎闻名于整个欧洲。

盖世太保获得这样一种听来令人发抖的名声决不是偶然的。它的这种名声远远超出国家中央保安局的其他机构和实际上不出名的国家中央保安局本身^①。盖世太保是整个纳粹政权唯一的执行工具，是该政权中的最可怕的主要机构，是其他部件环绕它旋转的机器轴心。只有在盖世太保内部，文件的加工、各种情报的收集和评价以及对其他局进

^① 国家中央保安局所在地在艾尔布莱希特亲王街八号，盖世太保的办公室。

行“科学”和“有计划”的调研才有其意义和目的。那里不断地变换着统计数字和别的地方送来的一大批人的花名册，那些人象野兽一样遭到追逐、吊打、虐待、奴役或消灭。如果说盖世太保这四个字沾满的血泪比人类历史上所有其他的名字多，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一九四四年春，盖世太保活动最为猖獗，它在国外拥有二十五个分局，六十五个所以及三百个分局中的“天线”和八百五十名边防警察局的警官。恩斯特·卡尔登勃鲁纳任国家中央保安局首脑海德里希的继承人直至战后为止。他在纽伦堡诉讼中供认，盖世太保在一九四四年底大约有三万五千至四万名“固定”成员，不过有人控告说，据一份比较全面的人数分配材料来看，它本来的人员为四万五千至五万个。^①这个数字看来是正确的。因为盖世太保在一九四四年下半年曾经吸收了一定数量的人员，他们在此以前参加其他组织的分支机构。

早在国家中央保安局成立的时候，盖世太保就把保安处的某些部门占为己有。缪勒在海德里希和希姆莱的支持下推行这种政策。一九四一年底和一九四二年初，缪勒力求把他的特务活动范围扩大到没有被占领的外国领土，并且对保安处外事局的权力提出要求。虽然他的计划失败了，但是有权直接同在国外的官方或秘密的“警察专员”通信，向他们索取情报，而且不通过第六局（保安处外事局）的媒

^① 这些数字既不包括自愿的或者领取报酬的间谍，也不包括在占领国中招募来的“辅助人员”。此外，还必须把盖世太保特务所经办的各种团体的重要性考虑进去。

介向他们发布指示。

为了保证自己的优势和控制权，盖世太保在战争爆发时把必要的干部提供给新成立的、由最高统帅部领导的秘密战地警察(GFP)。之后，当五千名秘密战地警察被分配给盖世太保的时候，海德里希可能依靠那些老人员的帮助，机敏地吸收了被占领国的秘密战地警察。这样一来，“原来”的盖世太保队员的数字就提高到三万五千人。

一九四四年十月一日，希姆莱发布命令，把属于德国内政部领导的保护关卡边境的官员置于盖世太保的领导之下。^①

边防警察早就被吞并了。“没收”税吏只是盖世太保首脑“渴望攫取”行政权的一个先例，接管谍报局的一个部门（军事情报处）倒是一个重要的步骤，如果纳粹政权不在几个月之后崩溃的话，那么这个步骤今后很有可能继续进行下去。这种合并标志着纳粹为谋取特权而对谍报局进行斗争的结束。

希姆莱为了设法控制他手下的每一个特务，于一九四〇年初特别动用了全部德国警察继续作战，并且把他们置于党卫队的管辖之下。这样做可以使任何一名警官今后避开法庭在预审时所作出的正式判决。事后，这些案件完全由党卫队领导的一个特别机构负责。通过这种方式，任何从外部来的控制都失去效力，希姆莱可以以党卫队首脑的

^① 五万四千名保护关卡的边境人员，其中有一半人的工资继续由财政部支付。战争结束前几天他们重新归部里领导。盖世太保认为，他们实际上不起作用。

名义在他的管辖范围内为所欲为：任意决定调查或不调查，中途停止调查，对判决施加影响，取消判决，禁止执行判决，赦免或严惩犯人。一九四〇年初，希姆莱在六年前锻造的那件可怕的工具因此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多亏这场战争它才找到一个它所合适的活动地盘。

第 四 部

战争中的盖世太保

(一九四〇年)

第一章

在波兰

一九四一年底至一九四二年初的冬天，当党卫队部队准备“扫荡”已占领的苏联领土，消灭大量居民时，希姆莱对贴身警卫团作了简短的讲话，决定“再次提高他们的士气”，因为他们的士气由于大量的恐怖行为开始低落。

“武装党卫队队员经常自言自语地说，当我今天一想到这些事，我就似乎觉得在光天化日之下目睹治安警察在你们这些人的支持下犯下了使人难以忍受的罪行，把一些人带到这里来是否有必要。在零下四十度的气温下，波兰也发生同样的事，我们不得不把成千上万的人，甚至几十万人押送出去，我们必须在那里——你们听到过这种事情，但是你们很快又把它忘记了——无情地枪毙成千名波兰领导人。”^①

波兰曾经是纳粹暴行的试验地。这个由城市和乡村组成的不幸的“大行政区”处在残酷的汉斯·弗朗克的统治之下，那儿的暴行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体系。不久，整个欧洲也因此遭受了重大损失。

^① 1940年9月7日，希姆莱在“梅茨节”的晚会上发表的讲话。《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29卷，第283页，脚注1918。

一九三九年十月七日，波兰战役结束。时过不久，希特勒在一项由戈林和凯特尔共同署名的法令中任命希姆莱为“加强德意志民族委员会的帝国委员”，并委托他去完成波兰“日耳曼化”的任务。

根据这项法令，希姆莱要把沃尔希尼和巴尔的库姆两地的“日耳曼族人”（根据莫斯科条约，这两个地方已经纳入俄国势力范围）迁移到德国来，另一方面要消除给德国和日耳曼大家庭造成危害的外国侨民的“灾难性影响”以及把人烟稀少的地区变为新的德国殖民地。由于希姆莱可以完全不受约束地为所欲为，因此很快实现了这项带有普遍性的指示：

“我们的任务不是用旧观念使东方日耳曼化，就是说，不是给住在那里的人讲授德语和德国法律，而是去关心住在东方的真正具有德国血统和日耳曼血统的人。”^①

为了加速这种完全新型式的“日耳曼化”，希姆莱命令采取适当措施，“阻止危险分子进一步渗透到波兰的知识分子阶层中去”^②，同时希姆莱让人把失去男人的波兰寡妇许配给德国人，并且冷冰冰地说道：“德国东部必须达到的最主要的目的是，清洗进入东部地区的外国侨民。”这样就可以从“杂种”中挑选出优秀的种族类型，保存了日耳曼化。“我认为，我们的任务是收养他们的孩子，不让他们接近周围的人，如果我们去抢或去偷走他们……我们获得的要么是可

^① 希姆莱：《德国劳动》，柏林，1942年出版。《国际军事法庭文件》脚注2915。

^② 希姆莱在1940年发布的命令。《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31卷，第283页，脚注2916。

以使用的好血统,把它安排在我们这儿,要么,我的先生们,他们会说这是残酷的,但自然界毕竟是残酷的,我们就消灭这种血统。”^①

波兰人和犹太人就这样眼看着他们自己的财产、房屋、财物、耕地被掠夺一空。那些被剥夺者,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可疑的危险的敌人,一概被送进集中营,在比较恶劣的情况下一些人被送往德国军工厂或当作农业工人使用,他们象强盗占有的奴隶一样在德国人的土地上强制劳动。

一九四〇年九月十二日,希姆莱通过法令实施“种族登记表”。登记表上必须填写:“1.积极投入到民众斗争中去的日耳曼族人……2.日耳曼族人虽然没有积极投身于德国文化,但是却保护了自己的德国文化;3.几年来同意和波兰国民保持联系的日耳曼族人……4.在政治上献身于波兰文化的日耳曼后裔(叛徒)。”^②必须通过“再改造”使这些“叛徒”重新归化为“日耳曼人”。谁反对这样做或者拒绝填写“种族登记表”,有人就会向盖世太保通风报信,把他送进集中营。

所有旨在“日耳曼化”和殖民地化的措施都委托给德国中央保安局首脑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去办理。德国中央保安局布置和办理征收、撤退以及把流放者运往德国,把日耳曼族的殖民者运往已经“解放了的”前德国东部省或者“大行政区”^③。

① 1943年10月14日,希姆莱在沙亨浴场的讲话。《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37卷,第517页。

② 《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31卷,第292页,脚注2916。

③ 1939年10月8日,希特勒把波兰西部四省并入德国,并于10月12日把在莫斯科瓜分时归于德国人的残存波兰领土宣布为“波兰大行政区”。

“哪里发现犹太人，我们就必须在那里消灭他们，”汉斯·弗朗克“总督”说道。为此，一九四〇年六月，奥斯威辛“灭绝营”在克拉考附近的一处肮脏的沼泽地带建立。这以后的五年时间里，数百万犹太人被杀害在那里。

不久，又建立了两个集中营：马伊达内克和特雷布林卡。特雷布林卡为建立绝灭营起了示范作用。

一年以后，德国中央保安局根据希姆莱的指示从被德国吞并的波兰领土上驱赶了一百五十万波兰农民和犹太人，把他们打发到大行政区去，他们在那里的处境真是难以忍受。一九四三年底，没收了七十万二千七百六十处地产，总共六百三十六万七千九百七十一公顷土地。这个数字中还不包括设立在但泽、东普鲁士、波森和西里西亚的公务机关所没收的土地。有关这方面的数字报告已经找到。将近五万个日耳曼族人（占被剥夺家产的波兰人的三分之一）已迁移到那里。日耳曼族人中转站成立了一个由希姆莱领导的新部门，它作为移民总局参加迁移活动。

被劫持到德国去的波兰人受到了奴隶般的虐待。希姆莱第一次把他关于未来帝国的理论运用于实践。

波兰农业工人必须服从一项列有十五个条文的章程，其中第一条规定：“波兰籍的农业工人原则上不享有申诉权，也不允许任何部门录用他们。”^①波兰奴隶横遭他们“主子”的独裁统治，他们没有权利离开自己的工作地点。冬天，他们从晚上八点钟到翌晨六点钟，夏天从晚上九点钟到翌

^① 1941年3月6日，巴登全体农民的通函。《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36卷，第133页。

以在这个神经中枢里得到满足，从欧洲最遥远的地点送来的情报就汇集在这里，然后再向上述地点发号施令。办公室、卡片索引、窃听中心、电台中心、实验室、档案室：这一切已经发展到了使艾尔布莱希特亲王街的门窗架挤坏，因而不得不向柏林其他地方发展，当时仅在柏林一地就有许多局被安置在这三十八幢大楼里。

当所有这些大楼不同程度地受到空袭的严重破坏以后，希姆莱进行了革新。在库菲斯滕丹大街一百十六号里的那些最重要的局的头目们，天天聚在一起用早餐。艾希曼的办公室也设在那条街上。坐在桌子旁的是些使欧洲为之颤抖的人物。卡尔登勃鲁纳热情地接待艾希曼。他们出生于同一个地方，有着某些方面的共同关系。他总是抓住机会，对他所熟悉的、住在林茨的艾希曼一家问长问短，或者问问孩子们在学校里学得怎么样，亲爱的、年迈的祖父母贵体可佳，以及这个小天地的兴隆情况。两人间的这种相互问候、相互亲切的关怀与在同一天早晨，用上一笔之力就决定了数千名不幸者的命运，或者在早宴后，说上一句话，或者签上一个字就可以把欧洲另一端的成千上万个殉难者判处死刑相比显得自相矛盾，其实从纳粹教条的观点看来是不矛盾的。

希姆莱尽可能多地参加这种早宴。他认为，这样的早餐碰头会是重新鼓舞他助手振作士气的好机会，因为他们眼看东线战事节节败退，或者由于最近英美对德国空袭增加，因而有时动摇起来。在这些碰头会上，气氛总是很乐观、很诚恳，虽然原则上不许谈论工作，但是也经常发生这

用于男人的规定也适用于这样一些可怜的人：“东部来的女管家除料理家务之外，随身必须始终带着劳动卡，用它来代替身份证。”^①

有人说，这是一种“奴隶身份”的标记，这并不夸张，人们倒是有点儿不好意思把一个显然有着古老文化国家的有道德的公民德国“雇主”所执行的规章制度宣扬出去，正是这些规章制度把其他人无条件地交给了他们。七年的纳粹统治使一些难以置信的事情得以存在。当然在这条道路上德国大工业家还要走得更远一点。

盖世太保对执行这部新法典关心备至。当几十万成年男女陷入经济和道德困境的深渊，几万名儿童遭受更加悲惨的命运时（有些劳动营让几乎是裸体的、营养不良的十岁儿童拉重车子，扛重东西），盖世太保的阴影始终笼罩着这群不幸者。

盖世太保在波兰作出了如此“出色的工作”，致使弗朗克在一九四〇年二月六日《人民观察家报》发表的一篇记者谈话中可以嘲弄一下他在布拉格的那位同伴“保护德国贸易主义者”牛赖特的那些恐怖措施。牛赖特曾经把绞死七个捷克大学生的红色布告张贴在捷克人住的所有乡镇。“如果我每次为了枪毙七个波兰人而去张贴一份布告，”弗朗克讥笑地说，“那么，波兰的森林将不够为这些布告制造纸张了。”^②

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五日，弗朗克发出预告，他将放逐

^① 沙克尔的规定。《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3卷，第506页。

^② 1940年2月6日弗朗克对《人民观察家报》记者的谈话。《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29卷，第461页，脚注2233。

一百万波兰工人。为了完成这项计划，盖世太保进行了搜捕。他们获得了很大的成就，一九四二年八月被放逐的波兰工人达到了八十万。

一九四〇年五月十日，世界开始把对波兰的注意力转移到西方，转移到正在向荷兰、比利时和法国挺进的德国军队。汉斯·弗朗克写道，我们必须“利用国际上集中对西线发生的兴趣来消灭数以千计的波兰人，尤其是消灭波兰知识界的主要代表”。

这件事早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就已作出决定。但是为了不让外国人找到谴责的论点，他们等待着有利时机，而且还挖空心思地想事先搞到几个过硬的借口。

五月中旬，弗朗克在同他的国务秘书约瑟夫·贝勒和赛斯-英夸特的一次谈话中对这次“特别抚慰行动”——又称“A-B行动”——的细节作了规定。这次行动的借口是结束为部队安全所作的危险性的宣传。希特勒常常凭借自己天才的“直观能力”，早在八个月以前就预料到了这种形势，为了改变这种形势，他当时就对所要做的事情作出了决定……

“A-B行动”完全由在波兰的德国中央保安局的代表去完成。他们是：党卫队大队长兼警察首脑弗里德里希·克吕格尔和党卫队队长兼警长布鲁诺·施特雷肯巴赫，人事局、第一局、德国中央保安局的头目和海德里希的代表。他们的人员通过专程从德国派来的党卫队而得到加强。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初，盖世太保逮捕了克拉考^①大学

^① 克拉考是波兰南部的一个城市，现名为克拉科夫。——译者

的教授。他们被带到德国内地的一个集中营里。在A-B行动中，要消灭的人员数字太大，把他们送到德国去，困难太多，比做任何事情都要来得麻烦。因此，决定从简办事。“我们不需要把这些人先押送到德国的集中营去，”弗朗克在一九四〇年五月三十日同克吕格尔和施特雷肯巴赫的一次谈话中说道，“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会遇到麻烦，就会同家属发生不必要的通信联系……因此，我们将用最简便的方式办事。”^①

接着党卫队开始大逮捕并进行窜改原词的审理。整个事件听任盖世太保独断独行。五月三十日，弗朗克向警察下达他最后的指示：

“如果法院企图干涉警察协助采取的A-B行动，这应看作是对国家和德国利益的背叛……我这里成立的大赦委员会与这些事情丝毫无关。A-B行动完全由党卫队队长兼警长克吕格尔及其机构执行。这纯粹是一种内部的抚慰行动，这样的行动是必要的，是在正常诉讼范围之外的。”^②

波兰的知识分子就这样在不经过正式诉讼和得不到任何可能赦免的情况下被盖世太保和党卫队“消灭”。施特雷肯巴赫在办完一切事情之后，趁机飞回柏林，去料理他的日常行政工作。当时为他举行了一次小型告别宴会，会上弗朗克在简短的、动人的演说里为共同作出的优异成绩向他表示感谢和祝贺。演说里有这样一段骇人的话：

“施特雷肯巴赫队长，你和你的部下在大行政区里所做

^{①②} 摘自弗朗克日记。《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12卷，第45页，脚注2233。

的事情是不会被人遗忘的。因此，你不必对此感到羞愧。”^①

此后盖世太保扩大了他们的权力。弗朗克在一九四三年十月二日签署的一项法令使盖世太保给那些最卑鄙的行径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当时已经有一万七千多个作为人质的波兰人，他们在没有经过任何诉讼的情况下被枪决了。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五日，弗朗克当着党卫队的面对这件事作了如下的辩护：“当我们听到枪决人数有一万七千名时，我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这些被毙者同样也是战争的牺牲品。”^②但是“外国宣传”围绕着人质被枪杀一事大叫大嚷，因此必须找出一条克服这种困境的途径。他们不改变方法，而是干脆从词汇表中正式删去“人质”这个单词，通过完全由盖世太保成员组成的“军事法庭”十月二日发布的一项规定去杀人，从而使杀人合法化。法令第四条规定：“保安警察的军事法庭由保安警察和情报处的一名党卫队长和两名该部门的成员组成。”^③另外，第八条规定：“保安警察军事法庭所作出的判决可以立即执行。”

盖世太保用这种方法可以非常迅速地采取行动。他们对那些反对现政权的人进行追踪、逮捕、判刑和处死。所有这一切都不必经过其他局的任何监督。在该规定发布以后，判处和枪毙了几百名关在克拉科夫监狱里的波兰人。

当盖世太保和保安处指使人在波兰野蛮地进行恐怖行

① 《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12卷，第48页。

② 《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19卷，第685页。

③ “禁止对大行政区内的德国建设工程进行破坏的规定”，1943年10月2日，1943年大行政区的规定法。《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7卷，第520页。

动时，海德里希没有疏忽他部门中的其他任务。

在准备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际，陆军某些人士的不安心情并没有逃过保安处无数侦探的眼睛。

保安处从克莱施特在一九三八年八月去伦敦的旅行中得到了风声，但是不能确定这位搞阴谋的特使是谁，也不能确定他的详细任务是什么。但是希姆莱的参谋部里却有人知道，这位密使带来了丘吉尔的一封信，其他的调查报告还没有送来。在一九三九年八月准备袭击波兰的同时，那些将军们重新发起进攻，当然他们不会漫无目的地行动。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决定，彻底研究这件事，调查这个潜在的反对派和英国情报部门之间可能有什么联系。由于调查工作在德国毫无进展，因此决定采取另一种方法，首先从英国人那里着手。

为了执行这项任务，希姆莱和海德里希挑选了保安处的两个“希望”人物，两个非常有天才的年轻人瓦尔特·施伦堡和赫尔穆斯·克诺亨。这两个人属于不能用金钱换来幸福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党花了很大力气使他们有所造诣。海德里希有权这么说，他为了同英国人取得直接联系需要一些彬彬有礼的人，他们能说一口正确的，甚至是道地的英语，而且能够在谈话中避免英国设置的圈套。冒险活动的结果证明他选择得多么出色。

年轻的克诺亨恰好分配在德国中央保安局第六局，即保安处外事局。他受委托在国外建立新的情报网。他努力去发掘流亡者，这些人因处境困难无意干“有利可图”的事。克诺亨了解这种社会环境，因为他从前就是研究这种社会

环境，监督流亡者和他们发行的刊物的。他用这种方法招募一个在巴黎穷极潦倒的国民经济学家，名叫弗朗兹·费歇尔的博士。费歇尔从此成为保安处在荷兰的特务，也许他是应保安处的要求才定居在那里的。他在荷兰可以同英国各界人士交往，不久又同谍报局的间谍取得联系，这些间谍想在德国流亡者当中刺探情报，获取资料。据说陆军统帅部的将军和军官中间成立了抵抗组织，克诺亨派费歇尔到边境去，要求他向英国人建议同这个组织的一个成员会晤。

十月中旬，费歇尔成功地使英国人愿意同抵抗人士保持联系。波兰之战实际上已经结束，同盟国希望在西部立即发动一场进攻。因此，任何有关德国陆军领导中可能出现裂缝的情报对他们说来如获至宝。英国谍报局不知道，费歇尔是一个“双重间谍”，受杜塞多尔夫保安处的控制。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施伦堡就来接替克诺亨，这是他们第一次的直接接触。

号称“心腹”的费歇尔为十月二十一日在荷兰小城市苏特凡安排了第一次“碰头会”。施伦堡给自己取了一个在最高统帅部运输科里工作的夏梅尔上尉的名字。事实上确有其人。英国谍报局的间谍对他们手中拥有的德国军队的军官名单了如指掌。但是为了谨慎起见，已经把真夏梅尔派往东部接受一项任务。化名为夏梅尔的施伦堡成功地骗取了前来会晤的三名间谍史蒂文斯少校、佩恩上尉和科彭斯少尉的信任。这四个人经常在荷兰会面，施伦堡甚至还陪同英国人去阿纳姆和海牙。

施伦堡在他越过边境的一次旅程中由一位令人尊敬的

先生陪同，他在给人介绍这位先生的时候，说他是武装部队抵抗小组的有领导地位的将军。这位“将军”受过教育，举止高雅，是一个出色的健谈者，他给英国间谍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施伦堡把这个困难的角色委托给一位“业余爱好者”，一位有名望的柏林精神病专家德·克里尼博士医生。

当时甚至慎重地派了一架飞机护送专机飞往伦敦。施伦堡在去荷兰的旅程中每次从杜塞多尔夫驻地向柏林汇报行动的进程。十月三十一日，假夏梅尔在海牙得到一架无线电收发报机，以便可以同英国谍报局的间谍不断保持联系。此外，他还得到一张特别证件，有了它就向海牙的秘密号码呼叫。这一局看来走得挺不错，再则施伦堡希望达到双重目的：首先使英国情报部门“中毒”，用假情报或者“游戏资料”来哄骗他们，其次去接近军事抵抗运动的核心。在十一月七日会晤时双方同意第二天在文洛举行碰头会。

十一月八日下午，由十二个党卫队员组成的一支特别行动队到达杜塞多尔夫，希姆莱派他们来是为了“保护”施伦堡的。行动队由瑙约克斯担任指挥，他曾经在对波兰格莱维茨电台的“袭击”时显露“头角”。

“夏梅尔”答应过英国人，他将在十一月八日把抵抗运动的一名领导人送到边境。可是他到了文洛后却说，这件事要在十一月九日才能办到。因此，这次约会推迟到第二天。

十一月八日晚上，希特勒在慕尼黑市民的酿酒地窖里发表年度演说，纪念一九二三年参加暴动的那些“英雄”们。不过这次很例外，戈林和希姆莱没有出席。希特勒讲得非常简短，发言以后立即离开礼堂，没有象往常那样与“老战

士”闲谈家常。

几分钟以后，据目睹者说，一次可怕的爆炸摧毁了半个礼堂，炸死六人，炸伤六十三人。希特勒要是不及时离开，恐怕早就上西天了，因为炸弹安置在礼堂中间的一根柱子里，而希特勒发表纪念演说总是站在那里，包括这次在内。

一小时以后，希姆莱打电话给在杜塞多尔夫的施伦堡，告诉他有关行刺的情况，并命令他在党卫队特遣队的帮助下劫持由“夏梅尔”约定第二天在文洛与他们会面的那三个英国人。这是施伦堡的意见。但这种意见值得怀疑。从党卫队特别行动队在炸弹爆炸前几小时到达杜塞多尔夫这一事实清楚地说明，慕尼黑行刺和绑架都是蓄谋已久的事。施伦堡在十一月八日那天无需什么保护，他已经成功地赢得了英国间谍们的信任。由十二名党卫队员组成的一支特别行动队是为这次特遣队行动而组成的，由那位大刀阔斧的专家瑙约克斯领导，这支行动队看上去似乎不象一支防护队，倒象是一支特遣队。另一方面施伦堡同英国人的会晤总是在荷兰领土上，而且经常是在内地举行的。这就使人难以理解，瑙约克斯和他的十二名党卫队员怎能照料得到施伦堡的安全。

十一月九日下午，施伦堡在靠近文洛边境的一家咖啡馆里等待英国间谍。当他们的车子——一辆重型皮克牌汽车——朝前驶来，打开车门的一瞬间，满载党卫队员的一辆运输车突破边境栅栏，开到咖啡馆附近停了下来。党卫队员纵身而下。开始了一场枪战。科彭斯少尉受了重伤，跌倒在地。正象施伦堡后来所描述的那样，瑙约克斯和其中

的一名队员冲向那辆皮克，他们象“抢干草束”似的把贝斯特、史蒂文斯和一个受伤者拖了出来。

当几个党卫队员火速掩护载着三个俘虏的车子撤退时，他们跳进皮克往回开，越过边境，扬长而去。这次劫持，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次绑架只进行了几分钟，因为这次行动的确是一伙强盗干的一次漂亮的袭击。这次暴力行动冒着极大的外交干涉的风险；它损害荷兰的边界，挑起武装入侵，在荷兰领土上犯下罪行。几小时以后，科彭斯少尉死在杜塞多尔夫的一家医院里，他的证件表明，他实际上是荷兰情报局的克洛伯少尉。

这些风险岂能用一个微不足道的成绩来为之辩护呢？但是希特勒和希姆莱思想上却怀有利用绑架的意图。十一月十日，慕尼黑的一个精工木匠艾尔塞正打算迁居瑞士的时候，在克罗伊茨林根被逮捕了。有人在他家里发现一张印有酿酒地窖礼堂的风景明信片，明信片上面有人用墨水在刺客安装炸弹的那根支柱的地方作了一个交叉形的记号。艾尔塞被带到柏林并在艾尔布莱希特亲王街总部受到海德里希、缪勒和施伦堡的长时间审讯，当时贝斯特和史蒂文斯也在场。他不打自招地承认自己是这次暗害活动的主谋者，他甚至感到很骄傲，成功地设计了一种爆炸机，它的制动器可以在十天以前定好时间。党卫队保安处在开始监守礼堂之前，他就可以依靠还没有哪个专家获得的这个技术成就把炸弹安放在支柱里面。贝斯特和史蒂文斯与这次行刺丝毫无关，但是纳粹宣传部门使用了一种秘密诀窍，把责任推给英国谍报局和奥托·施特拉塞（他是逃入瑞士的

格利戈尔·施特拉塞的兄弟)的“黑色阵线”。

艾尔塞看上去有点象第二个范·德·卢勃。纳粹分子不敢进行公开审判；在他们的记忆中国会纵火案搞得太糟了。艾尔塞被带到萨克森豪森，然后进达豪集中营。他在那里一直呆到一九四五年。他被安置在重要囚犯的营房里，拥有一间细木工工场，可以任意地在那里工作。此外，他也给自己做了一只扁琴，用它弹奏几小时。其他囚犯称他为“扁琴演奏家”。贝斯特和史蒂文斯第一次很偶然地在集中营里遇到了他们的“同谋者”艾尔塞。他向他们叙述说，他是受两个人的纵容制造他的那颗炸弹的，夜晚时分，他们领他到了市民的酿酒地窖里，以便把炸弹安装到他们所指定的那根支柱里面去。根据他的“同谋者”的要求，他用一只定时雷管和另外一只电雷管装备这枚炸弹，这样可以用一根长电线末端的一只简易开关来控制雷管，使爆炸可以随时发生。艾尔塞相信，他的炸弹是定时雷管的作用而爆炸的，很可能是在希特勒和那些作为陪同的纳粹首脑们离开以后，由第二只雷管引起爆炸的。

“两个陌生人把艾尔塞带到瑞士边境，”他继续说，“在那里，盖世太保逮捕了他。”在此以前，他们把那张有罪责的明信片还给了他。这次事件的详情符合盖世太保所宣传的思想，即这是一次有组织的行刺。由于贝斯特和史蒂文斯的被绑架，谍报局要对策划和执行这次袭击负责。这次袭击比人们捉拿艾尔塞——一个见识短浅、独一无二的刺客还要来得错综复杂。至于荷兰克洛伯少尉之死，纳粹宣传部门从会见贝斯特和史蒂文斯中已经得出结论，即荷英两国

政府对德国表示默认，这种论点在德国军队入侵荷兰前不久又被采纳了。

贝斯特和史蒂文斯一直被拘禁到美国部队解放集中营为止。那么艾尔塞呢？他在一九四五年四月根据希姆莱的密令遭到盖世太保的杀害。盖世太保对外只说，他是在一次空袭中丧命的。无论如何不能让他活生生地落到盟军手里，尽管在事件发生后的五年中曾经又有一次机会让他亮相。

一九三九年九月，德国参加欧洲的战争，接着建立了德国中央保安局，从而把主要的警察组织合并在一起。与此同时，党卫队内部发生变化，目的是要更完整地适应战争需要。

迄今为止，“勇敢的党卫队部队”反对的只是手无寸铁的平民，甚至在捷克斯洛伐克他们也没有遇到武装部队的抵抗。因为欧洲的其他国家抱着天真的想法，认为把这个勇敢的国家交付给那个作恶多端的人之后可以缓和他的胃口。

希特勒在一九三九年春决定入侵波兰，他指出，这一次必须打一场真正的战争。希姆莱迫切希望他的党卫队在这次战役中尽可能起到显著的作用。他看到有机会建立一支真正的军队，不再只是一支内部的，而是一支实实在在的、整齐划一的军队，这将会使他有可能达到最终目的，成为一个伟大的军事领袖：实现这位养鸡员在提升为党卫队首脑以来内心所怀有的梦想。从事实上来看，建立一支党卫队军队的好处是能与军队进行抗衡；进一步来说，如果这支党

卫队武装力量由精锐部队组成，那么一旦与将军们发生公开冲突，它就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完成这些任务也是众人所望，不过由大量应召者组成的正规部队极可能拒绝接受这些任务。

有人很早以来就在考虑，如何使固定为元首效劳的党卫队军团摆脱最高统帅部的权势。一九三八年八月十八日希特勒发布的一项密令规定，党卫队后备部队既不属于国防军，也不属于警察（尽管这支部队由党卫队头子希姆莱领导），这些军团的服役时间（志愿服役）为四年，在这个党卫队军团里可以正常地服兵役。在战争年代里，党卫队兵团在“军队范围内”应由陆军最高统帅指挥使用，但是在政治上仍然是“纳粹党的一个团”。最后，希特勒对一旦发生动员的情况有保留采取以下措施的权利：在考虑到内政的情况下，可以亲自确定把党卫队后备部队合并到军队里去的时间、实力和方式。

此令发布以后，希姆莱重新组织党卫队后备部队，他使这个部队摩托化，还建立了新的装甲防御部队、机枪营和侦察部队。一九三九年七月，他又补充了一个炮兵团：战斗部队就是在炮兵团的“警戒部队”中形成的。

一九三九年九月开始，党卫队后备部队改组为武装党卫队，当时欧洲对武装党卫队有所认识。一九四〇年初，志愿者踊跃加入了武装党卫队；它当时的人数约为十万人：六万四千人是志愿者，三万六千人是应召者。

武装党卫队的首批部队在波兰采取的残暴行为不出人们所料，而戈林却说，这是一种“模范的勇敢行为”。这时希

姆莱授权建立其他的师。

武装党卫队经过战争考验和锻炼之后组成国内的警察军队，它想在临危时刻单独承担维持秩序的任务。将军们眼看着自己失去在国内的任何作用。希特勒知道，“维持秩序”经常是军队夺取政权的借口。再说他也知道，先乱“后治”的方法该是多么地诱人。将军们对丧失警察支配权不能提出强有力的抗议，因为他们过去始终不重视它的作用，因而当党卫队取得这种独立性之后，他们满腹牢骚，重复罗姆事件时希特勒所颂扬的那个公式：“在德国只有一个武装力量：国防军。”

他们提出的责备是如此的尖锐，以致希特勒让他的副官撰写一份说明书，不过这份说明书没有分发出去，因为凯特尔不愿对希特勒俯首帖耳，他对希特勒说，这种姿态在军队看来是一种“侮辱”。最后，希特勒委托勃劳希契去抚慰有情绪的人并让军官们知道，“强制他们参加军事行动”的是“警察部队”。

时过不久，军官们又提出了新的抗议。对每个年轻的德国人产生多年“影响”的组织受到党的控制。党卫队认为，只要进行积极的宣传，招募最优秀的人员是轻而易举的事。这种一本万利的生意抢走了陆军和空军的未来的干部。戈林说，“陆军和空军有权提出抗议，因为占有这些优秀的志愿人员所造成的结果使得陆军和空军缺乏也许可以成为出色军官的男子汉。”希特勒对此装聋作哑，还是一个劲地授权希姆莱建立更多的师。

随着时间的推移，也由于希姆莱朝思暮想地扩大他的

部队，因此在后来，他放弃了“纯日耳曼血统”的入伍条件，在此之前，他把这个条件当作“保卫种族和国家社会主义世界观”的根本要求。当由完全纯北欧血统的又高又大的金发阿利安种人——这是冲锋队的骄傲和存在的目的——组成的冲锋队中渐渐地、令人意外地出现其他血统的人时，这个原则也就越来越被抛到九霄云外：一九四三年，成立了穆斯林的“剑”师；一九四四年，成立了阿尔巴尼亚的“斯坎德培”师、法国的“查理大帝”师和一个匈牙利骑兵师；一九四五年，成立了克罗地亚的“爱神”师、法兰德斯“朗热马尔克”师、瓦隆人的“瓦隆”师、荷兰师和意大利师。在此期间，还建立了希姆莱命名的“野蛮人”小联盟，还有土耳其斯坦团和高加索团、一支印度军团、一个挪威滑雪营、两个罗马尼亚营、一个保加利亚营和三个哥萨克营。这些五花八门的部队穿着统一的冲锋队服装。而在三、四年前，只有经过对祖宗三代进行严格审查的、“日耳曼民族的精华”冲锋队队员才能穿上这种服装！

据估计，一百多万男子汉参加了这个武装党卫队。这个“精锐部队”每到一处都犯下了滔天的罪行^①。

^① 战争结束时，武装党卫队有四十个师，五十九万四千人。1944年10月1日，它失去了三十二万人。

第二章

盖世太保进驻法国

就法国人而言，战争开始于一九四〇年五月十日。英法部队在“滑稽战争”的麻木状态中达八个月之久。人们已经渐渐地习惯了这个奇特的、无感觉的冲突，而且很少考虑部队的调动或者进攻，而是更多地去关心应征入伍者的娱乐，他们的收音机和足球。盟军总参谋部等待了几个星期的突然进攻促使工作重新走上正规。

但是没有一个人料到那股铁飓风会如此快地袭击国家的上空。事态发展之迅速令人费解。一九四〇年六月十四日，最高统帅部公布这份报告：

“从英吉利海峡到蒙梅迪附近的马奇诺防线之间的整个法国前线出现了全面崩溃，这就打破了法国领导保卫首都的本来意图。因此，巴黎宣布为无防备的城市。胜利的德国部队轻而易举地开进了巴黎。”^①

巴黎沦陷了。六月十四日五时三十分，恰好是三十六天前对荷兰边境发动攻势的同一时间，第十八军的部队在格奥尔格·冯·库希勒上将的领导下穿过维莱特门，开进巴黎。

接着一队士兵登上艾菲尔铁塔，另一队士兵朝凯旋门

^① 1940年6月14日，最高统帅部的报告。

走去。他们到达那里之后，插上卐字形旗子。上午，“大巴黎”的第一任司令官施图特尼茨将军在克里荣饭店下榻。一切进行得有条有理，一切看来都是蓄谋已久的。

六月十四日和随后的几天，第二十八军进驻巴黎，部分部队穿过巴黎，继续向南或者在市里安置宿营。

一支只有二十来个兵力的小队，穿着秘密战地警察制服，佩带少量武器，分坐在几辆轻便车里不惹人注意。

从军事上看，这支小队不同凡响。然而，使法国人毛骨悚然达四年之久的政治组织就是从这支小型的、不引人注目的队伍演变过来的。

迄今为止还从未有谁谈论未来这个小部门的奇特的历史。

当德国部队进驻波兰时，最高统帅部对同时间出现警察特遣队一事提出了柏拉图式的抗议。尽管有人提出反对，希姆莱还是得到了希特勒的同意，而且警察部队象在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那样同作战部队一起同时开进波兰。在最后确定西线战役计划时，最高统帅部反对在法国重复这种方法。将军们对党卫队和盖世太保在波兰所使用的方法大为恼火（将军们应该逐渐习惯这种事），这一次他们的抗议显示出一种决心，致使希特勒认为，最高统帅部提出的抗议言之有理。警察部队，保安队的特遣队均无权随同军队开进法国。只有军政府可以行使警察权力，军队将是国家的唯一主人，不受希姆莱的控制。

这个抗议使希姆莱陷入困境。如果胜利的军队独自掌握西部占领区的行政权，那希姆莱就会认识到对他的党卫

队和警察组织所带来的危险性。因此，必须建立一个“桥头堡”，使它能够把目前掌握在军人手里的警察权逐渐地、一部分一部分地切割下来。

希姆莱命令海德里希建立一支特别队，其任务是同首批部队一起在巴黎安置。这不仅是安全的事情，也是威信问题，而且还可能引起希姆莱向军人炫耀他警察的艺术技巧。

海德里希谨慎地组织一套班子，以此解决这项棘手的任务。他决定这套班子的实力为二十人，这样既很少引人注目，又有足够的人数组织第一个“桥头堡”。为了进入法国，他想出一条作战诡计：让二十个人穿着军事秘密战地警察的制服做掩护，他们的车子挂上国防军的车牌号。这样特别队就可以混杂在行军部队里自由自在地在法国的大街上行动，不受阻碍地到达巴黎。

六月十四日晚上，特别队临时安置在卢浮宫饭店。它在到达巴黎后不到二十四小时就着手工作。这二十人中有一人在上午来到警察署，要求得到德国流亡者、犹太人和一批敌视纳粹政界人士的档案。

这些人是谁？尤其他们的头头是谁？

海德里希一定要挑选一个既能担任特别队的领导又能完成建立“桥头堡”的艰巨任务的人。这时，他突然想起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此人就是干净利落地制造并策划文洛事件和绑架两名英国军官的赫尔穆斯·克诺亨。他三十岁上下已经表现出一种非凡的组织才能和决断力；他是一名优秀的运动员，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非常聪明的人，有修

养，懂礼貌，善于交往：在同法国人谈判时施展了浑身解数。克诺亨亲自拟定队员名单，只有一次例外。盖世太保第四局首脑缪勒无论如何坚持要由他的一个心腹，突击队大队长伯梅尔堡作为代表呆在小组里。伯梅尔堡的办事能力是众所周知的，因为他是一位老牌职业警察。他在特别队里是盖世太保的唯一代表。显而易见，这个队刚开始工作时，也许在较长的时间内不会有任何的执行权。由于盖世太保基本上是一个执行机构，所以它在队里的代表起着顾问的作用。特别队的其他成员都很年轻；大多数人来自大学，例如二十七岁的哈根，他虽然从一九三四年起就是保安处的成员，但在二月份参加了在柏林举行的第二次国家考试，而后从事于新闻工作。

除了伯梅尔堡和派来担任粗暴工作的两名武装党卫队员之外，第六局(保安处外事局)为这个特别队提供了人员。长期来，大家都在详细地调查国外情况。盖世太保和保安处对一九三五年以来的法国警察的情况了如指掌。有关法国及其行政部门以及它的文化、宗教、艺术，尤其是经济和政治组织的文件已经收集了一大堆。盖世太保和保安处的各区分部都接到任务要详细地研究与自己对口的一个法国区。多年来，柏林地区的特工人员就控制着“V区”即巴黎地区。

这种精确无误的准备工作的成果意义重大：盖世太保和保安处的特工人员可以在他们熟悉的土地上展开活动。他们非常了解地方上的风俗习惯、居民的表现，甚至一些显赫人物的私生活。为了“参观这个展览会”，克诺亨在一九

三七年亲自来到巴黎。

他于一九一〇年三月十四日在马格德堡出世。他生长在一个简朴的、有名望的家庭。他的父亲卡尔·克诺亨是个教师。小赫尔穆斯同教师的儿子海因里希·希姆莱一样受到严格的教育。他是一个好学生，在马德格堡读完高中，接着在莱比锡、哈雷和格廷根学习。一九三五年，他正当二十五岁的时候写了一篇关于英国剧作家乔治·科尔曼的论文，因而被授予哲学博士学位。他的梦想是要成为文艺学教授，但是政治对他的生活已施加影响。他的父亲是个旧学校的爱国者，后备军的炮兵上尉，军国主义的思想很严重，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凡尔登受了重伤，使他的一只胳膊几乎完全残废。赫尔穆斯十六岁参加了青年“钢盔队”，这个组织以统一该阵线的老同志为借口，发动了一场激烈的民族主义运动。

为了在经济上支持他的父母，赫尔穆斯在学习期间兼了几个月的体育课。接着，他开始为地方报纸写文章。当时纳粹党人已经执政。对一个大学生说来，如果他不参加纳粹党的某一个组织而想获得博士学位则是困难重重。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他参加冲锋队，获得一个小队长的头衔。他置身于一部很快会把他完全吞食掉的联动装置里。时过不久，文化部的机关刊物《大学生报》发表他的一篇文章。他对这项新的新闻工作发生了兴趣；他认为，新闻工作比讲授文艺学更为值得。一九三六年，他终于放弃从事文艺学的念头，进入官方的德国新闻社当了一名编辑。正当他在社里报道奥林匹克比赛的时候，遇到了他的一位已经

离开大学，转而加入保安处的老教授西克斯博士。西克斯博士领导保安处的出版部。他毫不费力地把他以前的学生争取到自己的一边。一九三七年，突击队中队长(上尉)赫尔穆斯·克诺亨成为柏林保安处总部的成员。一开始，他的任务是审定德国报纸，不久就专心致志地研究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的报纸。他工作的主要范围是这些国家出版的流亡者报纸和所有关系到流亡者的消息和广告。他为准备“文洛计划”而展开的活动和奇袭的成功使他步步高升，获得两级铁质十字勋章。文洛事件也是他被任命为一九四〇年六月十四日偷偷潜入巴黎的特别队队长的原因。

克诺亨先下榻在卢浮宫饭店，接着住在斯克里布饭店，后来又住在拉纳大街五十七号，最后住在福熙大街七十二号，一直住到一九四四年八月政权瓦解为止。他长得颀长，脸庞瘦削，难得露出笑容，看上去有点令人不悦，但却给人以镇定自若的感觉；他的两眼蓝得发灰，鼻子挺直，嘴巴略阔了点，左嘴角露出一丝难以察觉的蔑视神色；他高高的额头微微隆起，好象里面蕴藏着无穷智慧，栗色的头发整齐地梳向脑后，与额头的肤色相比形成鲜明的对照。对于一个特别队的队长来说，这张脸是出人意料的。这个控制驻巴黎德国警察的赫尔穆斯·克诺亨，不象人们通常讲的是个“严厉的人”，他那老练的举止及其教养促使他去完成工作。他将会动用他的特别队尽可能迅速地、彻底地清除一切影响。

军政府一发现克诺亨及其人员在巴黎活动，就提醒他说，他不该拥有权力，“为了公正地处理这种状况”必须把他

置于军政府的控制之下。

克诺亨保证说，他完全无意干涉占领军的特权，他的任务仅仅是调查德国和奥地利的流亡者、犹太人和共济会成员，简而言之，是调查所有纳粹主义的敌人。而且他答应，在需要“执行措施”的任何情况下，如抄家和逮捕都会请求秘密战地警察的协助。克诺亨的手段非常高明，他成功地同军事警察首脑索瓦博士缔结了一项协定。克诺亨特别队立即着手执行它的任务，关闭反德和反纳粹组织的办公室，没收它们的档案，对那些在逃的德国人、共济会成员和一批政治家进行抄家，攫取罪证，每当特别队发现一个执意想离开巴黎的流亡者，便向秘密战地警察请求逮捕他。

军人们以为，他们也许一帆风顺地控制了克诺亨手下的人员，因而变得有点趾高气扬；二十个特别队员同二千五百人的秘密战地警察相比力量悬殊。当时，秘密战地警察驻扎在巴黎，很快增加到了六千人。

克诺亨在巩固了他的桥头堡之后，为扩充起见，在突击队中队长基菲尔的同意下，第二批又到达了二十个特别队队员。

八月初，以突击队小队长罗兰德·诺塞克为首，成立了第三小队；他们的特别任务是收集政治情报。诺塞克是这方面的专家；他游历了意大利、比利时、匈牙利、土耳其、罗马尼亚、希腊和法国，而且说得一口流利的法语、英语和西班牙语。

诺塞克属于保安处外事局人员，他亲自组织特别队，只挑选会说流利的法语，熟悉法国，而且在法国已有私人关系

的特工人员。第三小队的人员中有：几个曾在自己故乡当过职员或商人(例如酒商)的德国人，一个离了婚的伯爵夫人，两个卢森堡人，一个年轻的捷克斯洛伐克女教师等等。

诺塞克和他的部下搬进博卡多尔饭店，办事处设在索塞街十一号保安部的房间里，住宿在那里的还有盖世太保代表兼法国国家保安警察首脑伯梅尔堡。

同时，克诺亨开始在省里驻防下来。八月初，他委托哈根在波尔多安装一根“天线”，以便监视从西班牙边境直至卢瓦尔的大西洋海岸和被占领的后方。哈根最初只拥有十八人，他首先在停泊在港口的比利时国王的游艇上落脚，直至他能够在梅迪克街设立办事处为止。

他同克诺亨一样立即紧张地投入工作。一九四一年初，他又增加了布列塔尼地区，在他管辖范围的十个最重要的城市里建立“分支”，然后再由每个分支把间谍派往各地。

同军人的摩擦压根儿没有停止过，相反：陆军总司令、大元帅瓦尔特·冯·勃劳希契指示军政府抗拒希姆莱的部下，并在任何情况下阻止他们侵犯军队的权限。

因此，克诺亨只能搞到一些流亡者、共产党人、犹太人和共济会成员的情报。在此期间，他与另外一个小组“罗森堡特别工作处”发生了竞争。由党的理论狂热者所拼凑的这个特别队同样负有汇编宗教和秘密团体档案，尤其是共济会地方支部档案的任务。他们之间很快发生了公开的冲突。这一次克诺亨的人员又一次处于劣势，因为克诺亨虽是希姆莱在法国的代表，但是罗森堡是亲自从元首那里得到特权的啊！最后达成一个协议。“罗森堡特别工作处”同

意只没收具有历史价值的档案，而把政治和当代历史的档案转交给克诺亨，不过克诺亨有责任把他可能遇到的历史文件转送给“特别工作处”。相互竞争仍然在继续进行，克诺亨的特别队也从未把最微不足道的文件交给“罗森堡特别工作处”。

这些争吵使克诺亨觉得有必要选择一个能同竞争对手进行讨价还价的上级做掩护。当党卫队旅队长(少将)兼高级警长托马斯博士作为海德里希私人代表带着官方任务抵达巴黎，监督已开展工作的所有特别队时，克诺亨松了一口气。托马斯博士是比利时和法国保安警察和保安处首脑的代表，他受官方之托，负责同德国驻法大使馆和军事部门的联系工作。渗透工作显然是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高级警长托马斯象个巨人，同克诺亨一样高大魁梧、大腹便便，说起话来声音洪亮。尽管克诺亨当过工人，但他体态高雅，举止谨慎，而托马斯对情报工作有时候却很粗心，在这方面缺乏才能。他目前的任务是获取西壁的情报，有人说，他对办公地点威斯巴登的赌场和夜总会要比对西格弗里防线的工事更为熟悉。

他是个专门蓄意行凶的杀人犯，是个难以满足的好色鬼。他也是海德里希的知交，经常同他去柏林的赌窟里鬼混，不过说到底他手中有一张非同小可的王牌，从而获得海德里希的信任，并被派到巴黎去：他的女儿是海德里希的情妇，同他生了个孩子。

托马斯住在拉纳大街五十七号。他不得不把自己的时间平均地花在巴黎和布鲁塞尔上，因为他的工作也涉及到

比利时。如果在法国的话，他得先饱赏一下皮卡尔洛和爱丽舍田园大街上的那些幽默小节目，然后再去办理政治和警务工作；他平时注意的是那些分离主义的小队。他与巴斯克、科西嘉和布列塔尼运动的代表保持接触，并相信，给予他们支持可以使他们扩大活动，对法国内政施加重要影响。可是他没有想到，这种力量实际上是微不足道、行之有效的。同时，他经常看到各政党的代表随时都在准备同纳粹党人合作共事。在这些政党中，一个颇有影响的极力反对共和制和反犹的“革命行动委员会”小队将起一个重要的、但对托马斯来说最终是灾难性的作用。该委员会的两个领导人德隆克尔和菲利奥尔立即受到托马斯的召见，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他的政治顾问。他们随即建立了一个政党，取名为“社会革命运动党”。

托马斯和实际上做间谍发展工作的克诺亨之所以利用这些人，是因为他们多年来的政治信念或者受到在法国的纳粹间谍宣传的影响。最阴险的宣传工具是德国国家铁路局办事处，它披着为旅游者服务的外衣，散发各种政治性的传单和小册子，不仅接待爱好德国自然美景和纪念石碑的人，而且还给予他们以优厚的待遇^①。德国新闻社的宣传处资助某些报纸，让它们时而采取一种显然对纳粹主义有利的或至少是聪明的立场。

^① 德国国家铁路局驻苏黎世办事处在瑞士开展同样的活动。不久，该办事处的一個领导人施特赖贝尔被捕。1943年秋，用他去换一个在德国被捕的瑞士人。他的代表伦贝格尔于1943年5月28日被判刑两年，后来被驱逐出境。

“第一流”的广告代办处用纳粹基金资助许多刊物，例如《被奴役的法国》，“反犹联盟”的机关报等。它是由路易·达基埃(又称“德·佩尔普瓦”)创立的，他后来为纳粹党人效劳，替他们迫害在法国的犹太人，而一个叫保尔·佩多纳的“大西方联盟”会长却被人认为是“斯图加特的叛徒”。①

“法德委员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个组织的成员中尤以乔治·斯卡皮尼和费尔南·德·布里昂最为突出。

所有这些政党和运动的报纸对法国部分公众的舆论都有一定的影响，使人们对纳粹暴行逐渐宽容和“谅解”。

就那些对这个政府有好感的法国人而言，他们长期受到两个组织的影响：第一个是在埃尔富特的“世界服务部”，它用六种语言出版一种半月刊，第二个是在汉堡的德国菲希特同盟，它发送全德的政治性传单和小册子。

这些宣传完全以反犹主义为基础。它向德国情报部门提供志同道合者，保安处和盖世太保可以从他们当中招募最有价值的间谍。与通敌小组保持联系是有利可图的，所以克诺亨派遣他的一名助手佐默尔独自去同他们打交道。

克诺亨及其人员都要看军政府的脸色行事。驻法军事总督奥托·冯·施图尔纳格尔上将的办公地点设在克莱贝尔大街上的美琪大饭店。他的组织由施密特博士领导下的汉斯·斯派达尔将军为首的军事参谋部和军政府所组成。

① 他得到这个诨名是在1939年战争爆发时，当时他受雇于斯图加特广播电台，在那里管理对德国宣传广播的事情。在1939年4月份的一期杂志上——一次特别的预先警告——登载一篇题为《贝当执政》的文章。

参谋部主管纯军事问题，而军政府的部门则处理民事问题，如：警察事务（贝斯特博士），经济事务（米歇尔博士），农业（赖因哈特），法律事务（梅迪库斯博士）。

卡尔·瓦尔纳·贝斯特博士是由于他的专业知识而当选的。据回忆，他曾经是保安处的组织者之一，担任过德国中央保安局第一局（人事局）和第二局（行政和经济事务）的局长。军政府主要是解决组织问题，并同法国行政当局保持联系。贝斯特毫无执行权，执行权完全掌握在秘密战地警察和战地宪兵队的手里，他们直接听从军事参谋部的指挥。但是由贝斯特领导的那个行政部门则处理涉及到法国警察的所有问题并对法国警察进行监视。

参谋部有着自己征用来的集中营和监狱，并想方设法监督它们。在每个分区里都有一个部门负责同地方长官和相当于该职称的秘书长保持联系，向他们转达上级的指示。在每个战地司令部里专门有一人研究警察问题。

可以这样认为，占领初期，希姆莱驻法国的局被严格限制在只能获取情报方面，所起的作用不大。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一九四二年五月。

安全问题和军事情报处只能有“谍报局”来考虑。该局办事处设在吕泰西亚饭店，由鲁道夫中校^①领导。

如同所有间谍组织一样，谍报局也选用使人听来无关紧要的公司名称来掩护他们的分局。“红十字会女子第十二军团征募处”是德国最重要的谍报分局之一，在法国南特

^① 鲁道夫从前在谍报局第一组工作，这个组织由化名为佩特森博士的施密特中校领导。

取名为“南特工程局”，在第戎取名为“工程总部”，在波尔多取名为“会计处”，在图尔称为“欧洲国际运输公司”。

克诺亨小队与这个庞大的组织一比较就显得相形见绌。尽管如此，克诺亨经过数月的地下斗争之后，还是守住了阵地，没有长期受他对手的支配。

但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的军事总督的职务当时给克诺亨的工作带来莫大的困难。实际上，施图尔纳格尔是希姆莱人员所面临的一个比较凶恶的对手。尽管克诺亨同秘密战地警察首脑索瓦博士达成协议，他们之间的关系仍然很紧张，致使施图尔纳格尔命令克诺亨停止调查，切断克诺亨小队同德国进行情报联络，克诺亨也就不能同海德里希进行任何的交往。

克诺亨到处碰壁。甚至在德国大使馆他也遭到冷遇。外交部在一九四〇年八月三日的一封信中规定了驻法大使奥托·阿贝茨的作用。他必须在法国内政、新闻、电台和宣传等各方面来控制军事秘密警察和国家秘密警察。此外，在没收重要的政治文件方面他可以出谋献策。“元首明确地命令，法国占领区和非占领区的所有政治问题由大使阿贝茨一人负责。”但是按照旧惯例，盖世太保和党卫队保安处对阿贝茨的指示根本不予理睬。

克诺亨的不幸遭遇倒是在无人想过和无人会阻止他的地方得到了报偿。他常去巴黎的沙龙，甚至最有名望的沙龙也去。他沉湎于时髦的女郎。他的法国朋友领他去名人家里，使他有充分机会发挥他所具有的那种聪明才智。人们很快看到他成为那个“世界”圈子里的各社交场合和宴会上

的座上客。那些人都希望利用开拓同德国人积极合作的道路来谋取私利。因此克诺亨不仅知道巴黎人生活的各个侧面(这对于象他这样一个人来说得益非浅),而且还能知道国家领导人和政治家的过去和现在,工业的实际情况,公众舆论的反应,各种倾向和反对党领导人,抵抗运动及其同英美关系等最感兴趣的事情。他的几个新朋友——可以说不少——就是这样成了他的间谍。(我不想残忍地说出现在已经被人民遗忘了的姓名,但是,如今把它视为给克诺亨当时的某些酒肉朋友上一堂爱国主义的课,倒是颇有兴味的。)

克诺亨名义上的领导人托马斯博士曾经选择另一种方式来影响法国内政。法国被占领以后,德国当局和维希政府采取了反犹措施。同时,《法国反犹报》从德国宣传部得到大笔经费,开始挑起一场真正的大屠杀,其目的是在法国居民中唤起反犹的感情。在德方的怂恿下以暴力行动为宗旨的这场运动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与其说托马斯喜欢柏西的沙龙,倒不如说更喜欢皮加尔广场附近的夜总会。他的政治顾问是欧仁·德隆克(以前当过极端法西斯主义的蒙面党徒^①的首领,而现在是社会革命运动的领导人)和助手菲利奥尔杀人犯。为了“引起公众舆论”,他们两人在一九四一年九月建议托马斯袭击巴黎的犹太教堂。托马斯认为这种想法有独创之见;这使他回忆起一九三八年纳粹党人在德国组织的那次“自发性

^① 蒙面党徒: 1934—1940年法国法西斯组织“革命行动秘密委员会”成员。——译者

的”大屠杀。他委托第六局（保安处外事局）党卫队中队长汉斯·佐默尔同德隆克和菲利奥尔一起准备这次行动所需要的物资。行动所需炸药由佐默尔派人从柏林取来。另外，佐默尔的特殊任务是要在军人，尤其是在施图尔纳格尔不知道的情况下，秘密地同法国“内奸”保持联系。

一九四一年十月三日夜晚，巴黎人在睡梦中被一系列的爆炸声惊醒。凌晨二点三十分的时候，一只炸药包使得炮塔路上的犹太人教堂遭到严重损坏；三点四十分，纳萨雷特圣母路上发生炸药爆炸；四点三十分，一颗炸弹在维克多利亞路上的犹太人大教堂爆炸；五点钟：圣伊索尔路；下午三点十五分：科佩尼克路。除了一颗炸弹在巴韦路，第二颗在蒙特斯帕路上的一家礼拜堂里爆炸之外，仅仅一个夜里，在国防军巡逻队的鼻子底下发生了七次爆炸袭击事件。

德隆克为他的老蒙面党徒的英雄行为感到骄傲。事实上，深更半夜地在大门入口处安放炸弹，然后偷偷地溜掉，这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①……

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一日，陆军统帅部给保安警察兼保安处首脑海德里希发去一封信。写信人（可能是贝斯特）回忆说，在袭击时有两名国防军成员和多名法国人受了伤。他继续说道：

“这些袭击是由德隆克集团内的一些法国人搞的。炸药是由党卫队中队长佐默尔从柏林设法弄来的，然后交给这些作案者。佐默尔知道袭击的时间和方式，而且在袭击前

① 1944年1月，德隆克被盖世太保杀害。有人讨厌他，怀疑他是“叛徒”。（当时外面的军事形势发展很快。）

直接同作案者呆在一起，奉保安警察兼保安处巴黎分局局长，党卫队中校克诺亨博士的命令采取行动。此人在一九四二年十月四日给军事总督附寄的报告中主观上和客观上都错误地把这些袭击看作“纯粹是法国的事情”^①。

克诺亨首先遭到谴责，虽然他对准备工作早有所知，但他还是在袭击前二十四小时发表意见说，由军事特别队采取的措施已经奏效，一切都很平静。（袭击后采取了报复手段。）“那些在十月二日和三日进行爆炸的作案者和主谋者不会不知道，他们的计划会影响不参与的人，而且带来最严重的政治后果。”^②

由于很快确定了作案者，从而避免了这次危险。但是法国警察迅速发现了事实真相，这次事件影响了占领军的威望。这封信的结尾泄露了它的天机：

“保安警察和保安处特别队的领导人应对他们的措施和队员的行为负责。即使不去推测这位领导人间接或直接参与爆炸暗害活动，但是就这次事件的政治作用和对德国当局政治地位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影响而言，有必要更迭特别队的领导。为此，陆军总司令请求解除党卫队旅队长托马斯的职务。参加爆炸暗害活动的人员——党卫队中校克诺亨博士和党卫队中队长佐默尔——不再继续留任在西部占领区使用。最高统帅部认为可以接受那里分局的协议。”^③

① 《国际军事法庭文件》脚注1629。

② 同上。

③ 同上。

施图尔纳格尔竭尽全力利用他对手所犯的错误，他相信能把他们干掉。回想起发信的那一天，在南特有十六个无罪的人质倒在射击队的子弹下，第二天又有二十七个无罪的人质在夏托布里昂被开枪打死，他对那些无辜被杀害的法国人所表示的同情看来显然是无稽之谈。

施图尔纳格尔在行政方面（纳粹党人对这唯一的地盘伤透脑筋）做得对。但是克诺亨太有价值了，简直难以考虑与他分道扬镳。托马斯尽管把“他的女婿”一下子提拔为“左右手”，但也是不堪一击的。海德里希提出一种大家都满意的解决办法：托马斯请求免除他在巴黎的职务，几天以后，他前往基辅担任新占领的东部地区的保安警察兼保安处首脑。

克诺亨以这个地区的唯一主人重新露面，他作为解除武装的警察头子受到军人的严密监督。然而，他的聪明智慧和随机应变使他能在这条险要的羊肠小道中取得胜利。

第三章

盖世太保巧胜军人

军政府反对海德里希的特别队，不仅是因为存在着对抗，而且也是对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二日在雷东德缔结的停战协定有不同的看法。

协议的第三条可作多种解释：“德意志帝国在法国占领区行使占领国的一切权力。法国政府在行使这些权力中有责任竭尽全力支持和依靠法国行政当局执行所颁布的法令。因此，法国政府必须立即指出被占区的所有法国行政机关和行政部门遵行德国军事总督的命令，具体地与他们合作共事。”^①

最高统帅部打算如实地使用这些规定，把占领区的法国行政部门置于绝对控制之下。其目的是：由法国人自己管理被占领的法国行政机关，监督法国当局是否严格遵守德国的指示，德国军政府的作用就是控制和监督。

军人们认为，这种解决方式有说不完的优点：法国人在执行过程中的困难可以由他们自己去克服，而且管理方便，尤其让法国当局去执行德国指示的这种方法最为上策，它可以避免居民对由德国人引起的一切事情作出本能的反

^① 《外交政策月刊》，1940年第7号，第523页。

应。从这些方面说明了德国当局为什么对那些表示愿意同他们合作的法国人如此般的友好，他们并不想并吞法国，而是想把它引导到德国政策的路线上来。

因此，从军人的观点看来，德国警察的一次直接行动恐怕是要把水“搅混”。他们所能容忍的德国中央保安局的唯一机构是由丹内克尔领导的反犹小组。他是伯梅尔堡的助手兼艾克曼在法国的直接代表。

特奥·丹内克尔是慕尼黑黑人，二十七岁，属于盖世太保的人员。他于一九四〇年九月抵达巴黎，经济上和组织上虽然隶属克诺亨，但并不隶属他的指挥。他的“工作”取决于艾克曼，由艾克曼直接向他下达指示。

“犹太问题的第一任总监”^①格扎维埃·瓦拉在他的诉讼中供认，丹内克尔是个“暴跳如雷的纳粹分子”，他只要听到“犹太人”这几个字，就会“失去理智似地”大发雷霆。当排犹措施生效时，他监督法国当局所作出的决断，并发表了措词激烈的抗议书，尽管他已对他们稍微施舍了一点仁慈。

丹内克尔把他的两个办公室分别设在福熙大街三十一号和柳林街十一号。他立即起用法国的反犹者，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帮助他们建立犹太问题研究所，为此，他没收了豪斯曼大街一家犹太人企业的房间。在那里“研究”“犹太人问题”的法国人若无其事地成了盖世太保的房客，同时又是绝灭营的最活跃的供应者。

德国的反犹宣传获得了成果。但是丹内克尔不会满足于做一个业余爱好者。一九四〇年十月三日，维希政府公

^① 1942年5月6日，瓦拉由达基埃·德·佩尔普瓦替代。

布一项“犹太人章程”。章程规定：祖父母三代人中的任何一人，凡是出身犹太族的，即使丈夫是犹太人，仍应视作犹太人。同时，该章程禁止犹太人担任“公职和接受委任”，只允许一定数量的犹太人从事自由职业和经商。

警察局给丹内克尔派来了十二名巡官，归他直接指挥，这样他得到了军人所要求的東西：德国人希望低贱的工作由法国人去做。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在德国人的压力下颁布一项法律，它威胁说，要把参加反对“国家阴谋活动”的人送交特别法庭处以死刑。

为了把德国人直接控制下的警官“夺回来”，维希政府的内政部长 P·皮舍于一九四一年十月建立“反犹事务警察署”，“反共警察署”和“秘密团体”；这位部长对共济会会员横加迫害，从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三日起，法律上不许他们担任公职，并把他们视为祖国的敌人监视起来。

这些特别警察署是在外行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上述三个组织的领导人不是警官，而是在某些好斗的极右分子中间挑选出来的。于是反共警察署的领导权落到一个叫多里奥法国人民党的商人手里，他以“全权代表”的身份得到当时一万法郎的可观的月薪。该组织的人员同样由激进分子所组成，另外用高薪诱惑几名自愿的职业警察加以充实，以后又增加了一些官员，他们觉得呆在如此糟糕的团体里感到非常沮丧，因而决心干同样的工作而“不使自己的手给玷污”。

必须再次指出，纳粹党可以在各个政党的党员中招募

他们的助手，这些人的爱国表现最为突出。

军政府的打算落了空。因为凯特尔认为正规的诉讼是“无利可图的”，所以最高统帅部采取报复的方法，并规定，如果行刺一名占领国的人员就枪毙人质。

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二日，公布一项由施图尔纳格尔签署的命令，命令中说，所有被监禁在德国监狱的法国人，从八月二十三日起被视为人质。凡是要枪毙的人可从这个“后备军”中去提取，可“按罪行轻重”决定人数的多少。九月十九日，另一项命令把“所有法国男人”归在第一类人质范围内，“他们由于共产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活动而受到法国当局的监禁或者将要受到监禁”，从此时此刻起他们就是驻法国总司令的囚犯。在藐视海牙公约第五十条关于禁止拘捕人质的情况下，人质法概括了这些命令，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六日，当奥托·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由他的表兄海因里希·冯·施图尔纳格尔接替之后，德国司令部在《巴黎日报》上发表警告时又作了下列补充：

“年龄超过十八岁的扰乱治安者，他们的男性亲属以及叔伯、表兄一概枪毙。

有这种亲族关系的所有妇女被判处劳役。

年龄在十八岁以下的上述所有人员的孩子应该进教养所。”^①

在整个这段时间里，盖世太保和保安处躲在幕后操纵。尽管他们在排除政府的隐患方面没有采取积极措施，但还是不断扩大了自己的活动范围。

^① 《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5卷，第450页。

克诺亨一开始就按照德国中央保安局的模式把他的队伍分成六个部门，它与柏林总部的六个局及其任务相一致。他不可能公开行动，但也不处于静止状态。他利用时间，充分收集文件，从犯人登记表上和某些政党中，尤其在多里奥的法国人民党人员中招募法国助手。

一九四一年以来，军人逐渐放松了对克诺亨及其组织的监督。秘密战地警察的任务过于繁重，因此，不得不允许盖世太保任意抄家，随时捕人。虽然详细汇报每个人的情况是他们的职责，但是这种形式通常被“遗忘”得干干净净。军政府迅速作出决定，争取克诺亨的组织参加调研工作，因为谍报局和秘密战地警察已不再参加调研工作。根据达成的协议，在民事和政治方面，盖世太保和保安处负责军队后方地区的安全，军事情报处则处理谍报局工作范围的事。但是两个部门之间的界限有时混淆不清，难以严格遵守。克诺亨的特工人员毫不在乎地随时超越界限，侵犯谍报局的权限，因此经常发生冲突。盖世太保和保安处与谍报局之间的关系始终处于对峙和竞争的状态，使德国的两个组织的头头结成了冤家。

盖世太保和保安处用各种方式来不断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从而提高克诺亨管辖下的各局的政治意义。一九四一年底，国防军负责下列一些事务：报纸、电台、戏剧和电影的检查，犹太人财产价值的鉴定和法国行政当局的经济问题。谍报局的其余部门全控制在克诺亨手里。

在此期间，克诺亨建立了三个“外围点”：波尔多、第戎和鲁昂。希姆莱的代表——一个有钱人——早在占领初期

就住在维希。他直接向希姆莱汇报“临时首都”所发生的一切事件。

整个组织工作——一场终于获得成功的顽强斗争——都是克诺亨一手了结。自从托马斯被撤回以来，他独自负责盖世太保和保安处。虽然托马斯的职务由党卫队大队长比尔坎普接替，但他只不过是一个弥补空位的人，因为在过去的六个月里新首脑尚未到达。

一九四二年四月，希姆莱终于得到希特勒的命令，他可以从军政府手里夺取警察指挥权，并委任一名新的私人代表。

为了强调战胜国防军这个项目的重要性，他挑选了一个海德里希热情推荐的人，党卫队少将卡尔·奥伯格。

卡尔·阿尔布雷希特·奥伯格于一八九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出生在汉堡，他是医生卡尔·奥伯格博士的儿子。他在一九一四年十七岁的时候念完高中，一九一四年八月报名参加战时志愿兵，一九一七年九月，在法国前线升为少尉，战争结束后，他荣获两级铁十字勋章。

当他重新回到汉堡以后，发现家里经济情况拮据，他当上了商人和一个纸张批发商的代理人。以后又在弗伦斯堡的克里斯蒂扬森酵母厂当职员。一九二三年，他在那里同比自己小五岁的弗里达·特拉姆结婚。三年以后，这对夫妇迁往汉堡，奥伯格在“西印第安香蕉经售公司”找到了工作。他呆在这家进口公司工作直至一九二九年租用一家名叫“班贾克”的竞争性的企业为止。他运气不好，十个月以后，即一九三〇年秋，他还是赚不到一分钱。那时在德国

三百五十万失业者。不过卡尔·奥伯格不是那种垂头丧气或者在贫民施粥所和劳动局门前排队的人。依靠家里小额贷款的帮助，他在市中心的夏姆堡街上开设了一家烟草店。

奥伯格在这期间被纳粹宣传所触动。他的那家小香烟店开设在一座几乎完全依赖于海外贸易的城市里，当时没有第二座城市象它那样经济普遍衰退。一九三一年六月，奥伯格参加国社党，党证号码为 575205，十个月以后，加入党卫队，他很快在那里发挥一个有计划的组织者的才能。到了第二年，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五日，海德里希来到汉堡视察这里的保安处。奥伯格自以为早就被党的保安处看中，这时经人推荐给海德里希，得到录用。他现在是个领薪俸的干部了，再也不必为金钱而奔波操劳。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他被提升为三级突击队中队长(少尉)，分配在海德里希的参谋部工作。不久，他们两人成为最亲密的同事。一九三三年七月底，保安处迁到慕尼黑，他随同海德里希前往，同年九月去柏林筹建保安处的总部。在短短的时间里，他在保安处里成为海德里希私人参谋部的首脑，接着担任人事局局长。他领导这个局直至一九三五年。在反对罗姆的行动中，他起了积极的作用。

奥伯格自愿退出保安处，重新积极地在党卫队里服役，并以冲击团队长(上校)的头衔接管第二十二冲击团(梅克伦堡)的指挥权。到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为止，他一直是第四分区(汉诺威)的领导人。一九三九年一月，他担任茨维考的警察局长，四月份升为党卫队大队长(旅司令官)。一九四一年九月止，除了一个短小的插曲之外，战争丝毫没有改变

他的生活。一九四一年四月，希姆莱任命他为不来梅的临时警察局长，但是那里的纳粹党魁已经指定了另外一个候补者，因而激烈反对奥伯格，于是希姆莱在一星期以后不得不把他调回茨维考。

一九四一年九月，奥伯格前往波兰的拉多姆，担任党卫队队长兼警察局长。他在那里参加了屠杀犹太人和迫害波兰工人的事件。最后，他来到巴黎，担任党卫队旅队长和警察少将^①，这是九年前，这位突击队中队长的一段飞黄腾达的生涯。

奥伯格受希姆莱派遣去法国时已经四十五岁了：他是个生气勃勃的北德人，高个子，长着一头金黄色的头发，身强力壮，由于啤酒喝得太多，有点大腹便便。从他长长的脸上露出一双灰蓝色的眼睛，从这对眼睛里流露出来的不是残酷和严厉，而是一种温和的注意力。一副厚玻璃的眼镜戴在他的长鼻子上，鼻梁骨向内弯曲，形成一个鹰嘴鼻，特别惹人注目。从侧面看，他的脸更加逗人发笑。从他过去的职务来看，他留给人们的回忆是一个沉着而耐性，对部下友好和善良的人。他是一个十分正派的、严肃的丈夫，婚后十三年成为三个孩子的爸爸。

总的说来，希姆莱为法国选中的这个人在一群象猛兽那样的盖世太保和党卫队员当中简直是个笨伯，实在是跑错了地方。不过奥伯格的一个特点别人是不能替代的：奥伯格严守纪律，绝对服从命令。

^① 本来安排弗朗兹·施塔勒克去巴黎，但是他阵亡在俄国，这样就把“机会”留给了奥伯格。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希姆莱决定派奥伯格到法国去。五月五日，奥伯格抵达巴黎。他的到来使德国警察和占领军之间的关系发生重大的变化。为了便于外人知道，奥伯格获得了“较高一级的党卫队队长和警长”以及“希姆莱的私人代表”的头衔，而托马斯只不过是海德里希的代表。同时，授予奥伯格全部警察权力，委托他在党卫队首脑和德国警察首脑与驻法国的德国权威人士之间，即同驻法国的军事总督海因里希·冯·施图尔纳格尔上将，总司令韦斯特，陆军元帅格德·冯·伦斯德，奥托·阿贝茨大使，以及最后同法国政府建立和保持联系。

为了说明并强调这件事的重要性，希姆莱本人曾经想把在巴黎的奥伯格正式调进他的局。但是党卫队首脑和德国警察首脑的无数工作使这件事不能如愿以偿，这样他就只好委托海德里希去办。海德里希有礼貌地把奥伯格介绍给德法当局。为此，他以个人名义宴请在职局里已工作两星期的警察局秘书长勒内·布斯凯和内政部部长伊莱尔。同时还宴请了法国政府在被占区的代表费尔南·德·布里昂和接替格扎维埃·瓦拉的犹太人问题研究的新委员达基埃·德·佩尔普瓦。

海德里希向他们作了简短的说话，他们应该尽可能地同占领军当局密切合作，每个人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应该为这项新的警察工作作出成绩。奥伯格将把这项“为了大家幸福”的工作担当起来。

海德里希以元首的名义提出一些要求，这些话作为要求的引言主要是针对勒内·布斯凯的，因为它们首先同法

国警察首脑有关。海德里希说，奥伯格已受权改组占领区的德国警察。从此，执行权由这个新的警察局，而不再是军事当局掌管。今后，后方地区部队的安全由警察和党卫队负责。希姆莱指示奥伯格：“你要注意，驻扎在海岸地区的部队不要遭受背后一击。”为了顺利地完成任务，他下达命令，被占区内的法国警察应该置于德国警察的领导之下。海德里希解释道，这一点按照停战条约的规定是合法的，因为占领国有权利和义务关心维持秩序。但是希特勒和希姆莱不相信法国警察会与他们进行忠诚的、有效的合作。因此，这位党卫队首脑要求彻底改革法国警察。他认为，法国警察应该由那些政党的可靠人员来领导并由它们的干部进行建设，这些人为了“建立新欧洲”而坦率地与德国当局合作。政党中首先是多里奥的法国人民党和达尔南的荣誉勋章授勋处。

纳粹分子坚决要干掉他们的对手，所以让冲锋队去“维持秩序”，然后再雇佣一些把党的事业放在国家事业之上的人去执行警察任务。在法国，托马斯曾经设法把那些乐意为纳粹间谍效劳的人置于他的保护之下。内政部长皮舍也建立了三个专门机构：反犹事务警察署，反共警察署和秘密团体。

海德里希本来希望，法国警察局的这位秘书长是一个软弱的人，然而使他惊讶的是遇到了断然的反抗。勒内·布斯凯拒绝把自己的警察置于他人监护之下，拒绝用极端主义政党的成员配备干部。相反，他这样回答说，只有让法国警察不受限制地履行自己的任务，德国人不使用轻率的报复手段，秩序才能得到恢复。看来海德里希承认布斯凯

的这些理由。他说，他自己认为，如果布斯凯负责把法国警察纳入符合德国利益的轨道，两个组织之间建立密切和友好的合作，那么这些措施乃是不必要的。

勒内·布斯凯对此作出保证，条件是：德国警察不能干涉法国警察的工作，双方组织可以各行其事。

海德里希只好承认，他无权单独签订这样一种条约。只有当他向希姆莱和希特勒报告这件事情以后，他才能执行授予给他的那些命令。他带着这个默契回到了柏林。此后他再也没有回巴黎。

海德里希和布斯凯在一九四二年五月五日的会晤使法国避免了一次严重的威胁。德国警察在波兰、丹麦和捷克斯洛伐克控制着全部的地方警察。在丹麦，几乎所有的警察遭到逮捕和驱逐。在捷克斯洛伐克，控制这种恐怖场面的是那个被任命为波希米亚和梅伦的帝国保护者海德里希本人。在波兰，党卫队执行盖世太保旨在消灭各界居民的命令。然而，问题就在于最后使用这种解决办法正好适合德国警察的用意。一大批能干的法国警察全部保存下来，就是说，在关键时刻准备应战。这也说明，维持正常秩序愈来愈困难了，因为那时候居民要受占领军统治下的痛苦比法国警察少得多。秩序干扰的程度超过以往任何时候。因此，为了“驯服”这些倔强的居民，法国意味着将要受到曾经在中欧和东欧使用过的残酷的统治，最后，大家对这个协议表示满意。

奥伯格立即着手重建由他领导的警察部队。

他的第一步措施就是把负有监督法国警察任务的军政府并入保安警察(盖世太保+刑事警察)和保安处。秘密战

地警察在其他方面几乎完全销声匿迹。在它们二十五个小队中有二十三个已经解散；人员分配到保安警察和保安处或者派到俄国前线去。奥伯格所接收的都是国防军的遣散人员，他们在盖世太保和保安处的支配下干着特殊的工作。但是直至最后一天，军政府还是看管着监狱、集中营，掌握着关税事务和战地宪兵队的领导大权。

这一切都是克诺亨的功劳，是他不断追求这一目的而长期工作的结果，该目的就是要设法保证党在德国和巴黎所拥有的对国防军的控制权。从那时起，依仗奥伯格所拥有的权力，这种统治权一再得到新的确认。从理论上说，阿贝茨大使在法国负有领导德国政治的任务，但是实际上德国政治是由警察部门领导的。

按照德国警察组织的模式，奥伯格把他的警察人员分成二组：治安警察(ORPO)和保安警察—保安处(SIPO-SD)。每组由一名长官领导。治安警察的办公地址设在费桑德利街四十九号，由施韦尼兴领导，从一九四三年起谢尔接替此职。保安警察—保安处仍由克诺亨领导，它的办公地址在柳林街和福熙大街。

根据政策，巴黎市外的最重要的地盘不能让给国防军，所以各区建立一个地方局；除了波尔多、鲁昂和第戎已成立的局之外又发展了七个局：昂热，马恩河畔的夏龙，南希，奥尔良，普瓦蒂埃，雷恩，圣康坦。因此，连同巴黎在内，当时共有十一个地方局。

各地方局建立地方分支网，并在管辖区的重要城市里收罗间谍；于是鲁昂地方局扩展到了埃夫勒，卡昂和瑟堡，

其次又在格朗维尔，迪埃普和勒阿弗尔发展了三个较小的部门。

北部和东部地区不属于巴黎总部领导；主管北部和加来海峡地区的莱尔局合并归于布鲁塞尔总部，而施特拉斯堡的地方局则由一个德国分区领导。

所有归属于巴黎领导的分局均按那里的总部模式进行组织，而总部本身则完全按照德国中央保安局的模式组织。

国家保安警察—保安处总部及其海外局共分为七个部门。他们通常的任务同在异国占领区的任务一模一样。第二处的实力(管理处)经过“第二警察署”的充实而增加了一倍。这个处就是过去那个军管小组，它同法国警察保持着联系，并负责监督他们和解释法律方面的问题。现在它正在设法同管理集中营和监狱的军政府的局保持联络。

第三处(保安处)提供了“奥托”名单；这份名单最早是由控制报纸的那个宣传大队开列的。不管是犹太人或反纳粹的作家所写的作品，还是他们所论述的主题，一概被登记在这份名单里。

第三处也负责监督德国购买站的事务，与行政长官沙克尔一起管理工资和就业问题。

第四处同在德国的第四局一样，其前身是盖世太保。它的任务是与“国家敌人”、破坏者、恐怖主义者，以及活跃的反间谍分子作斗争。它的所在地成为本部门间谍或者第三处和第四处去跟踪不幸者的终点站。它还消灭了为伦敦工作的秘密电台，编著了“电台节目”的解说词。

柏林派遣的一个代号为 IVJ(以后改为 IVB₄) 的特别

队隶属于第四处。它的任务是迫害犹太人。这个特别队由丹内克尔领导，他直接从在柏林的艾克曼那里接受命令。他正在为“迁移”犹太人进行准备工作，这就是说，他制定的措施，法国当局必须执行。那些由犹太人问题委员会指名搜捕的犹太人拘留在德朗西集中营，然后被押送到波兰，在一个绝灭营里遭到杀害。

经常参加丹内克尔组织的讨论会的有：阿贝茨的一名代表蔡特舍尔，军事当局的两名成员恩斯特和布兰克，罗森堡参谋部的一名特派员贝尔。给法国人带来巨大牺牲的措施就是在这些会议上决定的。

大使馆也指派了法国“专家”。这些“专家”是从通敌和反犹小组的领导人中挑选出来的。他们当中有M·布卡德，达基埃·德·佩尔普瓦，克里门蒂和一位假学者，“人类学家”乔治·蒙坦东。

丹内克尔滥用他的独立性，他的傲慢态度引起了克诺亨的猜疑。考虑到维护他作为领导人的威信，克诺亨找了一个“由于纪律原因”的借口把他调离别处。丹内克尔因此于一九四二年九月离开巴黎，在索非亚结束他的政治生涯。

一九四三年五月，艾克曼派遣他的心腹一级突击队中队长布吕纳带着任务到巴黎去，尽快加速撤退工作，因为据他估计，法国对“解决犹太人问题”“进展缓慢”，大大落后于欧洲其他国家。布吕纳来自萨洛尼卡，他给人的印象是个冷酷无情的粗人。艾克曼亲自把他带到巴黎。为了确证布吕纳活动有“良好的结果”，他到法国来了两次。以《示众报》为首的法国反犹报对犹太人在尼扎地区所获得的“犯罪的宽

怨”发动了一场真正的抗议运动。艾克曼就是为了这件事到那里去调查——正象这些报纸所断言的那样——“法国的所有犹太人”是否真的都已经逃到尼扎这个地方去了。

当布吕纳到达巴黎时，奥伯格得到希姆莱的命令，要他去“激励”那些在共同参加追捕犹太人时表现懒散的警察。

但是布吕纳享有很大的独立性。他带来了一支连同机动车在内、由二十五个身强力壮的人员组成的特别队。他从柏林得到命令，然后让犹太人问题委员会里的法国人去执行，以此回避克诺亨。一九四三年八月初，德朗西特别营归德国人管理；法国宪兵队只负责外面的看守。这样布吕纳可以进一步“加快”撤退的速度。

第四处的任务是见不得人的：被捕者当中，谁应该提交给正在布瓦西当拉格街举行会议的军事法庭，以及谁不经过审理就被撤退都由该处决定。此外，第四处具有极大的特权：他们一旦要报复的话，就把挑选出来的人质枪杀掉。

合并到第四处的有：处理“特殊任务”的一个组织，第四科(5)和从事于反间谍的第四科(N)。

最后，还有两个单位属于第四处，他们的人员学会“尊重”所有的法国人，尤其是巴黎人，他们的名字无人知晓。杀人集团编写了入侵报告，起草这份报告的主要部门设在维尔朱斯特街四十八号，是法国人民党和民兵中的突击队，其人员都是些声名狼藉的卡邦匪徒。如果保安处和盖世太保不想用他们的名义出现，特别队就要进行干预。他们的任务是袭击个别指定的组织、绑架或杀害知名人士。

第二个单位是由埃尔泽塞尔·比克勒领导的“保安警

察局第四科”；它拥有为盖世太保工作的法国人，并建立了一所培训助理间谍的特殊学校。

在很大程度上，两个小组使用的惯犯大多数是由他们从监狱里接出来的。这件事开始得很奇怪。一九三九年，一个名叫亨利·张伯林的人被拘留在塞普瓦集中营里，此人以前是巴黎警察署餐厅里的侍者头目。他在集中营结识了几个同样被拘禁的德国间谍，后来同他们一起潜逃外出。自从克诺亨到达巴黎后，他就开始当密探，为盖世太保工作，不久经他“雇主”的提名担任队长。他在拉丰的名义下拼凑了一个小组，由他和前特派员博尼领导。办事处设在洛里斯通街九十三号。张伯林-拉丰要求释放二十几个已判刑的人，用他们来建设自己的队伍。许多类似的罪恶活动场所相继出现，心怀鬼胎的马丁，人称“吕地·德·梅罗德”就是这些场所里的一分子。对这些刑事犯说来，虐待是流行的审讯法。他们凭着一张“特别证件”肆意携带武器，犯下了无数罪行，他们趁抄家之际进行偷窃，擅自搜查有钱人的住宅，干尽了各种营私舞弊的勾当。

这伙歹徒同时为盖世太保、保安处和谍报局工作。

原则上，第四处同第五处(刑事警察)一起行使执行权，即进行逮捕、审讯和抄家。至一九四三年年底为止，它的头头一直是伯梅尔堡。

当克诺亨着手筹建他的组织时，伯梅尔堡由于种种原因已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了。他是个老牌职业警察，对国际上的警务、法律的惯例和方法了如指掌。他曾参加过国际警察的先驱国际刑事警察组织，该组织的秘书处当时设

在维也纳。他通过这条渠道认识了法国最有名望的警察首脑。此外，他掌握法语，甚至通晓隐语。当时，他是德国中央供暖公司的一名“技术员”，长期住在巴黎。英国国王访问巴黎时，国际刑事警察组织派他到那里去同法国警察一起研究安全问题和对付国际恐怖分子所必须采取的措施。法国政府对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和部长巴尔图成为马赛谋刺事件的牺牲品记忆犹新。当时，伯梅尔堡可以进行直接的接触。当他被任命为索塞街盖世太保的首脑之后，他也并没有错过机会去利用这些接触。

但是到了一九四三年，伯梅尔堡突然感到上了年岁的痛苦。他的年龄似乎一下子把他制服了，当时令人担心的是，他的记忆力渐渐衰退，不能再当机立断，他的判断失去昔日的那种可靠性，这一切都发生在秘密抵抗组织和反对党对他们施加压力的时刻。盖世太保进行了一场不打招呼的战争，其来势凶猛，残酷无情，年迈的伯梅尔堡一下子显出一副软弱无力的样子。奥伯格和克诺亨同德国中央保安局达成协议，寻找一个不会伤害保安局的解决办法。奥伯格派驻维希政府的代表盖斯勒被秘密抵抗组织打死后，有人对年龄的界限议论纷纷，想把盖斯勒的职务委托给伯梅尔堡。而伯梅尔堡的职务则由施廷特接替，他担任驻法国的盖世太保首脑直至占领结束为止。

曾经伴随维希政府的伯梅尔堡撤出法国之后，在锡格马林根被分配在贝当手下的人那里工作。这是他最后的职务。

第五处是刑事警察。它主要同黑市场作斗争。这并不

过是从理论上说说而已，因为在许多场合下，德国当局本身就是黑市场牟取暴利的组织者。此外，刑事警察的任务就是配合盖世太保做些技术性的工作：测量囚犯的体长、验收指印、搜查武器、开具通缉令等诸如此类的事。

第四处的任务是收集有关政治集团的情报和监视他们同国外的关系。该处在巴黎拥有七个特别队，他们经常接到特殊任务。

以德国中央保安局突击队中队长潘维茨的名字命名的“潘维茨特别队”专程被派往巴黎，伙同第四处和第六处讨论“红色小乐队”事件，消灭在法国工作的苏联情报网。这个情报网收集德国部队活动的情报，了解其实力以及去法国整休和返回前开往东线去的师部情况；这些情报直接通过无线电台或在瑞士的中转站发往莫斯科。潘维茨特别队得到“广播剧-特别队”的支持。这个队由追踪地下电台的专家们组成。

第三特别队负责来法国访问的德国高级干部的安全。它是由经过精心挑选的党卫队队员和治安警察组成的。

第四队是根据它的领导人文格尔的名字命名的“文格尔特特别队”。它主要监督护照的签发，而“瓦格纳特工部”则是监督比较高级的社会人士。另外一个技术队的任务是去发现秘密军队作伪装使用的车辆。该队在秘密军队成立的南部地区进行活动。第七队，也就是最后一个队，它专给德国部队预定的住房招募妓女，有时也为某些集中营的妓院招募妓女。

实际上，在法国并没有第七处，只不过是德国中央保安

局第七局的专家们到巴黎来的次数多一些，研究法国反犹研究所的“工作”，把罗森堡特别工作处没收的书籍进行分门别类。罗森堡特别工作处设在杜蒙迪维尔街十二号，有计划地盗窃了艺术品、老式家具、书籍、银器、首饰和皮货。总之，在犹太人住宅里可以找到的一切昂贵的东西，这儿应有尽有。

一九四二年五月初，纳粹党人在法国成立了一个同样是无所不知和无所不在的组织。这个组织德国人是早就熟悉的。现在一切权力都交给了它；它变得可怕起来了。

从理论上说，虽然在法国的各个部门要按照德国中央保安局的模式进行分工，但它们毕竟不象柏林总部的部门那样，互相封锁消息。特别是外交部门，它们的人员，包括行政人员在内不到一百人，这些特务在各个区域从事活动，每个月都不得不约束日益增加的镇压措施。与此同时，他们将情报工作交给当地招募来的法国辅助人员去办，并且依靠法国通敌组织和某些政党提供的报告和告密材料。

所有属于“保安警察—保安处—特别队”的间谍穿着同样的制服，即左袖上有保安处袖章的党卫队制服。保安处这几个字并不说明它是属于原来保安处的第六局，而只能说明保安警察和保安处人员已经参加这种工作罢了。

曾经归军政府掌握的权力现在落入盖世太保首脑的手里。因此军管处在任命法国被占区的干部时要征得他们的同意；但是当盖世太保获得独立自主以后，他们却提出，在每次任命时这可能涉及到警察任务的利害关系，他们有进行干预的权利。

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占领南部地区之后，盖世太保提出要求，任命地方行政长官时必需征得他们的同意，甚至要推荐他们的候补者，这些无理要求遭到军管处和大使馆的拒绝。但是这丝毫没有改变第三处继续考查任命的官员，看看新的官员是否去阻碍镇压措施。最后，奥伯格成功地把挑选的一个人安插到法国警察的领导岗位上，担任相当于达尔南这样的角色。

盖世太保和谍报局除用通常途径获得消息外，还共同分享那个时候所特有的情报资料。

由于缺乏大量原材料、食品和许多消费品，因而出现了黑市贸易，那里买卖不受数量的限制，生意非常兴隆。要对这种短缺现象负责的是德国经济，因为它象对待每一个被占国的经济一样，一开始就掠夺法国的经济产品。德国经济之所以遭受生产不足之苦，是因为它的工业区遭到空袭的破坏，生产大幅度下降。与此同时，控制日益上升的战争费用愈来愈困难了。一九三九年，百分之四十二的战争费用由税收弥补，一九四二年，这部分费用下降到百分之三十三。一九四四年，下降到百分之十九。从被占国那里拿来用作“占领费”的战时特种税达到六百六十亿，加上以巧立名目提出的或者敲诈来的捐款在内，大约达到一千亿马克。仅一个法国就支付了三百十亿马克的占领费，这是所有被占国中最高的战时特种税，不过仍然是一笔微不足道的款项，因为德国的战争费用单单在战争第五个年头就上升到一千亿^①。

^① 战争结束时，德国的债务达到三千八百七十亿马克：一千四百三十亿为长期和中期债务，二千三百五十亿为短期债务，还有各种汇票。战争支出达到了六千七百亿马克。

法国运输部门实际上不能够继续提高所需供应的货物的装容量。所以德国当局改用第二种掠夺方法，即把黑市贸易列入它的预算之中。他们开设所谓的“采购处”，并决定同法国的一些部门一起进行正常的贸易。实际上，这些办事处成为营私舞弊的巨大温床。在那里达成了最难以置信的交易；进行交易的人占很大优势，因而他们享有不受处罚的特权，受到盖世太保的保护。无论什么货物和商品都在黑市上进行买卖和交换，如：钢、铜、钨、橡胶、水银、药品、羊毛、衣料、高级皮货、铁丝网、名酒和法国白兰地酒、未加工的皮、高级香水、长统丝袜、木材和铁路钢轨。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做买卖的人就是盖世太保和谍报局支付报酬的间谍。这样的买卖盈利很大。当时财产的来源就靠这一途径。他们不仅做黄金、外币和外汇的买卖，而且还向国防军的军需部供应必需品。要法国商人或者工业家去克服那种勉强的爱国主义的感情以及为这些采购处效劳，这并不难。盖世太保懂得如何把他们转化为自觉或不自觉的情报间谍。为了不失去业务订货这个有利可图的肥缺，某些人接受了这个工作。

全部采购处由“奥托组织”管理，它在巴黎拥有三个总办事处，波洛涅森林广场二十一至二十三号，阿斯多尔街二十五号和阿道夫—伊冯街六号，圣康和圣德尼船坞附近还拥有扩展的仓库。

奥托组织由赫尔曼·布兰德尔，又称“奥托”和罗伯特·珀舍尔这两个德国人领导。他们的正式任务是把购买来的所有法国商品划入德国预算并由谍报局作掩护。据估

计，他们个人所获的赢利达几十亿法郎。

该组织的首脑是布兰德尔，他中等身材，长着一张椭圆形的脸，双下巴。他讲究文雅礼貌。他出于爱好或者为了洽谈业务经常出入巴黎的娱乐场所，这时候他总是穿得很时髦，喜欢把银灰色的头发梳到后面，使人觉得有点矫揉造作。奥托组织对样样东西都感兴趣。布兰德尔冷冰冰地看着那个洽谈业务的人，一言不发地听他讲。要是生意谈成功，他就叫人把香槟酒拿来。

“奥托”对交易所证券也感兴趣。该组织的特工人员经常拿着盖世太保没收或抢来的股票到交易所里进行活动。盖世太保对有价值证券控制甚严。他们还对某些有钱的公司施加压力，目的是要它们让出一大批股票给德国公司，这些公司中有德国中央保安局派的代表。这样他们既可控制这些公司，又可分享它们的利润。

布兰德尔是谍报局的上尉。他身边有一个不断同谍报局领导保持联系的助手。盖世太保通过他从采购处的顾客当中招募间谍。最令人可怕的人是弗雷德里克·马丹，又称“吕地·德·梅罗德”和乔治·德尔法纳，又称“毛伊”，他们的办事处设在亨利·马丁街一百零一号。

一九四四年德国崩溃时，珀舍尔企图逃往西班牙，以便到南美享受他那笔巨大的财产。他预感到战争的结局，于是早就小心翼翼地作逃跑的准备工作，再说在里斯本有人已经为他准备好资本。然而他在西班牙边境被盖世太保逮捕，押送回国，被判处死刑，而且是绞刑。

布兰德尔带着自己的一部分财宝回到了德国。他沿途

找了许多藏身之地，得以使自己安然无恙。有人在香巴尼的一幢宫殿的侧楼里又发现了“奥托”埋藏的、里面放满宝石的灭火器。他先住在德国的慕尼黑，把宝石藏在水泥桶里，把名画藏在朋友家里，其中有西斯莱，勒努瓦，布丹，皮萨罗和德加的几幅画像，此外，还有壁毯，极其贵重的家具，稀有的邮票集，有价证券，古老的银器皿等。这些都是从法国那里进行四年有计划的攫取的精华。

德国崩溃以后，布兰德尔改名换姓，住在达豪附近。1946年夏天，他在那里被捕。后来在施塔德尔海姆监狱的牢房里自缢身死。

两个同谋都得到同样的下场，自缢在一条绳子上。从那个神话般的“奥托财宝”中只找回了一小部分。除了已经变黑的银器和正在分解的邮票之外，那些名画也许正在某些安全的隐蔽处腐烂变质。至于他们装运到葡萄牙和南美去的那些黄金、外汇和有价证券，哪个有钱的同谋如今是以此为生的呢？

第五部

盖世太保的地狱

(一九四〇——一九四四年)

第一章

盖世太保在法国开展工作

克诺亨在奥伯格的驾驭之下进行了组织准备工作，他利用那些围着自己影子旋转的仆从组织搞营私舞弊、激发政治欲望、制造恐怖：所有这一切导致镇压扩大化。

奥伯格在党卫队的纪律制治下准确地执行下达给他的命令，用泰丁格的话来说，他是“一个具有魔力的、能为他元首赴汤蹈火的人。他是残忍的出色化身，似乎他生就的任务是被人憎恨，而这一点他恰恰完全做到了”。

“憎恨”这个词说得不够有力。那些熟悉盖世太保暴行的人对制造死亡温床的首脑们所发泄的无济于事的仇恨和愤怒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

被捕的人数不断增加，从一九四四年五月到八月在南部地区，特别在里昂地区达到顶点。他们是由于两种情况而被捕的：一种是参加过反德活动或者仅仅是受怀疑而逐一被捕的，另一种是在大规模搜捕时被捕的。在法国，逮捕规模最大的是：一九四一年八月和十二月，一九四二年七月（对犹太人的搜捕），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在为躲避搜捕而迁往克莱蒙费朗的斯特拉斯堡大学；一九四三年一月在马赛有四万人被逮捕，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格勒诺布

尔，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克吕尼，一九四四年五月在菲热克和埃西厄，一九四四年七月在圣保罗德莱昂和洛克米内。在比利时、荷兰和丹麦，盖世太保使用同样的方法。至于中欧和东欧国家，那里的全体居民被掠夺、迁移或押往他处，过着奴隶般的生活。

个别被捕者由盖世太保审讯，绝大部分在肉体上受到折磨。一般说，当一种调查无需立即审讯时，逮捕后约十天举行首次审讯。叫被捕者开口说话的方法倒是千篇一律的，被捕者跪在一块尖角的木头上，施刑者则坐在他的肩膀上，或者把他的双臂反绑着吊起来，直至他昏迷过去；或者对他拳打脚踢，用皮鞭子抽，如果他失去知觉，就用水浇，直至他恢复知觉。刑法还有锉掉牙齿的，拔指甲的，用香烟，有时甚至用焊灯烧的。有时也使用电刑，把通上电流的电线接到人体最敏感的部位。他们用剃刀切开脚掌，然后强迫受伤者在盐上走路。把浇有汽油的棉花夹紧在囚犯的足趾之间，然后点火。“浴缸用刑”的方法是：把反绑着双手的牺牲者放进一只储存冰水的浴缸里，然后把他的头掀到水下接近淹死，最后一霎那再拉着他的头发拖出水面。如果不幸者这时还不愿意说话，那么立即把他的头再次掀入水中。

当被审者接近完全昏迷时，这种刑法的“发明者”和专家乔治·德尔法纳·马絮便中断审讯，然后叫人端来热咖啡或者茶水，有时候端上白兰地。当他的牺牲者一恢复知觉，他又重新开始那种同样残忍的“治疗方法”。

妇女们也难以逃脱这些刑讯，一般来说，拷问者对她们也要采取最卑劣的行径。法国帮手同他们的纳粹主子在进

行比赛，看谁先想出虐待的点子。所有法国人很少听人讲起这些暴行。有些人由于政治原因否认了这些暴行，有些人则认为，对牺牲者的报道言过其实。完全相反！在医生的鉴定书上，在知情人所记录下来的供词里，事实真相和拷问者本人的供认书里有着许多这里无法描绘的详细情节。

盖世太保的每一个分站只为自己“工作”，这符合内部相互隔绝，其他局里发生什么事一概不知的保密条例。因此它就会出现一个犯人受几个局审问的情况，而每个局都是为了自己才去审讯犯人的。

被交付“审讯”的，多数是弗雷纳监狱里的不幸者，他们被押上囚车，带到一个“临时的”牢房里关起来。在柳林街上的那幢大楼里，这样的牢房就设有好几处。最宽敞的在地窖里，楼层里的许多小房间都当作监狱。有时五、六个囚犯拥挤在一间不通风的小室达数小时之久。在这段时间里，他们的手铐多半是不拿掉的，甚至还要用链条把他们拴在一个墙环上。

审讯被捕者的时刻终于到了。最初几个人的回答通常会遭到雨点般的痛打。如果哪一个被缚着手的不幸者跌倒在地上，有人就会拳打脚踢地帮他一下忙，好让他重新站起来，结果经常发生肋骨或手臂折断的事。

审问在继续进行，一会儿对家庭进行恫吓（家庭人员经常遭连累），一会儿给以许诺或提出“有益的”建议。被告必须笔直地站立几小时，接受那些轮番审讯的人员的不断虐待和拷打。

为了达到对付一个顽固分子的目的，他们最后使用“文

雅的举止”。在这个领域里，虐待狂和刽子手的幻想带来了发明者为之骄傲的，如同中世纪“刑事询问”的无数变异和新方法，这种中世纪刑事询问的伎俩已经由父亲遗传给了儿子。纳粹主义设法找到的爱国主义的借口使那些看来正确的，至今还正常的人从下意识中迸发出极其可怕的本能。有些人考虑到危险性拒绝做叛徒去看人学样。只有少数几个人对这种审讯方法感到高兴。不论什么地方，连盖世太保的最小的“地方分站”都使用这些非人的手段。

在蒙彼利埃的玫瑰别墅里，里摩日的蒂伏利胡同，法国的大多数监狱，巴黎柳林街和劳里斯顿街的小室里，在盖世太保居住的所有房子里都回响着被拷打的爱国者的惨叫声，还可看到他们流淌的鲜血。柳林街上的厨房设在二楼，厨师们在二楼的第二百四十号和二百四十二号房间工作，但是他们经常被六楼里受“审讯”的牺牲者的惨叫声弄得心慌意乱。

遭受虐待的不幸者经过监禁以后早已虚弱不堪。单单在法国的监狱里就死了四万人。除此以外，还得加上被法国法庭、特别法庭和军事法庭判刑的人和法国集中营的囚犯。牢房里拥挤不堪，有时候十五个人挤在一个七至八平方米的小房间里，房间里脏得几乎不能想象，犯人们满身都是虱子，依靠少得可怜的一点配给量充饥^①，得不到亲人的来信和来访，与外界完全隔绝；如果谁在审讯时不屈服，不泄露还在外面的朋友的名字，就需要百折不挠的勇气和超

^① 拘禁在里昂附近的蒙吕克堡的妇女在早晨七点钟得到一杯草茶和一勺子汤，下午五点钟得到一片面包。

人的意志。有些人精神和肉体上都受到百般折磨。可是谁愿意冒斥责他人之风险呢？

象让·穆兰那样，成百人在毒刑下或者得病死去。还有其他一些人，象皮尔·布罗佐莱那样，自杀身死或者在受刑之前就逃入死亡的寂静之中^①。

盖世太保认为，只要从一个人的口中逼供出最有用的东西，就可以把他押送出去或者交给德国法庭。

押送意味着用强制劳动、疾病和非人的待遇来宣判慢性死亡。不幸者往往挤在一辆锁住的、密封的牲畜车里被押送异地，上百人，有时候一百二十人坐在一辆车皮里，没有新鲜空气，没有吃喝。当这样一列火车经过三天三夜到达布痕瓦尔德或达豪时，经常有四分之一的被押送者死在途中。

从一月一日到八月二十五日(押送的最后一天)为止，共有三百二十六列车次离开法国，不包括上莱茵、下莱茵和摩泽尔省。每列车装运一千到二千人。押送数字的增加反映了纳粹恐怖统治的强化：一九四〇年有三列车，一九四一年十九列车，一九四二年一百零四列车(人们看到，盖世太保“掌权”后立即出现了直线上升的现象)，一九四三年二百五十七列车。大约有二十五万人被押送出法国，只有三万五千人归来^②。一九四二年有三百到四百人被安置在达豪，一九四三年为一千人，一九四五年初为二千人或更多一些。

集中营里的气氛和生活在昔日囚犯所写的一些书里已

^① 皮尔·布罗佐莱遭受五天的拷打之后，在柳林街从六楼跳窗自杀，因为他害怕再次被屈打成招。

^② 在西欧，荷兰人回国的百分比是最低的，始终保持悲惨的记录：十二万六千被押送者当中，只有一万一千人重返他们的国土。

经作了详尽的描述。处于一个所谓文明的时代，在文明的国家里，经历过这场恶梦的人感到自己完全浸沉在纳粹的世界里。奴隶们至死都在服从一小撮暴君，这个奴隶世界完全是纳粹主义旧理论的产物。谁要是进了集中营，谁就永远别再想获得自由。在这个集中营里，党卫队员对新来的人说：“这里只有一个出口处，那就是烟囱。”在另外一座集中营里，接待他们的是块大牌匾：“从大门进去，从烟囱出来。”这就是纳粹党人开的玩笑，它的唯一的要点就是从炉子里出来的那股臭气。

集中营里的囚犯受到盖世太保背后的党卫队的控制。为了监视集中营，希姆莱建立了骷髅队。这个专业化的党卫队小组隶属以奥斯瓦德·波尔为首的党卫队的“经济和管理总局”^①。盖世太保从政治上对它进行控制。

希姆莱、海德里希及其接班人卡尔登勃鲁纳经常参观集中营。他们看着被拘留者在有气无力地工作，同时顺便检查煤气室的“工作”情况，并在执行死刑时出席观看。在这个死亡的世界里没有任何东西值得大惊小怪。从被毒气杀死者嘴里拔掉的金牙和金齿桥，以及拿下来的金丝边眼镜架子和结婚戒指都交给“经济局”使用。有一天，波尔被邀请去参加纳粹头子在国家银行举行的宴会。在大家入席就餐前，有人在银行的地窖里把党卫队经济局存放处的保险箱指给波尔和陪同他的党卫队队员们看。先生们看到了

^① 第一批集中营由集中营长官独立管理。1939年底成立“集中营”总局，它的任务是管理所有的集中营。1942年初，这个局作为“第四局”并入经济和管理总局。

用黄金熔化的一大堆小金砖、眼镜架子、自来水笔、金牙。然后大家前往餐厅……

在已解放的集中营里找到了最后还没有运走的储存品，其中有二万零九百五十二公斤金制的结婚戒指和可以装满三十五辆汽车的皮货。

工业公司使用集中营的囚犯必须向经济和管理总局支付租金。仅仅在一九四三年，党卫队经济局就向国家银行缴纳一亿多马克的现金。

简直一切东西都被“利用”上了。更有甚者把死者的骨头加工成肥料，把人的脂肪加工成肥皂。

章程规定，妇女进毒气室^①的时间要比男人多五分钟，因为剪掉她们的头发还得需要时间。

苏联部队解放奥斯威辛集中营时，发现那里有七吨剪得很光滑的头发，这相等于十四万个妇女的头发。当时人们不知道头发派什么用场，直到有一天发现党卫队经济和管理总局给集中营司令官传阅公告时才恍然大悟：“党卫队经济和管理总局局长，党卫队中队长波尔根据上级报告下达命令，不惜利用所有集中营提供的人发。男人的头发被加工成工业毡或纺成纱。潜水艇人员用的脚套和国家铁路局用的发毡袜都是剪下来经过梳理的妇女头发制成的。”^②男人的头发至少要二十毫米长方才可以被利用。通

① 集中营司令官鲁道夫·赫斯在奥斯威辛建造了一间可以容纳二千人的毒气室。

② 1942年8月6日，党卫队经济和管理总局给集中营司令官的传阅公告，〈国际军事法庭文件〉USSR511。

告的这句结束语带有十足的官腔：“定于每月五日收集头发，第一次定于一九四二年九月五日向本局汇报数量，男女头发应分别开来。”^①

聚集在这些地狱里的盖世太保所关心的是永远不减少人数。谁监禁在哪个集中营完全由各个局决定。只有两个人有权签发拘捕令：德国中央保安局首脑海德里希和他的接班人卡尔登勃鲁纳，如果卡尔登勃鲁纳不在，那就轮到盖世太保首脑缪勒。

集中营里缺少的工人由盖世太保提供。缪勒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发布的一份通告中规定，到一九四三年底，要向集中营输送三万五千名有劳动能力的人。

在集中营里，盖世太保由“政治处”代替，它对囚犯来说是一个可怕的地方，而对集中营管理部门来说则是一个争论的场所。集中营由一个“司令部”领导和管理。它一方面嫉妒地觊觎着盖世太保的特权，一方面对盖世太保干涉它们的事务也只得勉强忍受。

每一个新来的囚犯都要经过长时间的审问，因此有关出身的一些问题也属于个人情况一类，有关被捕原因、公务职业等文件存放在档案材料里。然后案卷转到政治处的档案室。由于这个处建立了卡片索引，因而对每个囚犯的全部情况了如指掌。

政治处可以随时把一个囚犯叫来审问。它的名字令人生畏。被叫到那里去的囚犯经常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几

^① 1942年8月6日，党卫队经济和管理总局给集中营司令官的传阅公告，〈国际军事法庭文件〉USSR 511。

乎永远是受到百般虐待的牺牲品。科贡报告说，在布痕瓦尔德，奥地利少尉黑肯阿斯特因为害怕通过扩音器的声音去呼喊审讯的囚犯而死于心脏病。

盖世太保在俘虏中间组织内奸。想去发现警探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光凭嫌疑就向政治处告发同犯等于是判处死刑。

有特别记号的囚犯在“避弹室”——狱中之狱——里受讯，那里的刽子手们可以随心所欲。被带到避弹室里去的不幸者必须立即脱光全部衣服，受到难以形容的拷打，最后总是惨遭杀害。

政治处得到盖世太保总部的指示，宣读对囚犯判处死刑的命令。从柏林发来的处死刑令很准时，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要处死一个只拘留几个月的囚犯。在布痕瓦尔德解放前八天，德国中央保安局第四局仍然顽固地继续发布处死刑令。于是发生了英国军官珀金斯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五日被枪杀一事。

偶然被释放的任何一名德国囚犯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向允许他居住的那个地方的盖世太保分部报到。他离开集中营前，必须在政治处的一份声明书上签字，并宣誓保证，对他在集中营里看到的一切和对囚犯的生活条件完全守口如瓶。一九四〇年以后，实际上已不再释放囚犯。

在布痕瓦尔德，俄国俘虏被送往政治处进行“特殊处理”。根据明确无误的命令，“特殊处理”意味着死亡。他们先开枪打死政委，接着轮到军官，最后是共青团领导人和共产党员。从关押“白”俄的俘虏营中挑选出来的密探被分派

在拘留俄国人的所有集中营里，以便发现有头衔或者是政治干部的人。

希姆莱对自己的工作感到骄傲。早在战前，他就对囚犯表白了自己的看法：“……他们是犯罪和堕落的残渣余孽……是身患脑水肿、斜视眼和驼背的人，半犹太人，是无数劣种的家伙。真是一群乌合之众……总的看来，教育他们绝不能用任何世界观的教程，而只能用规章，因为多数囚犯是奴隶，只有少数人有真正的品格……教育要用规章作开导，规章落实了，人们才能在干净的营房里生活。照章办事只有我们德国人能做到，几乎没有哪一个民族会是如此的人道。”^①

党卫队部队以及国防军和党的代表团经常被安排进行参观访问。达豪集中营的一个老囚犯发现，囚犯生活完全与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为了使来访者开心，他们作了彩排演出，不过这些节目都是老一套，按顺序演出。首先由一个“穿绿色服装的人”表演，他是从杀人犯中挑选出来的一个普通罪犯。接着维也纳的前市长施米茨博士登场，然后是一名捷克的高级军官，跟在他后面的是一个搞同性恋者和一个吉卜赛人。最后走过场的是天主教主教或波兰教会里的要人或大学教授。来访者沉醉在这些幽默之中纵声大笑。盖世太保把学者、具有高尚道德价值的、资产阶级和宗教的显赫人物同狡猾的罪犯混淆在一起，经过长时期的考虑之后，制定了一项计划，让那些从犯人中选出来的“监

^① 希姆莱就“党卫队和警察的本质和任务”的报告，摘自《1937年1月国防军的纳粹课程》，《国际军事法庭文件》脚注1992(A)。

工”有决定囚犯生死的权利，其目的是要系统地使人失去人性，蔑视和贬低敌对者。

一个纳粹的传奇人物说，导致这种堕落的是北欧种族无比优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信条。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一日，希姆莱向集中营司令官发布命令，只允许德国人拷打德国囚犯，以示惩罚。这对也许死于拷打的那个人说来会是多大的安慰啊！

盖世太保一面监督别人遵守这些古怪的规章制度，一面监督集中营管理部门的干部行为，并按时向缪勒汇报。缪勒把这些报告转交给海德里希，而他再把它们呈递给希姆莱。要是知道毛特豪森集中营的某些干部由于在管理上存在某些缺点而受到惩罚的话，那才怪呢。例如，集中营的医生可以不受惩罚地从囚犯中拉出两名年轻的荷兰犹太人加以杀害，以使用他们两人头颅上的两副整齐洁白的牙齿制作一只“装饰”写字台用的“独特的”镇纸器具。

在隔绝的、窒息的纳粹世界里存在着一种无情的逻辑。我们逃过了它，是因为我们对它的标准感到陌生，但是用谋杀的方式来扩大工业，我们认为不可饶恕的罪行，但对党卫队说来却是正常的行为，因为他们是执行命令的。在我们看来，管理上的错误是件小事，但却被看作是有罪的，因为它损害了党的原则，除了党的原则之外，便没有真理、没有幸福。

这些谋杀还在深深地震动着我们，将使人的良心百年不能平静，但是纳粹党人并没有把它们看作是谋杀。谁会想到屠宰场那个上班准时的工作人员只不过是因为杀死了

一头牛或者切割了几只羊的喉管而被控告犯了谋杀罪呢？一个名符其实的纳粹党人则认为，“劣种”的成员或者“祖国的敌人”、“人类的渣滓”比牛羊还不如，他们不该博得同情，消灭他们是一种有益的工作。

没有被盖世太保送进集中营的俘虏很少获得自由，即使他们没有什么真正的罪名也无济于事。相反，如果经过调查收集到了重要的材料或者因拷打而被诱逼出来的坦白材料，就可以把这个“罪人”交付德国法庭，然后在巴黎的布瓦西当格拉街开庭宣判。

法庭独自作出宣判，盖世太保不能对法庭施加任何压力。然而只要一宣判无罪或有罪，盖世太保又可以任意支配他。调查期间俘虏被拘留在弗雷纳·桑特或切尔米迪监狱，宣判之后，盖世太保认为把他们送交给法庭已一无用处，就把他们禁闭在罗曼维尔堡里。

碉堡围墙内建立起来的“罗曼维尔集中营”一开始由国防军管理，从一九四三年六月开始由党卫队管理。^①它收容各种俘虏并成立一种经常性的人质“后备队”，便于报复时好在任何情况下从中取人。

为了加强恐怖气氛，对暗刺进行报复，有意识地使用了一种原则，即无辜者在监禁长达数月之后就被拉出去击毙。政权和人与人的关系的这种基本观念深深地渗透到整个纳粹世界，致使他们中没有一个领导人想采用其他治理方法。

罗曼维尔的俘虏被分成四个到五个等级。第一等称之

^① 1943年6月1日，两个囚犯皮埃尔·乔治(法比安上校)和阿尔贝特·普瓦里埃设法逃跑以后，才由党卫队代替国防军。

为有权管理囚犯的人。他们的人数不到五十个，极大部分是具有一定影响的人，他们大部分往往是因告密而被看作是反纳粹的，由于安全原因被捕，不过对他们提不出什么控告。他们中间有图书馆管理员、科室人员、医生、厨师。他们每星期可以收一封信和若干只包裹。

他们当中看来不存在人质问题。总之，几乎所有到罗曼维尔来的人迟早要被押送出去。

第二类是因犯了法给占领军造成损害而被德国人逮捕的囚犯。这部分人中间甚至有德国间谍和盖世太保的法国帮手，这些法国帮手曾经利用了这一点来欺骗他们的“雇主”或偷窃他们的东西。有些人在以后受到法国法庭的审判。解放以后，他们被判处死刑，少数囚犯被押送出去，待遇几乎与第一类相同。

十五岁以下的儿童也属于第二类。不论在罗曼维尔，还是在其他的集中营，许多儿童同样受到禁闭，那里甚至还有一个七个月的婴孩。

第三类由政治犯和受到追踪的抵抗战士的妻子、母亲和女儿组成。她们的勇敢行为和斗争精神对囚犯说来是莫大的安慰。她们在集中营里传播消息，因此多次遭到严厉的报复。为了削弱她们的士气，德国人把女刑事犯和妓女混在她们当中。结果遭到了明显的失败。即使是妓女也在这些坚强人的影响下赢得了人类的尊严。她们中的大多数人被押送出去。

第四类是秘密被捕或被“隔离”的政治犯。他们受到的待遇与上述三类相似，例如信件和红十字会寄来的几只包

裹必须经过仔细检查，同时还可以“散步”几分钟。如果第五类的人数不足，可以从他们队伍中拿取人质。他们中的多数人枪杀，少数人获释，其他人则被押送别处。

以上四类的囚犯住在旧碉堡的空中楼阁里，这些房子通常用来作为兵营、办公室和仓库。

第五类的那些不幸者被关在旧碉堡的防弹地下掩蔽室和拱形顶的地下室里。管理人员不放过每个机会来提醒他们，迟早要带走和枪毙他们。这些人挤在一座散发出霉味的稻草库里，一片漆黑，由于潮湿，地下室的拱形顶上不断地滴着水，地窖的窗孔和门经常关闭着，角落处的厕所实在太小，连换件衣服都不可能，要洗手也没有水，在这样的监狱里有的只是令人作呕的臭气。五十几个俘虏被关在一间八十平方米的地下室里达数星期之久。把他们挤在一起是上面的规章。几星期后，那些满身都是虱子和患有疥疮的不幸者因见不到阳光而几乎成了瞎子。

伙食被限制在最低水平上。不允许收领信件和包裹。到了冬天由于寒冷和潮湿那就更苦了。有些人质在这样的境况下忍受了八个月，十个月，甚至十二个月。有时候强迫他们到令人恶心的地下水道去——一个相当于路易十三旧碉堡的阴沟，以示惩罚。

大屠杀时，原则上从这类人当中提取人质。这里的大多数囚犯由德国法庭判处死刑，但是其中也有人只被判处强制劳动或投入监狱，有时候也有人甚至从来不到庭受审。但是盖世太保按照个人的特征对他们作了区分：那些“地下抵抗分子”几乎全部都是由于从事共产主义或戴高乐主义

活动而被逮捕的。

纳粹主义培育出一批致人于死地的干部，其中一个名叫里肯巴赫的上尉，他统治着这个苦难的世界，象一个残暴的、野蛮的雇佣兵，他懂得行政当局让他留在法国的重要性，并乘机对这个国家浪费生产各种名酒进行深入的、有比较性的研究。虽然他经常喝得酩酊大醉，但是谁要是企图越狱，他就会暴跳如雷或者根据当时的情绪和酒量说些讥讽的笑话。当里肯巴赫喝醉后，从碉堡斜坡上滚下来时，他几乎总是挥舞着他的手枪，盲目地朝地下室窗户或者暴怒地向周围开枪。这种狂热性使他从俘虏那里得到了“潘潘”（“朋朋”）^①的绰号。哨兵非常害怕他一边巡逻，一边鸣枪，所以乖巧地躲开了他。他最感兴趣的娱乐就是让人缚住他要惩罚的一个俘虏的双手，放到碉堡的斜坡上，然后笔直向不幸者正步走去，大家在等待开枪的命令，但是等了几分钟，命令并没有下达。接着俘虏被带回到地下室里。自从两个囚犯在一九四三年六月逃跑以后，“潘潘”被撤了职。俘虏的真正主人就是党卫队中队长特拉普，据说他在法国当过酒商。

如前所说，这些人质的“主要后备队”是“地下抵抗分子”，他们绝大部分都在瓦勒里昂山遭到枪杀。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在巴黎地区被捕的，而是不管在什么地方发生重要情况，被捕者一律被送往巴黎，由盖世太保总部对他们进行审讯和立案调查。一九四二年二月和三月间，法国盖世太

^① 潘潘和朋朋，均系译音。——译者

保把在东南部逮捕的抵抗战士立即押往巴黎，由警察局里的“大卫特别旅”看守，然后交给盖世太保，八月底把他们送往罗曼维尔，塞在人质小组里。在调查过程中，他们中有七个人获释，有一个人在罗曼维尔逃跑成功。其余的人均遭枪杀或被流放。在获得解放的集中营里，只有四个人还活在人间。

枪决人质一事由国防军的命令决定，但是必须作为人质枪决的那些囚犯则由盖世太保来决定。到一九四二年六月为止，为了对行刺进行报复，在发生袭击以后立即枪决人质。接着，根据希姆莱和最高统帅部的指示，按时发布枪杀令，枪杀人质的数目按整个占领区发生行刺的方式和次数而定。因此，集体负责制趋于极端。在法国发生的每一次暗害活动由陆军司令部、盖世太保和在每个陆军司令部派有代表的谍报局提出报告。

这三份调查报告来自陆军参谋总部、空军参谋总部和海军参谋部，这种报告究竟由谁来写，要看被害人或机关属于哪个军种而定。最后，由大使馆和宣传大队对此发表意见，汇报居民的思想和情绪。

这些报告可以使案情水落石出，然后由凯特尔作最后决定。他首先向施图尔纳格尔下达命令，枪杀数目已定的人质。其次向奥伯格下达命令，让他去准备执行和负责公布执行的情况。这些措施（运送人质、选择地点以及确定日期和钟点）由索塞街第二警务处执行。在巴黎枪杀令由治安警察提出，在省里由国防军或警察联队提出。盖世太保第四处负责挑选被枪决的人质，大多数人质从罗曼维尔俘

虏中，有时候从弗雷纳或者省里的德国监狱的囚犯中进行挑选。曾经发生过这样一种情况，在五十个已被枪决的人质里只有一个囚犯在过去被德国法庭判处过死刑。另外，相当多的被判死刑的人并没有被处死，而是被押送出境。

如果关在罗曼维尔地下室的囚犯数目不足，就要动用第四类被隔离的“政治犯”。德国人把两个小组的囚犯看作是“替死鬼”。例如，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下达枪杀五十个人质的命令，但是自七月十五日以来，好多“地下抵抗分子”被运送到德国去了，罗曼维尔第二十二号地下室里只剩下了四十个俘虏，所以随意地从第四类中带走了所缺的十名俘虏。

一九四二年九月发生过类似情况，当时德国士兵包场的巴黎“国王”电影院遭到了袭击。因此盖世太保下达命令，要以枪杀一百二十五个人质来抵罪。不过到八月十一日才枪决了八十八个“地下抵抗分子”，罗曼维尔的“后备队员”人数也不够。那里只有四十六个“替死者”，他们被杀害在瓦勒里昂山上。后来盖世太保又给波尔多地区下达命令，从关在哈堡的囚犯中枪决七十名。监禁长达六个月之久的法国人就这样在距离巴黎六百公里的地方为了一次他们一无所知的偷袭行动而含怨死去。

这种大规模的枪杀愈演愈烈，直至战争结束。用恐怖手段来吓唬居民的做法不仅引起一些有身份的人的愤怒，而且促使了抵抗运动队伍的不断扩大。被枪杀在法国的人质数目总共达二万九千六百六十个。如果把他们分派到各地区去，可以描绘出一幅伟大的抵抗运动的地图。里昂和里

摩日这两个地区是法国抵抗运动的“主要城市”：被枪杀在里昂的人质有三千六百七十四个，在里摩日有二千八百六十三人。仅巴黎地区的“光荣榜”上就有一万一千个。

第二章

东欧地区的苦难

纳粹党人的暴行不受约束地袭击着东欧国家。他们竭力在波兰、波罗的海国家和暂时占领的苏联地区推行一种难以想象的有计划的灭绝政策。他们在西欧几乎可以说是在玩弄花招，一会儿采取恐怖，一会儿要求合作，而在东欧用的却是另一种方式，因为他们想并吞该地区，使它成为殖民地，为纳粹提供奴隶。

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七日，凯特尔根据希特勒指令，签发一项命令，委托希姆莱维持被占区的秩序，并授权由他来独自负责采取一切他认为合适的措施，保证贯彻元首的命令以及不必采取合法的行动，而是要使用“唯一行之有效的恐怖措施”。

“恐怖措施”由希姆莱领导下的“特别行动队”执行。根据最高统帅部和德国中央保安局的协议，特别行动队由党卫队、保安处的特工人员和盖世太保组成。他们不是为了进军俄国，而是早在一九三八年进军捷克时就建立起来的。施伦堡奉海德里希的命令把他们召集在一起。他们的目的是用恐怖手段去镇压企图进行反抗的居民，并在“政治上清洗”这个国家。

一九四一年，大多数灭绝指令是由海德里希起草的。在那些指令里面，人们可以找到他所喜欢的动听的词语，他几乎总是回避或不写“灭绝”这个词，而是写“过筛”，“改善健康条件”，“肃清”，很少写“消灭”和“处决”。

一九四一年五月中旬，海德里希委托盖世太保头子缪勒（德国中央保安局第四局）同最高统帅部谈判有关在后方使用特别行动队的问题。缪勒一再表现出他的顽固性和思想上的局限性，最后还是彻底败给了他的对手爱德华·瓦格纳上将。这时候海德里希就把这项棘手的任务（该任务指的是在东部获得全权委任状）委托给那位具有外交手腕的第四局（保安处外事局）的未来头头施伦堡去干。他准备让军人“吞服药丸”。海德里希的指示是最明确的：施伦堡必须做到，陆军不仅要容忍特别行动队呆在后方和作战地区，而且后方地区的司令官必须支持特别行动队、以及保安警察和保安处的特遣队，向他们提供燃料和食品，服从他们联络网的支配。施伦堡成功地完成了这项任务，这样海德里希就可以在五月底签署协议。

接着，建立了四个特别行动队。这四个队按地理位置分散在前线。^① 担任它们领导的是经受过考验的老纳粹党人，因为他们摆脱了希姆莱喜欢谴责的那种良心上的顾虑。

每个特别行动队配备一千到一千二百人，必须经过周密考虑后才能组织起来，然后按一定人数分别组成特遣队。在一千个人员当中，武装党卫队成员约三百五十个，司机和

^① 特别行动队的分布情况：A，波罗的海国家；B，斯摩棱斯克，莫斯科；C，基辅地区；D，南乌克兰。

技师一百五十个，盖世太保成员一百个，当地招募的外国辅助警察八十个，治安警察一百三十个，刑警四十到五十个，党卫队保安处的成员三十到三十五个。其余的人分别担任翻译，电报员，电传打字员，管理员和妇女工作，因为谋杀集团里也有妇女（每个特别行动队里配备十到十五个）。当然，领导职务均由盖世太保的人霸占，少数不重要的职务则有党卫队保安处和刑事警察的成员担任。

一九四一年六月底，特遣队准备在七月初开始行动。根据上级指令，一开始必须“消灭”犹太人和政治委员。海德里希的德国中央保安局首脑的代表——武装党卫队中将布鲁诺·施特雷肯巴赫于六月中旬专程从柏林去普雷茨，在一次会议上向特遣队队长下达了这些命令。这些命令指出，屠杀包括儿童在内的全体犹太居民。因此在里加一地就枪决了三万五千个犹太人。党卫队大队长兼警察局长埃里希·冯·巴赫·采列乌斯基在一九四一年十月三十一日骄傲地报告说：“埃斯特兰德一个犹太人也没有了。”

这就表明了特遣队是如何同“游击队”进行斗争的。为了从中获得一个明确的概念，有必要阐述一下党卫队戈特贝格将军领导的“科特普斯作战计划”的结局：

敌人的死亡人数	四千五百人
游击队嫌疑分子的	
死亡人数	五千人
德国人的死亡人数	五十九人
缴获的武器	四百九十二支枪

在九千五百个死者身上缴获的枪不到五百支。这些数

字说明,为什么只死了五十九个德国人,同时也说明党卫队把他们在半路上遇到的所有俄国农民都看作是“游击队”。驻白俄罗斯的帝国委员威廉·库贝在一封“科特普斯作战计划”的报告中写道,“由于对妇女和儿童进行多次枪杀,他们赐给和平居民的道义上的影响简直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随着这些谋杀而来的是有组织的掠夺。所有可用的东西如:鞋子、皮货、衣服、手饰、黄金、贵重物品被一抢而空。妇女手指上的戒指被夺走;在枪杀犹太人之前,为了利用他们的东西,必须叫他们脱光衣服,夺去他们身上的一切有用之物,掠夺物上交给德国中央保安局,再由保安局把它们交给德国财政部。纳粹党人也利用谋杀来作为向国家提供资金的手段。

许多亲眼目睹者描述了搜捕犹太人、屠杀犹太人时的情景。也许德国土木工程师赫尔曼·格拉伯的描述最为详细、最有说服力。他是斯托布诺夫的一家德国建筑公司乌克兰分公司的领导人。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四日夜晩,当罗夫诺犹太区里的五千个犹太人被杀害时,他正好在那里参观工地。在这些不幸者当中,大约有一百个人是在格拉伯那里工作的,所以他以缺少工人为理由设法营救他们。他寻访了一个个突击队长并向当局呼吁,他是这天晚上悲剧场面的见证人,而这种悲剧在整个东欧重演了上千次。在纽伦堡,他非常激动地讲述了这一切。

七月十三日晚上十点钟左右,党卫队带领的乌克兰民兵包围了罗夫诺犹太区,周围架设了强烈的探照灯。接着

乌克兰人和党卫队分成小股，冲进屋内，用枪托击敲房门；当房门打不开时，就把手榴弹扔进屋内。党卫队员象过去那样用狗鞭子催促居民快走，结果居民们往往来不及穿好衣服就得离开家门，让孩子们独自漂泊四方：

“在街上，妇女们哭哭啼啼要她们的孩子，孩子们也哭哭啼啼要他们的父母。但是党卫队却无动于衷，不断地鞭打他们，并且把他们驱赶到等在马路那一边的货运列车旁。每节车厢里，人塞得满满的，妇女和孩子的喊叫声、鞭子声和枪声此起彼落，经久不息……。这些受到鞭打、驱赶和受伤的人整夜在照亮的街上摇摇晃晃地走着。妇女们把已死的孩子抱在怀里，孩子们拖拉着他们已死的父母的手脚，走过大街，来到列车前……在我所经过的街上看到几十具不同年龄的男女尸体。房门打开着，窗玻璃已被打碎。满街都是衣服、鞋子、袜子、上衣、各种帽子、大衣等等。在一幢房子的墙角处躺着一个不满一岁的婴儿，头颅已经被击碎，鲜血和脑髓粘附在墙上，孩子的脸部难以分辨清楚。他只穿着一件小衬衫。党卫队突击队大队长皮茨司令官手里拿着一根很粗的狗鞭子①在八十至一百名蹲在地上的犹太男子身边来回走着。”

那些不幸者一面受到驱赶，一面被塞进卡车里，押赴刑场。凶手专门找一些人烟稀少、离开搜捕地点几公里的偏僻地方作为刑场。那里早已挖好长长的渠沟，殉难者从卡

① 1945年11月10日，赫尔曼·弗里德里希·格拉伯的有关1942年7月13日和14日在西乌克兰罗夫诺屠杀犹太人的口供书。《国际军事法庭文件》脚注2992。

车上下来时，凶手不让他们看见这些渠沟，然后把他们分成二十人、五十人或一百人一组带往渠沟。他们必须脱光衣服，在渠沟边上排列成行或者干脆跳入已经堆满尸体的渠沟里。周围站着备有武器，手里拿着狗鞭子的党卫队员。有时甚至只有一个党卫队员朝殉难者的头部挨次开枪。如果在渠沟里尸体堆满了，就用泥土覆盖填平。

有时党卫队员强迫殉难者卧倒在刚被枪杀的尸体上并朝他们的颈部开枪。几万乃至几十万苏联公民就是这样惨遭杀害的。一九四二年十月，在明斯克犹太区，仅一天时间就杀害了幸存的一万六千名犹太人。基辅有十九万五千人在战争中被杀害。

明斯克发生过这样一个事件，其结果成为纳粹所作的最令人可怕的发明之一。一九四一年八月底，希姆莱到明斯克视察旅行，希望亲眼目睹对监狱囚犯的枪杀。负责这项工作的突击队办事太不谨慎，因此把那些只是受了重伤的人也不分青红皂白地一起埋葬了。明斯克也发生过类似事件。但是当希姆莱正在命令他人进行枪杀时，看到不幸者、其中有妇女跌倒在地，身子还在颤动，嘴里发出微弱的声音，试图引起人们的注意，他顿时失去了自己那种众所周知的对万事无动于衷的本能，象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那样昏迷了过去。

明斯克事件给希姆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他重返柏林以后发布命令说，今后枪杀妇女和儿童时不要使用“精神上的折磨”，目的是让所有已婚的男突击队员不再把妇女和儿童当作枪杀的目标。一种典型的纳粹思想方法是：任

什么时候都不要去想禁止处决妇女和儿童，而恰恰相反是要他们加倍忍受那些枪杀令，结果从那时起，有更多的妇女和儿童遭到枪杀。

为了执行希姆莱的命令，党卫队的一个工程师正在着手研究一项工作。那些称为“S 载重汽车”的可怕的机器都是由这个纳粹技师、党卫队突击队中队长贝克尔博士设计出来的。

奥仑道夫对这些机器作了如下的描述：“从外表上看不出这种毒气车有何用途。实际上它们是封闭式的载重汽车。它们装置得非常巧妙，马达起动后，毒气就被吸入车内，大约十分钟至十五分钟以后就会导致人的死亡……汽车载着殉难者，然后驶往安葬场，这种安葬场同大屠杀时所使用的安葬场通常是一模一样的，运送囚犯尸体的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①

载重汽车的造型大小不一，一般可容纳十五人到二十五人。要是把妇女和儿童押上车，就得编造出一个借口，说要把他们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只要车门一关上，那么完全密封的车内就成了一间正在行驶中的毒气室。

贝克尔在完成自己的设计工作之后，委托突击队大队长、德国中央保安局运输科科长劳夫及其助手茨瓦培尔去执行这项工作。绍雷尔载重汽车厂接受了制造这些车辆的任务。车上都标有“S”记号，同时说明特殊用途和制造厂，这些汽车最早出现在一九四二年春，是用来装备特别队的。

① 德国中央保安局第三局局长奥托·奥仑道夫在1946年1月3日的供词。《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4卷，第356页。

负责制造这些杀人汽车的是贝克尔工程师，而劳夫则是负责汽车的保养。

可是与贝克尔和希姆莱的期望相反，“S载重汽车”根本没有解决杀人问题。居民们很快知道，登上一辆这样的汽车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不久就称呼它们是“死亡车”。为此必须玩弄一些迷惑人的花招。贝克尔写道：“我在小汽车两旁安装两扇百叶窗，看上去象乡下农民的住房，这样D组的汽车可伪装成居住用的大篷车了……我认为，汽车可以伪装，但不能长期隐瞒。……用毒气杀人并不十分顺利。为了尽快完成这项行动，司机一律开足马力。由于采取这项措施，那些被处死者不是按规定那样死于催眠，而是死于窒息。我的指导奏了效，一旦正确地校准操纵杆之后，死亡很快就来临了。这时，囚犯安详地睡着了，以前所看到的那种因中毒气而走了样的脸和大小便的现象此时再也看不到了。”^①

人们可以想象得出，党卫队的一个司机坐在这样一辆汽车的方向盘旁边，驾车在一条被国防军的装甲车压坏了的乌克兰大街上隆隆驶过，而在他的后面却有二十五个妇女和儿童挤在密封的、令人窒息的毒气铁牢里摇摇晃晃地死去。当他们到达最后目的地时，等待他们的是一个已经塞满了许多僵尸的土坑。

不久，司机和突击队员发牢骚说，他们得了严重的头痛病，而且断言，他们到达目的地以后，打开车门时吸进了大量毒气。他们在车内看到的一切实在令人可怕，说真的，他们

^① 1942年5月16日，党卫队突击队中队长贝克尔博士给大队长劳夫的报告。《国际军事法庭文件》脚注501。

对“这种肮脏的事”表示不满，可又不得不把那些缩成一团的、弄脏了的尸体拉出来，看来这是他们所不愿意干的事情。

纵然如此，S车队还是行驶了几个月，而且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也使用过。罗兹地区的盖世太保头子布劳恩菲施供认说，驻扎在切尔诺的库姆霍夫特别队在行驶着的毒气室里消灭了三万四千名犹太人。

使用这些车辆始终是保密的，特遣队的全体人员有责任对他们的全部行动，尤其对S载重汽车的作用绝对保密。在明斯克，有一个司机在醉意之中谈到了他的汽车，结果被党卫队法庭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不过关于这类肮脏事情的文件在德国档案中已经找到，并在纽伦堡公布于众。

最后，由于发生多次意外事件，不得不放弃S载重汽车，仍旧恢复采用枪决和绞死的手段。

特别行动队的行动结果是永远也说不清楚的。奥仑道夫在纽伦堡说，在他指挥期间特别行动队消灭了大约九万人。巴尔的库姆一地所使用的特遣队，仅三个月就杀害了十三万五千名犹太人。

四个特别行动队在苏俄领土上杀害的人数估计为七十五万人。

东欧的特别行动队得到三十个警察团的支持，这些警察团由骷髅队中的党卫队组成。他们采用同样的方法。在克尔许，一个六岁的孩子被开枪打死，是因为他唱过一首苏联歌曲。同样在克尔许，一个九岁小孩被吊死在“萨柯—凡泽蒂”广场上，他只不过是为自己采摘了几只杏子而已。

当时，苏联被占区忍受着纳粹的暴行，希特勒入侵的东

欧和中欧其他国家也难幸免。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希特勒命令三军总司令和他们的参谋总长前来总理府开会。他在会上说，如果同波兰交战会引起同西方的一场冲突，那么对占领东欧的广大地区将是有利可图的。此外，不要把居民拉去当兵，而是要他们干些活儿。三月十六日，希特勒宣布建立“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它属于德意志帝国，但是可以保留一个“自治政府”。十分清楚，那纯粹是一个傀儡政府。三月十八日，牛赖特男爵被任命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最高摄政者。

牛赖特在德国内阁中占据特殊地位。自从“夺权”以来，他荣任外交部长，属于保守的政府成员。兴登堡之所以挑选这批政府成员，是要让他们去控制希特勒。一九三八年年初，牛赖特不得不承认，他同希特勒的外交政策意见不一。一九三八年二月四日，他的职务由里宾特洛甫接替。自那以后，他作为不管部部长，秘密内阁会议主席，一个没有任何职权的幽灵和国家防御会议委员已经停止了任何政治活动。

盖世太保在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后立即安置下来，同时把他们分支机构的网撒向全国，每个机构负责一个区。苏台德区组成一个特区。布拉格和布尔诺各建立一个总部办事处，捷克斯洛伐克的十五个城市各建立一个最高议会办事处，下设保安警察和保安处的一个地方分支机构，它同以后在法国建立的组织十分相似。

这十五个最高议会办事处由布拉格和布尔诺总部办事处领导，而总部办事处又由德国中央保安局第四局领导。

由于四十万德国人居住在保护国，几乎所有的人都成了间谍，因此，招募本地人的工作非常简单。这些心腹进行间谍活动，轻而易举地就能得到德国居民的帮助。

斯洛伐克人从德国人手里得到一个“独立的斯洛伐克的国家”之后，建立了自己的警察——“国家安全部”(USB)。实际上，它完全由盖世太保所操纵，绝大部分情况下是合作共事。只是在一九四四年斯洛伐克民族起义以后，盖世太保和党卫队保安处才把它们网撒到斯洛伐克。

布拉格的盖世太保头子伯梅从五月十五日到二十三日在布拉格和布尔诺两地逮捕了四千六百三十九人，大部分是秘密共产党员。根据伯梅的命令，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逮捕了早已拟好名单的八千个捷克斯洛伐克知名人士，并把他们投入集中营，几乎所有的人都死在那里。

第二年，党卫队中将，帝国总监的国务秘书卡尔·弗朗克在一篇演说中向“民族统一运动”的领导人预示说，如果有影响的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家拒绝在帝国效忠书上签字，就枪决二千名人质。

但是希特勒认为，牛赖特采取的措施还不够，决定为他配备一名较为得力的副总监。海德里希立即意识到这个职务可能会给他带来好处。再说，又有鲍曼的支持，他就可以泰然地出来竞争了。希姆莱懊丧地看到了这种伎俩，对他说来，海德里希成为一个愈来愈危险的对手，而且新的职务将加强他的权力，对此，希姆莱只能听之任之。

威廉·霍特尔说，希特勒答应过海德里希，任命他为德国内务部长，这正是希姆莱本人所追求、也是以后所得到的

那个职务。霍特尔的说法并没有得到官方文件的证实。但是不管怎样，海德里希想从布拉格的职务中谋取最大的利益，那是一清二楚的。

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希特勒把牛赖特召到柏林。他措词严厉地训斥他，说他缺乏坚定性，并坦率地告诉他，他已经任命海德里希为拥有广泛权力的副总监。牛赖特对这种责备表示抗议，并提出辞呈。如同往常那样，希特勒拒绝他辞职。但是准许他在九月二十七日休假。他一直休假到威廉·弗立克于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五日以同样的军衔接替他时为止。

九月二十九日，海德里希来到布拉格。他当了官方的德国副总监之后，马上行使保护国的全部权力。每天有一个空中信使和一条秘密的电报线路使他直接与柏林联系，更不用说还有德国中央保安局的特殊电话网和无线电通信网。两架飞机随时准备起飞，使他在紧急情况下，两小时内就可抵达柏林。

海德里希拒绝接管牛赖特的全班人马，他带来了自己的人员，一个他所信任的、由德国中央保安局官员以及包括女速记员组成的小组。他甚至想把施伦堡一起带来，但是施伦堡聪明地拒绝了，他怀疑这位领导的运气，也许还害怕他的复仇欲，正象奥仑道夫那样，他为了制止海德里希的高升，曾经在希姆莱手下工作时反对过他。

海德里希在布拉格安置好以后，立即采取更加严厉的镇压措施，对稍有挑战行为的人进行大屠杀。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四日，波希米亚-摩拉维亚的武装党

卫队队长向这位党卫队首脑作了汇报：

“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两地的全部武装党卫队执行了枪决任务以及在处以绞刑时进行了监督：

迄今为止的成绩是：

在布拉格： 九十九人被枪决

二十一人被绞死

在布尔诺：

五十四人被枪决

十七人被绞死

总共：一百九十一人(其中十六个犹太人)被处决。”^①

这种恐怖行动在第二个月愈加尖锐。十一月十七日，布拉格大学生举行反对纳粹党人的示威游行。当天，他们中有四百人被逮捕。十一月十九日，从大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人中拉出九个人，不经过法律程序就把他们处决了，有一千二百名大学生进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

一九四二年三月九日，海德里希为盖世太保赢得了在保护国有发布保护性拘留令的权利。

与此同时，他竭力号召德捷合作，在许诺和残酷制裁之间交替奉行一种类似在法国执行的所谓“软硬兼施的政策”。

为了使用“甜言蜜语”，海德里希从柏林带来了一个“技术顾问”，他挖空心思地在考虑，用什么煽动性的方法使捷克斯洛伐克工人喜欢国家社会主义，并能促使他们为德国

^① 1941年10月14日，党卫队首脑于特纳给希姆莱的报告。《国际军事法庭文件》脚注1972。

的军备经济效劳。这个人用了一个化名，但是每一个记忆犹新的人都知道，他就是托格勒，在国会纵火案中扮演了一个可悲角色的前共产党议员。几年前，海德里希把他从集中营里接了出来，利用他去完成卑鄙的任务。

然而，捷克斯洛伐克人不吃软的一套，因此，海德里希要让他们多尝尝鞭子的滋味。

在柏林，海德里希的努力和不顾一切而取得的结果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他的“威信”在提高。“软硬兼施”的政策成为卓越的、积极的外交手腕，是对付那些应予消灭的无纪律的民族的行动典范。可是由于东欧斗争日益停滞不前，这些民族都是生产上的潜在力量和劳动力，因而他们变得太有价值了。

一九四二年春，海德里希达到了他权力的顶峰，直接威胁到该政权的另外两个幕后策划者，他完全摆脱了那个希姆莱和自从赫斯飞往英国后成为希特勒影子的鲍曼。他一直想保持德国中央保安局的全面领导。事实上，即使不是根据头衔的话，他已经是波希米亚-摩拉维亚的帝国总监。尽管如此，他还是准备把手伸向德国内政部。希姆莱和鲍曼联合起来堵住了这个危险竞争者的道路。幸亏他的一次意外事件解救了他们。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新日报》报道说：“布拉格五月二十七日通讯。星期三上午，布拉格发生了谋杀党卫队大队长、德国副总监海德里希的事件。党卫队大队长海德里希受伤，但无生命危险。凡拿获凶手者，悬赏一千万克朗。”^①

^① 《新日报》，布拉格，1942年5月28日。

这份简短的报告书引起知情人对这起事件的无数猜测。每个人都在猜想谁是欲把海德里希置于死地的造反者。除希姆莱和鲍曼对他的消失表示关注外，还有其他一些人，他们虽然不很出名，但完全能够策划暗杀活动。象格莱维茨政变的组织者瑙约克斯，海德里希曾经解除过他的职务。因此，他怀恨在心，对他进行监视。但是大多数人认为，希姆莱是主谋者。众所周知，事情已经非常清楚。

五月二十七日一清早，海德里希刚从巴黎回来，途经柏林。这时他正坐在车子里，前往古老的皇城赫拉德欣，他那办公室的所在地。他刚从他的庄园——一座被他没收的布拉格近郊的王宫——那里过来，在自己那辆无顶篷的梅尔迪斯牌的赛车里享受着温暖的阳光。他跟往常一样，坐在司机旁边，这是一个候补司机，因为海德里希的那个久经考验的司机病倒了。

汽车进入市郊那条马路，在通往伏尔塔瓦河桥前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异常险要的转弯处。因此，司机不得不减低车速。这时，就在离马路边大约二十公尺的地方等着两个穿工人制服的人，每人手里推着一辆自行车。海德里希的汽车很快被认出来了，在这辆汽车的指示灯后面有两面旗子——党卫队队旗和国旗，况且海德里希总是在同一时间里乘车通过这条路的。

这两位“工人”名叫扬·库比斯和约瑟夫·加拜克，属于在英国建立的自由捷克外籍军团成员。他们是从一架英国飞机上用降落伞空降下来的。

就在汽车减速转弯的那一瞬间，两个汉子中的一个向

汽车跳去，朝海德里希开枪射击。这个候补司机被这次意外事件吓得目瞪口呆，毫无反应，因而忘记开足马力——这一点要是海德里希的固定司机肯定会做到的，而他反而把汽车停了下来，这时第二个人从他的“早餐袋”里拉出一颗金属子弹，朝汽车方向滚去，刹时间，子弹在车底下爆炸起来。

进行开枪还击的海德里希和司机一起倒了下去，而这两个“工人”在他们预先放在路边的一架小型喷雾器的掩护下，骑着自行车逃之夭夭。

海德里希立即被送往附近的市内医院，并由布拉格的第一流外科医生霍尔鲍姆教授立即动手术^①。他的肺部和下腹部多处遭受弹片而受重伤。因此，不得不把他的脾脏拿掉。弹片划伤了很多处，把衣服撕成碎片。霍尔鲍姆给他作了强烈的注射，防止伤口感染和骨疽。看来，海德里希的病体正在痊愈，因为已经可以用食了，但是到了六月三日那天，他的健康状况突然发生恶化。

希姆莱青年时期的朋友和医生格哈特、有名的外科医生沙尔勃鲁赫十分火急地前往布拉格。他们的治疗无济于事，后来争议不休，海德里希于六月四日早晨去世。

尸体解剖证明，他死于胸膜炎，可能是由于去掉脾脏之故。有些医生断言，真正的死亡原因乃是人的组织机构在去掉脾脏之后，忍受不了注射的缘故。但是这种论点并没有得到证实。

^① 霍尔鲍姆由于为驻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纳粹工作，故被判处强制劳动，1945年他在布拉格的一个住宅区里为排地雷而受重伤。当医生不准备照料他时，他乘机成功地到了莱比锡，最后死在那里。

海德里希之死成为采取血腥的报复措施的信号。三千多人被逮捕，布拉格和布尔诺的军事法庭宣判一千三百五十人死刑。五月二十七日，来自德国中央保安局的盖世太保、刑事警察和保安处国外科的头子缪勒、奈比和施伦堡聚集在布拉格进行调查。

他们可以改装炸弹的机械装置，这种炸弹是由英国人制造的一种器械，它可以使一颗金属子弹滚到指定的线路上。在八公尺距离内，它的作用精确无误。

库比斯和加拜克躲在隐藏着许多捷克斯洛伐克抵抗运动战士的卡尔·博罗茅斯教堂里。盖世太保发现了这个隐蔽处，党卫队包围了教堂，开枪打死了所有躲藏在那里、此刻正在进行自卫的人，但是盖世太保不知道，库比斯和加拜克是否在他们中间。

调查工作很快中断，可能是因为没有重视作深入的调查。所以他们就把这次暗杀活动作为恐怖屠杀的借口。就在发生暗杀活动的那天，柏林还枪杀了一百五十二名犹太人作为“报复”。

维也纳行政长官兼总督席拉赫，可能出于同他那位在布拉格被暗害的同伴的友好感情，在给鲍曼的一封信中建议，为了进行报复，轰炸英国一座历史上重要的文化城市，因为这颗炸弹是英国货。

接着对抵抗运动的拥护者，甚至对捷克斯洛伐克居民进行了大规模的追捕。在一万五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搜查了五千个行政区，有六百五十七人被立即枪决。最后作出决定，惩罚有窝藏刺客嫌疑的两座村庄：利迪策和莱扎基。

六月九日早晨，党卫队“欧根亲王”师的一个队在党卫队中队长马克斯·罗斯托克的命令下，包围了离开布拉格三十公里的乡镇利迪策。所有村民被驱赶在一起，然后把十六岁以上的男人同妇女和儿童分隔开来。男人和青年关在村长戈拉克的谷仓里，妇女和孩子关在学校里。凌晨，把男人和青年编为十人一组，带到谷仓后面的园子里，就地枪决。到下午四点钟的时候，已经枪杀了一百二十七人。在附近的克拉德诺矿山工作和在周围地区的森林里当伐木工的十九个居民被逮捕，押往布拉格，同利迪策的七个妇女一样，同样遭到枪杀。其他一百九十五名妇女被押往拉文斯布吕克。从母亲怀里夺走婴儿，然后把他们杀死，其他的孩子(大约九十名)被送往波兰的格奈塞瑙。其中由德国家庭抚养的十七人在一九四七年又被找到了。最后村庄也被夷为平地，房屋被烧毁、炸掉，凡是有设施的场所均被铲平。

六月十一日，德国《新日报》登载了以下的报道：

“在对杀害党卫队大队长海德里希的凶手进行搜寻过程中，无可辩驳地证明，克拉德诺附近的利迪策村民帮助并支持了犯人作案，尽管他们否认参与此事，但这一点已经得到证实。居民对待这样一种罪行的态度从对帝国的其他敌视活动中也得到了证实。例如被发现的有非法文件、武器库、军用物资、电台，以及许多非法储存的配给商品。所有男人均被枪决，妇女被送进集中营，小孩被送进一所教养院里。这个村庄的所有建筑物被夷为平地，村庄的名字也被涂掉。”^①

^① 《新日报》，1942年6月11日。

对和平村庄采取这样一种报复行为，是要让德国居民知道任何抗议都是不允许的。命令采取这个“行动”的人是国务秘书兼党卫队分队长卡尔·赫尔曼·弗朗克，从此以后，他被称为“利迪策的屠夫”，他有权可以不经起诉任意处死某人。

海德里希死后，纳粹的野蛮暴行才真正咆哮起来。逮捕的次数增多、速度加快。囚犯甚至在监狱里就遭杀害。在布拉格的潘克拉克监狱杀害了一千七百名捷克斯洛伐克人，有一千三百人死在已经变为一个监狱的布尔诺的科米克学校里。

纳粹党人不能粉碎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抵抗。因此，直至最后对他们还是非常恼火。据估计，单单进入布尔诺监狱的就有二十万人，其中只有五万人准予释放，其余的人要么被杀害，要么被送到集中营里，让他们慢慢地死去。

总共有三十万五千个捷克斯洛伐克人被关进集中营，只有七万五千人免于一死，其中二万三千人的健康状况受到很大损害，以致很少有维持其生命的希望。直到一九四三年才公布处决令，在这以前几乎是保密的，但是每月仍然要处决一百个人。当纳粹党人撤离捷克斯洛伐克时，有三十六万人死于他们的统治之下。

由于海德里希之死，德国中央保安局已成为无主之仆。希姆莱在柏林的追悼会上说了几句双关语，使那些企图指望得到继承的人可以从悼词的字里行间听出一种威胁。希姆莱决定，德国中央保安局的领导权暂时由自己接管。这样他可以控制几乎已经失去了的这架庞大的机器，直到他

为海德里希选出一个继承人——一个不再是与她竞争的
人。

海德里希的遗像在希姆莱的写字台上已经放了几个月了。大家不明白，他是在其中发现了一种出于尊重而去纪念死者的迹象呢，还是为了永远回忆这次“最后的胜利”。德国中央保安局的大多数头目都选择第二种说法。不管怎样，这幅遗像总有一天会从写字台上不声不响地消失掉。

在赫斯于一九四一年五月十日飞往英国之后，缪勒早已秘密地清洗了元首前代表的周围人员。所有与赫斯有直接联系的人，他的同事、助手、秘书，甚至司机均被逮捕。因为赫斯对人类学家鲁道夫·施泰纳的学说很感兴趣，因此，他的拥护者也被逮捕，同时被捕的有先见之明者和占星家，因为赫斯在飞往英国之前，曾经同这些人商议过。虔信占星学的希姆莱对这些人的被捕听之任之，这就给海德里希带来了祸害。

海德里希死后，大家料到会出现同样的清洗，不过它是在小范围内进行的。德国中央保安局各局头目总是利用希姆莱的党去反对海德里希，从而保住他们的饭碗。这次清洗，只罢免了几个由海德里希新吸收进来的人的职务。此外，象赫特尔那些人（还有许多其他人）曾经是海德里希所痛恨的，而此时他们相反却得到了新的职务。

希姆莱在决定海德里希的继承人之前，考虑了八个月时间。一九四三年一月底在公布继承人的姓名时，人们普遍感到惊讶。德国中央保安局的新首脑竟来自第二号人物，而且没有人能预见到他的突然走运。希姆莱考虑施伦堡由

来已久，由于他年轻有为，希姆莱有足够的靠山去反对可能发生的竞争。但是正由于施伦堡的年轻，希特勒才拒绝了这项建议，因此，在一九四三年一月三十日，他任命一位奥地利人、老纳粹党员恩斯特·卡尔登勃鲁纳博士为德国中央保安局的头子。

恩斯特·卡尔登勃鲁纳于一九〇三年十月四日出生在离布劳瑙不远英克雷斯的里德，与元首的出生地点相同，所以一般说来，他的任命只能以此为根据了。

卡尔登勃鲁纳一家世代居住在那里，许多乡村手工业者走在这位新的纳粹达官贵人的祖父的前面，而这位达官贵人第一个跳出了这个半农世界，成为一名律师。恩斯特的父亲雨果·卡尔登勃鲁纳也当过律师，开始在拉包，以后在林茨。恩斯特就是在林茨上的学，并毕了业。他学父亲的样，在格拉茨学习法律。他在那里参加其中一个最早的纳粹大学生小组，并同天主教—基督教社会派大学生发生粗鲁的殴打。他在二十三岁那年获得法律博士学位，一九二八年定居在林茨当了律师。他的最后两个学年很艰难，家里不能再负担他的生活，为了挣钱来继续他的学业，他只好到煤矿去做夜班。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八年，他在萨尔茨堡的一位律师那里担任审理案件的工作。

在整个这段时间里，卡尔登勃鲁纳在自由奥地利的独立运动中继续从事政治活动，这场运动导致他参加了纳粹党。一九三二年，他参加奥地利纳粹党，党员登记号码为300179，一九三三年参加了保密性差的奥地利党卫队，党员登记号码为13039，当时，奥地利党卫队开始把战斗队潜送

进奥地利。他被分配到以前属于阿道夫·艾克曼的那一个连队里。

在党卫队里，他立即起着一名队长的作用，并在上奥地利成为纳粹党的演说家。此外，他作为法律顾问免费为党员和弟兄们服务。

一九三三年，他被提升为党卫队第三十七冲击团队长。他的活动引起奥地利警察的注意。一九三四年他被捕，随同其他几个奥地利纳粹分子一起被送往凯泽斯坦因布鲁赫集中营。当时，陶尔斐斯试图用他们自己的方法反对纳粹分子，但是不敢明目张胆。在集中营里，卡尔登勃鲁纳很快在同犯中间赢得了许多拥护者。那是因为他的高大身材和他的体力比他的法律知识起着更大的作用。复活节那天，他成功地组织全体同犯进行绝食，结果使得国务秘书卡尔温斯基只好服从陶尔斐斯的命令视察集中营，并答应改善一些物质条件。这样，除卡尔登勃鲁纳的营房外，所有营房停止了绝食活动。被送进维也纳医院里的卡尔登勃鲁纳和他的营房同伙不得不在第十一天中断了绝食，因为禁止供应给他们水。不久，他们获得释放。

一九三四年期间，卡尔登勃鲁纳成为党卫队第八师的领导人，但是他没有参加一九三四年七月企图杀害陶尔斐斯的暴动。因此，许士尼格政府挑选象他那样有能力的一批纳粹分子，促使一九三四年九月开始的政治安定导致成功。但是这种安定的尝试失败了，一九三五年五月，卡尔登勃鲁纳由于同德国党卫队的关系被指控为叛逆罪而重新被逮捕。六个月以后，他出庭受审。法庭指控他图谋造反，

但是缺乏证据，所以判处他拘留六个月。与此同时，律师协会因他参与政治活动而把他开除出去。在他被捕前不久，他已经被任命为奥地利党卫队的队长。

卡尔登勃鲁纳再次获释后，就致力于各派的联合工作。当时，纳粹思想处于低潮，甚至遇到坚决的抵抗，宣传“同伟大的兄弟民族的团结”显得容易些。他们在进行宣传的时候，使用那些“同血统、同种族和同语言”的俗语，因而符合多数奥地利人民的一种渴望。随着奥地利加入帝国，它的居民将会陷入纳粹立法之下的这个事实，大家却熟视无睹，奥地利人不得不忍受许士尼格政府的保守专制，不去注意这个专制的细节。

在遵照德国指示进行的这场运动中，卡尔登勃鲁纳结识了赛斯-英夸特，他同赛斯一起致力于各派联合的准备工作。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一日，赛斯任命他在自己的内阁中担任公安国务秘书。三月十二日三点钟，卡尔登勃鲁纳迎接了第一个到达维也纳阿斯佩伦机场的希姆莱，扼要地向他汇报了纳粹党人所取得的巨大胜利。当时，他把奥地利党卫队——他是该队队长——置于希姆莱的最高领导之下。合并那天，希特勒任命他为党卫队旅队长(少将)兼多瑙河上游地区的党卫队长。六个月以后，他被提升为党卫队分队长(中将)。与此同时，他也成了国会议员。

在结束因联合而引起的在奥地利的冒险活动之后，卡尔登勃鲁纳过着党卫队干部的舒服生活。由于他先后被任命为维也纳地区以及多瑙河上游和下游地区的党卫队长，一九四一年任警察局长，他几乎成了奥地利的希姆莱，但是

没有实权,只是柏林命令的简单传声筒,而且比缪勒、奈比或施伦堡掌握的权还要少。不过这个职务倒可以使他放手去实现他想要在情报处这个领域经受考验的思想。他组织一个从奥地利延伸到东南方向的重要的情报网,这样他可以把非常精确的报告送到柏林,以引起希姆莱和希特勒的注意。

卡尔登勃鲁纳的这种特殊工作就是希姆莱为什么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让他到伯希特斯加登来的原因。希姆莱曾经说过,把所有兴趣都倾注在情报处的这个人永远不会成为他的危险的对手。

为了使事情有个着落,希姆莱明确地向卡尔登勃鲁纳说明,他的主要任务是组织一个包罗万象的情报处。卡尔登勃鲁纳有些顾虑,他担心,他的行政职务可能会阻碍他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希姆莱预料到他会不同意,便向他保证,他可以继续保持德国中央保安局的实际领导权,而且向他提供象缪勒和奈比那样的“优秀专家”。

“他们一定不会这么干的,”他最后说。“他们要的只是情报部门,即第三局和第四局。”

这种安排使双方都满意:希姆莱可以十拿九稳地掌握所有警察事务的实权,而卡尔登勃鲁纳终于可以着手把他的理论在欧洲使用。在这些理论中,他首先认为,德国侦察工作中的缺陷绝大部分应归咎于把它分为政治的和军事的情报处。除法国和德国采用奇怪的模仿方法而犯了同样错误外,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这么划分的,合并两个情报处的这种想法颇有成效,使德国中央保安局基本上得到最后的改组,纳粹党取得对国防军的最后胜利。限制卡尔登

勃鲁纳的职务完全是理论方面的，它只会给希姆莱以干涉德国中央保安局内部事务的权利。不过卡尔登勃鲁纳也同样为自己搞到了德国中央保安局的行政权。他有权签发命令，而且正式批准拘留、枪决和发布日常指示等等。

这个汉子以海德里希继承者的身份，于一九四三年一月底抵达柏林。他真是个巨人，身高一公尺九十公分以上，肩膀宽阔，长长的脸上露出一副凶相，看上去阴沉沉的，活象在木头中被人砍出来一样。

一个宽阔的平额头，虽然高高的，但一点不象聪明人常见的；一双棕褐色的小眼睛，深陷在眼窝里，浓眉半遮，露出凶光；一张阔嘴配着两片薄嘴唇抿成一条缝；四方的下颚，硕大无比，一脸横肉块块，简直难以描绘，给人总的印象是又粗又笨。当时的恩斯特·卡尔登勃鲁纳就是这副嘴脸。

条条剑伤的疤痕使这张几乎没有表情的蠢脸更为令人讨厌。他说起话来慢条斯理，满口奥地利腔，声音低沉，由于酗酒过度，不一会儿声音就变得嘶哑不清。他烟不离嘴，每天要抽八十支到一百支，手指和指甲被烟熏得蜡黄，一股烟味。十点钟左右，他便开始喝香槟酒和其他各种烈酒，他特别爱喝叫人从法国弄来的白兰地。听人说话时，他一边用酒鬼特有的茫然又呆板的目光盯着对方，象在打量着你，但又没有注意你，仿佛是失去灵魂的幻影，一边从发黄的牙齿缝间挤出几句令人费解的话来。虽说希姆莱一再劝告他，可他总是下不了决心去请牙医看看，似乎看一趟医生会要他的命似的。

希姆莱有意识地把德国中央保安局委托给了这样一个

平平庸庸的人，实际领导权仍掌握在他的手里。他不怕被人出卖；卡尔登勃鲁纳是个狂热的纳粹党徒、一个信仰党的教条的信徒，唯独这个党能使他摇摆不定的性格坚强一点。他对这一任命表示心满意足。然而，没有施伦堡的帮助和对他有利的形势，那他也许永远看不到他的理论会得到实现。事实上，纳粹间谍的真正头子是施伦堡，他同希姆莱保持直接联系。虽然从理论上来说，他由卡尔登勃鲁纳领导，但是他早已摆脱了等级的依附关系。

尽管如此，卡尔登勃鲁纳还是认真地对待他所扮演的那个角色。象他的前任一样，他是个集中营和灭绝营的供应者。所不同的是，海德里希在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看到东部战局恶化，会用更为狡猾的方法去争取部分居民合作，而卡尔登勃鲁纳却不会随机应变，一味采取最野蛮的镇压措施。

他会毫不踌躇地亲自监督在集中营里所使用的方法。当他还在奥地利担任警察局长时（一九四二年秋），他视察了毛特豪森，观看囚犯是如何被送进毒气室的，同时透过门上的圆形窥视孔观察他们是如何垂死挣扎的。

一九四三年初，他又回到毛特豪森。这一次给他表演了对囚犯进行“试验”的三种处决法：绞死、朝颈项开枪、最后送毒气室。据集中营囚犯和工作人员说，卡尔登勃鲁纳到达后，情绪很好，接着走到那里正在进行“试验”的毒气室，他谈笑风生地等着人们把不幸者一一带进来。

当卡尔登勃鲁纳接替海德里希职务时，德国中央保安局已经成为一架巨大的机器。德国人对官僚政治的嗜好可

以在这个神经中枢里得到满足，从欧洲最遥远的地点送来的情报就汇集在这里，然后再向上述地点发号施令。办公室、卡片索引、窃听中心、电台中心、实验室、档案室：这一切已经发展到了使艾尔布莱希特亲王街的门窗架挤坏，因而不得不向柏林其他地方发展，当时仅在柏林一地就有许多局被安置在这三十八幢大楼里。

当所有这些大楼不同程度地受到空袭的严重破坏以后，希姆莱进行了革新。在库菲斯滕丹大街一百十六号里的那些最重要的局的头目们，天天聚在一起用早餐。艾希曼的办公室也设在那条街上。坐在桌子旁的是些使欧洲为之颤抖的人物。卡尔登勃鲁纳热情地接待艾希曼。他们出生于同一个地方，有着某些方面的共同关系。他总是抓住机会，对他所熟悉的、住在林茨的艾希曼一家问长问短，或者问问孩子们在学校里学得怎么样，亲爱的、年迈的祖父母贵体可佳，以及这个小天地的兴隆情况。两人间的这种相互问候、相互亲切的关怀与在同一天早晨，用上一笔之力就决定了数千名不幸者的命运，或者在早宴后，说上一句话，或者签上一个字就可以把欧洲另一端的成千上万个殉难者判处死刑相比显得自相矛盾，其实从纳粹教条的观点看来是不矛盾的。

希姆莱尽可能多地参加这种早宴。他认为，这样的早餐碰头会是重新鼓舞他助手振作士气的好机会，因为他们眼看东线战事节节败退，或者由于最近英美对德国空袭增加，因而有时动摇起来。在这些碰头会上，气氛总是很乐观、很诚恳，虽然原则上不许谈论工作，但是也经常发生这

种情况，缪勒或者艾希曼利用机会，向卡尔登勃鲁纳或者希姆莱问这问那。大家一边吃水果、干酪或者品尝一杯法国白兰地酒，一边就作出抉择，究竟干掉哪一类囚犯，或者喜欢采取哪一种处决法。这些谈话看来令人难以置信，但是对于这批家伙说来，那是家常便饭的事。因此，当他们把咖啡杯举到嘴边上来的时候，他们的手毫不颤抖。

在共进早餐这段期间，也讨论了第一批毒气室的设备以及为消灭犹太人而进行的那些试验的结果。他们把相互竞赛的高效力、低成本和使用方便的各种方法作了比较。这批家伙一面就餐、一面津津有味地交换了见不得人的坏主意，有时甚至连刀叉都顾不得放下一会儿。正象吉斯维乌斯所说，独有曾经投奔到谍报局当了谋叛者的奈比在听了这些谈话之后，心里很难过。因此，回去时“完全精疲力尽”了。

如果希姆莱不在场，就由卡尔登勃鲁纳主持。他在会上经常利用机会，攻击他所不喜欢的下属和同希姆莱有直接关系而激怒他的这些人。他的那些刻薄话经常是针对希姆莱的宠儿施伦堡的。对此施伦堡很有意见，并请求希姆莱免除他参加早餐会，但是这位党卫队头子非常重视这种安排，因而不允许有任何的例外。

尽管卡尔登勃鲁纳曾经受到希姆莱的保护，但他在进入德国中央保安局之后，仍然保留着他狭隘的思想和法律家的素质。

“卡尔登勃鲁纳上任以后，情形每况愈下。根据我们以往得出的经验，象海德里希这样一个凶手也许不象一个具

有冷酷的法律逻辑的律师那样糟糕，而这位律师所扮演的却是象盖世太保那样的一种危害公共安全的工具。”^①

艾希曼在盖世太保里面已经成为第四局的头子。虽然他是由缪勒的行政部门领导的，但他不断同卡尔登勃鲁纳保持联系，甚至经常直接从希姆莱那里接受命令。他得到的任务是“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这就是说：彻底消灭欧洲的犹太人。海德里希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九日组织的那场“自发性”的大屠杀使全面反犹政策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根据纽伦堡军事法庭的估计，在德国和被占国里，有六百万犹太人成为该政策的牺牲品。鲍曼在一九四三年七月一日颁布一项法令，艾希曼对屠杀犹太人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该法令剥夺了犹太人在正式法庭上的任何否认权，而且把他们置于盖世太保的唯一审判之下。

一九四二年十月九日，颁布了一项同样由鲍曼签署的命令，该项命令规定，不要再通过移民法，而仍然要通过在东部特殊营里所使用的那种“无情的暴力”，不断地去消灭大德意志帝国地区的犹太人。

大屠杀方式首先在东部使用，然后过渡到采用科学和工业方法杀人。艾希曼建立了四个集中营，最有名的是毛特豪森。其设备和建筑都说明纳粹党人打算在战胜和驯服整个欧洲之后，把灭绝政策看作长时间所需要的、而且必须要继续发展的一项工程。消灭犹太人之后，还有许许多多

^① 1946年4月25日，吉斯维乌斯在纽伦堡的作证词。《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12卷，第283页。

多的对手留待于去消灭。

“在一座山顶上，兴建了一座高大的石堡，周围尽是小营房。除了它固有的牢房以外，毛特豪森还拥有许多官兵居住的宿营地，宽敞的餐室和盥洗室。但是目的只有一个，即消灭围墙内的一切所谓的囚犯。毛特豪森集中营的一些分营直接受驻扎在那里的党卫队军官指挥。下达给这些分营的所有报告、命令和例行公事都由毛特豪森集中营一手包办。其它的集中营，包括两个最大、最臭名昭著的分营古森和埃本泽，不仅用来进行屠杀，而且还要把那里的俘虏当作建筑和生产工具使用，直至他们因挨打、挨饿而不能再进行工作时为止。俘虏一旦不能工作，通常就把他们送往毛特豪森作最后解决。”^①

艾希曼给护送队制定出一项制度，那些已被判处死刑的欧洲犹太人由他们护送到集中营。每次护送多少，要根据集中营的接收能力和德国铁路局提供的车皮而定。

灭绝营的司令官只是奉艾希曼之命，用毒气杀死囚犯。运输队长——一个党卫队军官在接到命令后，应该对列车是否驶往灭绝营以及应该如何处理这些被押送者作出决定。例如，护送队根据指示，把凡标有“A”或“M”、“奥斯威辛”、“马伊达内克”字样的人都用毒气来把他们杀死。

在奥斯威辛，通常采取下列方法：标有特殊指示牌的车厢运送年满十四至十六岁的孩子、五十岁以上的人，以及

^① 1945年6月17日，美国陆军第三军军法处长办公室的报告。《国际军事法庭文件》脚注2176。

病人(或者在刑事犯登记表上的人),一俟他们到达后,立即被送进毒气室。其他人要在一个党卫队医生的身边走过,由他凭眼力决定,谁有能力工作或谁没有能力工作。没有能力工作的人进毒气室,其余人均被分配到各个劳动营里。

把囚犯安置到劳动营去显然是一种临时措施,因为那些在“挑选”时得以幸免一死的人必须在非人的条件下干活,所以很快也会精疲力尽,最后还是同其他人一样进入毒气室。

在波兰东部使用一种特别残忍的方法,它的发明者是克里斯蒂安·维尔特,一个由德国中央保安局在卢布林任用的前斯图加特的刑事警官①。

维尔特在犹太居民中挑选出一批罪犯并答应他们说,如果他们为各项工作招收到乐意的“合作者”的话,就给他们以优厚的物质待遇。他用这种办法终于找到了约五千名男女,这些人的任务是参与毒打犹太人,消灭那些与自己同教派的不幸教友,以此苟且偷生。

据康拉德·莫根在纽伦堡供认,在“大行政区”东部的森林和荒野里,兴建了伪装的灭绝营,那是真正的“波将金村子”②。那些注定要消灭的犹太人在到达这里以后感觉来到了一个大的居住点。列车驶进了一个伪装的车站,等护送队和列车人员离开之后,才允许犹太人下车。犹太人

① 早在那时候,维尔特就在吹嘘他的特别审讯法了,不过这种审讯法引起了符腾堡州议会的质问。

② 波将金:俄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陆军元帅。“波将金村子”是借用波将金的名字命名的村子。在这里带有欺骗的意思。——译者

下车以后，立即被那些招募来的犹太人团团围住，这时由维尔特或者某个代表向他们训话。他说：“犹太人，你们迁移到这里来，是为了换个地方。但是在我们为你们组织这个未来的犹太国之前，你们当然必须学习劳动。你们必须寻找一个新的职业。你们在这里将学会一切。就这样开始吧，根据规定，每人脱去衣服，这样可以把衣服消消毒，再说你们可以洗个澡，不至于把流行病带到集中营里来。”

接着，犹太人排成纵队，朝“过道营”走去。在第一次停步时，男人就与妇女分隔开来，因为他们必须在不同的“衣帽间”里交出帽子、上衣、衬衫、鞋子和袜子，每交出一件东西便得到一块号码牌，“因此，这些人认为，他们也许以后可以拿回自己的东西”。因为这出恶魔似的戏整个儿是由维尔特雇佣的犹太人扮演的，所以不会引起不幸者的怀疑。要是他们的已背叛的教友催促他们赶紧走，“免得他们有所察觉，那么他们也会乐意地尾随在后。整个进程象条流水带似的，他们在到达最后一站时，就进入一间大房屋，有人说，这可能是间浴室。当最后一个人进入里面时，各道房门即刻关闭。接着，有人把毒气放进室内。里面的人死去之后，排风机立即开始转动。当毒气被排除以后，大门自动开启，犹太辅助工就把尸体一个一个地拖出来。”^①

维尔特施行这种方法不费吹灰之力，因为他以前的任务就是在颁布无痛苦致死术的法令之后负责杀害不能医治的精神病患者，而此刻由于他在这方面取得“优异成果”，因此仍然负责这项任务。

^① 1946年8月7日，党卫队法官莫根在纽伦堡的供词。

第三章

纳粹研究者的“科学实验”

卡尔登勃鲁纳成为德国中央保安局的头目以后，他的职权大大地扩大了。

德国中央保安局的权力范围扩大到象盖世太保一样，看守战俘和民工。

战俘营由国防军进行监督，有人也许会想，最高统帅部对下属军官和士兵进行适当的保护该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此刻这种国际法被恶意地歪曲了，再说，盖世太保成功地对这个领域进行了干预。最高统帅部不仅不反对，甚至同希姆莱及其间谍同流合污。事态会发展到如此地步，是因为它在对待国内的大屠杀和欺诈掠夺、以及后来又在对待特别行动队方面采取了“默认”的态度，这样，最高统帅部终于在这条下坡路上滑了下去，以致它渐渐地容忍了那些最卑鄙的谋杀手段，最后连自己也采取了这种方法。

对付苏联战俘是采用第一种措施。一九四一年七月，公共国防局局长赫尔曼·莱因纳克将军、战俘局的布罗伊尔、谍报局处长埃尔温·冯·拉豪森将军和代表德国中央保安局的盖世太保头子缪勒之间举行了会谈。根据希特勒指示的精神，这次会谈的结果是决定在东部发动战争。

一九四一年九月八日，这项决议上这么写着：“……布尔什维克士兵由此失去了按照日内瓦条约享受荣誉士兵待遇的任何权利。

……因此，对待有一点点反抗迹象的、特别是布尔什维克的煽动者，必须下令对他们采取无情而有力的措施。抗拒者、积极或消极的反抗者必须立即使用武器（刺刀、枪托和枪炮）予以全部消灭……

无论谁在执行下达的命令时，不使用或者不够有力地使用武器，谁就要受到惩罚。

对逃跑的战俘不必喊停即可开枪射击。对苏联战俘使用武器，通常被认为是合法的，绝对不许采用鸣枪警告的方式。”^①

那时在盖世太保内部成立了一个战俘特别科，又称第四队，由党卫队突击队中队长弗兰茨·柯尼希豪斯领导。一九四三年初，它同党卫队突击队大队长汉斯-赫尔穆特·沃尔夫的第四科合并。

这个科向战俘营中的盖世太保代表下达指示。实际上，在所有战俘集中营里，盖世太保和党卫队保安处的间谍大部分是用化名伪装自己的。根据缪勒的一项指示，明确地命令他们去追踪“所有政治犯和刑事犯，或由于其他任何一个原因而不受欢迎的分子”以及“所有可用来重建被占区的人士”，其目的是要消灭他们，或者对他们进行“特殊处理”。除此之外，间谍们应该在俘虏当中发现看来是“可以信任”的

^① 1941年9月8日，莱因纳克就苏联战俘待遇的公告。《国际军事法庭文件》脚注1519。

人，这样就能利用他们在集中营内部进行间谍活动，并通过他们去发现必须要干掉的俘虏。盖世太保的方法总是千篇一律的。

苏联战俘的命运是个悲剧。在第二次大战中，多数士兵对德国的战俘集中营有所认识，因而不会忘记那批列队的俄国俘虏，他们于一九四一年秋被押送到那里，当时面容消瘦、饥肠辘辘、踉踉跄跄地走着。他们走了很多路，经常有几百公里。他们中的数千人受到百般虐待之后，精疲力竭地倒在公路边上死去。幸存者被挤在隔离的栏栅里。希姆莱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发布的一项命令中规定，把逃跑后重新被抓回到集中营的任何苏联俘虏，一律交给就近的盖世太保分站。这意味着立即进行处死。

一九四一年被拘禁在弗洛森堡集中营的二千个苏联战俘，其中只有一百人幸存下来。二万多人被杀害在奥斯威辛。

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日，最高统帅部发布一项命令，必须对那些还倔强地活着的俄国战俘刺上花纹：“……花纹的标记是一个向下开口的约四十五度的角，一厘米长，刺在臀部左下方，离开肛门约一手宽的腿上。它采用每个部队都有的那种刺血针来点刺。务必选用中国的墨汁作为颜料。”^①

从一九四〇年起，最高统帅部仿效纳粹党，采用政治方法杀人。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卡纳里斯同三个谍报处的头目和远距离侦察处主任比尔克纳海军上将举行了会谈，并向他的伙伴们揭露了这一情况：凯特尔曾明确地

^① 《国际军事法庭文件》USSR 343。凯特尔的女秘书在纽伦堡供认，该项命令在十天以后已取消。

命令他去干掉当时在北非的魏刚将军。凯特尔担心魏刚利用那里完整的法国军队建立一个抵抗中心。因此，慎重地命令凶手把他杀死。但是那时在谍报局内部已经形成了一个反希特勒的核心，而且卡纳里斯借口技术上的原因不能执行而回避了这项命令^①。

最高统帅部在得悉季劳德将军从柯尼施泰因城堡脱逃以后，先是考虑用在维希的一支小型党卫队特别队把他干掉，不过后来于一九四二年四月还是授权谍报局派人把他杀死了。凯特尔向卡纳里斯下达命令，再由他把这项命令转交给他在处里的一位领导埃尔温·冯·拉豪森将军。拉豪森并不十分忙于采取行动，因而在八月份受到了凯特尔的警告。这次行动采用“古斯塔夫”代号。拉豪森违反了凯特尔的命令，“错过”了与缪勒达成协议的机会。事情一开始就对谍报局不利，他们的这种“鬼主意”给人看来太明显了。然而，卡纳里斯还是顺利地逃避了他应负的责任。他伪称海德里希在布拉格举行的第三谍报局的会谈中，要求由卡纳里斯一人处理这件事。因为海德里希死于六月四日，所以卡纳里斯不存在要进行辟谣的危险，事情还是老样子。但是最高统帅部同盖世太保一样不打算为了报复而受骗上当。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当季劳德到达北非以后，有人对他的家庭采取了报复措施。将军的女儿格朗瑞夫人同她的四个孩子一起被捕，其中一个孩子只有两岁，同时被捕的还有将军的女婿和格朗瑞夫人的年轻的女佣人。格朗瑞夫人因无人照

^① 在占领法国南部之际，魏刚于1942年11月12日在维希附近被党卫队逮捕，随即被带往德国。

顾，于一九四三年九月死亡，因此，人们决定把孩子遣送回家。然而事与愿违：盖世太保在最后时刻反对释放孩子，半年以后，他们的祖母加入四个孩子的行列。总共有十七个季劳德的家属遭到逮捕和流放。

对付法国将军们的两项杀人计划未能付诸实行。有人说，纳粹党人可能要坚持犯罪，因为他们在一九四四年底恢复了同样的计划。不知什么原因，也许为了吓唬在战争中被俘的将军和挫败他们的逃跑计划，决定虚构一出企图逃跑的戏，干掉一、两个法国将军。为了使事情顺利地进行，命令把拘禁在柯尼施泰因城堡里的七十五个将军中的几个押往远离不到一百公里的科尔迪茨刑事犯集中营；这台“企图逃跑”的戏应该在去那里的路上演出。卡尔登勃鲁纳受委托与外长里宾特洛甫一起监视这个谋杀组织，尤其要准备回答行动以后由红十字会或者“受保护国”即法国提出的问题，这一点已与最高统帅部达成协议，因为他们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

卡尔登勃鲁纳委托第四处的前头目党卫队中队长潘青格尔负责行动计划的技术准备工作。他过去管理战俘的事务工作，奈比死后，作为他的继承人当上第五局局长（刑事警察）。潘青格尔想起了一种经过多次试验有效的方法：“S载重汽车”！他脑海里浮现出一种小型“S载重汽车”的设想。勒内·莫特马尔·德布瓦斯将军被选为第一个牺牲品。十一月底，潘青格尔和里宾特洛甫的代表瓦格纳进行了会谈，在给卡尔登勃鲁纳的报告中，他们对所制定好的这份计划作了如下说明：

“1. 在由五个人分乘三辆涂有国防军标记的汽车组成的车队行进途中,最后一辆汽车发生故障,五个人即行逃跑。

2. 借助汽车开动的动力,从司机座位后面关着的车厢里放出一氧化碳。有关器具可用最简便的方法装置,也可立即重新拆除。在克服了巨大的困难之后,那就可以搞到一辆如上述所要求的汽车了。

3. 用饮食进行毒杀的方法已作了试验,但是经过多次试验后,未被采纳,因为这太不安全了。

象报道、验尸、证书、安葬等善后工作要有条有理地逐项进行解决。

运输队长和司机由德国中央保安局提名,他们必须穿上国防军的制服,携带士兵证。”^①

因为在打电话时多次提到德布瓦斯将军的名字,有人担心将军的逃跑可能会引起国外的注意,所以最后决定挑选另外一个牺牲者。从这个例子可以说明,在纳粹统治下,一个人的生命是毫无价值的。

万事办妥以后,规定在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九日解送六名将军。用三辆汽车解送他们:坐在第一辆的是苔纳和德布瓦斯将军,坐在第二辆的是弗拉维尼和比松将军,坐在第三辆的是梅斯尼和伏蒂埃将军。三辆汽车的行驶时间相隔十五分钟,第一辆上午六点钟准时离开柯尼施泰因。然而,第三辆汽车的驶出时间在最后一分钟里给推迟了;突然取消解送伏蒂埃将军,而汽车于七点钟离开了只留下梅斯尼将军一个人的城堡。

^① 《国际军事法庭文件》脚注 4048。

梅斯尼没有到达科尔迪茨。翌晨，第四军官集中营的司令官普拉维尔少校通知四名将军说，梅斯尼将军在企图逃跑时被开枪打死在德累斯顿。

“在德累斯顿，他带着军人的一切荣誉进了坟墓，”普拉维尔补充说道。这个最后的安排是正确的，这出压台戏没有使纳粹党人感到惊恐。

与梅斯尼将军一起被捕的同僚不相信他会企图逃跑。他们知道，自从梅斯尼的大儿子因参加反抗活动被押送到德国以来，这位将军害怕他的儿子被人报复打死，他已经放弃了逃跑的任何念头。直到调查了战后所缴获的档案材料之后，这些事情的经过情况才算真相大白。

美国起诉者多德在纽伦堡对这些事件作了精辟的评述：“……在这惨不忍睹和肮脏不堪的事件的整个过程中，纳粹的伪善嘴脸已在光天化日之下暴露无遗。这是不见血的屠杀，这是对职责的亵渎，而且有外交部的齐全的官样文件作幌子，为卡尔登勃鲁纳的保安部和盖世太保所批准，并受到职业军人中从外表上看来是团结一致的、骨干的支持和怂恿。”^①

对战俘实行的这些报复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汇编在最高统帅部的一项公告里。这份公告获得了一个纳粹党人所喜爱的名字：“子弹”。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缪勒给国内所有警察局拍发了这样一份电报：“最高统帅部特作如下规定：1. 除英美战俘外，凡被重新抓到的在逃战俘军官和不工作的下级军官，无论是在运送时逃跑的，还是大批逃跑

^① 1946年8月29日，多德在纽伦堡的总结发言。

或个别逃跑的，在重新抓到他们以后必须交给保安警察和党卫队保安处的头目。2.因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正式对外承认把战俘移交给保安警察和党卫队保安处，所以绝不许其他战俘知道有关重新被捕的事情。重新被捕者在向国防军询问处报到时必须讲明是逃跑的，不许说是重新被捕的。对他们的邮件必须进行检查。如果受保护国、国际红十字会和其他慈善团体的代表前来询问时，也作同样的回答”^①。

早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最高统帅部就作了规定，“……在任何情况下……逃跑的苏联战俘都必须交给秘密警察。”^②

与此同时，缪勒命令盖世太保分站的头目们把已经交给他们的囚犯安置到毛特豪森集中营里，并通知集中营的司令官，这是有关“子弹行动”的一次押送。这项命令犹似宣判死刑，它确实意味着，那些受这项“子弹”命令支配的军官和下级军官在到达毛特豪森后，一定会立即遭到颈部枪击而死去。

第二项“子弹”命令是对那些再次企图从劳动营里逃跑的民工采取同样的措施。

在这种情况下到达毛特豪森的俘虏被看作是“K 俘虏”；他们不必进行登记，也不编号，而是立即被带往集中营监狱。那里的人送他们进淋浴室，命令他们脱去衣服，借口

^① 1946年4月5日，凯特尔在纽伦堡诉讼中的辩护人把这份档案看作是“最高统帅部的假命令”，凯特尔本人断言，他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份公告。

^② 《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34卷，第166页。

说,要量量他们的身材,叫他们站到一架伪装的测量仪上,当滑板触及到头盖骨的一刹那,这架测量仪就会自动朝牺牲者的颈部开枪射击。如果“K 俘虏”一下子到达太多,则用淋浴室里的管子任意把水或毒气放进去,把他们毒杀在里面。

毛特豪森的集中营司令官也可使用自己的方法。一九四四年九月初,有四十七个英国、美国和荷兰的空军军官到达毛特豪森;他们的飞机在德国上空的一次空袭中被击落,他们是用降落伞跳下来的。十八个月以后,他们作为“K”记号的人被押送到毛特豪森。集中营司令官没有立即处死他们,而是把他们送到毛特豪森的采石场里,许多被拘禁的人就是在那里被残酷地折磨死的。

采石场是一块巨大的盆地,有一条用八十块粗糙的岩石垒起的阶梯通往那里。这四十七个俘虏光着脚,只穿着衬衫和短裤,抱着或扛着二十五到三十公斤重的石头往上走,还时时不断地饱尝拳打脚踢的滋味,甚至被人丢石头。到了上面还没来得及放下重担,又要赶他们快点跑下去,强迫他们把更重的石头往上搬。第一天晚上,四十七个俘虏中就死了二十一个。第二天用老方法对待其余的人。第二天晚上只剩下一个人活着。

一九四四年九月,希姆莱也视察了毛特豪森集中营,暴徒用处死五十个苏联军官的精采节目向他作了表演。这就是纳粹党人着重谈论的“士兵荣誉”。

这种大肆声张的做法引起了另外一起战俘事件:大批战俘从萨冈逃跑。

大约有一万名英美飞行员被拘禁在萨冈的“三号空中

战俘集中营”里。他们全是些只想逃跑、坐立不安和机灵的人。一九四四年二月底，哨兵发现了九十九条还未竣工的隧道。严密的监督不能阻止俘虏再次设法去完成已经开工的第一百条隧道。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夜晚，八十个英国军官从这条隧道里逃走了。英国人开创的这个顽强的先例使希特勒和希姆莱暴跳如雷。三月二十五日，一个星期六的清晨，当发现有人逃跑之后，立即下达命令进行大规模搜捕，并向布雷斯劳的盖世太保报警。第一批逃犯在离开萨冈几公里的地方被逮住，并被带回集中营。接着，在三月二十六日星期天，缪勒向盖世太保地方分站传达了枪毙重新被捕者的命令。三月二十七日星期一，航空部的瓦尔德上校、最高统帅部的冯·罗伊蒙上校、缪勒和奈比在德国中央保安局里举行会议，讨论尽快采取的措施。最后，缪勒向他们吐露实情，他是奉希特勒之命下达指示的，并在星期天清晨开始执行，十二到十五个逃跑者遭到枪杀。许多方面的人士对这种解决办法提出了强烈抗议。大家担心英国为了进行报复将会枪杀在英国的德国俘虏，而且由于这种措施使被指定来轰炸英国的德国飞行员可能为一种不安所侵扰。希特勒只同意宽恕第一批被送回集中营的俘虏。其他所有人一律按命令执行枪决。执行任务交给布雷斯劳①的盖世太保头子、党卫队突击队中队长沙尔佩温克尔。被

① 布雷斯劳的盖世太保以残暴而闻名。他们在市监狱里设计了一个断头台。从1938到1945年一共杀了一千多个政治犯，其中十一个法国人。布鲁塞尔的前任市长路易·施密特在受审期间死于盖世太保刽子手的毒打之下。

抓获的囚徒，有的是在基尔，有的是在施特拉斯堡被抓到的，他们统统被带到布雷斯劳就地枪决。五十名青年军官英勇牺牲。在这次事件中，缪勒同盖世太保的联系通常是小心谨慎的，禁止任何书面文件的来往，所有命令必须口头传达。

尽管采取了这些预防措施，枪杀事件还是传了出去。因此，卡尔登勃鲁纳命令大家，把这些枪杀事情说成是个别现象：有些囚犯是在空袭中丧了命的；有些人在拒捕时被击毙的；还有一些人动手打了他们的看守，为了进行自卫看守才开枪打死他们的；有些人是在押送回集中营的路上想再次逃跑时受伤致死的。最后按照这些内容编造了一则官方消息。但是没有人相信它，相反却证实了大家当时所害怕的，并在战后所发现的事情是千真万确的。

还有两项其他的任务重新由盖世太保承担。一项巨大而又不太引人注目的任务就是帮助德国战时经济不断需要的大量劳动力。从法国的一个交款数字就足以窥见纳粹警察在被占领国家中活动情况的一斑。为德国招募志愿工明显地遭到了失败。因此，只得转而采取征集工人的办法。盖世太保采取多种形式，从“释放”战俘（虽然这是一种为法国政府所容忍的、道德上的欺骗行为，但是她还是同意了可以用五个工人去调换一个战俘，不过这种调换的比例没有公布过）转而成立强迫劳改处，这个处招募大批年轻人并送他们去德国做工。甚至连征募劳动力的为首分子、行政长官蒂林根斯和“雇佣劳力的总代表”弗里茨·绍克尔也承认，五百万外国工人中只有二十万人是志愿者。多数

人逃避征募，当许多男人收到应征入伍通知单时，就悄悄地投奔到游击队那一边去了。最后有八十七万五千九百五十二个法国工人被遣送到德国。如果把一九四二年底在战争中所俘虏的一百零三万六千三百十九个法国人以及由于政治原因而被押送的人加在一起，那么当时就有二百多万法国人由于各种原因和各种关系成为纳粹的俘虏。

盖世太保的第二个新任务是建立一个不平常的、从事于所谓“医学试验”的组织。

如果要知道是怎样用纳粹原则贿赂医生，包括贿赂有资历的人士去干那些违背传统医学伦理的“试验”的话，就得回忆一下纳粹党人当时是怎样渗透到德国医务界，并在那里建立支部的。因为学者、医生、大学教师都是自由职业者或者是“反动分子”、犹太人或共济会成员，所以纳粹党人对这个队伍来一个“清洗”，致使他们中的五分之二的人被开除出去。

最后，希姆莱为了“科学实验”于一九三三年卖力地在种族研究的领域里创立了“遗传研究所”^①。一九三五年初，这个所把研究“日尔曼人祖先遗传”和研究“北欧-印度日耳曼种族”的特征和标志作为自己的任务。一九三九年十月一日，“遗传研究所”通过了一个扩大研究范围的新章程。这样终于在集中营里也进行了试验。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祖先遗产协会合并到希姆莱的个人参谋部里，从此以后，它就是一个纯粹的党卫队的研究所了。该所领导人有：希姆莱

^① 遗传研究所的地址是柏林—达莱姆，皮克勒街十六号。

(所长)、慕尼黑大学校长魏斯特博士教授和前书商协会秘书西韦斯。西韦斯当上了党卫队上校并起着重要的作用。

大多数涉及到人的试验均由遗传研究所发动、组织和投资。它到了最后拥有五十个专门的科学研究所。西格蒙德·拉舍尔博士认为，只要给希姆莱写封信就可以用人来进行试验。

拉舍尔是空军后备队司令部的医生。他是通过比他大十五岁的妻子尼尼才认识希姆莱的。一九四一年初，当时已经加入普通党卫队的他奉命去参加空军行政区第七队（慕尼黑）的一个医学班。讲课时特别谈到了在高度飞行时的心理和生理影响^①。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五日，拉舍尔写信给希姆莱：

“……现在，我接到命令去慕尼黑空军行政区第七队参加医学选修班。在这次学习期间，研究飞行高度至为重要，不过十分遗憾的是，在我们这里还不能用活人进行试验，因为这种试验很危险，没有人自愿挺身而出。因此，我严肃地提出这个问题，是否有可能谨请提供两到三个惯犯进行这些试验？……显然，被试验的人员在进行试验时可能会死去，不过这些试验将在我的参加下进行。它们对研究飞行高度至关重要，但不要象以前那样，在猴子身上进行试验，因为猴子对试验的反应是与人完全不同的。”^②

这些披着人皮的畜生所提出的要求，从字面上看似乎

^① 当时，德国人设法提高他们飞机的飞行高度，在这方面德国飞机落后于最新式的英国飞机。

^② <国际军事法庭文件>脚注 1602。

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战争初期所推行的、披着“科学”外衣的无痛致死术总算得到了发展，它能使医治不好的病人和精神病患者无痛苦地死去。早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和十一月就有一名叫扎梅斯施特兰的博士在一些人的身上，即在德国人的身上进行了首次试验，上级授权他利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里的德国囚犯进行那种冷冻试验。这种试验在达豪业已恢复。

拉舍尔奉承希姆莱的“科学”狂的建议就这样被愉快地采纳了。于是希姆莱的秘书卡尔·勃兰特在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回答拉舍尔说：

“……我可以通知你，为了研究高空飞行，希姆莱显然乐意提供囚犯。”^①

因此就在取之不尽的人鼠后备队的中心——达豪建立了一间负压室，拉舍尔开始了实验。实验的结果是骇人的。拉舍尔把拘禁在达豪的一位医生安东·帕霍勒格博士当作助手使用^②，据他说：

“我通过负压室的观察窗亲眼看到了一个俘虏忍受着真空的压力，直至他的肺部爆裂。有些试验会在头脑里引起一种压力，以致那些人为了减轻自己的压力而出现神经错乱和头发脱落的现象。他们用手指和指甲在自己头上、脸部拼命抓，发狂地残害自己。他们用手和头去撞击墙壁，声嘶力竭地喊叫，设法减轻对鼓膜的压力。一般说来，到

① 《国际军事法庭文件》脚注 1582。

② 拉舍尔叫帕霍勒格对这种性质的谋杀活动守口如瓶，但是他在1944年初成功地逃跑了。

了完全真空的时候，被试验的人就会结束生命。完全真空的试验无疑会导致死亡，所以在多数情况下人们更多地是把负压室用作例行的枪决，而不是用它们来作试验。”^①

这些可怕的试验持续到一九四二年五月。大约有两百个囚犯被利用来进行这种试验，其中八十个人死在负压室里，其余人多多少少患有严重疾病。经过这些稀薄空气的试验以后，拉舍尔开始进行一系列的有关冷冻作用的新试验。新试验的目的是要为那些经常在北海上空被击落的、担任轰炸英国任务的飞行员找到最好的飞行服。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本来可以在水上进行自救，但是当他们的携带游泳工具泡在水里数小时后，就给冻死了。

拉舍尔让人在达豪安装特殊浴缸和冷却器。陆军和空军颇感兴趣地注视着他的工作。拉舍尔要求配备助手。在他接受来自因斯布鲁克的雅利希、基尔的霍尔兹洛纳和辛格尔三位教授之前，要求盖世太保对这三位医生进行仔细的调查，以证实他们“在政治上也是无可指摘的”。拉舍尔想得到对他的试验给予保守秘密的绝对保证。一般说来，他对这些试验的真正性质不抱任何的幻想。冷冻试验从一九四二年八月继续到一九四三年五月。在试验于冷的作用时，不幸者整夜裸着身子忍受着德国的寒冬腊月，当他们的体内温度下降到二十五度时，把失去知觉的试验囚徒拉进来，进行复苏、回温的试验。希姆莱坚持使用“肉欲的热量”，为此从拉文斯堡叫来四个妇女。她们把自己一丝不挂的身体

^① 1945年5月13日，安东·帕霍勒格的口供书。《国际军事法庭文件》脚注2428。

压在一个不幸者的冰冷的身体上，设法使他苏醒过来。所有这一切都是多余的，因为对冻僵的人采取迅速加温的方法早在一八八〇年就由俄国医生列帕钦斯基解决了，纳粹“研究者”对他的著作也许是一无所知吧。

“对象们”光着身子或者穿着飞行服装浸在冰水里进行湿冷作用的试验。里面放上一只救生圈，以免他们淹死。帕霍勒格博士对这样一种试验也作了报道：

“在两名俄国军官身上进行的试验是达豪集中营进行的所有试验中最惨的一次。这两名军官从牢房里被带出来，禁止他们说话……拉舍尔叫他们脱去衣服，光着身子躺到浴缸里。两小时以后，他们还有知觉。我们请求拉舍尔给他们打一针，但是白费劲。到了第三个小时，其中一个俄国人对另外一个俄国人说：‘同志，请你同那个军官说，开枪把我们打死吧！’这个人回答道：‘你别想从这条狗那里得到什么！’

“一个年轻的波兰人用温和的语气把这些话翻译完毕之后，拉舍尔回到他的办公室里。那个波兰青年想用氯化物毒死他们，但拉舍尔又折了回来，用手枪威吓我们说：‘你们别管，不要接近他们。’当试验把他们折磨至死，至少持续了五个小时。尸体被运到慕尼黑进行解剖检验。”

拉舍尔的父亲和叔叔都是医生。有人在想，这个在具有高尚的道德价值的医生环境中长大起来、并受过教育的人怎么会被纳粹理论收买过去。他的政治信念驱使他去激烈反对他的父亲汉斯·奥古斯特·拉舍尔博士。他毫不踌躇地听从他妻子的建议到盖世太保那里告发了他的父亲，致使父亲两次被捕，第一次拘禁五天，第二次拘禁九天。

有一天，他的那位在汉堡行医的叔叔责备他在搞这种试验。双方辩论了整整一晚上。拉舍尔想方设法要维护纳粹原则和居德医生的原则。这位居德医生是最早对“不要去爱卑鄙的、与社会为敌的人”提出疑问的人之一，而拉舍尔的叔叔却竭力向他说明忠于虚伪原则的含意。最后，拉舍尔向他的叔叔承认，他“不敢再去多想了”；他虽然知道自己走在邪道上，但是“不可能摆脱它了”。

拉舍尔的态度同所有德国医生的态度截然不同。当韦尔茨博士建议他的同事卢茨博士用活人进行试验时，他回答说：“我对这种试验，态度不够坚定，在狗身上进行试验那已经够困难了，因为它眼巴巴地看着你时象是有灵魂似的。”

纳粹医生没有提出诸如此类的问题。拉舍尔看不起卢茨那样的同事。一天，他对生理学家赖恩说：“你认为自己是个生理学家，但是你的经验限制在豚鼠和老鼠。我可是真正熟悉人的生理的绝对权威者，因为我是用人进行试验，而不是用老鼠进行试验的。”

希姆莱为继续这些试验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并在许多封信中不厌其烦地说，只有党卫队可以提供必要的“活人材料”。他经常亲自出席这些试验，并不断地反对来势凶猛的那些抗议。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三日，他写信给米尔希：

“研究人的有机组织在高度时的反应，研究人体长时间停留在冷水里的冷却现象等工作恰恰关系到空军生命的重要问题，这些工作之所以能在我们这里特别有效，是因为我亲自负责为这些试验提供集中营里与社会为敌的该死者和

罪犯。

“拉舍尔博士最近要在航空部里作报告，可惜你没有时间去听。我非常想听这个报告，因为我相信，由于公开声明的原因而给拉舍尔博士的工作——对这些工作我确实已经承担了责任——带来的困难将会克服……”

“我们两人不要对困难感到恼火。等我们把人民头脑里的保守思想抹去的时候，那至少要花上十年。但是我们年轻的、无可指责的士兵和飞行员需要这种试验，他们岂能久而等之。因此，我请求你，把参谋部的退休医生拉舍尔博士从空军中开除出去，让他归我武装党卫队领导。然后，我将独自负责这个领域里的所有试验，并把我们党卫队里部分用于东部冷冻所需的实际知识全部转让给空军使用。为此，我建议你和沃尔夫两人推选一个‘非基督教徒’的医生，这个人必须既是一个正直的、又不是倾向于道德败坏的科学家，这样就可以把试验结果告诉给他。”^①

希姆莱在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四日给拉舍尔的一封信中甚至流露出更为不满的情绪，象往常那样，转而对威胁的口吻说：“今天还有人在拒绝用活人进行试验，他们宁可让勇敢的德国士兵死于冷冻的后果。因此，我把他们也看作是叛徒和卖国贼。我不怕说出有问题部门的这些先生们的名字。我授权给你，把我的这个意图告诉给有关部门。”^②

希姆莱的大力帮助也不能避免拉舍尔及其妻子的悲惨下场。

① 《国际军事法庭文件》脚注 1617。

② 《国际军事法庭文件》脚注 1609。

一九四三年流传着关于拉舍尔夫妇的谣言，接着突然发生了一件丑闻。拉舍尔夫人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当她结婚时，第二个孩子已经怀孕在身。此时，她感到很自豪，象她这样的年龄怀了第三个孩子。最后人们发现，她的怀孕是伪装的，第三个孩子是从一个孤儿院里骗来的。对于一个每天在最可怕的犯罪场所里用折磨人、杀害人的方法进行一笔出色的实物交易的人来说，那么关于第三个孩子的事看来是件区区小事，不足为怪。然而，纳粹伦理的圣杯守卫者们并不是这样来理解的。凡涉及到种族和出生的事都具有圣徒的特性，再说拉舍尔一家企图偷走一个孩子，这孩子的血也许是“不纯”的，因此他们由于欺骗了党卫队头目的这一事实而坏了事：这被看作是天大的罪。拉舍尔夫妇虽然失踪了，但还是在一九四三年底被捕，并被关了起来。当盟国部队向德国内地挺进时，希姆莱下达了严格的命令，不许让拉舍尔夫妇活着落到敌人手里。他知道这两个人都是多嘴多舌的人，尤其是拉舍尔夫人，所以害怕他们会泄露天机。拉舍尔夫人最后被绞死在拉文斯堡，拉舍尔博士被带回到达豪，关在牢房里。一九四五年四月底，当有人把饭菜从门缝里送给他的时候，被人用手枪打死了。

在集中营里仍然进行着许多其他的试验。他们在试验许许多多的痘苗和防御一场细菌战的预防剂。很少为人知道的一次偶然事件泄露了机密。在高加索，党卫队部队拒绝继续行军，因为传说他们进入了一个发生鼠疫传染病的地区。这可能是党卫队员拒绝服从命令的唯一事件。

为了获得痘苗，他们也利用了人；他们在布痕瓦尔德把

伤寒传染给作培植病毒的男人，在达豪研究沼泽热，培育蚊子，并在一千多人的身上进行试验。首当其冲的是波兰牧师。一九四三年九月，在东线突然爆发了一种黄疸传染病（一个月内发生了十八万起病例），接着就在奥斯威辛、继而在萨克森豪森对参加波兰抵抗运动的犹太人就上述病例进行试验。

集中营里被试验的人员是用之不尽的，在囚徒身上试用新药；在奥拉宁堡进行挨饿和口渴试验^①；在布痕瓦尔德进行人造荷尔蒙的试验；试验血浆用来治疗坏疽；试验药膏用来治疗磷火引起的烧伤。此外，还进行血液学和血清学的试验，在达豪，人为地引起了蜂窝织炎、溃疡、败血症。他们试验如何使用磺胺药，如何对骨头、神经和肌肉系统进行外科手术，用注射碳酸方法进行无痛致死术的试验，注射这种碳酸针以后，不到一秒钟就会置他人于死地；他们观察有毒子弹的作用（临床的描述是骇人听闻的）；研究一种把污染毒气的水进行解毒的方法；研究生物碱和未知的毒药；让囚徒服用毒药胶囊后进行试验，纳粹头目们在最后时刻就是服用这种胶囊自杀的。此外，还进行了有关化学毒气效果的试验。

这儿还不包括所有的试验。他们还试验绝育方法，纳粹党人想在夺取最后胜利成为欧洲主人之后，用这种方法逐渐使那些被奴役的民族失去生育能力，或者多多少少地限制他们的出生率。早在一九四一年十月，科莫的医生波

^① 这些试验特别折磨人。为此特地挑选了十六岁和十七岁的两个年轻人。

科尔尼博士在给希姆莱的一份报告中写道：“如果我们根据这些试验成功地制造出一种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使人感觉不到的绝育药，那我们就有了一种有效的新武器。如果能够对目前被德国俘虏的三百万布尔什维克分子施行绝育手术，使他们变成工人，听人使唤，而且不再生儿育女，那么这种想法就会展示出最广阔的远景。马道斯认为，口服用的镇静液汁，特别给雄性动物也可给雌性动物注射，这种液汁都能在若干时间之后产生一种作用，即使人持续地丧失生殖能力。”①

不过，这种镇静液汁的作用太慢了，而且，种植这种热带植物看来也很困难。所以采用 X 射线进行绝育那就容易得多了。布拉克博士在对囚徒进行试验过程中把上述有关方法发展到了完美无缺的地步。他发现，如果在男子身上进行两分钟五百到六百 X 光线的局部放射、在女子身上进行三分钟三百到三百五十 X 光线的放射，就会引起长期绝育。但是如何在病人缺水的情况下综合使用这种“治疗法”呢？布拉克博士苦思冥想地要解决这个问题。因此，他急急忙忙把自己的想法告诉那位“非常尊敬的德国党卫队长官”：

“实际方法运用如下：让办理手续的人走到一只开关前，回答提出来的问题或者填写表格，大约停留两到三分钟。坐在开关后面的官员可以使用仪器，就是说使用一只同时可使两只电子管进行工作的开关（因为放射必须从两面进行）。一套配有两只电子管的设备，每天大约可使一百

① 《国际军事法庭文件》35 号。

五十到两百个人绝育，要是用二十套设备，则每天可使三千到四千人绝育。我估计，每天再多送一些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的。”^①

战争的进程和战争的结束挫败了纳粹用科学方法屠杀各国人民的计划。但是这个计划早已拟定，并处在准备研制阶段之中。要是战争出现了另外一种结局，那肯定会采取这种措施了。

“选择”不幸者来作试验品的工作由集中营的政治处即盖世太保负责进行。只要在名单的名字边上写个字，划个小小的十字形记号就可以把一个年轻力壮的人送进负压室，一小时后，他的肺就会爆裂；或者把一个充满生活气息的年轻妇女交给医生，让她服用强烈的放射剂量，使她永远失去生殖能力。

有时候，希姆莱在给集中营间谍下达的命令中指定牺牲者，例如命令中规定，在奥斯威辛使用波兰的抵抗运动战士，以便对传染的黄疸病进行试验，或者为了进行拉舍尔的冷冻试验，在达豪使用俄国军官，因为他们具有抵御寒冷的能力。

此外，为了满足纳粹解剖研究所需要的人员，盖世太保进行了必要的“选择”。甚至把集中营也当作选择人员的储藏所。他们在这里所犯的、荒唐而可怕的罪行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可以与一个为满足自己病态的研究欲望而进行疯狂杀人的学者所编导的某些恐怖电影相媲美。

^① 《国际军事法庭文件》203号，“医生案件”。

第一种情况发生在施行无痛致死术计划的年代，这项计划的牺牲者均为德国人。

大脑研究所从属于柏林威廉皇家学院的研究所，它的三个分所分别设在慕尼黑、格廷根和迪伦堡。大脑研究所由哈莱福尔登博士领导。

有一天，当哈勒福尔登博士得知可以用二氧化碳杀死病人时，他马上想到，这样做对他的工作有利。他找来了一些负责人，按自己获得的情报对他们说：“听着，朋友们，如果你们杀了所有这些人，那至少要把大脑保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他们问我：‘你能检查多少人？’‘数字不限，多多益善，’我回答。”^①

接着，他给他们送去保存和运输所需的器具和说明书。哈莱福尔登博士对如何进行“无痛致死术”一事作了同样的报道：

“在多数研究所里，医生的数目寥寥无几。因此，他们让男女看守来挑选该杀的病人，因为他们要么忙得昏头转向，要么压根儿不感兴趣。谁要是总感到疲倦，或者看守者认为，这是一种‘病例’，他就会被写到名单上，接着，被送进死亡中心所。最糟的事情莫过于受人虐待。看守人员挑选使自己感到讨厌的人，然后把他们写到名单上去。”^②

当时，这个研究所拥有的大脑超过其它研究所研究的数量，也许哈勒福尔登此刻在想，多亏纳粹主义才保证了他

^① 哈勒福尔登向一位美国的调查法官所作的供词。《国际军事法庭文件》170号。

^② 同上。

科学的前途。

第二种情况发生在一九四一年，它表明了纳粹主义的教条也许在研究的领域上合乎逻辑。此时，他们不再象哈勒福尔登那样，满足于利用死者的尸体进行研究，而是完全为了把尸体用作研究材料才杀人的。

并吞埃尔萨斯以后，纳粹党人占领了施特拉斯堡大学，并在医学院里安插了他的一位心腹、突击队大队长希尔特博士，他遵循纳粹准则在那里执教，当然他的固执的念头是种族问题。希尔特制定计划要在施特拉斯堡创立一间犹太人骷髅和头骨的收藏室，这间收藏室由于东西丰富多采，因而是独一无二的。他写信给希姆莱，向他提出了上述这些要求：

“几乎所有种族和民族的头颅都已收集得完备无缺。不过提供给科学使用的犹太人的头颅则少得可怜，那是因为不太容易对它们进行加工。现在，东线的战争却给我们提供了消除这种缺陷的机会。犹太—布尔什维克的政委表现出一种令人厌恶的、但典型的低等人的性格，我们可以设法弄到他们的头颅，以获得一份具体的科学文献。”^①

这样双方达成协议，凡是犹太苏联政委今后都应活着交给军事警察，受他们监督，直到有一个特使到达时为止。然后由这个特使给他们拍照，对他们进行人体的测量，以及汇编有关他们职业和出身的所有资料，以便把他们杀掉并把他们的头颅保存起来送往施特拉斯堡。

^① 希尔特于1941年12月29日和1942年2月9日期间给希姆莱的信。《国际军事法庭文件》85号。

“在根据档案材料处死犹太人之后，应把他们的头颅保护好，然后叫一个年轻医生或者医科大学生把头颅从躯干上肢解下来，用防腐剂把它放在特制的密封金属容器里送往指定地点。”^①

这项指示忠诚地被执行。施特拉斯堡大学从那时起就可以获得稀罕的“货物”。

诚然，这些头颅再也满足不了希尔特，他要求的是完整的骨架，是“犹太—布尔什维克政委”的骨架。奥斯威辛集中营得到命令，向希尔特提供一百五十副骨架。由于奥斯威辛集中营不能把骨架制成标本，而希尔特也不想对这些躯体进行测量，所以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把活着的“对象”送到施特拉斯堡附近的纳茨魏勒集中营。一九四三年六月由盖世太保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里挑选出来的一百十五个囚犯到达纳茨魏勒。八月份又到达八十一个。党卫队大队长雅各布·克拉默尔过去在大多数的集中营里工作过，当上贝尔根—贝尔森的命令官之后得到了“贝尔森刽子手”的绰号。这次他接受杀死这些殉难者的任务。他用氰来毒死他们，这种方法无损于尸体，而且希尔特还可以把温暖的尸体放到解剖台上。对此他感到十分满意。

当美国和法国部队逼近施特拉斯堡时，希尔特收藏的解剖体已包罗万象了。纳粹党人心里感到有点害怕，因为施特拉斯堡大学地窖的冰箱里还藏着八十具尸体，弄不好会泄露秘密。希尔特请求给予指示。难道要他保存所有的

^① 《国际军事法庭文件》85号。

收藏品吗？把它们部分销毁？还是全部销毁？此事看来只能从尸体身上割下肉来，以便使人认不出尸体的真面目并可以随便解说一下，这是法国人留下的尸体。密切注视着事态发展的遗传研究所主任西韦斯最后于十月二十六日向大家保证，收藏品已经分散了。可是这份报告是假的；希尔特的助手们并不能很快地解剖尸体，因而当盟军部队占领施特拉斯堡时，这些尸体还放在希尔特的“储藏室”里。法国第二装甲师的部队发现了它。希尔特本人早已溜之大吉，直到今天还是无影无踪。没有人知道他的命运究竟如何。他属于逃避调查，并在纽伦堡“医生案件”中除了他们同事之外，不受审判的纳粹党的少数实验者。

第四章

盖世太保的间谍网遍及整个法国

希姆莱象在欧洲其他被占领国一样在法国也推行他自己的那套政策。克诺亨认为，这种政策同里宾特洛甫和阿贝茨所奉行的政策格格不入。他们的政策完全是以赖伐尔为基础的。如果阿贝茨非常重视德阿特，那么只有通过激发嫉妒心来把赖伐尔束缚住，因为他知道这种伎俩的作用是有限的，德阿特在法国并不享有名望，所以阿贝茨在制订政策时，把眼光放得很远，企图通过赖伐尔来谋求法国人的大力支持。

希姆莱的目的很清楚。由于维希政府拒绝缔结反布尔什维克的同盟，所以他想迅速取得一种积极的，即基本上是一种军事上的合作，同时他想建立几个武装党卫队师，以加强东线的兵力。他估计到那里的事态变化，在俄国进行的这场冬季战役使军队损失了一百多万人。由于军事形势已经不能恢复到夏季战役时的状况，因此招募新兵已成为当务之急。同时这些不可缺少的部队穿着希姆莱武装党卫队的制服，从而增加了实力，促使他去实现他一生中的痴心梦想：统率陆军。

他满脑子想的就是要达到这种欲望，因而指示奥伯格

极力促进法国的亲纳粹运动。希姆莱可能已经取得了他策略中的第一回胜利。德隆克成功地把亲纳粹政党的领袖们联合在一起。他们于一九四一年七月七日举行了会谈，并在这次大会上^①成立了“反布尔什维克兵团”。之后，这个兵团改名为“法国志愿兵团”。大使馆人员没有参加这个组织，他们在与其参事韦斯特里克磋商之后采取了冷淡的态度，因为这与维希政府的倡议无关。时间过了十八个月，即在一九四三年二月十一日赖伐尔发表公告之后，法国志愿兵团才被公认为是符合公众利益的。

奥伯格追随希姆莱制订的政治路线。克诺亨后来曾这样说过：“对奥伯格来说，达尔南和多里欧比赖伐尔更为有趣。”一九四二年夏天，当法国开始为武装党卫队招募新兵时，奥伯格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奥伯格和阿贝茨之间尽管有不同的看法，还是相当默契，也许正因为这样，各人在自己的范围内工作。阿贝茨监督政府一级的“重要政策”。

奥伯格也同施图尔纳格尔进行合作。在巴黎，他在装备和实力问题上受他领导。但是在所有警务方面，他只听从希姆莱本人下达的指示。

奥伯格到达巴黎后，就定居在拉纳大街五十二号，他一直住到战争结束。他本人的参谋部由两名军官哈根和贝

^① 会谈设在完全由德国情报部门占用的“雄伟饭店”里举行，出席这次会谈的有：德隆克、多里欧、德阿特、康斯坦丁、克里门蒂、布瓦塞尔和保尔·夏克。首批志愿兵于1941年8月27日在凡尔赛集合。当时，赖伐尔在参加了庆祝升旗典礼后的回家路上差一点成为保尔·夏克手下的牺牲品。

克(一九四三年二月荣斯特接替了他的职务)、六名军士、两名女速记打字员和三名女电话接线员组成。

他立即改组他领导下的警察署。为此他取得了以下的一些特权：

采取安全和镇压措施的最高领导权已集中于巴黎。一旦与施图尔纳格尔的军政府和负责外交事务的阿贝茨发生冲突，奥伯格就可以打电话给希姆莱，让他作出反对他俩的决定。在发生严重事件的情况下，他拥有无限的权力，用各种手段“制服”那些最危险的“小组、政党和人物”。

奥伯格是法占区的党卫队最高首脑，他不仅可以动用党卫队，而且也可以动用党卫队招募来的法国人去采取镇压措施。此外，他有权得到那些辅助小组和半军事化小组的支援。奥伯格尽量利用这两个组织。他没有忘记在德国夺权的教训。所以他竭尽全力支持按照冲锋队或者党卫队模式组成的小组，当然他并不知道这些“运动”往往是既成的“敲诈”行为，它们使那些恬不知耻的人有可能收回那笔捐助的巨款，而那些人就是用这笔巨款去建立几支可怜的部队的。

海德里希完全根据希姆莱的策略把奥伯格介绍给法国政府的代表勒内·布斯凯和乔治·伊莱尔。五月初，他把他们叫到巴黎，向他们暗示，有人希望维希政府把警察权力移交给亲纳粹政党的头目。据回忆，勒内·布斯凯对这个决定的目的性有争议并要求海德里希延期谈判。这时候布斯凯再次努力说服德国人放弃这个念头。这样法国警察就有责任维持治安，象他所说的那样，少去镇压“反对德国”的阴谋活动，而更多地去镇压“反对国家”的阴谋活动。他的

目的是在一九四一年九月三十日废除“人质法令”，为此同奥伯格举行了谈判，讨论一项共同声明中的决定，这项声明是建立双方警察间关系的基础，划定相互间的管辖范围。

海德里希之死破坏了这些谈判。布斯凯回到了巴黎，大家希望从他那里得到同奥伯格达成的有效协议。可是海德里希的死使一切事情又得重起炉灶。有人把海德里希曾经同意，现在暂时失效的指示通知赖伐尔。与此同时，那些通敌的政党，尤其是多里欧的法国人民党在报上发动了一场激烈的攻击，并举行抗议集会反对维希政策，谴责他们软弱无力、胆小怕死，甚至同“欧洲”的敌人（指纳粹分子）同流合污，控告布斯凯犯了保护犹太人和共济会会员的罪行等等。

尽管党卫队在巴黎进行愤怒的攻击，会谈还是继续进行。七月二十九日，会谈终于有了结果，用克诺亨的话来说，这个结果就是《奥伯格—布斯凯条约》。根据布斯凯本人的供词，条约的最后文本经他作了修改之后就确定下来，然后公布。奥伯格解释道：“地方行政长官和警长聚集在我家里用饭，席间布斯凯和我当众宣读了我们早已撰写好的文件。”^①

那天宣读的这个条约看来完全是布斯凯的胜利，因为它明确地说明了德国警察的职权，并确定了法国警察的完全独立性，尤其是它包括一项至关重要的、可以缓和压力、特别是可以结束拘留人质的条文。事实上，条约里说得一

^① M·布斯凯非常愉快地通知我，会谈延期举行。即使奥伯格的法国客人和德国客人已经到达，警察总监还是想方设法迫使奥伯格作些让步。因此开饭时间晚了一小时。

清二楚，法国警察将永远不把人当作人质，也不会把法国警察逮捕的人交给德国当局，成为他们报复的对象。那些法国政治犯同刑事犯一样将由法国法庭按照法国法律予以判决。只有直接进行暗害活动来反对占领军或占领当局的主犯才可以由德国警察提出要求进行判决。除此之外，德国人均不得把被捕者当作报复的对象或者作为人质加以拘留。

在这种情况下，警察总监有理由对所得到的条文感到骄傲。此条约应向所有法国警察、所有保安警察、保安处和治安警察的领导公布。南部地区被占领后，这个条约也适用于这个地区。这是奥伯格—布斯凯于一九四三年四月十八日签订的第二个条约^①。第一个文本的重要条款已被收进第二个文本里，而且重复谈到了法国警察逮捕的法国公民将按照法国法律由法国法庭判决。

遗憾的是，这些诺言只是纸上谈兵。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九日隆重公布的这个条约与人们预想的效果相差十万八千里，而且它并不能阻止枪决人质，在条约签订以后，每天的实际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九日^②以来，根据奥伯格签署的文本，德国人既不能逮捕一个法国人，也不能提出引渡的要求，除非犯人是直接反对占领军或占领当局的主犯。此

^① 该条约的全文收录在本书的附录里。据我所知，它根本没有在任何地方发表过。

^② 本条约于8月8日才分发给巴黎以外的分局。这样做丝毫不能改变对以后发生事情的判决。

外，必须提出犯人犯罪的证据，然后把他交付法庭。实际上这等于是取消人质制。

悲惨的事件对这些诺言的实际效果作了鉴定。八月五日，即发布《奥伯格—布斯凯条约》后的第七天，躲在让·波英体育场篱笆后面的三个汉子把两枚手榴弹扔进了正在那里训练的五十名德国士兵组成的一个班里，致使八人死亡，十三人受伤。这是条约预先考虑到的、涉及到直接暗杀占领军成员的事件。盖世太保调查的结果确定了作案者：他们是匈牙利人马图内克，罗马尼亚人科普拉和克拉齐乌姆。他们于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九日被捕，经德国军事法庭判决后，于一九四三年三月九日被枪决，然而巴黎报纸在八月十一日向居民发表公告说，九十三名恐怖分子已被证实犯了恐怖行为或者共同参与了此事。他们在同天上午被枪决。在公告上签字的是：奥伯格。

这种处决人质的做法明显地损害了十三天以前所签订的条约。

在八月十一日那天，从七点钟到十一点钟就有八十八个男人（不是九十三人）被枪杀在瓦勒里昂山：七十个法国人和十八个外国人。盖世太保只逮捕了三人，其余六十七人均由法国警察署特别科捕获。他们中间只有九个人参与暗杀德国部队行动：三人曾经企图使一辆乘有度假者的列车翻车，四人破坏了德国人的一条电话线路，一人开枪打死了数名德国士兵，另外一人把一个炸药包放进德国人经常出入的一家娱乐场所里。在这些被处决者中只有杜特里奥伊一人由德国军事法庭判决。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埃皮纳尔军事法庭判处他死刑。

即使除去由法国警察逮捕，随后交给德国人的十八个外国人，盖世太保逮捕的三个法国人以及袭击德国士兵和军事设施的九个人和唯一受法庭判决的一个人，那么五十七个法国人的案件却仍然存在，他们并没有直接参加反对德国人的暗害活动，然而却在完全践踏七月二十九日条约的情况下被当作人质枪决了。他们所有的人都是由于犯了政治罪而被法国警察逮捕的，因为他们违反了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九日关于解散共产党的这个公告，他们书写、散发或收藏传单，给那些好斗的、从事地下活动的共产党员提供住宿等等。根据当时现行的法国法律，所有这些行为都是违法行为，应由法国法庭按《奥伯格—布斯凯条约》规定予以判刑。有些案件的定罪更是草率从事：埃蒂斯之所以被捕，是因为他“同情共产党人”，招待从贡比泉集中营里逃出来的犯人吃饭；逮捕菲雷特雷，是因为他把自己的自行车借给一个好斗的共产党人；逮捕斯科迪亚，是因为他被人“怀疑”同共产党特别组织的一个成员保持关系。他们是在行刺前被捕的，怎么可能参加行刺？《奥伯格—布斯凯条约》生效后有两人被捕：八月一日逮捕德施安妮奥，八月三日逮捕布列塔尼，随后他们被交给盖世太保。八月十日最后落入法国警察手里的五个被枪杀者是：弗雷纳监狱里的博亚蒂、让·科帕农、亨利·道伯夫和弗朗索瓦兹·沃特尔斯，他们当时先被拘留在警察署，而后被交给德国人，翌晨即被枪决；赖纳于六月十八日被法国特别旅逮捕，八月十日被送进罗曼维尔堡。

这些男人均由法国行政当局拘留。它可以根据所发布的条约，按照法国法律对他们进行判决和拘留。其中一人甚至已被判决，但是受到了法国刑事当局的保护，他就是路易·多列士。他于一九四〇年十月被捕，因为散发传单，被判处十年徒刑。一开始他被拘留在监狱里，然后在夏托布里朗集中营里，以后又被交给德国人，再由他们把他送进贡比泉集中营。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二日他越狱成功。七月十日他再次被特别旅抓到，七月底被交给德国人。

五十七个因政治信仰被捕的法国人在德国人开枪射击下倒毙在地，当时勒内·布斯凯认为“人质法令”已经取消了。

这种公然损害刚刚缔结的条约难道不会引起维希的反映吗？政府至少会理解到奥伯格的签字和讲话是毫无价值的，盖世太保打算任意采取行动并让恐怖气氛继续存在下去。

看来并不是八月十一日的悲剧影响了维希政府的态度，因为它在一九四三年同意更新条约。也许要从维希维护“法国独立”的政治路线角度上来理解这个文件，它意味着对满足人们幸福的那种独立性的讽刺。

奥伯格仍然在发布枪杀人质的命令。法国特别旅把逮捕到的许多法国人按时交给盖世太保。九月十九日——发布条约后还不到两个月——奥伯格在法国报纸上宣布将枪决一百十六名人质，以示对九月十七日袭击巴黎“雷克斯”电影院的报复。这是人们近来在法国目睹过的最大的一次屠杀。九月二十一日这些人质惨遭杀害，四十六个死于巴

黎，七十个死于波尔多。

这些人质象八月十一日的那些不幸者一样。在巴黎被枪杀者中间只有一人受德国法庭审判，再说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人参加过暗杀活动。

警察总监已经作了最大努力，但是情况依然如故，《奥伯格—布斯凯条约》所起的效果是有限的。

在对条约进行徒劳无益的谈判期间，奥伯格着手改组他的部门。警察分成两大类：穿制服的治安警察和保安警察。第二部门的头目是克诺亨，他按照柏林总部的模式把保安警察再分成两个部门。第一部门负责法国的安全，第二部门主管政治情报以及反间谍工作，并负责监视法国、中立国家和梵蒂冈。只有第一部门有权逮捕人。巴黎行政机关的总部设在塞赛街十一号，它的人员来自盖世太保。

第二部门的主要机构是为法国成立的，它是巴黎保安警察—保安处的第三局。该局收集所有法国国内形势的情报，它下设四个处。第四处分四个科。他们的任务和范围是：第一，副业和农业；第二，商业和交通；第三，银行和交易所；第四，工业；第五，劳动力和社会问题。

第三局局长莫拉克斯是位非常机灵的人。他卓越超群，有教养，知识渊博，懂得同别人建立重要的关系。他是个沙龙常客，懂得把许许多多名人象大工业家、商人、上层社会的代表、银行家和经纪商、政治家的夫人和女友等等视为情报来源。一位银行经理告诉他某些公司的真情实况、股票的分配、各公司的真正实力以及如何去控制它们的途径等情况。这些好差使使他可以参加有盈利的商业活动。一位

“通天”的工业家向他述说他的竞争者的公司背景、生产的如实数字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想通过德国人来摆脱压在身上的负担。这位工业家希望德国人取胜后促使工业合作，他想从工业合作中捞到好处。一位大商人告诉他有关犹太人控制的竞争商行，还把犹太人伪装起来的财产泄漏给他听，于是他提出了没收这些财产的建议并接管了这些财产。某个政治家的一位女友把情人私下告诉她的秘密政治关系出卖给了他。

莫拉克斯在这些圈子里活动得轻松、自然，能投他人所好。他用这种方法获取到的情报使他的主子能够从法国经济中得到更多的好处。如果说各方面的供应量已经到了饱和点，那他可以根据手头材料回答说，工农业生产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有了提高，而人们的要求也随之提高。

漂亮的莫拉克斯先生的上等朋友们出于个人利益在掠夺他们国家财产时狼狈为奸。在那个奇怪的年代里，一部分巴黎的“上等人士”的确在上演一台相当肮脏的戏。

与此同时，奥伯格在他福煦大街的官邸里建立起许多新的局。每一个局都显示出警察比陆军占优势，因为奥伯格吃掉了曾经是军管处地盘的地区。其中新成立的政治情报处，它由保安处(第六局)的几个部门组织而成；一个部门监督报纸、文学和艺术、电影院和剧院；一个部门监督天主教和耶稣教的教会；在敌对国家里有一个反间谍的部门，在中立国家里有一个情报处。所有这些部门都隶属于克诺亨的总局(保安警察和党卫队保安处)。

克诺亨得到海德里希的全力支持并顺利地坚持了下

来。但是海德里希之死使形势起了变化。实际上，那时候缪勒成了盖世太保的主人。他发布详尽的命令并要求正确无误地执行。克诺亨在法国竭力使用随机应变的手段，并尽可能去适应环境。缪勒发布的那些不可更改的命令经常束缚着他的手脚，所以他有时对这些命令干脆置之不理。他的独立性格、时而流露出来的自信和内心深处的信念以及他在法国的德国警察部门的事业，所有这一切经常使他对缪勒采取几乎是公开反抗的态度。

缪勒直截了当地把罪责推给克诺亨，说他即使不倾向于“法国”，那至少是倾向于“西方”，就是说他被西方人的思想方法和习惯争取了过去，因此他开始腐化堕落，而且非常危险地同他们混为一体。这些攻击接踵而来，致使故意充耳不闻的希姆莱最后也只好出面进行干预。克诺亨极力进行自卫。他得到奥伯格的有力支持，奥伯格对他的才能评价很高。

在巴黎，克诺亨对军人同样是放任不管。从理论上讲，所有经过审讯后不能释放的被捕者和所有的案卷都必须交给陆军。但是实际上军事法庭释放的人重新被盖世太保所逮捕。盖世太保不把俘虏移交法庭就擅自枪毙的事也屡有发生。这种惯例绝不局限于克诺亨的局，德国也是如此，以致卡尔登勃鲁纳最后不得不在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二日向他的局和分局发出一条明确的指示，该指示说：

“经常”发生法庭对已被盖世太保处决的人提出控告，那是因为没有向法庭提出关于处决的报告。因此，帝国元首命令，今后盖世太保应把处决情况通知地方法庭。在

报告书里可以提及人名和他被处死的行动说明。处死的原因可不予报告。

奥伯格到达后，这些直率的方法被广泛采用，首先因为他得到了希姆莱的批示，其次因为盖世太保比以往任何时候愈加强硬。一九四二年六月十日，德国中央保安局的领导在一份通函里向保安警察和保安处的所有下属制定出了在“加快审讯”时应注意的详细的章程。

如果在审讯过程中得知囚犯了解有关敌人、联络点计划的重要情报，这时才可以严厉审讯。严厉审讯“只”适用于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耶和华^①的证人、破坏者、恐怖分子、抵抗运动成员、间谍、坏分子、不听话的波兰或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其他情况必须事先得到德国中央保安局的同意。人们看到，尽管受到批示的限制，但事实上人人都不能逃脱这种严厉审讯。

一九四二年七月是谈判的日子。在辛辛苦苦地签订《奥伯格—布斯凯条约》期间，巴黎还举行了其他会谈。四月十七日就任陆海空三军总司令的弗朗索瓦兹·达尔朗和国防部秘书布里多克斯将军于一九四二年六月采取措施，目的是争取德国人的同意，把停战条约上所限制的兵力再增加五万名。这是一种天真的要求，也许是出于图虚荣，争名望的动机。德国人根本不理睬这种要求，因此不同意进行谈判。九月初，在谍报局的所在地——巴黎的“卢坦堤安饭店”举行了会谈，法国方面有两名法国军官达尔朗和布

① 基督教《圣经》中的耶和华(指上帝)。——译者

里多克斯参加。

谍报局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当时在巴黎。情报问题专家，大使馆参赞拉恩在晚餐时把卡纳里斯同两名法国军官互相作了介绍。接着又在“卢坦堤安饭店”召开了两次会议。卡纳里斯让自己处的一位处长赖莱上校代表他参加第一次会议，第二天的会议由他亲自参加，以便“了结这件事”。

谍报局人员在会议开始时立即建议它的间谍同法国在北非的第二局的间谍进行合作。双方相当快地在原则上取得了一致意见。法国人打算把有关达卡和英国海港巴瑟斯特之间的船只活动情况通知谍报局间谍。此外，卡纳里斯还有其他计划要尽快地实现。德国人想从维希那里获得授权书，以便派遣一支强大的部队进入非占区，这支部队有法国的假证件，到了那里它可以自由地去发现地下电台。

除第三谍报局搜寻电台的处以外，还设有国防军情报联络处，目的是去发现秘密电台。联络处设在苏切特大街，它的总部设在波莱罗伊和恰特雷特，拥有一个别动队。这个部门也是属于治安警察的。

这些搜寻队发现了每天用无线电向英国发报的秘密电台网，经测定，这些电台设在法国南部，主要在里昂地区。对于德国当局来说，督促维希政府根据停战条约的指示，中止产生副作用的这种活动是比较容易的。然而谍报局和盖世太保的做法太过分了。事实上，盖世太保想在自由区里尽可能悄悄地自己活动。当时这样做被看作是德法联合起来消灭秘密电台的。根据论证，这样一种友好的合作对继

续谈判产生有利的影响，因为法国想在继续谈判中增加它在停战条约里应得到的一份武装力量。

当法国代表向维希政府汇报以后，他们不得不同意德国人的愿望，并保证把在作战行动中被捕的法国人交给法国司法部。这也许是为那些在自由区被捕的人而做的最起碼的事。条约签订之后，德国人要求得到伪造的法国证件，包括身份证、食品定量卡等等。勒内·布斯凯的任务是制造证件，而且赖伐尔叫他遵守纪律，作出让步。

九月二十八日混合特遣队在南区成立了。它由谍报局、盖世太保和治安警察的二百八十人所组成。所有这些人都是在伪造的法国证件的掩护下进行工作的。德国警察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维希的各个部门里，这对非常重视著名的“自主权”的人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其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二百八十个人分布在里昂、马赛和蒙彼利埃的宿营地，受波埃梅尔堡、谍报局的德伦巴赫和治安警察的舒斯特尔共同领导。这次总行动的代号取名为“多那行动”^①。

精确测定那些电台的方位首先在北区获得了成功。弗里德里希·德伦巴赫是谍报局的人，他是一个测定方位的杰出的技术员，也是政治警察中的一个老手，同德国情报处的许多老间谍一样，他还是波罗的海自由军团的前成员，罗姆就是从自由军团里挑选他的朋友的。后来他参加德国陆军，一九二五年参加不莱梅的政治警察，一九二九年进入谍报局。在他专门从事研究无线电追踪技术之后，他终

① 所有参加者均说法语。

于成为萨尔布吕肯第三处处长。他毫不费力地把全部地下电台网的位置很快作了测定。最后里昂地区的二十个地下电台全部“覆没”。与此同时，马赛、图卢兹以及边窝地区发现了几家秘密电台。几乎各地的电报员和他们的助手全被逮捕。

现在一个叫伯梅尔堡的人上台了。一支以基费尔队长命名的特遣队属于第一批支队，它们在一九四〇年七月加强了克诺亨的小分队。基费尔以反间谍专家身份留在法国，他谦虚谨慎，没有私欲，一心扑在工作上。他是“无线电收发报”的名家。他实际上是在逮捕那些经营秘密电台的人之后开始工作的。无线电收发报是一种迷惑人的、偷偷摸摸的行动，需要很大的敏感性。他认为在除掉一个秘密电台之后还需让它继续工作，并同敌人保持直接联系。要获得这种成就是非常困难的。首先遇到的是技术上的困难，它不比侦破电台的困难来得小：译成密码、精确的播送时间、变换暗号等等。由于事先耐性地不断地进行窃听，所以完全可以解决或者发现这些陌生人，然而事情还要看原来这个报务员是如何“接收”和“操作”的。实际上两个报务员之间，在“线路”的两端有一种难以解释的习惯音阶，只要有一点儿偏向，靠这种音阶立即可以“感觉”到什么地方出了毛病。每个报务员都有他自己的操作方法。如果一架电台由几个报务员在操作，一个受过训练和熟悉业务的人就会立即觉察到是谁在那里发报，当时的技术发展到了这般程度。因此主要的是让被捕的报务员事先不报告对方自己已落在敌人手里而继续工作。为了防止报务员用任何一种

暗示发出危险的呼号，这就需要有一种特别巧妙的监督方法，除非对方发报变化繁多。如果对方注意到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无线电收发报不仅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害了报务员，因为他这时候容易“中毒”，第二种方法很少令人满意，它要求机智灵活，需要有人去接替原来的那个报务员并模拟他的发报。

伯梅尔堡和基费尔同卓越的德国专家科普科夫一起收服了法国南部的无线电台。有些被破获的发报站还在正常地继续发报，甚至同伦敦取得联系，那里的人对报务员被捕一事一无所知。对抵抗运动成员来说，后果是灾难性的。德国人收到有关用降落伞投送武器（大约有二千件武器是以这种方式落到他们手里的）、军需品和金钱的多份报告；他们拿到了文件，发现了间谍网，特别是在诺曼第、奥尔良、昂热和巴黎地区。结果许多人相继被捕。

“多那”特遣队并没有回到北区^①。当德国部队于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开进南区时，这支特遣队可以继续工作，不必再伪装自己。一九四二年底至一九四三年初，德国人成功地对法国地区发动了一场猛烈的攻击。由于盖世太保细致耐心的工作，所以在审问和窃听无线电通话中获得了支离破碎的情报，并成功地吞并了一些部门，这就使他们有可能进入法国情报网。之后可以逮住用降落伞着陆的间谍，截获他们身上的证件并逮捕他们。最后英国在法国的全部组织几乎暴露无遗，处于瘫痪状态。到一九四四

^① 伯梅尔堡回到了巴黎，由穆勒尔代替，他同样会说流利的法语。

年五月为止盖世太保一直在采取这种行动。

本来的无线电台早已消灭。盖世太保想机智地关闭这种无线电台。拍往伦敦去的最后一封电报隐隐约约指的是用降落伞投掷下来的东西：“多谢你们的合作，并给我们送来了武器。”但是英国报务员风趣地回答说：“区区小事，不足挂齿。这些武器对我们说来只是一点点。它们是一种奢侈品，我们很快会得到的。”几星期前，伦敦发现了布列塔尼的秘密电台落在敌人手里，这一点德国人又是心中无数。有人故意给这些电台继续“喂食”，这样英国人又可以把间谍派遣到法国，由他们在一些地方建立新组织。

无线电台活动的后果不仅给秘密抵抗组织带来了很大的灾难，而且也给盟国的情报部门带来了困难。

弥补这个损害需要付出几个月的功夫和重大的损失。许多抵抗运动的战士和盟国的间谍纷纷落入盖世太保手里，在抵抗运动的历史上属于被枪杀或者被流放的低潮时期。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德国部队顺利地开进南区。负责国防的国务秘书、布里多克斯、奥凡和扬凯恩命令停战的部队不要抵抗。勒内·布斯凯向警察下达了同样的命令。

美国人于十一月八日在阿尔及利亚登陆，接着德国人开进突尼斯。他们害怕盟军登陆法国地中海沿岸，对法国居民给予美国人的接待不抱任何幻想。十一月十一日那天夜里，维希政府收到一份威胁性的照会，在照会中说德国部队有必要占领地中海沿岸。第二天上午七点钟武装部队

越过分界线，根据早已制定的“安东行动”计划向南挺进。上午，冯·伦斯德陆军元帅到达维希，向贝当正式宣告占领这个迄今为止的“自由”区。十一月九日停战军兵团奉命撤离驻地，在最后时刻收到了布里多克斯签署的一项违抗令，这项违抗令要他们冒着被捕的危险坚守在兵营里。

六个特遣队随着向南挺进的部队朝他们要驻扎的六个城市移动。奥伯格和克诺亨的人员准备在南区开设他们住家的“分店”。

长期来，间谍们穿的是停战委员会、德国领事馆和红十字会的外衣，干的却是整理秘密文件的工作。在维希，大队长盖斯勒于一九四二年二月正式起用德国警察代表团，该代表团于十一月十一日上午立即进行逮捕活动。在十一月十一日，十二日和十三日这三天，盖世太保正式建立自己的分局，在南区军事区的每个主要点——利摩日、里昂、马赛、蒙彼利埃、图卢兹和维希建立了特遣队。十二月初，这些特遣队改为保安警察和保安处的特遣队，即改为与北区特遣队相同的区局。同北区一样，它们也在重要的城市里偷偷地建立分支机构。这种组织工作结束之后，整个法国笼罩着一个多而密的庞大的德国警察体系（保安警察—保安处）的网。一九四三年四月一日，这个网大体就绪并分布如下：

除北部地区和附设于布鲁塞尔的加来海峡外，巴黎总局控制整个法国以及隶属德国地区的上莱茵、下莱茵和摩泽尔。隶属总局的有十七个区局：巴黎、昂热、波尔多、马恩河畔的夏龙、第戎、南希、奥尔良、普瓦蒂埃、雷恩、鲁昂、圣

康坦、利摩日、里昂、马赛、蒙彼利埃、图卢兹和维希。这十七个区局拥有四十五个分局(一九四四年六月拥有五十五个),十八个较小的分支机构和三个电台边防委员部(一九四四年六月有六个),此外还有十八个边防站。总之巴黎总局下面共有一百一十一个办事处,盖世太保在联合登陆时就是用它们来卡住法国的。这个拥有一百三十一一个连接点的网同三个不属于巴黎的里尔、梅斯、施特拉斯堡区局及其驻外机构均保持联系。

此外还有无数的辅助机构:雇佣的打手队、形形色色的特工队和特遣队,更不用说盖世太保在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上半年还从内奸、多里欧的法国人民党以及民兵部队那里得到的援助等等。

人们不妨回忆一下,在盖世太保的每个办事处里间谍进出不断,他们根据指示在对盖世太保有利的司令部、劳动局、“宣传”处“定居落户”。间谍们使用许多散布谣言者、密探和志愿的或者领取报酬的告密者,事后往往使人感到毛骨悚然。可以想象,要是法国希望得到另外一个命运,战争的结局也许早已有所不同。

一九四三年四月希姆莱来到巴黎视察总局。他对一切感到满意;因为他的政策开始开花结果。一月三十日通过法律成立民兵部队,达尔南担任领导,他是奥伯格寄予最大希望的一个人。只要有耐心,法国警察可以增加一倍,问题在于用那些政治上可靠的志愿者来代替不可信的人,这样那些志愿者就会起到德国冲锋队那样的作用。

二月十一日法令正式承认已成立十九个月的法国志愿

军团。那些志愿者被高薪^①的诱饵所吸引欣然应征入伍，并根据德国人的命令来到凡尔赛的新兵报到处，接着被送往离开拉多姆二十二公里位于波兰森林中部的克鲁泽纳训练营。

最后希姆莱的宠儿——武装党卫队开始在整个法国招募新兵。“武装党卫队的朋友们”举行集会支持征募。在情报局秘书保尔·马里昂的主持下，多里欧、德阿特、罗斯多、达尔南、克尼平和武装党卫队的法国旅第一任队长坎策号召公众在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持那些身穿“德国制服”、“保卫法国”的战士们。

在德国，一九四三年对希姆莱来说特别重要。这年年底他任内政部长、德国警察头子、巩固德国民族的帝国委员，这使他拥有统治被占区“新的德国人”的权力，他的任务就是把巴尔干岛的德国人遣返德国。其次他还兼任公共卫生部长，因为该部的权力已经转移到了内政部。他作为党卫队军团的最高首领领导一批信仰假科学的机构，并对高等学校和科学、尤其对医学施加压力。他作为绝对的君主统治着集中营。为了他的党卫队，他从集中营获取巨额收入，被羞耻地称为“马克斯·海利格帐号”的党卫队的德国银行使这种巨额收入不断上升，最后他的私人军队，武装党卫队在这一年里增加了七个师：四个德国师和三个外国师，这样他就拥有十五个战斗师。

希姆莱的生涯曲线扶摇直上，这同他国家的命运曲线

^① 一个未婚的士兵每月军饷高达二千四百法郎，一个未婚的少校为一万零七百六十法郎。此外还有高额的补贴费、家庭津贴和作战津贴等。

形成鲜明的对照。在他的权力达到顶峰的一九四三年，德国遭到了无可挽回的军事和政治失败。那是指斯大林格勒战役、开辟非洲战线、进军意大利和推翻国内法西斯断垣残壁的那一年，再说人民的痛苦一言难尽。当盟军的空袭毁坏汉堡和空军参谋总长汉斯·耶舒恩纳克将军绝望轻生的时候，希姆莱却骄傲地向他的元首提供可投入战斗的新的武装党卫队师，以此来“拯救欧洲”。国家的崩溃和人民的痛苦提供给他登上王座的阶梯。

一九四三年法国完全被盖世太保束缚住。没有一座城市、没有一个地区能逃脱克诺亨手下那些警觉的间谍们的活动。尽管如此，每天晚上大家还是关门闭窗偷听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这家电台为首先战斗在非洲、继而战斗在西利西亚和意大利的法国人带来了鼓舞和希望。虽然死亡的人数比以前多，但是他们知道，刽子手的末日已是为期不远了。

当时所有监狱都挤得满满的（一九四三年就有四万多人被捕），但是抵抗运动小组和游击队员依靠从降落伞上扔下来的武器组织和武装自己，他们多亏“强劳处”的帮助而获得了宝贵的食物，这个组织把那些不愿到德国去干苦力的人隐藏起来。因此，盖世太保不得不使自己的方法适应这种新的形势。

奥伯格为了主宰法国人企图争取和他们合作共事，尤其要争取警察。他认为，警察在采取镇压措施时行动仍然太“迟缓”。初春时，他在克诺亨和他的传令官哈根的陪同下前往维希。贝当同意接待他。这个几乎是秘密的约会准

备得尽善尽美。梅内特雷尔博士在几天以前就已经到达巴黎，并且拜访了奥伯格，与他讨论法国国家元首必然会遇到的礼节上的细节问题。

贝当在花园饭店接见了奥伯格和他的两名随从，在座的有总监布斯凯和梅内特雷尔博士。会谈进行了八分钟，它完全涉及到四月十八日公布的《奥伯格—布斯凯条约》的第二个文本。奥伯格和他的陪同者对这次会谈作了汇报。

贝当似乎只是从奥伯格的嘴里才知道这项条约的，他声色俱厉地指责布斯凯，为什么这么晚才把条约通知给他这个国家元首^①，而地方长官和警察局长却要比他知道得早。为此，他请求奥伯格的帮助，并补充说：

“我对法国发生的事也感兴趣。”

当他陪同来访者乘电梯的时候，他最后说道：

“就我而言，我认为，法国最大的敌人乃是共济会会员和共产党。”

奥伯格后来说：“我对他的坦率和活跃的思想感到惊讶。”

经短时间的接见以后，赖伐尔款待了奥伯格，接着在皇家饭店为他举行晚宴，法国方面参加的有赖伐尔、阿贝尔·博纳尔、梅内特雷尔、雅尔德尔、加博尔德、布斯凯、罗哈德和盖尔拉达，德国方面参加的有奥伯格、克诺亨、哈

^① 勒内·布斯凯告诉我，他们已经及时地把谈判和争取到来的条约的设想通知了贝当，但是关于条约本身的细节则在最后签订条约之后才通知贝当的。这也许是贝当说出有点刻毒的话的原因，对于这句刻毒话，奥伯格已作了汇报，而且不会由于老态龙钟而被遗忘。

根、诺伊布罗将军和领事克鲁格·冯·尼达。

保证合作的愿望丝毫没有改变现状。每天都有地方当局通知奥伯格，游击队员现在遍地皆是，他们在组织秘密抵抗运动，并且愿意当内奸。此外，他们公开要求德国人的保护，指责法国警察同那些亡命之徒狼狈为奸。事实上：即使有些叛徒或者雇佣者由于政治热情、由于渴望提拔或者到占领军里谋求一官半职，但是仍旧有许多勇敢的人进行破坏活动，因为他们对盖世太保的手段、对敌人所采取的措施感到愤慨。他们告诫那些受到被捕威胁的法国人，同时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在行政部门、甚至在警察中间（直至维希的国家警察总局）建立积极的抵抗运动小组。在纳粹恐怖的年代里，没有一个国家机关所作出的牺牲比警察大。为了对警察进行严密的控制，盖世太保总部建立了一个特别科，由党卫队中队长霍尔斯特·劳贝领导。这个科建立后首先进行大逮捕并把许多警官流放他处。但是它从来没有成功地对付得了法国各部门所组织的抵抗运动。

一九四三年初春，盖世太保要求它的局经常了解警官、直至警长中的变化、调动和提升。然而，下层机构里反纳粹活动往往进行得最为剧烈。

游击队员日益加强的活动使盖世太保坐立不安。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中旬发生了德国人所谓的“贝当—赖伐尔分离事件”。阿贝茨认为只有赖伐尔是重要的，是真正能治理这个国家的人，但是盖世太保的一些报告指出秘密抵抗组织企图拐骗贝当的可能性，这在公众舆论中一定会引起强烈的反应。据秘密派到国家元首周围的情报员报

告说，贝当打算离开政府和维希，某些知名人士也向他建议过这件事。这个可能性非常之不幸。奥伯格采取了代号为“狐穴作战计划”的严厉的防护措施，对维希周围的人进行彻底搜索，所有可疑者撤离该地或者遭到逮捕。接着在城市周围设立防护区，每条街设立检查来往行人的岗哨，最后又在其他地区密布治安警察岗哨。所有这些预防措施都是斯科尔兹内和突然从德国来此的特遣队共同采取的。斯科尔兹内化名为沃尔夫博士外出旅行，负有保护维希和采取一切适当措施的全权。但是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把上述事情通知总司令维斯特，大元帅冯·伦斯德。斯科尔兹内在检查“狐穴作战计划”的预防措施之后表示同意并补充了其他措施，以便“一旦发生英国人派飞机去接贝当时”可以保护维希的机场。因此他又折回柏林。

一九四三年底，在指定人选方面，奥伯格取得了很大进展。他看中达尔南由来已久。达尔南是民兵部队和武装党卫队的人员。奥伯格认为，民兵部队是“一种运动，它同党卫队运动极其相似”，并有“能力”“给法国警察以新的动力”。由于头脑里存在着这种思想，他总是宠爱达尔南并且支持他的组织。一九四三年夏末，党卫队将军戈特洛勃·伯格曾邀请达尔南和他的秘书加莱特到德国作一次学习旅行。到了秋天，达尔南被任命为法国武装党卫队的“名誉”大队长，并委托奥伯格向他公布这次提升。

就在这个时候，奥伯格、克诺亨和军人开始怀疑总监布斯凯的良好愿望。有人早已劝过赖伐尔用一个政治上较为可靠的人来代替布斯凯。十一月底，贝当和赖伐尔的关

系破裂，内政部里重新更换人员。奥伯格要求赖伐尔利用时机提升达尔南为警察总监。达尔南的民兵部队已经正式被承认为“后备警察部队”。

对此，赖伐尔不发表有倾向性的意见，因为达尔南曾多次攻击他是“共济会会员的朋友”和第三共和国的前拥护者。他希望马赛和雷蒙纳的前地方长官能得到任命，但是他最后还是放弃了这个希望，任命达尔南为内政部国务秘书，免去现任内政部部长乔治·伊莱尔职务。

十二月二十九日勒内·布斯凯退出了国家警察总署。在他离开自己办公室以前，他让人烧毁了一大批不愿落到达尔南手里的档案。两天以后达尔南搬进了孤独的办公室，这样就在当年的最后一天完成了维希政权开始以来最有效果的行动。由于把维持秩序的任务委托给了一个善于敲诈勒索的党员，一个极端主义小组的头头，所以给滥用职权大开了方便之门，并公开模仿起纳粹体制来了。按奥伯格的计划，民兵部队应成为法国的党卫队，应该在几个月后作为武装党卫队参加希姆莱的军队。

住在巴黎的勒内·布斯凯受到了监视。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即登陆诺曼底的这一天他在巴黎被捕，他的父亲在蒙托邦被投入监狱。但是后者十四天以后被再次释放，而这位前警察总监却依然是个俘虏。

伯梅尔堡和他的司机住在纳伊的一幢别墅里。他的一位同事达梅罗也曾住过那里，直至维希政府召回他去那里接替被抵抗运动小组杀害的盖斯勒。

这幢宽敞舒适的别墅为某些客人，有时也为著名的囚

犯提供住宿帮了大忙。布斯凯也被安置在那里。十天以后他从陆路被带到德国，在特格恩西分配给他一幢别墅，迫使他住在那里。几天后他的妻子和五岁的儿子也跟着去那儿。

达尔南刚一上任就得到无限的权力。一九四四年一月十日公布一条法令，把指挥全法国警察的唯一权力交给他。当他的前任获得警察总监的头衔时，他只被任命为维持秩序的总监。

从此时起，民兵部队实际上作为国家机构进行活动。他们的宿营地成为与盖世太保合作的毫不掩饰的附属品。在这两幢房屋里施行着同样的审讯方法。囚犯被直接交给盖世太保，手续很简便。法国政府的警察越来越多地被民兵部队所排挤。

被捕的人数每星期逐步上升。仅仅三月份就有一万多人被法国当局拘留，这与一九四三年头四个月所拘捕的人数不相上下，当然还应该把被盖世太保拘捕的人数计算在内，但是他们的数目是个未知数，而且有时候几星期不向司法当局报告所有被民兵部队拘留在监牢里的不幸者。

一月二十日公布第二条法令成立军事法庭，这个滑稽的法庭由三名不是司法官的律师组成。他们的姓名是保密的，他们在监牢里秘密举行会议，他们所作的判决应立即执行，不得提出上诉。那里既没有起诉人，也没有辩护人。长期来德国人要求成立特别法庭以此镇压秘密抵抗组织的活动。奥伯格后来承认，他不想如此迅速地采取措施。

军事法庭于一月底在马赛，随后又在巴黎开展工作，其

中在圣旦进行“审理”的一家法庭判处了十六个抵抗运动战士死刑，立即执行。借用匿名杀害法国人的那些“法官”极大部分是民兵部队的成员。

如果作者在这里根据个人的回忆报道了法国监狱里的囚犯是如何窃听这些军事法庭的会议的，那么人们也许会原谅他。只要稍为仔细听听军事法庭开会时的这些乱七八糟的声音，就足以明白这些法庭是依据一种奇怪的法律观念办事的。

军事法庭多半在下午召开会议。总之，我在这段时间里几乎一直听见他们工作时的响声，我料到是三个秘密的法官先生在参加午宴后前往监狱。

他们来到监狱之前，总是举行同样的仪式。所有被争取过来参加“杂务工”的囚犯：洗碟者、厨师、端菜者和书写员都被送回到自己的牢房里。接着看守人员把所有牢房的窥孔和双层门关了起来，好象到了晚上似的。稍待片刻听到监牢的双翼大门徐徐启开。一辆卡车开了进来，停在环形路上，人们听到一阵低沉的撞击声：棺材被卸下来，放到石块路上。卡车开得很巧妙，以便停在远一点的地方，它很快满载着棺材又开走了。

大门再次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一支步伐整齐的行军部队的脚步声在环形路的城墙间发出回响。一个命令下来，便听到枪托碰阶砖时所发出的响声：行刑队已作好射击准备。

顿时一片静寂，牢房里的囚犯在紧张地偷听着。跑龙套的演员已经准时到达，大家在等着剧本的主角，在小门

上轻轻地敲一下门就马上启开了。这时传来了前院小石子路上的脚步声，栅栏门接连发出叽叽嘎嘎的声音：“法庭”人员已经聚集在律师的接待室，犯人们可以在小桌子后面作一番自我介绍，他们过去就是倚靠在这张小桌子旁同对面的自己辩护人讲话的。

此时戏剧发展得很快。从监狱底层传来一阵嘈杂声，接着又是一扇牢门的响声，时而打开，时而关闭，还有正在走向接待室的脚步声。

整座监狱屏住呼吸、气氛紧张。“政治犯”和“刑事犯”之间不再有什么区别；每个俘虏都喜爱其他俘虏，也就是喜爱那个落入可怕陷阱的兄弟，要活着离开这个可怕的陷阱那是不可能的。

几分钟过去了，五分钟，也许是十分钟。如果“被告”较多些，那么会议有时候需要大约十五分钟。而这十五分钟看来是长得可怕。门声和脚步声终于宣告了会议的结束。有时突然发出一种声音，那是一种很快就要窒息的绝望声或愤怒声。铁栅栏又相继启开，圆石子又在脚底下发出沙沙的声音，小门重新在这三位“先生”的后面关上了，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镇静地走了出去，而被判者却在仓卒地写完他们最后的一封信。

警卫队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一阵喊叫声，接着“犯人”们满腔怒火、泪水纵横地引吭高歌，那只曲子的歌声回荡在环形路上，多数人唱马赛曲，有时唱国际歌，接着又是一阵喊叫声，声音渐渐离去：“永别了，同志们！法国万岁！”紧接着是一阵枪声，它在高墙间发出可怕的隆隆的回声，经久不息

并在监狱的角落和我们的头脑里起伏不停。一种单调的霹雳声犹似打雷后发出的那种做作的声音：给死者添补了致命的一枪。

当特遣队的整齐步伐从大门处远远离去的时候，我们听见锤击声，有人正在把毛坯木料制成的棺材钉牢。最后卡车开走了。达尔南的刑庭也就宣告结束。

到了晚上，监狱神父看望了每间牢房，在那憔悴的脸上和大眼镜后面的那双善良的近视眼里流露出世人的全部悲哀。“我的朋友们，你们知道，你们的同志……”他的声音停留在这句话上。“他们死得勇敢。如果你们是虔诚的教徒，那就为他们祈祷吧！如果你们也勇敢起来，你们就有希望、就有信心。”说完话以后，他就走了，他从每个牢房里带走十二个或十五个被捕者，他们正在等待法庭的下一次审判，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流露出虔诚的爱和虔诚的信心。

我必须指出，遗憾的是这些军事法庭的大多数“法官”在解放后没有被认出来

第 六 部

盖世太保的末日

(一九四四年)

第一章

陆军反击盖世太保

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东方刚刚破晓，一支强大的舰队全力向法国北岸推进。一小时后，盟军第二十一集团军的先头部队在伯纳德·蒙哥马利爵士将军的率领下登上了卡尔瓦多斯海岸，迅速地取得了立足点。这场经过酝酿、期待已久、异常可怕的法国之战即将开始。

盖世太保在盟军的围困和夹攻中只有招架之势，毫无反击之力。德国陆军重新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顽强地进行激战，终于保住了几个月来坚守的每一寸土地。希特勒禁止任何退却行动。党卫队直接参加作战，驻守在东南地区的“帝国师”用常见的暴行来执行他们扫荡游击区的任务。这个师为了抵抗盟国部队，从蒙托邦到圣洛，横扫了整个法国。在他们所经过的道路上，留下了成百具尸体。蒂尔的九十九个被绞刑者和格拉尼河畔拉多村的被枪决或被活生生烧死的居民成了国家社会主义的牺牲品。

残暴的统治必然导致他们走向灭亡。“帝国师”在圣洛战役中失去了五分之三的兵力。圣洛沦陷之后，德国部队被迫逃离阿弗朗什，一窝蜂似地向布列塔尼撤退。

在巴黎，奥伯格和克诺亨的官员们开始惶惶不安，盟

国部队迅速逼近首都的消息不胫而走，因此，必须采取措施，以防一旦巴黎失守，有些人为了确保行动自由而偷偷溜走。等到天快大亮的时候，抵抗力量的作战分队必定会阻击最后一批德国撤退部队。为此，奥伯格命令预先逮捕一切适宜担任领导工作的人。

早在四、五月份有人就采取了这样一个措施：逮捕了十三个被看作敌视德国的在职的地方行政长官和其他一批著名人士。

八月十日，又有四十三个人被逮捕和放逐，他们当中有：地方行政长官、高级财政官员、上将、上校、少校、律师和教授。巴黎人没有觉察到这些所采取的措施，他们沉浸在一种催眠的状态之中，被解放斗争的胜利成果弄得神魂颠倒。这场解放斗争扩大到了首都以西二百公里。七月十四日，巴黎好几个区的市民在法国国旗的指引下穿过大街，准备进行最后的决战。

巴黎人根本没有预料到七月二十日发生的戏剧性事件，这个事件使驻巴黎的德国当局、尤其是盖世太保大吃一惊。

德国反法西斯人士早就打算重整旗鼓，采取冒险行动，但是由于保安队和盖世太保四出活动，这一行动遭到了破坏。在军队中也组织了抵抗部队，只有他们似乎有几分成功的希望。但是一切证明，他们宁愿找一些能说服自己的理由来安慰自己，而不去过多地考虑接受上司赐给他们的许多恩惠。上司懂得：要用越级提升^①、支付高薪的方法来堵塞他们的嘴，更不用说希特勒经常把这些礼物赐予那些

^① 1940年7月19日，十二名将军同时被提升为大元帅。

大元帅和将军了。

所以最初抵抗纳粹的勇敢行动并非出现在军队。在战争时期，最早的敌对运动往往产生于高等院校。这些院校的师生们受到良心的责备，因而起来反对继续轻视一切精神的价值。派纳粹密探混入大学是破坏不了具有独立、自由和正义感的老传统的，这些老传统对各地大学生来说非常宝贵。

纳粹密探在慕尼黑大学发现了一个名为“白玫瑰”的抵抗运动小组。这个小组油印和散发缪恩斯特主教、加仑伯爵大胆说教的小册子，并在一九四二年夏天继续油印和散发从席勒的论文《卢库尔戈斯的立法和梭伦》中摘录的几个篇章。

一九四三年初，“白玫瑰”的队员开始进行公开对抗。年轻人敢于把“打倒希特勒！”的大字标语刷到墙上，这在今天也许是不足为奇的，而在当时却需要相当大的勇气。二月十八日，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后，有人油印了公开号召起来反对纳粹统治的传单，并以投寄方式将其投向讲堂。同时，传单还向国防军官员的良心和自尊心发出呼吁。卡尔登勃鲁纳亲自处理这个意外事件，他把卡纳里斯和拉豪森叫到慕尼黑，他们了解传单事件的全过程。二月二十二日那一天，传单的起草者被处以死刑。青年人更相信军人的荣誉感，他们的呼吁在军队内部引起了反响，也许这个呼吁有助于谍报局的那些一成不变的老牌密谋集团采取行动。

然而，“白玫瑰”的青年队员并不仅仅满足于散发传单。二月十九日，他们在慕尼黑领导大学生进行了政治集会。盖

世太保的一个密探小头目一眼认出了正从一扇窗户里向外散发传单的一对年轻兄妹。于是，他便急匆匆地跑去报告。

盖世太保立即采取了行动，当天就逮捕了三个大学生，他们是二十四岁的克里斯托夫·普勒布斯特，二十五岁的汉斯·舒尔，这两人都是医科大学学生，还有二十二岁的莎菲·舒尔，她是哲学系的学生。三个人经受三天的审讯和拷打后，于二月二十二日被判处死刑，当天晚上就被处决。搜查活动还在继续进行。七月十三日，哲学教授库特·休伯和医科大学学生亚历山大·施莫莱尔被捕。十月十二日，厄运终于降临到医科大学学生维利·格拉夫的头，上，“人民法庭”宣判他们死刑，并且用大斧砍去了他们的头颅……。绝大多数的法国人是不知道这些酷爱自由的殉难者的名字的，可是他们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在此向他们表示适当的敬意是有充分理由的。

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灾难象催化剂那样影响了军队。目光敏锐的人认为，总有那么一天，希特勒要么不得不放弃战争；要么将战争扩展到俄国寒冷的平原，以全军覆灭而告终。如果现在将军和军官们对希特勒及其统治采取直接行动，那么为了拯救还可以拯救到的东西，应该更多地去反抗纳粹罪行，而不应停留在愤慨上。多年来，这些罪行就是在他们的眼皮底下犯下的，可是他们似乎并不打算结束这些罪行。害怕失败以及要想保住既得利益的这种本能的动力就足以唤醒和驱动它们。

自从纳粹统治开始以来，希姆莱就派人严密监视着军队。可是，保安警察担心，军官们在参谋总部的保密情况

下，有时会协同外交官一起搞阴谋活动。德国中央保安局派出了最出色的间谍进行追踪，然而密谋者拥有强大的、实际上难以穿透的堡垒——谍报局，当然这同样也是希姆莱想占有的对象，希姆莱内心早就想把所有的谍报机构控制在自己手里。一九四三年二月初，这些机构也是卡尔登勃鲁纳的主要目标。当时，谍报局和盖世太保之间正在相互角逐，因为密谋者长期来不敢下决心干掉希特勒，而现在终于下了这个决心。军官们也许早就可以除掉希特勒，甚至可以使用合法手段，但是，他们不敢这样做。当他们作出决定以后，接连进行了几次徒劳的尝试，其中最有可能成功的一次尝试是在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三日进行的，它被称为“闪电计划”，因为这个计划将由一根雷管引起爆炸而立即导致全面政变。谍报局和国内驻防军参谋长、补充军司令弗雷德里希·奥尔布里希特将军在柏林作准备；中央集团军第一参谋长海宁·冯·特莱斯科夫少将和他参谋部内的一个传令官费边·冯·施拉勃伦道夫中尉在中央集团军总部的所在地斯摩棱斯克作好了最后的准备。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三日，希特勒到中央集团军视察，他在乘飞机返回腊斯登堡之前，施拉勃伦道夫给了希特勒的陪同官员一个装有“两瓶白兰地酒”的包裹，这个官员事先已答应特莱斯科夫的请求，替他把“白兰地酒”带给元首总部的一个朋友。包裹里放着一枚定时炸弹，大概在飞机越过明斯克时炸弹就会定时爆炸。这枚炸弹是从谍报局带来的，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到斯摩棱斯克去参加谍报局会议时，他的陪同——谍报局第二处处长埃尔温·拉豪森把炸弹交

给了冯·格斯道夫上校。

但是，炸弹的雷管失灵了，希特勒乘的飞机安全抵达腊斯登堡。密谋分子借口包裹里的瓶子搞错了，于是将它原封不动地取了回来。因此，这次谋杀的企图从未被发觉。

其他一些关于消灭希特勒的计划仍在制订中；有的眼看就要实现了，可到最后所有计划还是化为泡影。

但是，缪勒和施伦堡这伙人继续进行他们的调查。一九四三年四月五日，他们在谍报局内部打开了第一个缺口：盖世太保逮捕了谍报局对外谍报处处长汉斯·奥斯特上校，此人是密谋分子中最活跃的头目之一。在第一批被捕者当中还有杜那尼博士，盖世太保在他的保险箱里发现了一些文件，这些文件为他们提供了密谋分子活动的重要线索。由于文件太零乱，所以盖世太保不可能采取大规模的行动，况且还有其他障碍挡住他们的道路：希姆莱在反对卡纳里斯这方面患有一种严重的心理变态病，因而没有果断地对谍报局直接发动攻势。所以，这位谍报局首脑又支撑了几个月。

九月，盖世太保用一种他们所惯用的“方式”进行了新的打击。主要打击曾在威廉二世手下担任最后一任的外交部长、在魏玛共和国做过驻日大使的威廉·索尔夫的遗孀索尔夫夫人周围的人。索尔夫夫人和她的女儿巴勒施特莱姆伯爵夫人继续了一九三六年故世的丈夫和父亲的英勇反抗行为，她们经常把持相同政见者聚集到“沙龙”里，称之为“索尔夫夫人茶会”。“索尔夫圈子”同瑞士的逃亡者保持联系，并通过他们与英美间谍取得联系。一九四三年九月

十日，柏林仁慈医院一位年轻的瑞士医生雷克策博士经人介绍加入了这个圈子，他立刻流露出强烈的反纳粹情绪，并自告奋勇地愿意把消息传递到瑞士去。可是索尔夫夫人在处理这件事情上不够谨慎，哪里知道，雷克策博士是盖世太保的一名特务。这一次，希姆莱也在耐心等待，但是，到此为止所收集到的材料还不足以对卡纳里斯予以决定性的打击。

但是到了十二月，强迫奥斯特辞职并逮捕他的材料已收集齐全。一九四四年一月，卷入索尔夫圈子事件的七十四人均被逮捕。不久，大部分已经暴露身份的人被提交“人民法庭”庭长、惨无人道的罗兰·法赖斯勒进行审讯，尔后被判处死刑。^①

一九四四年初，新的意外事件使谍报局的活动经常处于隐蔽的、偶尔再公开一下的状况。由于谍报局的活动机构没有“全部”瘫痪，希姆莱现在敦促希特勒采取措施，这些措施是希姆莱在施伦堡的威逼下要求采取的。

二月十八日，希特勒下令摧毁谍报局这个中心机构，它是由“外事局”和原秘密处“谍报局办事处”所组成。谍报局办事处被德国中央保安局吞并。专干纯军事情报的外事局情报处作为“军事机构”而获得某种程度上的独立性。

同时，希特勒对德国中央保安局第六处处长施伦堡（纳粹情报局的独裁者）给以“对外行动完全自主权”，唯独卡纳里斯被免职：解除其军事情报局局长的职务。

^① 索尔夫夫人和她的女儿幸免一死，她们由于日本大使的干涉，被关进了腊文斯勃鲁克集中营。

格奥尔格·汉森上校转任军事情报局头目，他原先是谍报局第一处处长，主管陆海空情报局。汉森和弗赖塔克-洛林霍芬男爵上校是谍报局内部密谋集团的最早成员，非凡的运气保护了他；盖世太保没有预料到他的活动。现在他作为军事情报局的头目继续积极地参加密谋活动。但是，自七月二十日发生谋杀事件之后，他和他的朋友一样被处死①。

谍报局——德国中央保安局在国外的对手就这样终于土崩瓦解了。希姆莱战胜了自己的敌手卡纳里斯。密谋分子再也无法为自己寻找借口和出路了，原因是过去向他们提供伪造证件、假指令和炸弹等的来源被卡断了。密谋分子过去经常利用机会把那些已经暴露身份的人送到瑞士去，但现在这种可能性已不复存在了；同英美保持接触也是困难重重。这一切使密谋分子中间早已公开存在的意见分歧再次激化。

如果不是在谍报局解散前夕有一个新的同谋者采取了另外的行动，那么这次打击对阴谋活动来说也许是致命的。参谋总部军官克劳斯·沈克·冯·施道芬堡伯爵中校在突尼斯受了重伤②，后来被提升为上校、补充军总参谋长，他是一个旧贵族军士家庭的后裔，他的母亲是乌伦克尔-格奈斯瑙。施道芬堡也相信国家社会主义政体的优越性，并幻想着由他重建一个美好的德国。但是他也意识到，战争失败了，希特勒争夺德国和军队已到了极点，他也许不会很快遭

① 弗赖塔克-洛林霍芬自杀身死。

② 施道芬堡在突尼斯失去了一只眼睛和右手臂。

殃。因此，施道芬堡参加了密谋活动。密谋活动的核心人物就是前莱比锡市长卡尔·弗里德里希·戈台勒和前任陆军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上将。

吉斯维乌斯清楚地阐述了施道芬堡的动机：“施道芬堡不希望希特勒把有遭到死亡威胁的军队推向灾难；对他来说，拯救祖国和拯救军队具有同等意义，因此他不能孤军作战。施道芬堡承认自己是‘七·二〇’事件的高级军人集团的人物。人们从一九四二年起——那时失败接踵而来——谈论有一个秘密的军官集团，那完全不是偶然的事。这个集团有意识地出现，坚决要在其他方面去闯出一条路来。”^①

施道芬堡认为，所有争论，所有未来的计划，所有备忘录和给将军们的信都是毫无意义的，而他所需要的是行动：这是密谋集团的首脑第一次冒生命危险。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他被叫去腊斯登堡的元首司令部“狼穴”听报告，在他的公文包里放着一枚定时炸弹。然而，希特勒为了逃避遇害，他有神机妙算，在最后一刹那取消了“元首会谈”。施道芬堡只好携带着公文包里的炸弹飞回柏林。

施道芬堡的干劲给密谋集团增添了新的生气。现在谍报局被摧毁了，他不得不为自己在最高统帅部找一个新的避难处，并争取一些将军参加密谋，或者至少使他们保持友好中立。

这在盖世太保和党卫队保安处中是不可能办到的事。但是，两个重要的警官、早期政权的纳粹分子却站到阵营的

^① 吉斯维乌斯著：《直到痛苦的结束》，第2章，第238页，1947年第1版。

对立面去了，并向密谋分子提供援助。曾在俄国指挥过作战部队的刑事警察头子奈比和柏林警察局局长赫尔道夫伯爵及其副手柏林警察局副局长弗雷德里希·迪特罗夫·冯·舒伦堡伯爵，也成为叛变的纳粹老将，他们最主要的任务是在国家发生政变时与柏林卫戍司令冯·哈斯中将保持联系。哈斯是密谋集团的核心分子。

同时，西线占领军的许多指挥官也保证给予密谋分子以援助。他们是：法国军事总督海因里希·冯·施图尔纳格尔上将；比利时军事总督亚历山大·冯·福肯豪森将军；尤其是B集团军司令、战场上一个庞大的常备集团军的唯一指挥官埃尔温·隆美尔陆军元帅（他没有拒绝密谋分子的使者的迫切要求）和他的参谋长汉斯·斯派达尔将军。在物质上占压倒优势的侵略军使他们确信，受支配的德国军队不可能长期坚守诺曼底防线，但为了拖延战斗时间，一定要守住防线。希特勒始终拒绝考虑陆军元帅提出的论据。

谍报局的瓦解造成了重大困难。在一九四三年内，密谋分子至少进行了六次企图谋杀希特勒的尝试；可是在一九四四年上半年一个计划也未完成。施道芬堡认为，只有消灭希特勒，才能推翻这个政权。他的出场使那些曾妄想兴登堡逝世之后为元首效忠的将军动弹不得。

在法国战役中，登陆是英美军队的首要战绩。同盟国向意大利进军，随后占领罗马，苏联军队也踏上了波兰领土，德国东部防线全面崩溃。所有战场上的灾难向施道芬堡证明，他不可能再施展手腕，而且也无法挽回局势。

然而，密谋集团把希望寄托在一种错误的假设上。密

谋分子确信，希特勒一死，他们也许能以和平方式同西方列强谈判。他们希望立即停战，但是反对无条件投降。由卡尔·戈台勒起草的“和平计划”与现实完全不相符合，这种同西方国家媾和的特殊方式，正如戈台勒和他的朋友所认为的那样，与缓和东部的战事毫无关系。相反，他们打算在建立新的权力之前的这段时间内缩短东部防线。并认为，美国人和英国人也许会与他们联合起来同俄国人作战，这是《雅尔塔协定》作出的一个完全错误的判断。如果阴谋活动得逞，事件的发展趋势也许不会改变；如果密谋分子杀害希特勒，并掌握了政权，那么猜想他们一定会明白，西方国家根本不会听取他们的建议。作为一个遭到丘吉尔——在军事上占优势——打击的人，只有忠实履行《雅尔塔协定》，如果拒绝无条件投降，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面对这样的退却，由军队支撑的德国新政府也许会作出把战争继续下去的决定。

与戈台勒和贝克相反，施道芬堡和他的朋友似乎是比较现实地、理智地理解这种局势的。所有防线的崩溃告诉他们，希特勒鼓吹的抵抗等于是德意志民族的自杀。如果战斗直指大陆的心脏，整个经济发展的潜力就会遭到破坏，数十万人——尽管不是百万人——就会死亡，同时还会出现可能使德国从此一蹶不振的危险。

施道芬堡从这一认识出发，与领导小组的戈台勒和贝克拟定了“伐尔克里”计划：杀死希特勒，立即在柏林建立一个军政府，这个政府也许可以用国防军的部队来接管那些最危险的纳粹组织——党卫队、盖世太保和党卫队保安处。

六月底，施道芬堡被任命为国内驻防军的参谋长，这个职务为他经常出入于元首大本营创造了条件，从而加快了执行计划的准备工作。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密谋分子利用以前所发生的其他事件的细节，通过施道芬堡之手予希特勒和纳粹政权以沉重的打击。七月二十一日深夜一点钟，希特勒在广播电台讲话。施道芬堡的炸弹（又是一个偶然事件）偏偏饶恕了他，“伐尔克里”计划失败了。血腥的迫害和镇压开始了。

在巴黎，与在布拉格和维也纳一样，占领军中的同谋者于下午四点钟得到消息说，谋杀活动已按计划进行。四点三十分贝克打电话给施图尔纳格尔，命令他采取已经决定的措施。虽然有人从一开始起就怀疑，依靠一次可怕的背叛是否会使这次行动取得成功？但是施图尔纳格尔还是立即行动起来。前不久，古恩特·冯·克鲁格陆军元帅接替了伦斯德西线总司令的职务，他同意一旦袭击成功就向密谋分子提供援助。晚上七点钟克鲁格从官方广播电台获悉，希特勒只是受了一点伤，于是他便退却下来。七点三十分维茨勒本打电话告诉他，希特勒可能死了，此时此刻他似乎又参加了密谋集团。八点十五分，他得知与最高统帅部保持联系的长途直线电话线路已被切断，他再次转变方向，这最后一次因后果严重，他的指挥失去作用，巴黎的密谋分子已经不听从他的命令，并决定，将密谋行动进行到底，甚至在柏林密谋活动完全失败的情况下，也不能阻碍他们在法国继续执行计划。他们公开与希特勒及其政权决裂，这一行动几乎可以肯定，它会在德国引起极大的反响。命令就

这样传达了下去。

晚上七点钟，军校第一摩托化步兵团第二营奉大巴黎司令官冯·博伊内堡-朗斯费尔德将军的命令，包围了福煦大街的大楼，首先是奥伯格的住所，柳林街以及拉纳大街附近的各局机关，他们紧握着手枪冲了进去。没有一个党卫队员进行过丝毫的抵抗。晚上十一点，驻巴黎的一千二百名党卫队、盖世太保和党卫队保安处的官员几乎全部被禁闭起来。奥伯格本人则在他与阿贝茨通电话时被博伊内堡的副官冯·勃莱梅尔上校当场擒获的，而且乖乖地被解除了武装。当时有一个人漏网：即克诺亨。他这时正在他的一个在大使馆工作的朋友蔡彻尔家进晚餐，他的一个部下打电话给他，催促他立刻到福煦大街去。克诺亨感到怀疑，所以他想先驱车上奥伯格那儿去。他赶到那儿，才知道奥伯格已经被捕，于是，他同样束手就擒。克诺亨被带到福煦大街以后，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发现了冯·勃莱梅尔。午夜刚过不久，党卫队队长奥伯格、克诺亨和盖世太保以及党卫队保安处的头目都被博伊内堡将军派人押送到卡斯蒂利奥内街上的大陆饭店里——将军的办公处就在旁边的默里斯饭店，以便对他们的命运作出判决。

在此期间，当军校准备第二天早上枪决盖世太保和党卫队保安处的头目（他们在密谋集团的军事会议上立即被判处死刑）时，克鲁格作出了最后一次转变^①，同时，他报告说，施图尔纳格尔采取了那种“不许可的行为”，以此向柏林

^① 克鲁格的卑鄙行为并没有使他得救。据柏林方面引证，他为了开脱自己，在去克莱蒙昂纳尔贡的路上服毒身死。

告急。

与此同时，施道芬堡从柏林打电话给施图尔纳格尔，把政变失败的消息告诉了巴黎的密谋分子，在他挂上电话之前，他说：“我的凶手已在门口。”

巴黎的密谋分子遭到了一种意外的压力，但这并不能促使他们放弃这次行动。在克鲁格告发施图尔纳格尔之后不久，西线海军部队总司令克朗克海军上将在柏林出现。密谋分子是那种习惯于只拟定有关陆军计划的人，丝毫没有考虑到海军的力量。克朗克奉柏林关于要进行干涉的命令，向分散在巴黎的海军部队告急，并从他的司令部里向博伊内堡和施图尔纳格尔发出最后通牒：如果不立即释放奥伯格和党卫队，他将使用武力，这是给受伤的野兽致命的一击。现在继续进行一场毫无希望的叛乱已经成为一种罪行。七月二十一日凌晨一点钟，当柏林开始进行镇压、报复和进行逮捕的时候，巴黎的将领们不得不释放他们的俘虏，并把武器退还给他们。到了上午一切照旧。巴黎人没有注意到，在德国占领区内已经发生了重大事件。

几小时内，陆军就被希姆莱和他的党卫队践踏了。将军和军官们第一次敢于大胆地攻击他们暗中的敌手，却因为遭到驻法国的克鲁格和柏林的弗洛姆那样的同僚们的卑鄙地进行破坏而遭到失败。弗洛姆为了除掉危险的证人，在紧急关头，根据《军事法庭法》枪决了以施道芬堡为首的策划“伐尔克里计划”的领导人。但是，弗洛姆这样做，在希特勒、希姆莱及其刽子手的残酷报复面前仍然挽救不了自己。希姆莱得胜了，盖世太保牢牢地控制住了他们多年来梦寐

以求的军队,并开始进行调查。在调查过程中,他们可以乱翻参谋部里的绝密文件柜,而且通过调查可以对所有的旧帐进行一次清理。

在巴黎,克诺亨把调查的任务交给了盖世太保头目博伊内堡的继承人施廷特。接着被逮捕的有:总参谋部军官施图尔纳格尔;施道芬堡的表兄弟凯撒·冯·霍法克中校,此人负责他的上司与柏林密谋集团之间的联系工作;施图尔纳格尔的参谋长汉斯·奥特弗里德·冯·林斯托夫上校;克鲁格的副参谋长埃贝哈德·芬克,以及比利时军事总督的表兄弟冯·福肯豪森男爵^①。

施图尔纳格尔本人在叛乱的当天被紧急召回柏林。克鲁格的报告奏了效,施图尔纳格尔立即明白,他输了。七月二十一日中午,他乘车离开巴黎,汽车半路抛锚,他只好留在莫城。一辆备用汽车将近下午三点钟才到,他乘车继续向目的地驶去,还未到凡尔登,他便叫司机朝色当方向开,汽车穿过战场继续往前。一九一六年,他曾经作为一名年轻的上尉在这儿的战场上作战过。汽车开到马斯河畔,他命令司机停车,他下了车,叫司机在附近的村庄等他,他随后步行而来,“以便让自己的腿骨稍微活动活动”。当汽车刚离去不远的时候,一颗子弹射进施图尔纳格尔的太阳穴,他摇摇晃晃地跌入河里。

他的司机等了他好长时间,心里感到不安,在返回前去接他时发现了她,于是把他送进了凡尔登陆军医院。枪

^① 福肯豪森和霍法克是被熟悉巴黎沙龙的施多策尔·马拉茨逮捕的。

弹打穿了他的头盖骨，他没有死，但双目失明了。

施图尔纳格尔大体上复元后，于八月二十九日同其他被控者一起在咄咄逼人的法赖斯勒和血腥的“人民法庭”面前受审，他们所有的人都被判处死刑，是在普洛成西监狱被用极其残酷的刑罚挂在肉钩子上，慢慢地绞死的。“你们应该象屠宰的牲畜一样被绞死！”希特勒歇斯底里地吼叫着。双目失明的施图尔纳格尔也被架到了钩子下。镇压持续了一个月之久，它株连到密谋分子的朋友和家属。这次镇压以可笑的判决为幌子，要比一九三四年“清洗罗姆分子”更加残酷。

希姆莱和卡尔登勃鲁纳把这场暴行当作真正的娱乐。七千多人被逮捕，被枪杀的可能接近五千人^①。退休的卡纳里斯虽然没有参加“伐尔克里计划”行动，但他也被逮捕了。经过长达一个月的监禁之后，他于一九四五年三月上了绞刑架。那个为了掩饰自己，叫人谋杀贝克、施道芬堡及其同僚的卑鄙的弗洛姆在一九四五年三月被枪决。福肯豪森在最后时刻被美军解救了出来。许多已暴露的军官宁可自尽，也不愿被捕和受“法庭”审判。十月十四日，隆美尔离开了人间，他是被迫自杀的。

在巴黎，奥伯格和克诺亨重新担任警察局和情报局的头目。那里的军事局势发展很快，因而阻碍了调查工作的进行。博伊内堡将军只知道执行施图尔纳格尔的命令，而没有一点主见，因此被调往后备军。迪特里希·冯·肖尔

^① 被枪杀的人数达 4980 个，这个数字可能是正确的，但要进行核实，那几乎是办不到的。

铁茨将军担任“大巴黎”的卫戍司令。

七月底，盟军大力加固滩头堡，并不断得到了军队和物资的补给，因此发动进攻，以解放法国。七月二十四日开始进攻阿夫朗舍。七月二十八日攻克库汤斯和格朗维尔，七月三十日阿夫朗舍，八月三日雷恩，八月十日南特和昂热相继被攻克。在这段时间里，奥伯格、克诺亨和盖世太保顽固地继续他们的工作，并关心着把最后一批罪犯押往德国。他们撤空贡比臬驻地、罗曼维尔堡和其他监狱里的人员，那儿还有好几千人在押，这最后一批的撤退工作是在恐怖的空袭情况下进行的，要比其他所有的撤退更加可怕。在七月二日从贡比臬撤离的那些囚犯当中出现了激烈的搏斗。闷热、口渴以及在他们即将获得自由的时候却要遭受杀害，因而产生悲观失望情绪，所有这一切都使得这批最后的囚犯成为真正的殉难者。

离贡比臬有好几里路程，每辆卡车上都躺着许多死尸，在运输列车到达达豪之前，大概有九百个囚犯死在车上。

克鲁格在瓦尔特·莫德尔元帅接替他前不久，决定全部撤退。两天之后的八月十五日，当加拿大人开始进攻法莱兹的时候，第二辆载着二千四百五十三个犯人的运输列车离开了法国。

七月中旬以来，抵抗运动的代表一直试图与德国人进行谈判，以便使运输囚犯之事告一段落。瑞典总领事拉奥尔·诺德林肩负仲裁人的艰难使命，与肖尔铁茨以及德国大使馆取得联系，他传递备忘录和提案，这些都是由法国国内武装力量总司令柯尼希将军的副手帕罗迪和科姆特·

亚历山大·德·圣帕莱撰写的。然而，即使肖尔铁茨和其他人赞成订一个协定，但没有一个德国人敢于承担责任。八月十七日，奥伯格为撤离巴黎作最后的准备，他的档案室和盖世太保的卡片索引早在八月初撤运走了。八月十七日夜里，德国警察的工作人员到达了马恩河畔的夏龙。这一天，巴黎的全部德国警察有目的地离开了南希和普罗万的据点，留守在首都的只有奥伯格和克诺亨以及他们的工作人员，他们还在捆扎东西呢。

警察的即将撤离使军人和外交官勇气大增。八月十七日早晨，肖尔铁茨突然决定，在驻法军队司令接受并签署协定的条件下采取行动。与此同时，“华丽”饭店的办公室已经冷冷清清。同一天上午，档案被运走了，全部人马已在前往东部的路上。但是，人们终于发现了一个弗里茨·胡姆少校，他准备以军队司令的代表身份签字。

谈判人匆匆来到亚历山大·德·圣帕莱那儿，迅速地签订了协定。

由拉奥尔·诺德林和弗里茨·胡姆少校签署的协定共有三段：“M·诺德林从签署协定的那一天起成为一切政治犯的领导人和监督人，”所有这些政治犯被监禁在五个监狱、三家医院和三个军营“以及其他拘留所和运输列车里，并要对他们负责”。德国当局有责任把所有犯有暴力行为的政治犯转交给诺德林。

“M·诺德林应负责关心用一个上述的政治犯去换取五个德国战犯。”

最后一条规定从未施行，盟军的挺进和德国人的撤退

不可能促使他们履行协定。

当时，最主要的事是立即释放法国犯人，人们担心他们象在卡昂的囚犯那样，在监狱里就遭受杀害。事实上，八月十七日，在巴黎的监狱大门向他们开着的同时，而罗曼维尔堡和贡比泉军营里却完全是另一回事。那里的负责人——党卫队、盖世太保或者党卫队保安处的成员——拒绝执行肖尔铁茨的命令，他们只听从奥伯格的命令。

尽管德·格拉蒙和德·拉吉什先生以红十字会代表的身份进行干涉，驻贡比泉的党卫队保安处大队长彼得·伊勒斯还是拒绝释放犯人，他甚至要逮捕所有的谈判者，因此谈判者不得不迅速离开。

第二天早上，伊勒斯按照奥伯格的指示撤运了一千六百个犯人，几乎所有人都死在德国。

这是执行奥伯格在首都发布的最后一道命令。八月十八日上午，奥伯格、克诺亨、治安警察头目、谢尔和最后一批盖世太保官员撤离巴黎。他们在维特尔——据最高统帅部透露，法国东部防线将予以加强——就象在总局一样布置工作。

八月二十日，克诺亨决定派一支特遣队带着任务回巴黎，只要有可能在那儿呆下去，就根据事态的发展情况，按时发报。诺斯克担任特遣队的领导，他是先头部队成员之一，这支部队在一九四〇年六月加强了克诺亨的特遣队。八月二十一日，诺斯克随同四辆汽车（其中一辆汽车装有无线电设备）和十一人（他们中间有五个法国间谍）向巴黎挺进。八月二十三日，当勒克莱克师驻扎在朗布依埃时，特遣队已

到达巴黎外围。巴黎人正为迎接即将到来的解放欢欣鼓舞，当时气氛极为紧张，以致特遣队有随时被捕的危险。因此诺斯克决定把侦察限制在郊区，特遣队到万森门和蒙特勒伊门巡驶一圈就返回，驻扎在莫城。诺斯克在那儿一直坚持到八月二十八日，然后他不得不迅速地撤离他的通讯站的人员，否则，美国的装甲车就要截断他的退路。

盖世太保的最后一批部队按照一九四〇年六月实现的类似方法离开了巴黎。克诺亨单枪匹马固守在即将沉没的船舵旁，抵抗怒气冲天的敌手，从一九四〇年六月十四日至一九四四年八月十八日，他自始至终地守卫在他的岗位上。但是法国之战对他来说还没有结束。

第二章

豺狼互相残杀

在德国，清除“七·二〇”和卡纳里斯的密谋分子之后，德国中央保安局所属各情报机构也作了最后一次变动：军事情报局被解散了，它的头目汉森上校已被绞死；谍报局的有关人员被消灭，它的各个分队被拆散分配在第四局（盖世太保）和第六局（党卫队保安处外事局），合并到盖世太保的部队从事间谍活动、反间谍活动、跳伞和破坏活动。军事情报处的部队合并到党卫队保安处。从此盖世太保和党卫队保安处的每个科都有一个相应的“军事小组”。

七月二十日的谋叛使希特勒完全确信，不能相信军队这个“反动集团”，他决心羞辱它一番。

根据马丁·鲍曼的建议，把年轻的、狂热的党员提升为军官，并把他们分配到部队去，以便监视他们同伙的政治行为。凡是他们认为不符合纳粹的事，都要直接报告给那个凶恶的纳粹正统观念的卫护者鲍曼。于是他们控告“西里西亚集团军的军官们”有“反战行为”，因为曾在一场可怕而漫长的战役中受到严峻考验的、并被证明是可靠的集团军在俄国的猛烈攻击下退却了。

希姆莱达到了他荣誉的顶峰，终于当上了集团军的领

导。一九四四年岁暮，他的武装党卫队大约发展为七个扩大师，荷兰和法国的“志愿军”参加以后，又增加了两个旅。由那些为了逃避处罚，从自己国土逃到敌人运输车上的多里欧民兵组成的特别志愿军与党卫队志愿军“查理大帝”暴风旅相继成立。

当希特勒发布命令之后，德国军队就紧紧地卡住法国东部，而盟军部队直到一九四五年初才到达莱茵河和德国的边界。

八月二十日，奥伯格和克诺亨把他们的司令部建立在维特尔，他们几乎还没来得及整理一下，就得到了两个使人恼火的消息。首先是希姆莱的那封十分侮辱人的信，党卫队首脑和警察头子用最粗鲁的言语指责他们说，他们在七月二十日不进行抵抗，束手就擒。并对他们的勇气和忠诚表示怀疑。几天以后，即八月底，卡尔登勃鲁纳粗暴地命令克诺亨前往柏林。克诺亨对这次委派不抱幻想：只要他还在巴黎，就不会加害于他，不然会影响盖世太保的撤退。随着占领法国的结束，放纵的时代也过去了。他的敌人终于成功地使他失宠。事实上，卡尔登勃鲁纳眼下要立即告诉他，他已经被降了职，并且调到武装党卫队去当一名普通士兵。

不久，克诺亨被分配去担任阿道夫·希特勒的侍卫，接着受命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贝内肖夫演习营训练防坦克战。他被派遣到前线，然后又从那里被召回到柏林，这一次他获悉希姆莱与他重归于好，他将在德国中央保安局任职。一月十五日，克诺亨的职务已被指定了下来，他受托去配合党卫队保安处组建新的科，发挥原谍报局的作用。但是德国

的崩溃使他没有时间来完成任务。

在维特尔，克诺亨的职务由曾任图卢兹局前局长的冲锋队中队长祖尔接替。希姆莱命令，要在法国的一小块仍然由德国占领的土地上建立一个组织，这个组织的所在地可用来作为把间谍派到已解放的法国土地上去的根据地，这些间谍首先应该从以前逃往德国的法国内奸中进行招募。

九月，希姆莱拜访了在热拉尔梅尔的勃拉斯科维兹上将，此人一直任G集团军——即新组建的H集团军的首脑。希姆莱借此机会考察了他的间谍，这也许是他到法国的最后一次旅行。不久以后，奥伯格被安置在圣迪埃附近的普兰凡，达尔南及其助手克尼平在那儿看望了他，以便在改善物质条件方面得到他的援助，因为这些民兵的生活条件比住在希尔梅克军营里还要来得糟糕，所以他们期望到了德国后能重新进行编制。

奥伯格在普兰凡向法国的一个城市人民发出了最后的重要通知，要求圣迪埃居民于十一月八日撤离城市。十一月七日，奥伯格草拟了一项关于撤离的命令^①。从十一月九日到十四日，准予在城市里进行抢劫，把货栈的存货从工厂里拖走，把工具和机器运往德国，然后，把所有不能拆卸的设备炸毁，同时火烧市内的房子，那熊熊大火整整燃烧了三

^① 贴在市议会布告上的撤退命令用了以下几句结结巴巴的法语：“德国国防军的意图是要居民尽可能远离战区，免得受害遭殃……”（布告诚意地附上拟草人的德文原件加以说明：“德国国防军尽力使居民远离作战区，以避免牺牲和痛苦，由于这个原因，圣迪埃的居民必须进入由战地宪兵队或指示牌所指定的区域，截止期为1944年11月9日九点钟，供应五天口粮，衣服盖被自带。停留在撤离区必定自取灭亡。”）

天。十个企图抢救自己家具的居民被就地枪决。最后，把所有十六至四十五岁的居民拉去从事建筑防御工事。事实上，采用这种方法聚集起来的一百四十三名居民被押送他处。

十一月十八日，奥伯格同他的参谋部一起从普兰凡迁到贝耳福附近的鲁日蒙。他在那儿只逗留了几天，然后穿过格布魏勒和恩西斯海姆继续撤退。十二月一日，奥伯格、祖尔和他们的人终于越过了莱茵河，于当天晚上到达弗赖堡。十二月三日，队伍到达茨维考，奉希姆莱之命，奥伯格和祖尔的工作部门在那儿安营扎寨。

不久以后，奥伯格在由希姆莱指挥的魏克塞尔集团军中获得了指挥权，他结束了警察生涯，重新进入武装党卫队。

盖世太保在法国又活动了几个月。爆破学校、间谍学校和许多专科分校设在弗赖堡和济克马林根附近的施特滕。

斯科尔兹内在弗里登塔尔建立了一个培训情报间谍和破坏分子的中心。过去逃往德国的法国人民党、全国人民联盟的成员，主要是国民军和革命社会运动党（前蒙面党徒）的成员被招募去当间谍，首先由达尔南向冲锋队大队长德特林提供士兵，德特林同他的副官中队长欣里希斯博士一起接受在锡格马林根招募士兵的任务。德特林是“狐狸”特遣队队长，他的任务是把间谍潜送去法国。

最后，达尔南受权为法国民兵部队办一所专科学校。由民兵部队主管和领导，党卫队保安处和盖世太保的教官“协助”工作，也就是要在民兵部队成员德甘和他的助手——卡

古莱的杀人犯菲利奥尔的领导下进行工作，菲利奥尔是民兵部队“第二处”的拷问者之一^①。后来达尔南甚至计划在法国建立一个“白色游击队”。

经过努力，一个个培训间谍的基地建立了起来，一批批间谍和破坏分子潜入法国。一些人秘密地越过巴塞尔旁边的勒腊赫边防站进入瑞士，多数人被瑞士警察逮捕，其他人则成功地进入法国，甚至有些人在完成任务之后返回德国，但是绝大部分人不久就被逮捕。

还有一些人同降落伞一起从飞机上被扔了下来，他们被放在软垫的储藏器里，因为这些行动只能在夜间进行，深夜跳伞对于未受过训练的人来说是危险的。大部分间谍到达了科雷兹县。几小时以后，当他们还来不及执行任务就被逮捕。而有些人在这一瞬间咬破了装有毒药的胶丸进行自杀，每个间谍都随身带有这种胶丸。

在盟军后方地区进行的所有间谍破坏尝试几乎全部失败。一九四五年初，德国人对军事形势已感到绝望。

从暴力中产生、靠犯罪和恐怖养育十二年之久的纳粹分子慢慢地坍塌在一片废墟和血泊之中，整个民族同它进行了殊死的斗争。

昔日的那些忠实信徒、狂热透顶的纳粹分子、“伟大的领袖”、国家的主人都在绝望地想从“世界毁灭”的一片混乱中捞到一根救命稻草，并想方设法施展出他们的浑身解数。

这些全能者中的每一个人都在窥伺着自己身边的人，

^① 菲利奥尔在利摩日区工作时化名为“德尼”，给人留下了可怕的形象。

都想从别人那里知道些什么，策略上微不足道的错误往往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事。希特勒政权的这幢人造大厦埋在他总理府的避弹室里，现在他感觉到这幢大厦正处在崩溃阶段^①。他知道，昨天还在阿谀奉承他以及为了听从他嘴里的一句话而犯下滔天罪行的那些人，现在却想把他遗弃不顾。可是他就象古埃及的国王一样不愿独自离开这个世界，他要别人随他一起去攀登荣誉的高峰，或者随他一起死去。他那癫疯的目光正仔细研究着那些在坚强果断的假面具后面所隐藏着的恐惧的脸孔，以便发现叛变的迹象，他决不让任何一个人幸免一死。

元首，他曾经使众人激动；大元帅，他已是一个病态的、无足轻重的佝偻老人，四周野兽般的灼热的眼光正盯着他那张苍白的、死期临头的脸。

没有经过党卫队卫兵的检查，谁也不准进入总理府。掌权时建立的卫队眼下还在守卫着他。他相信，他们是唯一对他生命负责的人。他们和小院内的少数几个人同他一起与世隔绝，这些人幸而没有受到他那鄙视的怀疑，因为他对整个人类持怀疑态度。鲍曼与他形影不离，他用败坏对手声誉的方法战胜了他们。希姆莱在他赢得完全胜利——独裁、甚至想竭力排除希特勒之后，便失去了信任。

从一九四四年八月到一九四五年三月，希姆莱曾经是德国的最强者。七月二十日以后，他战胜了最后的对手，当上了他梦寐以求的军团司令。与此同时，他集中了比任何

^① 希特勒离开腊斯登堡，于1944年11月底把他的大本营安扎在总理府的避弹室里。

一个人都要多的官衔和职务，成了德国内政部长和卫生部长，全德警察、所有情报局和所有秘密机构的头目。他作为党卫队的元首拥有一支精干的军队，这支军队在一九四五年春有三十八个师、四个旅、十个营或武装部队、十个军团分遣队以及三十五个军团和独立团，他的这些部队既令人可怕又狂热无比。最后希姆莱还控制了分布在各处的一大批党组织和国家机构。在他任军团司令之后，他就要弄手段——这是他惯用的拿手好戏——把还未得到的军队掌握在手。

他的政治上的老对手赫尔曼·戈林事实上被击败了；他对一切掉以轻心，埋头于惨淡的商业经营，沉湎于穷奢极欲之中。里宾特洛甫也是身败名裂，他的“高明的外交策略”过去从未失败过。戈林公开辱骂他是“卑鄙的小商人”，而元首还在不久以前称他为“新俾斯麦”，他对此付之一笑。

戈培尔保持了她的势力，但是鲍曼的势力更强。这个狂热者懂得，要用坚定的决心把敌手扔在一边。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四一年，他担任国家领导人以及元首副代表赫斯的内阁大臣，赫斯逃跑以后，他就接任希特勒的副代表和纳粹党办公室主任，自此以后，他事实上拥有统治全党的大部分权力。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二日，他除了已担任的职务外，又担任元首的秘书。

鲍曼认为，希姆莱不再是危险的对手。但是他很快看出了希姆莱的目的，他并不想掩饰这一点，即希姆莱没有能力当一名军事领袖。后来他玩弄了一出把戏，拿菲格莱因当作棋盘上的“兵”推在前面，而自己却在幕后操纵。

在元首大本营里，希姆莱有一个常驻代表：希特勒的传令官赫尔曼·菲格莱因中队长。这个爬上武装党卫队将领的菲格莱因早先是个马夫，接着成为设在巴登、后来设在普伦次劳的希姆莱的司令部与元首之间的联络官。当时菲格莱因同爱娃·勃劳恩的妹妹格利特·勃劳恩结了婚，他几乎可以说是希特勒的妹夫，受到他的双重信任：既是传令官，又是爱娃·勃劳恩的亲戚。整天同他接触的鲍曼与他结成了同盟。

集团军司令希姆莱铸成的大错此刻非常突出，他的不足之处已暴露无遗。波默恩失守之后，希姆莱由于指挥无能于三月被解除职务。在匈牙利，军事形势发展得很糟糕，党卫队精锐师的反攻在纳粹党的一位老将塞普·狄特里希的指挥下正在进行着。鲍曼寻找机会，给予希姆莱一个决定性的打击。

四个精锐师是：“阿道夫·希特勒师”，“帝国师”，“骷髅师”和“霍恩施道芬师”。他们赢得了一切荣誉，成为该政权的骄傲，希姆莱的骄傲。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四个精锐队的卫队袖章全被没收。

这一全体性的降级标明了希姆莱的失败。从现在起，他不再是别人的对手了。他的军事作用迫使他连续几个月没有接触重要的警察工作，在这样一个关键性的时刻里分离是非常危险的。鲍曼、接着希特勒本人养成了一种习惯，直接向卡尔登勃鲁纳发布命令，这样一来希姆莱感到自己被排除在警察的实际领导之外，而且元首的大部分指示都不发给他了。

他经历了“千年帝国”的最后时刻。“优生种族”的帝国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底被限制在一条狭长的地带，它正在逐渐地继续缩小。纳粹党和盖世太保虽然战胜了它们的敌人和对手，但是这些胜利全是徒劳的。一大片房屋废墟的中心——这里一度是首府的所在地——距离华丽的“菩提树下街”只有几百公尺，俄国的炮弹不时落在这条街上。希特勒在他避弹室的底层继续向部队下达命令，但是部队并没有收到他的命令，绝大部分的部队压根儿已不复存在了。

四月十日，希特勒终于听取了他周围人的意见，因而决定将他的大本营迁到伯格霍夫的山间别墅里，他的侍从人员动身去伯希斯特加登，以做好必要的应急准备工作。四月十二日，一次空袭摧毁了总理府的残骸，并使它陷于一片火海之中。四月十六日，俄国人突破了奥得河防线和劳齐茨防线，向柏林进军。但是希特勒并没有离开他的避弹室。他在四月二十日——他的五十六岁生日——决定动身的那一天，突然取消了去伯希斯特加登的计划。红军当时已到达柏林以南七十公里的吕本，并正在穿过施普雷森林接近城市。在北面，他们到达了距离柏林三十公里的奥拉宁堡。

四月二十一日深夜，三个人经希特勒同意离开了总理府的断垣残壁，他们是：里宾特洛甫、戈林和希姆莱。希特勒放弃去伯希斯特加登。他此刻明白，他的保卫“阿尔卑斯山要塞”的思想不能实现了。尽管四月二十日晚上遭到了空袭，但是辅助电台还是不受干扰地播送了他所作的最后一次广播演说，他在演说中表示决心，无论如何要坚守柏林。

戈林听到这些话惊恐万状，他同那些还活着的、聚集在

总理府避弹室里的“老战友”，同希姆莱、戈培尔、里宾特洛甫以及与元首形影不离的鲍曼一起度过了希特勒的生日。但是戈林并不打算去死，处在俄国人炮弹和手榴弹下的避弹室底层，其凄惨的结局似乎与他及其思想不相吻合，他已经做好出走柏林的准备，时间紧迫，戈林蹑手蹑脚地走出避弹室，在突然降临的夜幕中来到他那政府首脑的邸宅，那里有一辆专车在等着他。

自四月初以来，戈林就把他的那些从欧洲各个角落里抢夺来的艺术珍品藏到了一个安全地点，要把这些数目可观的掠夺来的东西运往伯希斯特加登需要两节车皮，他的第二个夫人，演员埃米·宗内曼同她的女儿也逃到了那里。戈林的汽车在几辆载着最后一批箱子的卡车和一辆乘着工作人员的车子护送下向南逃窜。穿过美俄军队彼此仍分开的一条狭长过道，“最忠于元首的骑士”的车队顺利地于四月二十一日晚上到达伯希斯特加登。戈林不知道，希姆莱也在同一时刻逃之夭夭。过后不久里宾特洛甫也溜走了。他们都认为自己有可能成为希特勒唯一的继承人。而两人决定，终于打出他们自己的王牌来。

戈林认为自己可以作为希特勒的合法继承人。在他建立盖世太保以后，他就是领导者的忠实支柱。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九日的命令规定，如果希特勒死去，戈林将成为元首；如果希特勒由于某种原因“暂时还不能”行使他的职务时，戈林仍将成为元首。

根据这项命令，戈林相信继任的先决条件业已存在。因为希特勒不能控制局势，况且他已对凯特尔和约德尔说过，

要是眼前进行和平谈判的话，戈林也许是最合适的谈判者。空军将领科勒于四月二十三日在伯希斯特加登把这件最感兴趣的事告诉了他，戈林断定局势至少可以象人们所说的那样，这个“时刻”事实上已经“来到”。美国人和俄国人已在易北河畔会师，红军完成了对柏林的包围圈，攀登最高权力的时钟终于敲响了。此时，尽管情况如此，戈林还是被一种至高无上的自豪感所侵扰。

他把留驻在伯希斯特加登的纳粹党重要人物召集到身边，他们是：帝国总理府长官和“荣誉党卫队”中将汉斯·拉麦斯，科勒将军和空军上校贝尔恩德·冯·勃劳希契，陆军元帅的儿子和戈林的副官。大家一致认为，元首决定把自己锁在柏林，并不能使他行使统治权。戈林在征得他们同意之后给希特勒拍发了一份电报，他在电报中请求希特勒同意他们的意见，并借此声明，他将利用在国内外的行动自由权来接管帝国政府领导权。如果到晚上十点钟得不到回音，他将为了大众的幸福“采取行动”。

这对那个长时期的独裁者是一次最后的恐吓，正是这种恐吓心理才驱使戈林拍发了这份附有条件的电报。在事件接连不断发生的情况下，作出抉择的可能性很小，要想得到一个回音，那希望就更小了，所以戈林在四月二十三日晚上十点钟时，认为自己是唯一有资格进行和平谈判的人（关于和平谈判问题，他早已胸有成竹）。然而，电波发出的消息出乎意外地到达了总理府的避弹室。鲍曼收到了这份电报并且对希特勒说，这是一种不忠的行为，是企图篡夺权力，规定回音的期限是个最后通牒。正如鲍曼所希望和期待的

那样，希特勒怒不可遏，他歇斯底里地大骂“这个吗啡瘾者，这个该死的骗子”。

晚上十点钟不到，戈林收到了希特勒的回电。他简明扼要地禁止戈林的那种倡议。同时，一支党卫队小分队在弗朗克中队长的率领下出现在他的面前，并逮捕了他。这是鲍曼所要的最后一招，以便清算他的宿敌的旧帐。他主动拍了一个电报给驻在伯希斯特加登的一支党卫队小分队，命令他们立即将帝国元帅以“叛国罪”加以逮捕。就在戈林自以为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时，他正朝着一个被判处死刑者的不祥境地走去。

第二天，即四月二十四日，戈林明白自己的末日到了，因为出现了卡尔登勃鲁纳。他朝被捕者看了一眼（戈林的副官也一起被捕），然后又一声不吭地走了出去。同一天，奥伯多瑙的总督艾格鲁贝尔宣布，凡是在他管辖区内的任何一个人，如违抗元首的意旨，均应立即枪决，不管他的职位多高。

科勒将军没有被捕，他想说服希姆莱和赫勒释放戈林，但是没有成功。四月二十九日他被软禁在附近一个宫殿里。

五月一日，鲍曼一面利用希特勒的自杀来反对戈林，一面立即打电话给弗朗克，向他下达明确的命令：“不能让四月二十三日的叛逆者逃跑！”因此必须对戈林严加看守。这与叛处死刑毫无两样，鲍曼就是从这种思想出发打电话的。然而，局势在逐渐发生变化，美国人随时都会出现，再说党卫队看守所的司令官也不敢承担处死帝国元帅的责任。五月五日，空军一支小分队途经该地，党卫队的人员非常高

兴，他们可以把那些讨厌的犯人转交出去了。空军人员很快在这个地区分散开来：戈林被释放了。他首先请求希特勒的继承人邓尼茨与艾森豪威尔谈判，并愿为此效劳。根据邓尼茨的一封信来判断，他相信“元帅之间的会谈”一定会取得良好的效果。五月七日签订的停战条约并没有夺去他还能发挥作用的希望。五月八日，当他被占领伯希斯特加登的美军俘虏时，他请求能促成他同艾森豪威尔进行一次交谈。然而使他非常吃惊的是：他将同纳粹的主要头目一起作为战犯被提交国际法庭。

盖世太保的头子戈林的继承人“忠实的海因里希”·希姆莱也在四月二十一日离开了柏林。当戈林和他那载着艺术品的货车向南缓缓驶去时，希姆莱正驱车向丹麦边境驶去。他想在那儿打出他自己的王牌，虽然元首并没有授权他去同盟军进行谈判，但是他还是想方设法同盟军进行谈判，以使用友好的方式来摆脱险境。

但这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目光敏锐的施伦堡长久以来就觉察到，^①战争的结果是不会改变的，德国的遭遇（首先是纳粹领导人的遭遇）只有尽快地同胜利者谈判才能减少一些。自一九四四年八月以来，施伦堡控制了全德的情报机构，从欧洲各国获得了大量的情报。他在中立国家的间谍经常向他报告盟国所采取的预防措施和他们的打算。很明显，对于象他这样的人来说，前途是暗淡的。但是这些间谍可以使某种接触变得容易些，可以建立联系，然后开始秘

^① 施伦堡甚至在1942年8月就知道战争的结果，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始终为他那敏锐的洞察力感到自豪。

密会谈。施伦堡决心摆脱困境，而且为了使自己隐蔽起来，把希姆莱推到幕前，愚蠢的卡尔登勃鲁纳完全被施伦堡所使的手腕蒙在鼓里。

一九四四年夏，施伦堡在斯德哥尔摩的一家旅馆里同美国外交官休伊特会见，同他探讨了谈判的途径。这第一个尝试，结局唐突，施伦堡把此事告诉了希姆莱。希姆莱在勃然大怒之后相信，类似的绝对保密的接触也许有利可图。这时施伦堡开始灵活地对希姆莱施加影响，最后希姆莱授权由他去促成某种程度的和解，希姆莱把这种和解看作是真正的人寿保险。

一九四五年初，他手下的一个间谍——驻维也纳第六处的赫特尔博士根据施伦堡的指示，在伯尔尼同美国将军多诺万进行联系。这一步骤的目的，是要争取与美国人缔结特别和约，组成同盟对付苏联。这个同盟应通过在东线继续共同作战来实现。因此，施伦堡的这位代表企图借用美国人来对付俄国人，以保证洛塔尔·雷杜利克上将的北集团军的安全。失败并不能使纳粹分子认识到他们的真正的处境，因为他们总是误入同样的歧途。尽管赫特尔到伯尔尼去了多次，但他提出的建议始终没有得到回答。

然而，与瑞士共和国的前任总统让-马里·米西进行的谈判取得了积极的成果。米西忠于瑞士的人道主义的传统，他争取把关在集中营里的犹太囚犯尽可能多地予以释放，并且送来瑞士。这些囚犯的命运似乎已经注定：他们将在盟国军队到达之前被屠杀。对此，希姆莱同意进行谈判，并于一九四四年底和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二日在威斯巴登与米

西会面。他同意把一定数量的犹太人送到作为“犹太人有
权流亡国外”的中转国家的瑞士去，但是要求国际犹太人组
织，特别是美国犹太人组织应该付出适当的赎身金。最后
达成协议，每两星期将一千两百个犹太人送往瑞士。这个
数目与成千上万个在集中营等死的不幸者相比是微不足
道的，但是现在毕竟已有几百个人被从毒气室里救了出来。
二月初，第一辆运输车到达瑞士，犹太人组织支付给米西五
百万瑞士法郎。报纸对这件事作了报道，某些外国报纸宣
称，瑞士同意在战争结束后给予纳粹党领导人以政治避难
权作为报酬。希特勒得悉后大动肝火，他禁止继续释放囚
犯。

米西仍然继续努力，他不顾年纪大^①，不顾空袭和远
途的危险多次到德国去。四月初，他得到希姆莱的允诺，
集中营不予拆除，而是完整无损地让给盟军。如今，在值
得怜悯的小分队中的囚犯被抛在路上，或者拥挤在封闭的
车皮内，他们毫无目的地穿越德国去寻找另一个集中营，
这些犯人与其说是被盟军释放，不如说是去送死。他们在
一些集合点听从命令，当不幸者们听到战斗越打离他们越
近时，就会在畏惧和希望中间徘徊。

与米西有着同样思想的犹太人国际代表大会的代表希
勒·施托希、国际红十字会代表卡尔·布克哈特和瑞典人
福尔克·伯纳多特伯爵都在积极工作。这些谈判使希姆莱
相信，他可以通过国际条约拯救德国(和他的生命)。

他与伯纳多特伯爵会晤两次。那是在一九四五年二月

^① 他当时已七十多岁。

和四月初，他给予伯纳多特的诺言同给予米西的诺言一样：集中营不予拆除。然而他对继续打交道一事犹豫了很久，由于他一面对元首无条件的绝对服从，一面害怕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如果他的双重表演被发现的话，这种惩罚就等待着他，所以他不敢决意冒险。可是，在这关键性的四月，希姆莱已经失宠，他的党卫队也遭贬黜，此外，希特勒又很少接见他，这种情况使他有可能脱掉他的主子套在他头上的紧箍咒。

四月十九日，在施伦堡力图说服劳工部长弗朗兹·赛尔特的时侯，希姆莱与财政部长施维林·冯·克罗西克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结果取得一致意见，希特勒必须下台或者隐退，由希姆莱接班，以便迅速缔结“光荣和约”。密谋者在最后时刻同他们的先行者一样很少是现实主义者。希姆莱相信是会成功的，因为伯纳多特伯爵在他们最后一次会晤时，劝他去接替希特勒，并要他公开宣布：元首由于重病在身不能履行他的义务。因此，他应该解散国家社会主义党。希姆莱准备发动这次迟延的政变，但事先要弄清楚——因为畏惧仍旧折磨着他——盟国究竟愿不愿意同他谈判。

四月二十一日，希姆莱离开总理府后与施伦堡会面，施伦堡正等待着他，以便陪同他一起去霍恩吕兴疗养院。因为那里已经做好了同伯纳多特伯爵进行会谈的准备工作，希姆莱答应阻止拆除汉堡附近的博伊恩加默集中营，并且请求伯纳多特，把他的建议转达给艾森豪威尔将军，希望能同他会晤一次。伯纳多特尽一切努力打消希姆莱在未来的德国起政治作用的幻想，所以会晤并没有获得成功。

然而，希姆莱仍旧抓住这根救命稻草不放，而这根救命稻草似乎就在他希望紧紧抓住的一刹那时间里从他手中滑落下来。在霍恩吕兴约会之后，伯纳多特立刻动身经过吕贝克前往瑞典，而希姆莱决定在吕贝克会见他，以便向他提出建议。这些建议是他想在消灭希特勒的同时——他终于接受了这种思想——为了停止敌对行为而提出来的。施伦堡飞往吕贝克，发现伯纳多特已越过了丹麦边境，正停留在阿彭拉德。他与伯纳多特通了电话，征得他的同意在弗伦斯堡会晤。施伦堡在那儿凭他外交家的那根三寸不烂之舌，劝说伯爵与他一起返回吕贝克，因为此时此刻希姆莱已经到达那里。虽然伯纳多特确信继续会见用处不大，但还要蠢蠢欲试。四月二十三日晚上十一点钟，希姆莱同伯纳多特在瑞典领事馆地下室的蜡烛光旁举行了最后一次谈判，当时在不断遭到空袭的吕贝克市已经断电。经过五小时会谈以后，伯纳多特同意希姆莱向瑞典政府提出的建议，但是这些建议是否应该传达给盟国，那只有他一个人有权作出决定。

希姆莱立刻写信给瑞典的外交部长克里斯蒂安·京特。他在信中请求京特在盟国方面斡旋一番。

第二天，杜鲁门总统发表声明，拒绝接受德国以任何形式提出的单方面投降的设想，这使希姆莱的希望化为泡影。

四月二十二日，他获悉希特勒下令处死他旧时的私人医生卡尔·勃兰特博士，因为这个人把自己的妻子送到美国人那里，勃兰特是在图林根被捕的。此事证明，元首还可以从避弹室的底层发号施令。

此时此刻，那个已处在半禁闭的、神经错乱的“法老”^①自知没有希望了。四月二十二日，他对周围的人说：“战争失败了……我用枪自杀。”第二天，有关戈林“背叛”的消息给他施加了一点力量，他怒斥那些叛徒和胆小鬼，并发布了对他们的处罚令。四月二十四日，柏林处在包围之中，但是希特勒仍然对前来解围的温克大军抱有希望，温克这支军队是个幽灵，很明显，四月二十七日那天，军队根本没有到达柏林。

在四月二十七日前一天，一件意外事变使得元首更加恼怒，连希姆莱派到元首那儿的联络官、希特勒的连襟菲格莱因也离开了避弹室。当希特勒在四月二十七日得知这件事时，他派了几个党卫队人员去找他，他们很快找到了他，这一次把他作为犯人带回了避弹室。当有人在四月二十八日把从英国广播公司窃听到的消息提供给希特勒时，斯德哥尔摩路透社办事处报道了希姆莱同伯纳多特的会晤，以及他的投降建议书，这最后的背叛使希特勒勃然大怒，因而作出了一系列最后的决议。俄国人涌进柏林，接近波茨坦广场，最后的猛烈进攻开始了。希特勒怒气冲天，他命令手下把赫尔曼·菲格莱因拖到总理府的大院里给枪毙了。然后，他派人叫来一名文官。四月二十九日早晨，希特勒与他多年的情人爱娃·勃劳恩结婚，在场的有证婚人鲍曼和戈培尔。过了一会儿，他立即口授他的遗嘱，并叫自己的女秘书写下来。戈林和希姆莱受到了鄙视。他说：

^① 指希特勒。——译者

“戈林和希姆莱在不让我知道，并违反我的意志的情况下与敌人进行秘密谈判，企图非法独揽国家大权。他们除了对我个人完全不忠以外，已经给国家和全体人民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① 他把他们从党内开除出去，解除其一切权力、职务和头衔，并任命邓尼茨海军元帅为他的接班人，头衔为“帝国总统”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

在第二部分关于他私人的遗嘱中，他委任鲍曼为他一九三八年五月二日遗嘱的执行人，通过立遗嘱，他把自己的私人财产用来交纳党费；将若干钱款付给他的家庭、家属和一些朋友。

遗嘱的最后部分写道：“我本人和我妻子不愿受撤职和投降之辱，选择了死的道路。我在为我的民族服务长达十二年的过程中，绝大部分的日常工作都是在这里完成的，因此立即在这里火化，这是我们的意愿。”^②

四月三十日下午三点三十分，阿道夫·希特勒和爱娃·希特勒结束了生命。希特勒用一支手枪对准自己的嘴开枪致死。爱娃服毒自杀。两个人的尸体按照他们的最后意愿被党卫队员抬到总理府的花园里，浇上汽油，烧成灰烬。

戈培尔和他的妻子仿效希特勒，携带着他们的六个孩子去死。戈培尔夫妇请求一位医生，用注射毒剂的办法使孩子们入睡，他们自己则请求一名党卫队员朝颈项开枪把他们打死，这个党卫队员表示愿意为他们效劳。戈培尔一

^① 希特勒于1945年4月29日立的政治遗嘱，摘自《德国政治和历史文件》，第528页。

^② 《新汉诺威信使报》，1946年1月4日。

家的八具尸体也在花园里火化,当时是晚上九点整。

最后一批幸存者从避弹室里摸索着走出来,穿过总理府的废墟,企图在黑暗的掩护下通过俄国人的战线。他们中间有鲍曼,他已电告邓尼茨,希特勒已经任命他为继承人,并希望他在新政府里找到职位。

据两个目击者发现,鲍曼是在城市的废墟中死去的,但是他们的证词互有出入。希特勒的司机埃里希·肯普卡说,鲍曼可能是被一颗在逃犯当中爆炸的俄国手榴弹炸死的。可是据希特勒青年团首领阿图尔·阿克斯曼讲,鲍曼是在枉费心机地企图通过俄国战线时服毒自杀的。

根据这两个证词还不能确证鲍曼之死。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要求对鲍曼进行法律起诉,并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对他进行判决^①。从那以来,世界各地不断报道说,鲍曼活着。一九四七年他逗留在意大利,在那儿的一个修道院里找到了避难所。一个隐居在伦巴第两年多的党卫队员确信,鲍曼是在修道院里死去的,而且可以说明他埋葬在哪儿,当时所作的调查没有绝对确凿的证据,但是假定鲍曼成功地逃往意大利,并在那儿找到了政治避难所,然后他从那儿出发到达了南美,那么这一切也是可能的。据说他在阿根廷住了多年以后,患癌症死于智利。^②

① 鲍曼是唯一缺席的被告,他被判处死刑。

② 据1964年7月底的德国报纸报道,黑森州总检察长弗里茨·鲍尔仍旧确信,鲍曼成功地越过梅拉逃往巴拉圭;鲍尔博士继续努力缉拿鲍曼,他依据宣传部前国务秘书瑙曼和前希特勒青年团首领阿克斯曼的供词,以及一个天主教神父的保证,鲍曼逗留在前纳粹党的一个殖民地,巴拉圭首都亚松森。

在这些事件发生时，希姆莱开始走上了他最后的歧途。他离开吕贝克以后，就象一头落入陷阱的野兽来回地绕圈子。事实上，这块逐渐变得狭窄的土地与陷阱并无两样，它牵住了任何一头危险的野兽。他首先驾车朝柏林方向驶去（他未预料到希特勒已知道他背叛），但是要到达目的地是不可能的，他只好驶向北方菲斯滕贝格总部。

四月二十六日，他在那儿听到戈林“背叛”以及关于下令逮捕“帝国元帅”的消息。

希姆莱加快速度再次向丹麦边界驶去，以便重新与施伦堡会面。他委托施伦堡陪同伯纳多特去弗伦斯堡，并继续寻求“谈判”之路。四月三十日，施伦堡从丹麦来到弗伦斯堡，他在那儿获悉，自己也被解除了官职。希特勒预感到，施伦堡与希姆莱的倡议有着密切联系。党卫队保安处政治处处长汪克中校和军事处处长斯科尔兹内中校替代了他的职务。

施伦堡不是那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他恢复官职，驻守在特拉弗明德。五月一日上午，他在那里得到了关于希特勒自杀和邓尼茨接任的消息。

不久以前，希姆莱在吕贝克附近的普勒恩的邓尼茨司令部里同邓尼茨进行了谈话，并决定与他“商量”现在应该采取的措施。

施伦堡陪他去同施维林·冯·克罗西克接触，晚上飞往丹麦继续进行“谈判”。他在急匆匆地返回普勒恩以后，马上飞往斯德哥尔摩。在那儿出现的投降使他感到吃惊。

希姆莱自己则去弗伦斯堡附近的米尔维克追随新政

府。五月四日，新政府在那儿的海军学校里开始办公，一群无头苍蝇在“帝国总统”的身后相互碰撞。凯特尔、约德尔和其他高级军官都说，战争会在挪威继续下去。邓尼茨把帝国委员特波文和包姆以及林德曼将军召集到身边，探讨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举行起义的途径。一批党的达官贵人试图对固执己见的休息室里的战略家们加以干涉，他们不知道那些战略家已经被消灭了，而且当不断的空袭每分每秒都要造成无谓的牺牲时，他们对如何减少由于一场无情的战争而被弄得支离破碎的民族的痛苦也很少关心。

希姆莱躲在那些喜欢听信谣言、动摇不定的群众中不露面，直到最后作出无条件投降的决议时为止。那一天，这个罪责难逃的党卫队首脑从政府中被撵了出去^①。现在，希姆莱意识到，他直接受到了威胁，于是便不知去向了。五月八日深夜，各条战线停止了敌对行动，自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起，大炮首次沉默下来。

没有人知道希姆莱在哪儿，也许他同一些忠实的党卫队员一起躲藏在一个不安全的隐蔽处，这些队员都象他一样考虑如何逃避报复。盟国的特工人员对他搜寻了十五天之久。他们推测希姆莱在弗伦斯堡的周围地区，结果还是没有找到他，他的照片被分发到那里的占领军手里，要是许多德国人知道希姆莱的隐蔽处，他们很可能早就报告了。

这种局势不会拖延得很久。五月二十日，希姆莱决定进行一次尝试，同他的一小撮党卫队军官一起到达巴伐利

^① 邓尼茨“政府”表面上似乎支撑到5月23日，他们的成员就是在这一天被捕的，邓尼茨被提交纽伦堡军事法庭，判处十年徒刑。

亚一个安全的避难所。

五月二十一日，一支小分队正在密切注视着通往不来梅的不来梅沃德公路，当时有一批从战场上被驱逐的逃兵试图采用步行或者乘坐稀奇古怪的车辆回到他们的故乡去。

这里全是一片低洼的沼泽地，一个被浑水浸透的、布满小松树的贫瘠地区，火车停在“魔鬼沼泽地”的附近。逃兵不得不逐个地经过英国的监察站，一个男人向监察站递了一张名为海因里希·希青格尔的身份证。他在左眼上扎着黑色的绷带，与大多数逃兵一样，穿着杂色的服装：普通士兵所穿的一条便裤和一件军装。他的不安的举止和一些人（他们绝大部分根本就没有证件）中间的这张全新身份证使人对他产生了怀疑。两个英国士兵为尽职起见，挟着他的胳膊，把他带进了警卫值班室。然后他们向第二军的保安机关报告了这件事。第二军的司令部设在吕内堡。他们把这个人带到附近的军营，把他关在牢房里。没有人怀疑到，这个眼睛上扎有绷带的男子汉就是可怕的希姆莱。他刮去了小胡子，把眼镜藏进了衣袋里。

希姆莱自己知道，他很快会被人们认出来，于是决定孤注一掷，他请求同军营指挥官作一次私人谈话。当他还没有被带到那里时，他就揭去了眼睛上的黑色绷带，并自我介绍说：

“海因里希·希姆莱。现在重要的是，我想立刻探访蒙哥马利元帅。”

难道他还一直相信可以扮演一个角色，或者指望在有

可能作一次旅游时偷偷地溜掉？正象他所指望的那样，结果是：他很快被送到了吕内堡的司令部，然后转到了保安处。

在吕内堡，人们对这样一个重要的犯人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医生对他进行了检查，把他的东西非常仔细地“搜查了一遍”。在一个衣袋里找到了一个装有氰化钾的大安瓿。希姆莱披着一件旧式的英国制服，被安置在一间牢房里，直到蒙哥马利情报处的墨菲上校到达为止。墨菲没有审问希姆莱，而是检查已采取过的那些措施。他问下属，有没有检查过希姆莱的口腔。绝大部分纳粹分子把毒药藏在舌头底下或者一颗假牙里面。墨菲认为已找到的安瓿也许是假的，真的可能已经转移了。

医生准备对希姆莱再进行一次检查，当医生命令他把嘴张开时，他苦恼地紧闭着嘴，咬碎了一点儿东西，由于吞咽下去的毒药奏了效，因而象被雷电击中似地跌倒在地^①。

医生立即把希姆莱的胃液吸干，但是这也无济于事。德国党卫队头子在短短的几分钟内结束了生命，四肢僵直地躺在地上，周围站着英国士兵，盟国战地新闻记者拍下了死者的照片，然后尸体被埋葬在一个秘密的场地。

死亡也在等待着以希姆莱为头子的盖世太保的得力干将和忠实部下海因里希·缪勒，但是他似乎已经是死里逃生了。他于一九四五年五月初失踪。据许多在俄国被俘的德国军官在被释放以后回到家乡时作证说，缪勒去过莫斯

^① 纳粹头子在战争接近尾声时，往往随身放着一颗绝对密封的、藏在口腔里的毒丸，毒丸一定要咬碎后才会生效，如果这颗毒丸无意中吞了下去，它能抵抗消化酸，同时不会产生任何作用。

科，继施伦堡之后，缪勒利用“红色乐队”事件与俄国间谍取得联系，而且协助他们来摧毁德国。许多德国警察为了生存而尽力为美国、英国乃至为法国谍报机构工作，许多人也的确达到了个人目的。缪勒选择了为俄国人服务的活动。虽然他在调查“红色乐队”事件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好杀性，使人难以接受他此时的做法，但又不能完全排斥它。根据同样的消息来源，缪勒于一九四八年死于莫斯科。

最近有一则(未证实的)消息说，缪勒和鲍曼一起居住在智利。

卡尔登勃鲁纳站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前，戈林站在他的旁边，两人在经过十一个多月的审讯之后，于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被判处绞刑。

十月十六日，与卡尔登勃鲁纳一起被绞死的有：里宾特洛甫、凯特尔、罗森堡、约德尔、弗兰克、弗立克、赛斯-英夸特、沙克尔和施特莱彻。戈林通过党卫队大队长兼警长巴赫-齐列夫斯基的帮助，成功地弄到了毒药。他在上绞刑之前的两小时象希姆莱一样咬碎了毒药。

德国劳工阵线的首领罗伯特·莱伊在纽伦堡开审以前就在监狱里自缢。

奥伯格和克诺亨企图躲藏起来。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奥伯格化名为阿尔布雷希特·海因策住在蒂罗尔基布厄尔附近的基施贝格村，可是到了七月底，美国军事警察就逮捕了他。八月七日，他在维尔德巴德被转交给法国当局，这是法国当局要求引渡的。

克诺亨更加机灵，他隐藏在格廷根，所以逃避了对他进

行调查达七个月之久。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四日，他为了转移到美国占领区，离开他的隐蔽处，这是很愚蠢的。只有寸步不动，才能保存自己。一月十六日，他在拜罗伊特以北五十公里的克罗纳森被美国军事警察逮捕。他被监禁过好多集中营，主要监禁在达豪集中营。在卡尔登勃鲁纳和里宾特洛甫案件中作过证词之后，他也被移交给法国当局。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九日，他到达巴黎。

法庭花了九牛二虎之力进行调查，并对奥伯格审讯了三百八十六次。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在谢尔什一米迪监狱里军事法庭开庭，奥伯格和克诺亨出庭。有关他们的旁证材料共收集了九十多公斤，起诉书不少于二百五十页。已经拖期的主审不得不再次延期进行，而同一法庭进行的第二轮审讯到九月二十日才以判处奥伯格和克诺亨死刑而告终。

一九四九年，前大使阿贝茨被判二十年强制劳动。但是到了一九五四年，他根据大赦令获释^①。

奥伯格和克诺亨两人一面相信这件事情的经过，一面在听了对自己的判决之后脸上露出一丝笑容。因此《巴黎人解放报》于当天报道：“这一宣判是对那些在德国警察统治法国的黑暗岁月里遭到枪杀或流放的牺牲者的一种纯道德上的忏悔。”

一开始就预料到的宽宥行动直到一九五八年四月十日尚未实现，就在这一天，在总统的公告上把死刑改为终生强

^① 1958年5月5日，奥托·阿贝茨和他的太太在科伦—鲁尔区的高速公路上因车祸丧生。阿贝茨曾任《进步》周刊编辑。

制劳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鉴于判刑后服过役，因而又把这种终生强制劳动的刑罚减为二十年强制劳动。

要是这样的话，奥伯格和克诺亨就得在一九七四年十月八日释放，然而法国政府没有说明原因就提前释放了他们。两个人被秘密带到米尔豪森监狱。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根据最后一次宽宥行动，把他们转交给德国当局。

克诺亨回到了他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家。奥伯格怎么办呢？他也可以回到他在汉堡附近的家。但是法庭对他提出了起诉，说他与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的事件有关。

一九三四年六月，奥伯格在柏林党卫队保安处总局担任党卫队中队长(少校)，实际上是海德里希的助手。党卫队保安处在准备“清洗”时起了重要作用。

然而，法庭的起诉似乎没有使奥伯格感到特别的不安。一九五七年五月，审理重大刑事案件的慕尼黑法庭对六月三十日血浴中的两个罪犯前党卫队将军塞普·狄特里希和达豪集中营的前党卫队司令官迈戈尔·利伯特进行了审理。有人控告利伯特同艾克一起在罗姆的牢房里谋杀了罗姆。因此法庭判处两个罪犯十八个月的徒刑。

这个对数百万无辜者负有直接责任的阿道夫·艾克曼长期逃避了法庭对他的起诉。一九五二年他逃往南非洲，在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玻利维亚周游了三年之后，于一九五五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定居，他的夫人和儿子随后也到达那里。他伪造了一张名叫里卡多·克勒门特的假身

份证，然后在一家名叫梅塞德斯-本茨的工厂工作。但是，他装出来的那种善良的小职员的外貌并不能拯救他：一九六〇年五月十三日，在他下班回家的路上，以色列的特务抓住了他，并且秘密地把他劫持到以色列。他站在耶路撒冷的法庭面前受到公开审判，审判从四月十一日持续到十二月十五日，最后判处他死刑。

一九六二年六月一日，艾克曼在拉米监狱被绞死。尸体被焚毁，骨灰也在当夜被撒入大海。

最后还活着的盖世太保的一个头目与艾克曼一起销声匿迹，上了西天。

在盖世太保这出历史剧中，大多数主角都落得了他们应有的下场。这是他们生存的那个血腥时期里唯一闪烁着道德之光的一个侧面。

错综复杂的盖世太保组织是纳粹的主要支柱和诱饵，它随着纳粹的崩溃而消失得无影无踪。它在技术上的拿手杰作：包括整个欧洲的庞大的人名索引卡片以及保存着几百万人的机密档案，当时都在地毯式轰炸德国城市的火焰中燃烧殆尽，或者从颠簸的卡车上落到了垃圾堆里。然而，有些完整无损的材料落入胜利者的手中，因此对那些非常谨慎地去收集这种材料的人来说恰好成为沉重的思想负担。

恶梦苏醒，四肢感到困倦疲惫。重新获得自由时的心情与尸体和眼泪的滋味交织在一起。要不断地去回忆那种恐怖的工具，它带来了无数的尸体、眼泪、悲哀乃至耻辱，因为盖世太保呈现在我们面前就象一面破碎的镜子中的

人，它迫使我们相信，确实有象盖世太保这样的人。

纳粹的罪行并不是一个民族的罪行。残酷、热中于暴力、崇拜权势和残忍好杀的种族狂既不是某一个民族的遗产，也不是某个时代的特征。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难以避免它们。这些本能都有着生物上和心理上的根源，它们之所以存在那么多，是因为我们没有觉察到它们。人是一种食肉动物，在和平的年代里，他们的阴谋活动是在地下进行的，而且受到常规、习俗、法律和所有文化与文明标准的约束。但是一旦得到了政权，他们不仅抑制不住可怕的冲动，而且可以从中渔利。在那个戴了多少世纪的薄薄的文明的假面具后面露出一副残暴的嘴脸，一旦把这个假面具撕去，就突然发出那已被遗忘的时代里致人死命的咆哮。

用盖世太保方法表现的纳粹主义企图要实现的事和几乎成功在望的事，就是毁灭在几千年中形成的人类，这一点我们已对它有所认识。纳粹世界是一个充满暴力的王国，是一个等级森严的世界。在那里，温柔、善良、同情、尊重法律和尊重自由的思想统统不再是道德行为，而是不可弥补的罪过。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他只能卑躬屈膝地服从，听命去杀人，如果他不懂得去附和多数人的意见，那么他甚至就会默默地死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他以杀人为乐趣并把杀人犯视为英雄。这似乎象人们想要忘掉的恶梦一样，已经很遥远了，然而有毒的生面团会随时出现，人们没有理由忘记得这么快，绝对不能忘记。

可怕的冒险活动把德国变成一片废墟，遗留下来的是个支离破碎的、蒙受耻辱的德国，任何一个国家似乎都可以

侵占它。如果一个民族屈服于不停地进行宣传、恐怖、全面军事化、告密以及严密监视的政权；如果青年人牢牢记着纳粹的错误原则；如果一个民族不讲仁义道德，而且还要人们相信，这是经过挑选的民族——优生民族，那么结局肯定就是这样。哪一个民族过去反对过这样的政权？又有哪一个民族会在明天去反对这样的政权？

问题毕竟存在着，而且将永远存在下去。

可以引为警戒的德国实例已经消失了。纳粹的幸存者和那些思念家乡的人把死亡的种子抛向高空，让它们随风飘扬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如果人类缺乏记忆力，即使环境有利，但是时间概念混乱或者缺少防身符，那么血腥浪潮还会重新冲击过来。

在这种情况下，下一批的牺牲者会是谁呢？

缺 页

附 录

缺 页

德国中央保安局的内部结构

保安警察和保安队的头子①

I. 审讯长

- a) 审讯长 1 党卫队和警察审判权
- b) 审讯长 2 党卫队惩罚事项和工作中的违法行为

II. 专员小组

III. 德国中央保安局驻国际刑事警察委员会办事处

IV. 保安警察和保安队学校的总监

- 1. 柏林—夏洛滕堡保安警察干部学校
- 2. 菲斯滕贝格—梅克伦堡保安警察学校
- 3. 贝尔瑙保安队学校
- 4. 布拉格保安警察和保安队帝国学校

德国中央保安局从建立起就分为七个局

第一局：保安警察和保安队的人员、培训和组织

局长：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〇年七月②为贝斯特博士，到一九四三年初止为施特雷肯巴赫，到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止为舒尔兹，投降时为埃尔林格

第一组 A：人事

① 以下四个工作部门及各局、组、分队后面的说明，均分别指它们所管的职责范围。——译者

② 1940年起，贝斯特在巴黎的德国军政府里面身居要职。

1 分队：保安警察和保安队成员的一般人事事务

2 分队：秘密警察的档案

3 分队：刑事警察的档案

4 分队：情报处的档案

5 分队：纳粹党和党卫队档案

6 分队：社会救济

第一组B：继任者、教育和培训

1 分队：按照政治世界观和党卫队的标准进行教育

2 分队：继任者

3 分队：培训、进修和特殊训练

4 分队：体格锻炼和军训

5 分队：生平准则、考试局、基金管理、第一组B的一般事务、组员的事务和档案室

第二局：财政和经济

局长：至一九四〇年七月止为贝斯特博士，以后为内克曼、西格特、施帕西尔

第二组A：财政、薪金和核算

1 分队：保安警察的财政支出、外汇等

2 分队：保安警察的薪金、供养、车马费等

3 分队：德国中央保安局的军饷处和会计处，包括房管处在内

4 分队：保安处的财政开支、军饷和核算

第二组B：经济事务、俘虏事务、司法事务(同德国司法部的联系工作)等

1 分队：住宿、原材料、没收的财产等

2 分队：服装、业务需要等

3 分队：俘虏事务

4 分队：司法事务等

第二组C：技术方面的事务

1 分队：无线电、照相和电影事业、刑事技术方面的工具

2 分队：电报和电话

3 分队：车辆

4 分队：武器

5 分队：补给品

第三局：德国的生活区=国内保安处①，党的机构

局长：党卫队分队长奥托·奥仑道夫，任职期为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五年②

第三组A：法律制度和德国机构的问题

1 分队：生活区工作的一般问题

2 分队：法律生活

3 分队：宪法和管理，包括不属于第三组 A5 分队所管辖的所有立法事务

4 分队：一般的人民生活③

5 分队：一般的警察法律问题、警察的权限、警察的执法权、警察界的特别法和立法技术

第三组B：民族性

a) 讲课

b) 特殊问题和对事物的检查

1 分队：民族工作

2 分队：少数民族

3 分队：种族和民族的健康

4 分队：国籍和加入国籍

5 分队：被占区

第三组C：文化

a) 特殊问题，包括对事物的检查

1 分队：科学

① 当时还没有成立保安处 I (“考察和反对敌人”)，在成立德国中央保安局时，第三局就在盖世太保内部成立了。

② 奥仑道夫在东欧也领导着一支特别行动队(参见第五部第二章)。

③ 这个小分队按时汇报人民中间的一般情况。

2 分队：教育和宗教生活①

3 分队：民族文化和艺术

4 分队：报纸、文献著作、广播

第三组D：经济

a) 讲课，包括经济导报、杂志、商业法和劳动法

b) 殖民地的经济

c) 特殊问题和对事物的检查，在经济法、商业法和劳工法的所有立法事务中的工作

D—西方：被占领的西部地区

D—东方：被占领的东部地区

1 分队：粮食经济

2 分队：商业、手工业和交通

3 分队：财政经济、货币、银行和交易所、保险公司

4 分队：工业经济和能源经济

5 分队：劳工和社会事业

第四局：考察和反对敌人=盖世太保②，国家机构

局长：海因里希·缪勒，任职期为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

第四情报收集处(N)③

第四组A：敌人，破坏和保护

1 分队：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次要组织，战争中之不法行为，地下活动和敌对者的宣传

2 分队：防御破坏，与破坏作斗争，政治上进行欺诈

3 分队：反动派，反对党，正统主义，自由主义，只要不在第四组 A1 分队范围里的一些阴谋事情

4 分队：保护，行刺报告，监视，特别任务，追捕队

第四组B：政治教会、教派和犹太人

① 同教会作尖锐斗争时，这个小分队的人员被分配给了盖世太保。

② 该组织在政治领域掌握了执行权，直接保持了一千五百名特务。

③ 从 1941 年起开始工作。

1 分队：政治天主教

2 分队：政治新教、教派

3 分队：其他教会、共济会

4 分队：犹太人事务、撤退事务、没收敌视人民和敌视国家的那些人的财产，剥夺德国国籍①

第四组 C：人员的卡片索引、人事档案管理、保护性拘留、新闻界和党派

1 分队：鉴定、主要卡片索引、人事档案管理、询问处、对外国人进行监视

2 分队：保护性拘留事务

3 分队：报纸和文献著作的事务

4 分队：党及其支部的事务、特殊案例

第四组 D：大德意志帝国的势力范围

a) 外籍工人

1 分队：保护国对被保护国行使职权的事务、捷克、斯洛伐克、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南斯拉夫，希腊前王国的其他地区

2 分队：行政区事务、在德国的波兰

3 分队：机要处、敌视国家的外国人、流亡者

4 分队：被占区：法国、比利时、荷兰、挪威、丹麦②

5 分队：被占区的东部地区

第四组 E：谍报局

1 分队：谍报局的一般性事务，根据保密条例第五条，对叛逆和叛国的事情以及其他事情均需作出鉴定，谍报局专员

① 在阿道夫·艾克曼领导下的这个小分队奉命执行“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任务。

② 这个小分队的头头名叫卡尔·海涅·霍夫曼，他以前在杜塞尔道夫担任盖世太保的政治顾问，以后在荷兰担任保安警察的头子，之后还在丹麦担任过盖世太保的首席助理。他曾下达了关于消灭数千名押送犯的“夜雾命令”。

2分队：一般的经济事务，防御经济间谍，保护工厂和监督小工业，保护工厂和监督小工业法，政治警察专员

3分队：西部谍报局

4分队：北部谍报局

5分队：东部谍报局

6分队：南部谍报局

第四组F：护照和外国警察

1分队：边防警察

2分队：护照

3分队：身份证和证件

4分队：外国警察和边境上的原则事务

5分队：中央签证处

第五局：同犯法行为作斗争＝刑事警察

局长：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①为阿图尔·奈比，
一九四四年至希特勒政权崩溃为潘青格尔担任

第五组A：刑事政策和预防措施

1分队：法律问题，国际间的合作和刑事研究

2分队：预防措施

3分队：女刑事警察

4分队：向警察局申报和登记户口

第五组B：

1分队：应判处死刑的罪行

2分队：欺诈

3分队：伤风败俗的罪行

第五组C：追捕、警犬、提供情报

1分队：追捕中心

2分队：追捕手段

3分队：警犬、提供情报、刑警人员的档案

^① 奈比参加过7月20日的阴谋活动，失败后被绞死。他曾经在东部领导过一支特别行动队。

第五组D: 保安警察(盖世太保和刑事警察)的刑事技术所

1 分队: a) 痕迹确认

b) 人员确认

2 分队: 化学和生物-自然科学的研究

3 分队: 文件研究

W 分队: 技术工场

保安警察的刑事生物所

保安警察(盖世太保和刑事警察)的刑事医学中心研究所

第六局: 外国情报处=国外保安处①

局长: 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一年初为党卫队旅队长海因兹·约斯特; 一九四一年至希特勒政权崩溃这一段时期为瓦尔特·施伦堡

第六组A: 外国情报处的组织

五个分队

第六组 B: 西欧

三个分队: VI 131 法国

VI 132 西班牙和葡萄牙

VI 133 北非

第六组C: 俄国—日本势力范围

十三个分队②

特别分队Z③

第六组D: 英美势力范围

三个分队

第六组E: 中欧

六个分队

① 国外保安处同卡纳里斯领导下的军事“谍报局”发生竞争。第六局使许多外国公司为自己效劳并利用了数千名的特务。最有名的是由党卫队突击队大队长莫伊齐施在安卡拉领导的称为“锡塞罗”的埃利亚·巴茨纳这个特务。

② 其中第十三分队在阿拉伯国家。

③ 奉命在俄国进行破坏活动。

第六组F：用于在国外的外国情报处的技术辅助工具

六个分队

第六组G：科学方法的研究部门①

第六组S：

三个分队

经济分队：把经济打入安道尔(独立分队)

文化分队：把文化打入安道尔(独立分队)

奥托·斯科尔兹内领导一个特别队，它的任务是在物质上、道德上和政治上准备和进行破坏活动

第七局：世界观的研究和评价②

科学组织问题和听众的特别分队

第七组A：文字资料的登记(图书馆、报刊和问讯处)

1分队：图书馆

2分队：作报告，翻译服务处，报刊材料(报刊资料的收集)的分类和利用

3分队：问讯处

第七组B：利用

1分队：共济会

2分队：犹太人

3分队：政治教会

4分队：马克思主义

5分队：自由主义

6分队：其他的敌对组织(流亡者、分裂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反动派等)

第七组C：档案馆、博物馆和科学的特殊任务

1分队：档案馆

2分队：博物馆和展览会

3分队：科学的特殊任务

① 1942年成立。

② 一，二，三局纯粹是没有分支机构的中央局。

奥伯格—布斯凯的第二个条约

事由：德法警察在新占区实行合作

保安警察首脑和新占区的地方长官之间举行了一次会议，在会上，法国警察总书记布斯凯同意德法警察在新占区实行合作。因此，我公布下列方针：

1. 指示德法警察，他们的共同任务是，有效地维持好德国部队在新占区的作战范围内的秩序：用提供给他们的一切手段去维护德国部队的安全、德意志帝国的利益以及法国人民的和睦合作。同时要采取预防措施来击退共产党人、恐怖分子、特务、破坏者以及那些激进分子的进攻。在他们身后有：犹太人、布尔什维克和英美人。因此，他们将携起手来，紧密合作。法国警察将在这个范围内以自己的责任感与这些敌人作斗争，同时帮助党卫队首脑尽快得到有用的情报，并在各种场合下给予他们支持。德国警察部门将把他们所窃取到的、对采取警察措施具有重要性的情报通知法国警察部门。

2. 高级党卫队长和警察局长将在事先和尽快地把德国警察采取有关共同工作的所有措施通知给法国警察总书记。

3. 凡是符合德国部队安全所必要的共同的警察措施均由那里的法国当局负责发布和执行。

4. 保安警察和保安处当局与治安警察当局在执行所有警察任务时将同法国警察的地方长官和当局合作共事。

5. 只有在需要完成保卫德国部队安全的任务时，德国警察才可以采取自己的行动。

但是，原则上让法国警察执行任务，由于惯犯或者由于犯了政治罪而被法国警察逮捕的法国公民可提交给法国法庭并按法国法律判决。

除了这一条之外，任何人都将一视同仁，不管他是哪一国人，只要他暗害德国部队的成员，或者对德国军事设施进行破坏活动，或者在这方面有所准备或企图均被视为有罪的。在这种情况下，法国警察应将这些被捕者交出来。

在特殊情况下，高级党卫队长和警察局长同法国警察总书记之间可达成协议。被捕者由法国警察看守，但可以由熟悉警官案卷的德国警察进行审讯。

审讯可以在法国警察的一个代表出席的情况下，在法国的一个地点举行。

在这种情况下，要么由高级党卫队长和警察局长向法国警察总书记提出要求，要么由主管司令官向地方警官提出要求。

6. 双方一致认为，高级党卫队长和警察局长不会迫使法国警察当局提出人质的名字，同时，德国当局在采取报复措施时也绝对不会把由法国警察逮捕的人当作人质处理。

7. 高级党卫队长和警察局长确信单单一支装备精良和能干的警察和宪兵队伍就可以保证共同任务的完成。因此对法国的警察和宪兵来说，应加速改组，重新装备和重新武装。

他对法国警察总书记所呈递给他的计划将会友好地予以审查。

这些方针基本上是以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德法警察规定在前被占区的合作为基础的。由于承认法国政府在新占区的独立原则，因此，这些方针使法国警察在自己范围内行使主权成为可能。为此目的，对于特殊情况——如果需要的话——可通过同法国警察总书记的特别协议进行调整。

签字：奥伯格

分队长兼警察中将

致德国驻巴黎大使馆

人名索引

A

Abetz, Otto, 奥托·阿贝茨

Axmann, Arthur, 阿图尔·阿克斯曼

August Wilhelm v. Preußen
奥古斯特·威廉·冯·普鲁士

Auphan, 奥凡

B

Bach-Zelewski, Erich von dem,
埃里希·冯·巴赫-采列乌斯基

Ballestrem, Gräfin, geb. Solf,
巴勒施特莱姆伯爵夫人

Ballin, 巴林

Bauer, Fritz, 弗里茨·鲍尔

Bayle, Francois, 弗朗索瓦·贝勒

Bazna, Eliaya, (Cicero), 埃利亚·巴茨纳

Beck, Jozef, 约瑟夫·贝克

Beck, Ludwig, 路德维希·贝克

Beck, 贝克

Becker, 贝克尔

v. Behr, 冯·贝尔

Behrens, Hermann, 赫尔曼·贝伦斯

Bell, Georges, 乔治·贝尔

Benesch, Eduard, 爱德华·贝奈斯

Berchtold, Josef, 约瑟夫·伯希托尔德

Berger, Gottlob, 戈特洛勃·伯格

Bergery, 贝热里

Bernadotte, Graf Folke, 福尔克·伯纳多特伯爵

Best, Karl Werner, 卡尔·瓦
尔纳·贝斯特

v. Beulwitz, Veit-Ulrich, 魏特-乌尔里希·冯·博伊尔维茨

Bickler, 比克勒

- Bierkamp, 比尔坎普
 Birckel, 比尔克尔
 v. Bismarck, Otto, 奥托·冯·俾斯麦
 Blanke, 布兰克
 v. Blaskowitz, Johannes, 约翰内斯·勃拉斯科维兹
 v. Blomberg, Werner, 瓦尔纳·冯·勃洛姆堡
 Boatti, 博亚蒂
 Böhme, Jakob, 雅各布·伯梅
 Boehme, 伯梅
 v. Boemelburg, 冯·伯梅尔堡
 Bohle, Ernst, 恩斯特·博勒
 v. Boineburg-Langsfeld, 冯·博伊内堡-朗斯费尔德
 Boissel, 布瓦塞尔
 Bonnard, Abel, 阿贝尔·博纳尔
 Bony, 博尼
 Bormann, Martin, 马丁·鲍曼
 Bosch, Robert, 罗伯特·包许
 v. Bose, 冯·包斯
 Bousquet, Rene, 勒内·布斯凯
 Brack, Viktor, 维克托·布拉克
 Brandl, Hermann, 赫尔曼·布兰德尔
 Brandt, Karl, 卡尔·勃兰特
 v. Brauchitsch, Bernd, 贝尔恩德·冯·勃劳希契
 v. Brauchitsch, Walter, 瓦尔特·冯·勃劳希契
 Braun, Eva, 爱娃·勃劳恩
 Braun, Gretel, 格利特·勃劳恩
 Braun, Otto, 奥托·勃劳恩
 Braunfisch, 布劳恩菲施
 v. Braunschweig, (Erbherzog), 冯·不伦瑞克
 v. Bredow, Kurt, 库特·冯·勃莱多夫
 v. Brehmer, 冯·勃莱梅尔
 Breitscheid, Rudolf, 鲁道夫·布赖特沙伊特
 Bretagne, 布列塔尼
 Breuer, 布罗伊尔
 Bridoux, 布里多克斯
 Brill, Robert, 罗伯特·布里尔
 de Brinon, Fernand, 费尔南·德·布里昂
 Brossolette, Pierre, 皮尔·布罗佐莱
 Brückner, 勃鲁克纳
 Brüning, Heinrich, 海因里希·勃鲁宁
 Brünner, 布吕纳
 Bucard, M, M·布卡德
 Buchrucker, 布赫鲁克
 Bühler, Josephm, 约瑟夫·贝勒

Bünger, Wilhelm, 威廉·宾格
尔

Bürckel, Josef, 约瑟夫·贝克
尔

Bürckner, Gottlieb, 戈特利
布·比尔克纳

Buisson, 比松

Burckhard, Carl, 卡尔·布克
哈特

C

Canaris, Wilhelm, 威廉·卡纳
里斯

Cance, 坎策

Cerutti, Vittorio, 维托里奥·
切鲁蒂

Chack, Paul, 保尔·夏克

Chamberlain, Sir Neville, 尼
维尔·张伯伦爵士

Chamberlin, Henri, 亨利·张
伯伦

Chiaromonte, 希亚罗蒙特

v. Choltitz, Dietrich, 迪特里
希·冯·肖尔铁茨

Churchill, Sir Winston, 温
斯顿·丘吉尔爵士

Ciano, Galeazzo Graf, 加里
亚佐·齐亚诺伯爵

Clementi, 克里门蒂

Colette, Paul, 保尔·科勒特

Clop (alias Coppens), 克洛伯

Colman, George, 乔治·科尔曼
Copla, 科普拉

Compagnon, Jean, 让·孔帕尼
翁

Constantini, 康斯坦丁

Cracium, 克拉齐乌姆

de Crinis, 德·克里尼

Crips, Sir Stafford, 斯坦福·
克里普斯爵士

D

Daine, 苔纳

Daladier, Edouard, 爱德华·
达拉第

Daluege, Kurt, 库特·达吕格

Damelow, 达梅罗

Dannecker, Theo, 特奥·丹内
克尔

Darlan, Francois, 弗朗索瓦
兹·达尔朗

Darnand, 达尔南

Darquier, dex Pellepoix, Louis,
路易·达基埃·德·佩尔普瓦

Darre, Walter, 瓦尔特·达里

Dauboef, Henri, 亨利·道伯夫

Deat, 德阿特

Degan, 德甘

Delfane, Georges, 乔治·德尔
法纳

Deloncle, Eugene, 欧仁·德隆
克尔

- Dernbach,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德伦巴赫
- Deschaniaux, 德施安妮奥
- Deterding, Sir Henri, 亨利·德特丁爵士
- Detering, 德特林
- Diels, Rudolf, 鲁道夫·狄尔斯
- Dietrich, Sepp, 塞普·狄特里希
- Dimitorff, Georgij, 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
- v. Dirksen, Herbert 赫伯特·冯·狄克森
- Dodd, Thomas J, 托马斯·J·多德
- Dönitz, Karl, 卡尔·邓尼茨
- v. Dohnanyi, Hans, 汉斯·冯·杜那尼
- Dollfuß, Engelbert, 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
- Donovan, 多诺范
- Dressel, Fritz, 弗里茨·德雷泽尔
- Drexler, Anton, 安东·德莱克斯勒
- Duesterberg, Theodor, 西奥多·杜施特堡
- Doriot, 多里欧
- Durcansky, Ferdinand, 斐迪南·杜尔坎斯基
- Dutrieux, 杜特里奥伊
- E**
- v. Eberstein, Friedrich Karl Freiherr, 弗雷德里希·卡尔·冯·埃贝施泰因男爵
- Ebert, Friedrich (Vater), 弗雷德里希·埃伯特(父)
- Ebert, Friedrich (Sohn), 弗雷德里希·埃伯特(子)
- Ehrlinger, 埃尔林格
- Eichmann, Adolf, 阿道夫·艾克曼
- Eicke, Theodor, 西奥多·艾克
- Eigruber, Sepp, 塞普·艾格鲁贝尔
- Eisenhower, Dwight D, 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
- Elser, Georg, 格奥尔格·艾尔塞
- Eltz v. Rübenach, Paul Freiherr, 冯·艾尔茨-鲁本那赫男爵
- Ernst August v. Braunschweig-Lüneburg 恩斯特·奥古斯特·冯·不伦瑞克-吕纳堡
- Ernst, Karl, 卡尔·恩斯特
- Ernst, 恩斯特
- Erzberger, Matthias, 马修斯·埃尔兹伯格
- Esser, Hermann, 赫尔曼·埃塞

v. Eulenburg, Fürst Philipp,
 菲利普·冯·奥伊伦堡侯爵
Everling, 埃弗林

F

v. Falkenhausen, Alexander
 Freiherr, 亚历山大·冯·福肯
 豪森男爵

v. Falkenhausen, 冯·福肯豪
 森

Fegelein, Hermann, 赫尔曼·
 菲格莱因

v. Fey, Emil Ritter, 埃米尔·
 里特尔·冯·法伊

Fillatre, 菲雷特雷

Filliol, 菲利奥尔

Finck, Eberhard, 埃贝哈德·
 芬克

Fischer, Franz, 弗兰茨·费歇
 尔

Flavigny, 弗拉维尼

François-Poncet, André, 安德
 烈·弗朗索瓦-庞赛

Frank, Hans, 汉斯·弗朗克

Frank, Karl Hermann, 卡尔·
 赫尔曼·弗朗克

Freisler, Roland, 罗兰·法赖
 斯勒

Frey, Kurt, 库特·弗赖

v. Freytagh-Loringhoven, Wes-
 sel Freiherr, 威塞尔·冯·弗

 赖塔克-洛林霍芬男爵

Frick, Wilhelm, 威廉·弗立克

v. Frisch, 冯·弗立许

v. Fritsch, Werner, 瓦尔纳·
 冯·弗立契

Fromm, Friedrich, 弗雷德里
 希·弗洛姆

Funk, Walter, 瓦尔特·丰克

G

Gabcik, Josef, 约瑟夫·加拜克

Gabolde, 加博尔德

v. Galen, Clemens Graf, 克
 莱门斯·冯·加仑伯爵

Gallet, 加莱特

Gamlin, Maurice-Gustave, 莫
 里斯-古斯塔夫·甘末林

v. Gayl, Wilhelm Freiherr,
 威廉·冯·盖尔男爵

Gebhardt, Karl, 卡尔·格哈特

Gehrt, 格尔特

Geißler, 盖斯勒

v. Gersdorff, 冯·格斯道夫

Georges, Pierre, 皮埃尔·乔治

Giraud, Henri-Honore, 亨利-
 霍诺雷·季劳德

Gisevius, Hans Bernd, 汉斯·
 伯恩德·吉斯维乌斯

v. Glaise-Horstenau, Edmund,
 埃德蒙·冯·格拉斯-霍尔斯特
 瑙

- Glaser, 格拉泽尔
v. Gleichen, Heinrich Freiherr, 海因里希·格莱兴男爵
Goebbels, Joseph, 约瑟夫·戈培尔
Goebbels, Magda, 玛格达·戈培尔
Goerdeler, Carl Friedrich, 卡尔·弗里德里希·戈台勒
Göring, Edda, 埃达·戈林
Göring, Emmy, 埃米·戈林
Göring, Heinrich, 海因里希·戈林
Göring, Herbert, 赫伯特·戈林
Göring, Hermann, 赫尔曼·戈林
Göring, Karin, geb. v. Fock, 卡林·戈林(娘家姓福克)
Gorak, 戈拉克
Gottberg, 戈特贝格
Gräbe, Hermann Friedrich, 赫尔曼·弗里德里希·格拉伯
Graf, Ulrich, 乌里希·格拉夫
Graf, Willi, 维利·格拉夫
Granger, geb. Giraud, 格朗瑞
Grauert, Ludwig, 路德维希·格劳尔特
Grimme, 格里梅
Gröber, 格罗贝尔
Großmann, 格罗斯曼
Gruhn, Eva, 埃娃·格鲁恩
Guderian, Heinz, 海因兹·古德里安
Guehenno, Jean, 让·盖埃诺
Günther, Christian, 克里斯蒂安·京特
Guerard, 盖尔拉达
Guerber, Andre, 安德烈·居尔贝
Guett, 居德
Gürtner, Franz, 弗朗兹·古特纳
- H**
- Hacha, Emil, 艾米尔·哈查
Hagen, 哈根
Halder, Franz, 弗朗兹·哈尔德
Hallervorden, 哈勒福尔登
v. Hammerstein-Equord, Kurt, 库特·冯·哈麦施坦因-埃克沃德
v. Hanneken, 冯·汉内克
Hansen, Georg, 格奥尔格·汉森
Hanussen, 豪森
v. Hase, Paul, 保尔·哈斯
v. Hassell, Ulrich, 乌里希·冯·哈塞尔
Hauser, Paul, 保尔·豪泽尔
Hausmann, Leonhard, 莱昂哈

德·豪斯曼
Hays, Arthur, 阿尔蒂尔·埃斯
Heckenast, 海肯阿斯特
Heilmann, Ernst, 恩斯特·海
尔曼
Heines, Edmund, 埃德蒙·海
因斯
Heinkel, Ernst Heinrich, 恩
斯特·海因里希·亨克尔
Heinrich der Löwe, 狮子亨利
Heinrich I, der Vogler, 亨利
一世(捕鸟者)
Heiss, 海斯
Helldorff, Graf Wolf-Hein-
rich, 沃尔夫-海因里希·赫
尔道夫伯爵
Helmer, 黑尔默
Henlein, Konrad, 康拉德·汉
莱因
Heß, Rudolf, 鲁道夫·赫斯
Hewitt, 海维达
Heydrich, Bruno, 布鲁诺·海
德里希
Heydrich, Reinhard, 莱因哈
德·海德里希
Hilaire, Georges, 乔治·伊莱
尔
Hilferding, Rudolf, 鲁道夫·
希尔费丁
Himmler, Gudrun, 古德隆·希

姆莱
Himmler, Heinrich, 海因里
希·希姆莱
Himmler, Marga, geb. Conze-
rowa, 马尔加·希姆莱
v. Hindenburg, Oskar, 奥斯
卡·冯·兴登堡
v. Hindenburg, Paul, 保尔·
冯·兴登堡
Hinkler, Paul, 保尔·欣克勒
Hinrichs, 欣里希斯
Hirt, August, 奥古斯特·希尔
特
Hitler, Adolf, 阿道夫·希特勒
Höler, Aly, 赫勒
Högl, 赫格尔
Höß, Rudolf, 鲁道夫·赫斯
Höttl, Wilhelm, 威廉·霍特尔
v. Hofacker, Cäsar, 凯撒·冯·
霍法克
Hoffmann, Karl Heinz, 卡
尔·海因兹·霍夫曼
Hohenzollern, (Familie), 霍
亨佐伦王室
v. Hohenzollern-Sigmaringen
(Prinz) 冯·霍亨佐伦王室-
西格马林根(亲王)
Hohlbaum, 霍尔鲍姆
Holzlöhner, 霍尔兹洛纳
Holzweber, 霍尔兹韦贝尔

Hoßbach,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霍斯巴赫

Huber, Kurt, 库特·休伯

Huber, 休伯

Hubert, 休伯特

Hüber, 许贝尔

Hugenberg, Alfred, 阿尔弗雷德·休根堡

Huhm, Fritz, 弗里茨·胡姆

Hunglinger, 洪格林格

I

Illers, Peter, 彼得·伊勒斯

J

Jackson, Robert, H, 罗伯特·H·杰克逊

Jannekeyn, 扬凯恩

Jardel, 雅尔德尔

Jorisch, 约利许

Jeschonnek, Hans, 汉斯·耶舒恩纳克

Jodl, Alfred, 阿尔弗雷德·约德尔

Jost, Heinz, 海因兹·约斯特

Jüngst, 荣斯特

Jüttner, Max, 马克斯·于特纳

Jung, Edgar, 埃德加·荣格

Jung, Rudolf, 鲁道夫·荣格

K

v. Kahr, Gustav Ritter, 古斯塔夫·里特·冯·卡尔

Kalckreuth, Eberhard Graf, 埃贝哈德·卡尔克卢斯伯爵

Kaltenbrunner, Ernst, 恩斯特·卡尔登勃鲁纳

Kaltenbrunner, Hugo, 胡戈·卡尔登勃鲁纳

Karpfenstein, 卡尔芬斯坦因

Karwahne, Berthold, 贝特霍尔德·卡尔瓦纳

Karwinsky, 卡尔温斯基

Keitel, Wilhelm, 威廉·凯特尔

Keller, 凯勒

Kempka, Erich, 埃里希·肯普卡

Keppler, Wilhelm, 威廉·凯普勒

Kesselring, Alfred, 阿尔弗雷德·凯塞林

v. Ketteler, Wilhelm Freiherr, 威廉·冯·凯特勒男爵

Kieffer, 基费尔

Klagges, Dietrich, 狄特里希·克拉格斯

Klausener, Erich, 埃里希·克劳斯纳

v. Kleist-Schmenzin, Ewald, 埃瓦尔德·冯·克莱施特

Klitzsch, Johann Ulrich, 约翰·乌里希·克林茨赫

- v. Kluge, Günther, 古恩特·冯·克鲁格
- Knipping, 克尼平
- Knochen, Helmuth, 赫尔穆斯·克诺亨
- Knochen, Karl, 卡尔·克诺亨
- Koch, 科赫
- Köhler, 克勒
- König, 柯尼希
- Königshaus, Franz, 弗兰茨·柯尼希豪斯
- Kogon, Eugen, 欧根·科贡
- Koller, Karl, 卡尔·科勒
- Kopkow, 科普科夫
- Koppenhofen, 科彭霍芬
- Kordt, Theodor, 西奥多·科尔特
- Kramer, Josef, 约瑟夫·克拉默
- Krancke, 克朗克
- Krüger,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克吕格尔
- Krug v. Nidda, 克鲁格·冯·尼达
- Krupp v. Bohlern u. Halbach, Gustav, 古斯塔夫·克虏伯·冯·波伦-哈尔巴赫
- Kruse, 克鲁泽
- Kube, Wilhelm, 威廉·库贝
- Kubis, Jan, 扬·库比斯
- Küchenthal, Werner, 瓦尔纳·格兴泰尔
- v. Küchler, Georg, 格奥尔格·冯·库希勒
- ### L
- Lämmermann, Karl, 卡尔·雷默尔曼
- v. Lahousen, Erwin, 埃尔温·冯·拉豪森
- Lammers, Hans Heinrich, 汉斯·海因里希·拉麦斯
- Lateit, 拉泰特
- Laube, Horst, 霍尔斯特·劳贝
- Laval, Pierre, 皮埃尔·赖伐尔
- v. Leeb, Wilhelm, 威廉·冯·李勃
- Leipart, 莱巴特
- Lemberger, 伦贝格尔
- Lemoine, 雷蒙纳
- Lepczynsky, 列伯钦斯基
- Ley, Robert, 罗伯特·莱伊
- Lindermann, Fritz, 弗里茨·林德曼
- v. Linstow, Hans Otfried, 汉斯·奥特弗里德·冯·林斯托夫
- Lippe-Biesterfeld 利普-比斯特费尔德
- Lippert, Michael, 迈克尔·利伯特
- v. Loeb, 冯·勒贝

- Lorenz, 洛伦兹
 Lorenz, Werner, 维尔纳·洛伦茨
 v. Lossow, Otto, 奥托·冯·洛索夫
 Lousteau, 罗斯多
 van der Lubbe, Marinus, 马里努斯·范·德·卢勃
 Lucius, 吕希
 Ludendorff, Erich, 埃里希·鲁登道夫
 Ludwig II, König v. Bayern, 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三世
 Lundberg, Karl A, 卡尔·隆德堡
 Luther, 路德
 Lutz, 卢茨
 Lutze, Viktor, 维克多·卢策
- M**
- Mach, Sano, 扎诺·马赫
 Maier, Reinhold, 莱因霍尔达·迈尔
 Malreaux, Andre, 安德烈·马尔罗
 Malreaux, Clara, 克拉腊·马尔罗
 Mann, Thomas, 托马斯·曼
 v. Manstein, Fritz, Erich, 弗里茨·埃里希·冯·曼施坦因
 Marion, Paul, 保尔·马里昂
- Martin, Frederic, 弗雷德里克·马丹
 Martunek, 马图内克
 Maulaz, 莫拉克斯
 Maurice, Emil, 艾米尔·莫里斯
 Max v. Baden, 巴登的马克斯亲王
 v. Mecklenburg-Schweirin, (Erbgroßherzog), 冯·梅克伦堡-施维林(大公爵)
 Medicus, (Franz A?) 梅迪库斯(弗朗兹 A)
 Mehlhorn, 梅尔霍恩
 Meisinger, 迈辛格尔
 Meißner, Otto, 奥托·梅斯纳
 Menetrel, 梅内特雷尔
 Mesny, 梅斯尼
 Messerschmidt, Willy, 维利·麦塞施米特
 Messersmith, George S, 乔治·S·梅塞史密斯
 Michel, 米歇尔
 Miklas, Wilhelm, 威廉·米克拉斯
 Milch, Erhard, 埃哈德·米尔契
 Mitford, Unity Walkrie, 乌尼蒂·瓦尔克里·米特福德
 Model, Walther, 瓦尔特·莫德尔

v. Moltke, Cuno, 库诺·冯·毛奇
Montandon, Georges, 乔治·蒙坦东
Montgomery, Sir Bernard, 伯纳德·蒙哥马利爵士
Morgen, Konrad, 康拉德·莫根
de Moro-Giafferie, 德·莫罗-贾费里
Mortemard de Boisse, Rene, 勒内·莫特马尔·德·布瓦斯
Moulin, Jean, 让·穆兰
Moyzisch, 默尹齐施
Müller, Heinrich, 海因里希·缪勒
Münzenberger, Willi, 维利·明茨贝格
Muhler, 穆勒尔
Murphy, 莫尔费
Mussolini, Benito, 本尼托·墨索里尼
Musy, Jean-Marie, 让-玛丽·穆西

N

Naujocks, Alfred Manfred, 阿尔弗雷德·曼弗雷德·瑙约克斯
Naumann, Werner, 瓦内纳·瑙曼
Nebe, Artur, 阿图尔·奈比
Nefzger, Sebastian, 塞巴斯蒂

恩·内夫茨格
Nelte, Otto, 奥托·内尔特
de Neree, Caroline, 卡罗琳·德·内莱
Neubronn, 诺伊布罗
v. Neurath, Konstantin Freiherr, 康斯坦丁·冯·牛赖特男爵
Nockemann, 内克曼
Nordling, Raoul, 拉奥尔·诺德林
Nosek, Roland, 罗兰德·诺塞克
Noske, Gustav, 古斯塔夫·诺斯克

O

Oberfohren, Ernst, 恩斯特·奥伯弗伦
Ober, Frieda, 弗里达·奥伯格
Ober, Karl, 卡尔·奥伯格
Ober, Karl Albrecht, 卡尔·阿尔布雷希特·奥伯格
Odewald, 奥德瓦尔德
Ohlendorf, Otto, 奥托·奥仑道夫
Olbricht, Friedrich, 弗雷德里希·奥尔布里希特
Oskar v. Preußen, 普鲁士的奥斯卡亲王
Oster, Hans, 汉斯·奥斯特

P

Pacholegg, Anton, 安东·帕霍勒格
Pannwitz, 潘维茨
Panzinger, 潘青格尔
v. Papen, Franz, 弗朗兹·冯·巴本
Payne, 佩恩
Pelkmann, Horst, 霍斯特·佩尔克曼
Perdonnet, Paul, 保罗·佩多纳
Perkins, 佩尔金斯
Petain, Philippe, 菲利普·贝当
v. Pfeffer, Franz, 弗朗兹·冯·普菲费尔
Pilsudsky, Jozef, 约瑟夫·毕苏斯基
Pöschl, Robert, 罗伯特·珀舍尔
Pohl, Oswald, 奥斯瓦德·波尔
Poirier, Albert, 艾伯特·普瓦里埃
Pokorny, Adolf, 阿道夫·波科尔尼
Poppoff, Blagoj, 布拉戈伊·波波夫
Prawill, 普拉维尔
Pritt, Denis Nowel, 德尼·诺

韦尔·普里特

Probst, Adalbert, 阿达尔贝·普勒布斯特
Probst, Christoph, 克里斯托夫·普罗布斯特
Pucheu, P, P·皮舍
Pütz, 皮茨

R

Raeder, Erich, 埃里希·雷德尔
Rahn, Rudolf, 鲁道夫·拉恩
Rall, 拉尔
Ramshorn, 拉姆斯霍恩
Rascher, Hans August, 汉斯·奥古斯特·拉舍尔
Rascher, Nini, geb. Diehls, 尼尼·拉舍尔
Rascher, Siegmund, 西格蒙德·拉舍尔
Rattenhuber, 腊登休伯
Rauff, 劳夫
Rauschnig, Hermann, 赫尔曼·劳希宁
Reckzeh, 雷克策
Redesdales, (Lord) 雷德斯代尔(勋爵)
Regler, Gustav, 古斯塔夫·雷格勒
v. Reichenau, Walter, 瓦尔特·冯·莱希瑙
Reichert, 赖歇特

- Reile, 赖莱
 Rein, 赖恩
 Reinecke, Hermann, 赫尔曼·莱因纳克
 Reineking, 赖内金
 Reinhard, 赖因哈特
 Reinhardt, 赖因哈德
 Reinhardt,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赖因哈德
 Reinthaler, 赖因塔勒
 Rendulic, Lothar, 洛塔尔·雷杜利克
 v. Reurmont, 冯·罗伊蒙
 v. Ribbentrop, Joachim, 约希姆·冯·里宾特洛甫
 v. Richthofen, Manfred, Freiherr, 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男爵
 Rieckenbach, 里肯巴赫
 Rieth, 里特
 Rochat, 罗哈德
 Röhm, Ernst, 恩斯特·罗姆
 Röpke, Wilhelm, 威廉·勒普克
 Rommel, Erwin, 埃尔温·隆美尔
 Ronge, 龙格
 Rosenberg, Alfred, 阿尔弗雷德·罗森堡
 Rostock, Max, 马克斯·罗斯托克
 托克
 v. Rothschild, 冯·罗茨彻尔德
 Rudenko, R. A. 鲁登科
 Rudolph, 鲁道夫
 v. Rundstedt, Gert, 格德·冯·伦斯德
- S**
- de Saint-Phalle, Comte Alexandre, 科姆特·亚历山大·德·圣帕莱
 Samestrang, 扎梅斯施特兰
 Sander, 赞德尔
 Sauckel, Fritz, 弗里茨·绍克尔
 Sauerbruch, Ferdinand, 斐迪南·沙尔勃鲁赫
 Scapini, Georges, 乔治·斯卡皮尼
 Schacht, Hjalmar, 希尔马·沙赫特
 Schäfer, 舍费尔
 Schämmel, 夏梅尔
 Scharpwinkel, 沙尔佩温克尔
 Schaub, Julius, 尤利乌斯·夏勃
 Schenk v. Stauffenberg, Claus Graf, 克劳斯·申克·冯·施道芬堡伯爵
 Scheer, John, 约翰·谢尔

- Scheer, 谢尔
- Scheidemann, Philipp, 菲利普·谢德曼
- Schellenberg, Walter, 瓦尔特·施伦堡
- Scheppmann, 舍普曼
- v. Schirach, Baldur, 巴尔杜·冯·席腊赫
- v. Schlabrendorff, Fabian, 费边·冯·施拉勃伦道夫
- Schleffer, 施莱法
- v. Schleicher, Elisabeth, geb. v. Hennnigs, 伊丽莎白·冯·施莱彻尔
- v. Schleicher, Kurt, 库特·施莱彻尔
- Schloss, Louis, 路易·施洛斯
- Schmidt, Hans, 汉斯·施密特
- Schmidt, Hans Walter ("Fräulein"), 汉斯·瓦尔特·施密特("小姐")
- Schmidt, Louis, 路易·施密特
- Schmidt, Wilhelm, 威廉·施密特
- Schmidt, Willi, 维利·施密特
- Schmidt (alias Dr. Petersen), 施密特(化名佩特森博士)
- Schmitt, 施密特
- Schmitz, 施米茨
- Schmorell, Alexander, 亚历山大·施莫莱尔
- Schmundt, Rudolf, 鲁道夫·施蒙特
- Schneidhuber, August, 奥古斯特·施奈德休勃
- Scholl, Hans und Sophie, 汉斯和莎菲·舒尔
- Schotte, Walter, 瓦尔特·朔特
- Schragmüller, 施拉格米勒
- Schreck, Jilius, 尤利乌斯·施雷克
- v. Schröder, Kurt Baron, 库特·冯·施罗德男爵
- v. Schuschnigg, Kurt, 库特·冯·许士尼格
- Schüsselmann, Kurt, 库特·许塞尔曼
- v. d. Schulenburg, Friedrich Dietlof Graf, 弗雷德里希·迪特罗夫·冯·舒伦堡伯爵
- v. d. Schulenburg Friedrich 弗雷德里希·冯·舒伦堡
- Schulz, 舒尔兹
- Schulz, 舒尔兹
- Schweinichen, 施韦尼兴
- v. Schwerin-Krosigk, Joh. Ludwig Graf, 约翰·路德维希·冯·施维林-克罗西克伯爵
- Scordia, 斯科迪亚
- Scranowitz, 斯克兰诺维茨

- v. Seeckt, Hans, 汉斯·冯·西
克特
- Seldte, Franz, 弗朗兹·赛尔
特
- Severing, Carl, 卡尔·泽韦林
- Seydel, 赛德尔
- Seyß-Inquart, Arthur, 阿图尔·
赛斯-英夸特
- Shuster, 舒斯特尔
- Siegert, 西格特
- v. Siemens, Carl-Friedrich,
卡尔-弗雷德里希·冯·西门子
- Sievers, Wolfram, 沃尔弗莱
姆·西韦斯
- Simon, Josef, 约瑟夫·西蒙
- Singer, 辛格
- Six, 西克斯
- Skorzeny, Otto, 奥托·斯科尔
兹内
- Solf, Hanna, 安娜·索尔夫
- Solf, Wilhelm, 威廉·索尔夫
- Sommer, Hans, 汉斯·佐默尔
- Sorge, Richard, 里夏德·佐尔
格斯
- Sowa, 索瓦
- Spacil, Josef, 约瑟夫·施帕西
尔
- Speidel, Hans, 汉斯·斯派达尔
- Spreti, Hans, Erwin, Graf, 汉
斯·埃尔温·施普雷蒂伯爵
- Stahlecker, Franz, 弗朗兹·施
塔勒克
- Steiner, Rudolf, 鲁道夫·施泰
纳
- Stempfle, Bernhard, Pater, 伯
恩哈德·施丹佛尔神父
- Stevens, 史蒂文斯
- Stindt, 施廷特
- Stirmann, Franz, 弗兰茨·施
蒂曼
- Storch, Hillel, 希勒·施托希
- Strauss, Alfred, 阿尔弗雷德·
施特劳斯
- Strasser, Gregor, 格利戈尔·施
特拉塞
- Strasser, Otto, 奥托·施特拉塞
- Streckenbach, Bruno, 布鲁诺·
施特雷肯巴赫
- Streibel, 施特赖贝尔
- Streicher, Julius, 尤利乌斯·
施特莱彻
- Stresemann, Gustav, 古斯塔
夫·施特莱斯曼
- v. Stülpnagel, Heinrich, 海
因里希·冯·施图尔纳格尔
- v. Stülpnagel, Otto, 奥托·冯·
施图尔纳格尔
- v. Stutnitz, 冯·施图特尼茨
- Suhr, 祖尔
- Suvich, Fulvio, 富尔维奥·苏

维希

T

Taittinger, 泰丁格尔
Taneff, Wassil, 华西尔·泰涅夫
Terboven, Josephm, 约瑟夫·特博文
Thälmann, Ernst, 恩斯特·台尔曼
Thomas, 托马斯
Thorez, Louis, 路易·多列士
Thyssen, Fritz, 弗里茨·蒂森
Tiso, Josef, 约瑟夫·提索
Torgler, Ernst, 恩斯特·托格勒
Torres, Henry, 亨利·托雷
Trapp, 特拉普
v. Tresckow, Henning, 海宁·冯·特莱斯科夫
Truman, Harry S, 哈里·杜罗门
v. Tschammer-Osten, Hans Freiherr, 汉斯·冯·恰默尔-奥斯滕男爵

V

Vauthier, 伏蒂埃
Vallat, Xavier, 格扎维埃·瓦拉
Vermeulen, 弗莫伊伦
Vögler, Albert, 阿尔贝特·伏

格勒

Voß, 伏斯

W

Wagner, Eduard, 爱德华·瓦格纳
Wagner, Frieda, 弗里达·瓦格纳
Walde, 瓦尔德
v. Waldeck-Pyrmont, Josias Erbprinz, 约西亚斯·冯·瓦尔台克-皮尔蒙亲王
Wanck, 汪克
Weber, Christian, 克里斯蒂安·韦伯
Weltz, 韦尔茨
Wenck, Walter, 瓦尔特·温克
Werner, 瓦尔纳
Wessel, Horst, 霍尔斯特·威塞尔
Westrick, 韦斯特里克
Weygand, Maxome, 马克西姆·魏刚
Wilhelm II, 威廉二世
v. Windsor, Edward, Herzog, 爱德华·冯·温沙公爵
Wirth, Christian, 克里斯蒂安·维尔特
Wissell, Rudolf, 鲁道夫·维塞尔
v. Witzleben, Erwin, 埃尔温·

冯·维茨勒本	Wrede, (Fürst), 符雷德 (王公)
Woche, 沃海	
Wolf, Hans-Helmuth, 汉斯-赫尔穆特·沃尔夫	Wuest, 魏斯特
Wolff, Karl, 卡尔·沃尔夫	Z
Wouters, Francois, 弗朗索瓦兹·沃特尔斯	Zehner, 策纳
	Zeitschel, 蔡特舍尔
	Zwabel, 茨瓦贝尔



书号: 1118835
定价: 1